

古镜今鉴

修身卷

# 领导干部读 群书治要

刘余莉  
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第三十六讲 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 001

道也者，不可须臾离 / 002

保合大和，乃利贞 / 008

向天地万物学习 / 012

利而不害，为而不争 / 014

第三十七讲 为政之道，修身为本 / 017

好学近乎智 / 018

力行近乎仁 / 024

知耻近乎勇 / 026

第三十八讲 仁信和道，帝王之器 / 028

为天下福 / 029

上下相亲 / 030

民不求而得所欲 / 032

除天下之害 / 033

**第三十九讲 为政天下 / 035**

大盖天下 / 036

信盖天下 / 037

仁盖天下 / 040

恩盖天下 / 041

权盖天下 / 042

事而不疑 / 042

**第四十讲 君子之务，以行前言 / 044**

人须有志 / 045

孔子之忧 / 046

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 / 052

**第四十一讲 君子以自强不息 / 055**

至诚无息 / 056

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 / 058

**第四十二讲 君子以厚德载物 / 065**

君子有宽厚的德行 / 066

君子不在乎富贵 / 071

**第四十三讲 敦孝悌以重人伦 / 073**

教育的本义 / 074

不孝之人，习以成性 / 076

第四十四讲 弃老取幼，家之不祥 / 082

做人要懂得人情事理 / 083

教儿教女先教自己 / 089

第四十五讲 善事父母 / 093

大孝不匮 / 094

立身行道 / 099

长守富贵之道 / 100

第四十六讲 孝无终始 / 103

非法不言，非道不行 / 104

忠顺不失，以事其上 / 107

谨身节用，以养父母 / 111

第四十七讲 事亲有道 / 114

居则致其敬 / 115

养则致其乐 / 119

病则致其忧 / 122

丧则致其哀 / 123

祭则致其严 / 123

第四十八讲 孝心一开，百善皆开 / 125

德有伤，貽亲羞 / 126

行孝并非一味顺从 / 129

不辱其身，不羞其亲 / 131

爱其亲，敬其亲 / 132

#### 第四十九讲 行仁思义 / 135

弘毅行仁，见利思义 / 136

恕者仁之术，正者义之要 / 140

克己复礼为仁 / 143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 145

夫妇有别，夫义妇德 / 147

#### 第五十讲 诚信为人 / 149

诚者，天之道也 / 15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 / 155

君子重信 / 156

微言而笃行 / 160

#### 第五十一讲 无信不立 / 162

以信为先 / 163

上行下效以立信 / 167

得贤贵诚 / 171

#### 第五十二讲 正己化人，成人达己 / 174

为君者正，何物不正 / 175

其身正，不令而行 / 182

君子为政，以正己为先 / 186

上之所好恶，不可不慎 / 187

第五十三讲 有诸己，而后求诸人 / 190

教，上所施，下所效 / 191

将有三礼 / 196

君子有三恕 / 198

正己而不求人 / 200

第五十四讲 率道而行，端然正己 / 202

与人无争，于世无求 / 203

荣辱之责，在乎己 / 211

言有物，行有恒 / 214

第五十五讲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 / 217

顺从道义，公正无私 / 218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 229

观德于忍，观福于量 / 230

不计前嫌，以德报怨 / 233

第五十六讲 惟德动天，无远弗届 / 235

谦尊而光，卑不可逾 / 236

满招损，谦受益 / 243

劳谦君子，万民服也 / 246

德日新，万邦惟怀 / 247

德不谦者失天下 / 248

**第五十七讲 谦恭处下，慎终如始 / 250**

若升高，必自下 / 251

海纳百川，谦冲自牧 / 257

虚其心志，恭其容貌 / 260

骄不与罪期而罪自至 / 262

使骄且吝，余不足观 / 263

**第五十八讲 审时度势，明哲保身 / 265**

亢龙有悔 / 266

功成名遂身退 / 268

**第五十九讲 德比于上则知耻 / 269**

从善如登，从恶如崩 / 270

毋不敬，俨若思，安定辞 / 272

在上不骄，制节谨度 / 279

**第六十讲 道也者，不可须臾离 / 281**

自强不息，忠信待人 / 282

格物致知，慎独修道 / 287

慎守行之四仪 / 292

**第六十一讲 君子不重则不威 / 294**

言必有防，行必有检 / 295

多言多败，多事多患 / 298

君子慎密而不出 / 304

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 / 306

## 第六十二讲 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 310

益者三乐，损者三乐 / 311

俭以养德，仁以待人 / 317

以道交者，天荒地老 / 319

亲附善友，时时有润 / 321

益者三友，损者三友 / 323

## 第六十三讲 爱日以学，及时以行 / 326

学致广才，宽忍致仁 / 327

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 330

好学的标准 / 332

贵尚学道，贱下独思 / 335

见贤思齐，亲师择友 / 336

## 第六十四讲 学贵有恒，积善成德 / 341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 342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 / 344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 / 346



## 第三十六讲

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 道也者，不可须臾离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

——《群书治要》卷七《礼记》

什么是“天命”？在郑玄对《中庸》的批注中他这样解释：“谓天所命，生人者也，是谓性命。”这个“性命”就是我们所说的“天命”，“天命”就是“性”。这个“性”有什么特点？古人对它有很多描述。譬如“人之初，性本善”，这个“善”不是“善恶”的“善”，而是对“性”的圆满无缺的赞美，古人把它称为纯净纯善，也就是说人的本性都是纯净纯善的。人们经常用一些词语来描述本性，说它具有真诚、清静、平等、无为、真常等特点。用王阳明的话来讲，就是“自然灵昭不昧者也”。它是自然的，不是有所作为，不是故意表现，而是“灵昭不昧”。王阳明在《大学问》中，对本性的特点、作用进行了进一步描述：“是其一体之仁也，虽小人之心，亦必有之。是乃根于天命之性，而自然灵昭不昧者也。”也就是说，找回了自己本性的人，他所表现出来的就是慈悲，表现出来的就是有“一体之仁”。

什么是“一体之仁”？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能够有同体的慈悲，能够把我和众生、我和万物都看成是一体的，密不可分，不分彼此。所以庄

子说：“天地与我同根，而万物与我为一。”这都是找到了自己本性的人所说出来的言语。既然我和他人、我和万物都是一体的关系，当众生受到苦难的时候，我去无私无求地给以帮助，也是天经地义的事，不需要讲什么条件。

我们大多数人，看到别人有苦难，可能也会去帮助，但是不会像帮助自己一样、像自己的身体受苦一样去帮助别人，因为没有这种同体的感受，可能就是尽一点儿力、出一点儿钱就算了。但是真正地认识到我和众生、万物都是一体的人，他对于众生的苦难，就如同是自己在受苦一样。他有一种同体的感受，所以他去帮助众生是非常尽心尽力的。

现实中，人们对于和自己有关系的人，譬如说父母、兄弟姐妹、朋友，他会有帮助、关爱和同情的心。当这些人遇到苦难时，好像也能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和他们有着同样感受的痛苦。但是当看到别人或者是陌生人遇到苦难的时候，就生不起这种同情心、怜悯心、救助的心，这就是没有同体的感受。

对于这种同体的感受，王阳明说：“虽小人之心，亦必有之。”即使是小人，也有这种天然的本性，也有这种同体的慈悲心。这一点我们从小孩的身上特别容易观察得到。譬如说，在幼儿园经常会看到这样一个情景，有两个小朋友在玩，一个小朋友追赶另一个小朋友，结果前面的小朋友不小心跌倒了，后边的小朋友看到之后，就“哇哇”地哭起来。这是因为这个孩子的本性还没有受到污染，天性还没有被蒙蔽，他看到前面的小朋友跌倒的时候，那一种苦痛他能够感同身受，就像发生在自己身上一样，所以他很自然地就哭了起来。

但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被利欲所蒙蔽，这种天然的同情心、一体的感受就愈来愈少了。实际上，这种天命之性只是被蒙蔽了，并没有丧失，是“在圣不增、在凡不减”。这种天命之性，我和众生、君子和小人都同样具有。这个天命就是这里所讲的性，“天命之谓性”。

“率性之谓道”，这个“率”，是顺着、循着的意思。顺着本性去做就是道。怎样顺着本性去做？我们既然明了人与万物都是一体的关系，所以在待人接物、为人处世的时候，就要把这种态度体现在我们的行为之中，就要表现这种一体之仁。这样的人就不会与人家发生冲突，更不会有竞争。

所以中国的传统文化，从小就教导人要礼让、退让、谦让。为什么？因为古圣先贤了解人的本性，知道事实真相是我和众生是一体的。所以这个教育顺着人的本性去施教，就是“修道之谓教”。

教育的目的就是使人从习性返回到本性，我们按照道来修治自己的心术，修正自己错误的想法、做法和看法，才能够和本性相应，所以中国人的观念和西方人的观念有很多不同，譬如说仁爱的观念。中国人讲“仁者无敌”。“仁者无敌”并不是说有仁爱之心的人打遍天下无敌手；真正的仁者是体会到了人的天命之性，人的本性是纯净纯善的，和众生是一体的，所以他不会和任何人对立，也不会和任何人有对立的念头。

这个“仁者无敌”也不是说有仁德心的人就没有人诽谤他、批评他、嘲笑他，而是他自己在遇到别人的诽谤、嘲笑、攻击时，仍然是以一片慈悲之心来对待，在他自己的内心深处，不和任何人起对立。在他的一生中，没有自己不能原谅的人，没有自己恨的人，没有自己不爱的人。

中国还有一个成语叫“化敌为友”，为什么能够化敌为友？真正能够化敌为友的人，也一定是有仁爱之心的人。在《二十四孝》中就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位于二十四孝之首的舜就是其中之一。他的后母和弟弟三番五次地要置他于死地，但是他并没有怀恨在心，而是常常反省自己哪里做得不够，为什么没有能够得到后母的欢心，让后母满意。他总是想方设法帮助他的后母和弟弟。后来，他的德行终于感化了他的后母，感化了他的弟弟，也感化了天下的百姓。所以舜被列为二十四孝之首，这反映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理念——“仁者无敌”。

《二十四孝》之中，还有一个和舜相类似的故事，那就是闵子骞。闵子骞的亲生母亲过世了，他的父亲为他找了一个后母，后母又生了两个孩子。但是后母非常偏心，在寒冬腊月的时候，她给自己的亲生儿子穿的是用非常暖和的棉絮做的棉衣，但是给闵子骞穿的却是芦花做的衣服。这种衣服看起来很厚，实际上并不保暖。

有一次闵子骞和父亲一起出门。闵子骞赶马车，因为冻得瑟瑟发抖，结果没有把马车驾好。他的父亲就非常生气，盛怒之下，一鞭子就抽在了闵子骞的身上，结果把棉衣抽破了，里边的芦花都跑了出来。这时候，父亲才知道，原来这个儿子身上所穿的衣服，不是保暖的棉衣，而是芦花做的衣服。他一生气，回家之后就要把闵子骞的后母休掉。

这时，闵子骞并没有这样想，“你看，终于给我报仇了，出气的机会来了”，反而是跪在地上为他的后母求情，劝父亲把后母留下来，并且说了一句话：“母在一子单，母去三子寒。”结果，他的德行感化了他的后母，从此以后，一家人过上了和睦而幸福的生活。

可见，“人之初，性本善”。虽然有些人的心性被蒙蔽了很久，污染得很严重，但是只要有机缘受到圣贤教诲，把他的良心给激发出来，人会被教育好的，也可以化解怨仇。

在《论语》中也记载着这样一句话，孔子说：“君子无所争”，即君子没有要和别人竞争的地方。“必也，射乎”，如果一定要说有和人竞争的场合，那一定是在比赛射箭的时候。“揖让而升，下而饮”，两个人互相鞠躬，互相敬礼，然后才走上堂去比赛射箭。“下而饮”，下了堂之后，赢了的人要给输了的人敬酒，并且还很谦虚地说“承让承让”。

其实这并不是虚伪的谦虚，而是发自内心地表示这只是偶然把对方赢了。为什么？因为在高手之间的比赛，偶然因素很多。我偶尔一次把对方赢了，确实也有运气的成分在其中；而输了的人，接受了敬酒之后，不是嫉妒、埋怨胜过自己的人，而是“反求诸己而已矣”，马上反

过来反省自己的技艺学得不精，所以我今天才败在了人家手下。那么一个人有嫉妒心是什么原因？一个人有嫉妒心的根本原因还是不自信。如果一个人有自信的话，他自己有所长，也不担心别人会有能力、有技术。因此，人要在根本上努力，提升自己的德行、水平、能力，而不是去嫉妒别人。

这样的礼节使得胜者没有傲慢之心，反而更加谦虚、谨慎；输者也没有嫉妒、怨恨之心，而是想着去提升技艺，争取下次获得好的成绩。所以孔子最后说：“其争也君子”，即使他们竞争，在比赛射箭，也是不失君子之风，他们没有因为竞争和人产生对立。其实这句话也可以理解为，他们争的是什么呢？他们是争做君子。

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国古人从小所学的，就是建立在仁爱思想上的、处处为人着想的处事态度。怎样才能解决自己和他人之间的利益冲突，既能够维护自己的利益，又不损害对方的利益？这样两全其美的办法，只有具有仁爱之心的人才能够发现。

这种仁爱之心运用在化解冲突、促进世界和平上，也非常有效果。所以我们的教育，就是要修正错误的心态，错误的想法、做法。譬如说“损人利己”这个观念，好像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就必须去损害别人的利益。事实上，损人绝对不会利益到自己。恰恰相反，《孔子家语》告诉我们：“夫损人而自益，身之不祥也。”想通过损害别人的方法来利益自己，反而给自身招致了不吉祥，甚至招致灾难，所以要修治自己的心态和思想。但按但照什么来修正呢？答案就是按照人的天性来修正。符合天性的，我们可以这样去想，不符合天性的，就不能够这样去想，不能够这样去做。这就是“率性之谓道”。

“修道之谓教”，教育的过程就是要使人从习性回归本性的过程。人的习性很多，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七情六欲。在《中庸》中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喜、怒、哀、惧、爱、恶、欲，被称为七情，这些情

绪还没有发出来的那个状态，被称为“中”的状态。这个状态就是人的本性的状态。本性是清净无染的，所以“喜怒哀乐之未发”，这就被称为“性”。那什么是“和”呢？喜、怒、哀、惧、爱、恶、欲等情绪都发出来了，但是没有过度，都符合一定的节度，符合礼的要求，这个状态就被称为“和”的状态。

“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对于一般人而言，要达到“中”的状态很难，因为体会不到这种清净无染的状态，体会不到“喜怒哀乐之未发”的状态到底是什么样的。所以中国古人教我们“退而求其次”，求“和”的状态，那就是喜、怒、哀、乐、爱、恶、欲这些情绪都发出来了，但是都不过分，都能够符合礼的节度，做到“欲而不贪”。这就是有子所说的“礼之用，和为贵”，礼的作用就是达到“和”。

在古人那里也有很多关于这方面的论述。对什么事情可以喜欢，喜欢到什么程度，也都有一定的要求。人事物都可以去喜欢，也可以去享受，但是不要贪婪，不要去控制，要达到一种比较适度的、有节制的状态，这个状态就叫“发而皆中节，谓之和”。

《尚书》中说：“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这个“荒”就是荒淫无度、太过分的意思。对内兴起迷恋女色之风，对外喜欢游猎，没有节制。还喜欢饮酒，甚至酗酒，沉溺于靡靡之音。住的房屋又高又大，极尽奢侈之事。墙上还雕刻着花纹，雕梁画栋，这些都太过分了。以上有一种情况出现，就没有不灭亡的。这就提醒我们，什么事情都要有节度。古人知道人的欲望一旦被引发出来，连自己都控制不了，所以他才设置了礼，来节度人不合适的欲望和行为。这个也说明，我们中国古人“防患于未然”的智慧。

《大学》中也说：“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当我们心里喜欢这个、讨厌那个的时候，已经失去了“心之正”，

即心已经不正了。为什么？因为“天命之谓性”，而天性、本性具有平等的特点，这就要求我们对人要一视同仁、平等对待，结果才会和睦相处。平等对待是因，和睦相处是果。如果我们看到这个就喜欢、看到那个就厌恶，看到这个就满意、看到那个就不满意，心就已经不得其正了。“身有所忿懣，则不得其正”，一个人在愤怒之下，说出来的话一定是过分的，甚至很伤人，这个时候心也失去了它本来的中正。《大学》《中庸》的目的都是让人从习性回归到本性，按照道来修养自己，最后使自己体悟、找回天命之性。

“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道”犹如道路。人的行为方式，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不能够离开“道”。如果须臾之间离开它，都会招致不幸，甚至灾难，所以这个“道”是不可须臾离开的。如果能够须臾离开这就不是道了。这也是说明，天命之性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只是人没有去体会它的存在。如果人的心太杂染、太浮躁，就体会不到天命之性。

## 保合大和，乃利贞

保合大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

——《群书治要》卷一《周易》

“保合大和”，“保”，保持；“合”，合于、合乎；“大和”，指宇宙自然原初、本来的和谐状态。

古人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宇宙万物的运行规律是恒常不变的，不会因尧、舜或桀、纣这样的君王而改变。孔子也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天不用语言讲道理，但从四季的自然变化之中，从万物的自然生长之中，人们可以观察到那种自然而

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人们从四季的变化中，观察到了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规律；从万物的自然生长中，观察到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因果事实。这些规律不是人为规定的，而是自然而然的。“大和”就是指宇宙原初的、本来的和谐。

故宫有三个大殿，分别为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第一个殿叫太和殿，太和就是指宇宙原初的和谐。譬如人一出生，外有四肢，内有五脏六腑，整个机体自然地和谐运转，使人身体健康。第二个殿叫中和殿。人如何顺着“太和”的秩序来治国？如何保持太和之气、太和之道？就是要懂得用“中”。“中”是不偏不邪，古人讲中正，如果心有偏私则不和。

明朝的郑廉，七代同堂，上千口人共同生活，和睦相处。明太祖朱元璋想知道郑廉是用何种方法把这样一个大家庭管理得井井有条、和谐和睦的。于是他赐给郑廉两个大水梨，并且派锦衣卫前往观察他如何处理这两只水梨。郑廉拿到水梨后，不慌不忙，命人抬来两个大水缸，吩咐把水梨挤碎，将梨汁滴在两个水缸里，再召集全家族的人，让每人喝一碗梨水，让全家族的人，无论与自己关系远近，都能平等地享受到皇帝的恩赐，这就叫“中”。中正才能和谐。

如果心有偏私，和自己关系近就得到水梨，和自己关系远就不被理睬。那么受宠的一方会恃宠而骄，易生骄慢之心。而被忽略的一方，如果性格强势，就会生不平之心，从而累积起怨气，怨气累积会导致怨恨，矛盾冲突就产生了；如果性格懦弱，可能会抚下不平之心，但会变得自卑。因此，无论是受宠的一方，还是被忽略的一方，都没能健康地成长，一家人也不可能和睦相处。所以古人非常懂得讲究中正，只有保持“中”，才符合太和之气、太和之道。

第三个大殿叫保和殿，也是明清两代皇帝封太子的地方。他们希望用中正的方法，顺应太和的治国理念能够代代相传、代代保持。这说明古人治国很用心，即使是大殿的名字也要符合天道，起到伦理道德教化的作

用，使人看见就受到提醒。

现代社会却恰恰相反，商业广告随处可见，人们看重物质利益，金钱至上，和古人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有些人见利忘义、忘恩负义，甚至做出“笑贫不笑娼”的事情。因为人们重视金钱，就会为追求利益而不择手段。如果人们重视道德，大家会向往成为有德行的人，一个人即使再有钱，假如没有道德，也不会被尊重。

“保合大和”，就是要保持这种和谐自然的关系。“乃利贞”，“利”指和谐有利；“贞”是正的意思，而且这个“正”是永远纯正。也就是说，只有顺着和谐自然的关系去做，才能使万物祥和。这种利益是真正的利益，是可以保存的利益，而非眼前的蝇头小利，甚至对长远是有害的利益。在《论语·子路》篇，孔子提醒：“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孟子·梁惠王上》记载，孟子不远千里去见梁惠王，梁惠王见面却问：“叟不远千里而来，将怎样利于我的国家？”梁惠王问孟子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得到利益。孟子很有智慧，他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大王何必谈利益，愈想得到利益就愈得不到真实的利益；如果不讲利益而讲仁义，真正的利益才能得到。古圣先贤所讲的利，不是指眼前不能长久保持、急功近利的利，而是能够平治天下的大利益。要想达到这种大利必须靠仁义道德。顺着宇宙自然和谐的状态，并且保持这种状态，才能得到真实长远的利益，这种利益没有后遗症，叫作“利贞”。

“首出庶物，万国咸宁。”“首”指首领、首脑，或是国君、君王。领导者要成为天下人的榜样，就必须依道而行，按太和之道来治理国家，做到“言为世则，行为世范”，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社会大众的表率，这样才能给天下带来太平。君主依照规律治国，万国，也就是天下的国家都会关注他，并向他学习。一个国家能够依道治国，就能让大家生起效仿

学习之心，最终就能平治天下。

现在特别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是因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讲的都是道，如果依道而行，就能把国家治理好。唐太宗李世民用《群书治要》治国，使得万国来朝，开创了“贞观之治”。外国的使者来向中国学习，要通过多重翻译才能与太宗皇帝交流，由此可知当时来中国学习的国家之多。

历史上曾经出现“成康盛世”“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等。“成康盛世”的几十年里，监狱没有死刑犯。中国历史上出现这些盛世，说明要把天下治理好，是有方法和道理的。我们重要的是要学习其中的方法和道理来治理今天的国家。如果体悟不到圣人的境界，将精华的东西，作为糟粕剔除，那么“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虽具有抽象的意义但在事实层面却会以自己的知见、自己的水平去取舍。正如“夏虫不可语于冰”，用“以己度圣”的心态对待传统文化就像一个二层楼的人眺望二十层楼的人，不仅无法企及圣人的思维高度，反而会将至为精华的东西作为糟粕抛弃了，这是非常遗憾的。

“道德”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道”是自然而然的规律，是前面所讲的“大和”。“德”就是按照自然规律去做。首先，古人观察宇宙天地之道，将维系人伦关系的人伦大道总结为五个方面，即孟子所言“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处理好这五种伦理关系，社会自然和谐有序。其次，还有“仁、义、礼、智、信”构成的“五常”。“常”，指恒常不变的规律和道理，适用于古代、现代以及未来。最后，还有所谓的“八德”，“八德”有两种说法，“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或“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去除重复的说法便留下了“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十二个字，“五伦”“五常”“八德”是古人治理国家的常理、常法。

如果抛弃以上治理国家的常理、常法，就会出现左丘明说的“人弃

常则妖兴”的怪异现象。譬如“父子有亲”表现为父母慈爱儿女，儿女孝敬父母；如果出现子杀父、父告子的不正常现象，就属于妖兴的范畴。所以君主治国必须顺着太和之道，才能够给天下带来太平。

汤恩比在研究了各个国家的文明史之后提出，能够真正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的，只有中国的孔孟儒学和大乘佛法。孔孟儒学的基本内涵是仁义忠恕，大乘佛法的核心精神是真诚、慈悲，都符合太和之道。因此，21世纪之所以是中国的世纪，并非仅仅指政治、军事、武力方面，而且还指中国的文化方面。中国文化的普遍宣扬，不仅对世界不构成威胁，而且能给世界带来真正的和谐。

## 向天地万物学习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群书治要》卷三十四《老子》

这句话表达了人应当效法大地，安静柔和、无私无怨地承载养育万物而不居功；大地效法上天，包容万物，普施而不求回报；上天效法道的精神，清静无为，万物自成，道性自然而然等意韵。这说明了圣哲先贤非常谦卑善学，他们不仅向身边的人学习，而且向天地万物学习。

“人法地”，“法”是效法的意思。《群书治要》中批注言“地，安静和柔”，说明只有安静的大地才能承载万物。如果地震了，人无论是在房屋里，还是在房屋外面，都会惊慌失措、无所适从，所以大地不安静的话，人就惶恐不安。批注又言地“劳而不怨”，说明大地即使很辛劳，也不会产生抱怨，更不会产生索求。这突出了大地如母爱般无私无求。批注还言地“有功而不宣”，说明大地虽成就万物的生长，但从居功自傲。不宣功的大地像母亲一样安静、温柔，默默促进孩子的健康成长，成就家

庭的和谐兴盛。有的人就把夫妻关系比作儿女健康成长的大地，如果这个大地不平稳了，经常地震，孩子的感受就像在地震的时候惶惶不安。

所以坤德内涵，源于并类比大地之德。古人言“母教为天下太平之源，闺闾乃圣贤所出之地”，良好的母教是天下太平的根源。孩子从一出生，他所面对的就是父母和儿女之间的关系，他从父母的身上学会了如何待人接物。母亲如果具备如大地般“安静和柔、劳而不怨、有功而不宣”的特点，孩子便耳濡目染，远离抱怨、对立和索求。因此，他总是想着付出、成就别人。这样的孩子长大之后心理非常健康，性格非常开朗，而且能够与人为善，不去和人争，怎么会和人出现对立、纷争和冲突？“闺闾乃圣贤所出之地”，圣贤的培养离不开贤惠的母亲，目前的社会之所以很难有圣贤，如孔子、孟子这样的圣人，或许就是因为现在已经没有像孟母这样的“圣母”了。

古人“男女有别”，蕴含了深刻的智慧，男性承担符合自身自然属性的责任，主动地外出创业，挣钱供养家庭。女性实现符合自身自然属性的本分，自觉地相夫教子、维护家庭。只有男女互相配合，各尽其责，才能够经营好家庭。古人提出“三从四德”，“从”不是服从，而是成就，中国古代女性无私地成就丈夫和家庭，甚至放弃了自己的名，甘愿成为“某某氏”，真正实现了坤德所提倡的“有功而不宣”。同时，古人还强调“夫有义，妇有德”，并非单向化地要求女性付出，也对男性提出了恩义、道义、情义的要求。

男性效法天道自强不息的精神，女性遵循大地厚德载物的特质。所以男子一般都是承担着创造家庭经济收入的责任，他要去赚钱养家糊口，让家人衣食无忧。女子承担的责任比男子更为重要，因为她要把儿女教育好，相夫教子，培养出后继的人才。所以女子不仅不能受到轻视，而且应该非常受尊重。因此，现代社会应充分认识到相夫教子的重要性，实现坤德的创造性转化。

中国古人的智慧，确实是要用心去体会才能够领悟。

“地法天”，意味着地的博爱厚施源于天“施而不求报”的精神。天能“生长万物”而“无所收取”，所谓“天无私覆，地无私载”，都传达了大公无私的理念。“天法道”，说明在天之上存在“道”，即宇宙万有的本体。天地万物都是由道生化而来，天的精神源于道。道的批注指明：“清静不言，万物自成。”万法由道所生，但是它本身清静无言。

“道法自然”，即“法尔如是”。道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本无名，其无所不在、无所不包。

## 利而不害，为而不争

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

——《群书治要》卷三十四《老子》

圣人无私而不积藏，有德则教愚，有财则济人，尽其所有帮助别人，自己反而更充足。因此，天道是全然利益而不侵害万物；圣人之道是遵循自然法则，帮助世人而毫不争夺。

“圣人不积”。学习圣贤之道的目的就是要成为圣人。圣人就是把自己的明德和本善找回来的人。人皆可以为尧舜，人皆可以成圣贤，说明每一个人都有明德，都有本善，学的目的就是要恢复人之初的性本善。这就是孟子所说的：“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圣人不积”，因为本来就没有，积什么？“本来无一物”。如果一个人特别重视钱财，被钱财迷惑，“利令智昏”，在利益面前就昏头昏脑了，智慧也就没有了。还有贪色、贪情，情令智迷，如果一个人放不下性欲，

在情欲面前也就迷惑颠倒，明德就找不回来了。圣人是明心见性的人，是恢复了本善、明德的人，所以能够把财色名利等全都放下，放下才能够成圣成贤，找回自己的明德。

这里批注上说，“圣人积德不积财，有德以教愚，有财以与贫”。圣人的特点是积累德行，而不是积累财富。圣人明白这个道理，虽然不积财，财也不缺乏。一个人之所以在财富上能够得到彻底的自由，就是因为他对财彻底看破了，对它没有任何贪恋，而且愈是拿钱去帮助别人，财富愈不缺乏，愈施愈多。

“有德以教愚”，自己有德行、自己有智慧也不能够吝惜，要去教导别人，让别人也开启智慧，这就是法布施得聪明智慧。因为人每一次在给别人讲解的时候，就是在给自己讲，自己也愈来愈明朗，智慧愈来愈开显。这叫“圣人不积”。

“既以为人，己愈有。”“既”是尽、全部的意思。如果尽其所能地帮助别人，自己反而更加充足。批注言：“既以财贿布施与人，财益多。如日月之光，无有尽时。”正如法布施得聪明智慧，财布施得财富。施行法布施的仁者在布施的过程中得到更多的智慧，而施行财布施的仁者在布施的过程中得到了更多的财富。

“天之道，利而不害”，天之道，利益而不侵害万物。批注言：“天生万物，爱育之令长大，无所害也。”上天有好生之德，都是生养万物，希望万物能够自然而然地成长。为政者治国理政要效法天道的仁慈好生之德。如古人治国，倡导“礼主刑辅”，重视教化人心而不是重视用刑罚来惩罚人。即使设置刑罚，目的也是“刑期于无刑”，最终是让人不再犯罪、不必用刑，不是想去惩罚他，而是给人警戒。古人重视伦理道德的教育，其实也是因为效仿了天地好生之德来治理国家。

“圣人之道，为而不争。”指圣人效法天道无私与好生之德。“为”指代尽心尽力地去造福万民，“不争”强调不邀功、不争名，甚至是做到了

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圣人只是一心把这件事情促成，使之成就，造福人民，并不是为了让大家认可，使自己的名声得以显扬。老子倡导功成、名遂、身退。因为如果不隐退，往往可能会招致嫉妒障碍。

## 第三十七讲

为政之道，修身为本



好学近于智，力行近于仁，知耻近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能成天下国家矣。

——《群书治要》卷十《孔子家语》

## 好学近于智

“好学近于智”，突出了好学的重要性。《礼记·学记》言：“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孔子也曾感慨：“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孔子整天没有吃饭，一晚上没有睡觉，在那冥思苦想，但是没有利益，“不如学也”。学什么？学习的内容就是古圣先贤之道，倡导大家读圣贤书，向圣人学习，可以让自己的人生少走很多弯路，避免很多错误。所以“好学”的内容是指圣贤之道，而非知识、技能。而智慧是每个人本性固有的，通过学习把智慧开发出来，才能实现“近于智”。

好学首先要向老师学习，所以必须有尊师的态度。不尊师，则没有办法体悟到大道，也没有办法开发自性，也就是《大学》中所说的“明明德”。《礼记·学记》上言：“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因此，好学首在尊师，“学”在《说文解字》中的解释是：“学，觉也，效也。后觉习效先觉之所为也。”“学”就是觉悟、效法

的意思，是后觉悟的人效法先觉悟的人的行谊，效法他的心行。老师是先觉悟的人，弟子是后觉悟的人，弟子拜师的目的就是求觉悟。向老师学，是学习老师获得找到回归本性的方法。为了保证尊师重道的落实，古人设置了礼节。譬如，弟子到私塾读书，需由家长带领向至圣先师孔子像行最重礼，即三跪九叩首之礼。然后请老师上座，家长再带着学生向老师行三跪九叩首之礼，以示尊重。我们想一想，一个孩子看到自己的家长，自己最尊敬的人，对老师行如此之重的礼，他对老师的态度会是什么样的？他对老师一定会生起敬重之心，对老师讲的话就不敢不遵从，所以尊师才能够重道。而受了叩拜大礼的老师，生怕自己的德行不够、学问不够，没有尽到责任，辜负了学生家长对自己的期望，所以一定要尽己所能，认真负责地把学生教好。时刻警醒自己不负家长的重托，自然尽己所能、认真负责地教导学生。而当前的学校教育存在的问题，有些正是由于家长自身的傲慢以及对孩子溺爱，致使教育缺失了尊师重道的基本理念造成的。评价、投诉、网络等学生及家长的诸多维权途径使教师搁置了教书育人的重任，取而代之的是无为、讨好及避责。但是现在很多家长不明白这一点。学生在学校被老师说得稍微重了一点，回去就告诉家长，家长就不乐意，就去找校长，校长再去找老师。最后的结果就是，这个孩子在学校犯了错误，老师也不愿意给他指正过来，一味地在家长面前夸赞他，因为不想找麻烦了。因此，古代的拜师礼，无论是对学生还是对老师，都起到了教化的作用，对当今而言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礼记·曲礼》言：“男子二十，冠而字。”自此，除了父母之外的所有亲朋好友都要称其字，表示对其尊重，皇帝也不例外。但其师可以一生称其名，说明师恩与父母之恩同等重要，父母赐予身命，老师赐予慧命，后者甚至重于前者。

此外，皇帝也身体力行地遵守重师之道。在接见群臣的时候，皇帝面南背北，以君臣之礼来接见。但在接见老师的时候，皇帝必须以主宾之

礼来接见，不能够以君臣之礼来接见。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古代开明皇帝知道如何身教胜于言教，上行而下效。大家看皇帝都对老师如此地敬重，整个社会才会兴起尊师重道的风气。

而且在历史上，凡是开明的皇帝都能率先垂范尊师重道的传统。譬如汉明帝，汉明帝还是太子的时候，曾向桓荣学习《尚书》，直到他做皇帝之后，仍然以学生身份自居，并以师生之礼与之相见。甚至为桓荣设几杖，召集百官及桓荣的其他弟子，一起向其施弟子礼，而且汉明帝还亲自带头向老师请教，听受老师讲学。

而每当老师身体不适的时候，汉明帝不仅派使者慰问，那些专门负责皇帝膳食的官员和御医，也都络绎不绝地去服侍桓荣。明帝自己也经常到老师家询问病情，一进入老师居住的巷子就下车步行，手捧着经书走到老师的床前，轻抚老师垂泪哭泣。他还送给老师一些床具、衣服等，为的是让老师更加舒适地休养。他每次去见老师，都久久不忍离去。在他的带领之下，文武百官再来探病，都要到桓荣床前下拜。桓荣去世之后，汉明帝亲自改换丧服送葬，把老师安葬在尊贵的位置。古时的开明帝王充分发挥了榜样的力量，整个社会兴起尊师重道的风气。

清朝虽是满族入主中原，但是前期能够把中国治理好，并且创下了康乾盛世，正是因为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对儒释道的经典都非常通达，而且特别聘请儒释道的大德、老师到宫廷讲经。

而到了清朝末期，慈禧太后垂帘听政，与经典的道理相违背。为了掩饰自己的过失，慈禧把宫廷讲经的传统废弃了。结果自私自利之心生起来了，大家不再像以前受到儒释道的教育，一心为公，有忠君爱民的思想。没有了儒释道的教育，人的自私自利观念就生起来了，结果这个国家就愈来愈衰弱。

向老师学习，不仅仅是从书本上学习，听老师讲经说法，更重要的是从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中去学习，从老师的为人处世、待人接物中去学

习，去体会老师的存心。

《说苑》中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公明宣学于曾子，三年不读书。曾子曰：“宣，而居参之门，三年不学，何也？”他说，你既然到我门下求学了，但是三年都没有学习、没有读书，为什么？公明宣曰：“安敢不学？”我怎么敢不认真学习？我既然来到您的门下，就是为求学而来。但是他是怎么学的？下面这几句话就很有味道了。

“宣见夫子居宫庭，亲在，叱咤之声未尝至于犬马，宣说之，学而未能。”看您平时居家的时候，只要有父母在，对于狗马都不大声地叫骂，这一点我非常钦佩，但是没有能够学到。“宣见夫子之应宾客，恭俭而不懈惰，宣说之，学而未能。”看您在接待宾客的时候，恭敬、节俭，没有懈惰的情绪，没有应付的态度，我非常钦佩，想学但是没有学好。“宣见夫子之居朝廷，严临下而不毁伤，宣说之，学而未能。”看您在朝廷办事的时候，对于下属非常严格，对他们的态度非常庄重，但是从来不伤害他们，对于这一点我也很钦佩，但是想学也没有学到。“宣说此三者学而未能，宣安敢不学而居夫子之门乎？”

曾子避席谢之曰：“参不及宣，其学而已。”曾子从公明宣的这番话中非常受教，领悟到学不仅仅是学圣贤之书，更重要的是从生活中，从老师待人处事接物中的点点滴滴来学习，去体会老师的存心、老师的志向，这才是善学。

再譬如，孔子有一颗专心求学的心、好学的心及真诚之心，能达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效果。孔子向师襄子学习弹琴，学了一首乐曲，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师襄子对孔子说：“我虽然是以击磬做的乐官，但是我还是擅长于弹琴。如今，你已经学会了这首琴曲，可以进一步学点别的了。”孔子听了，并不急于学其他，他回答：“我还没有学会弹奏技巧。”孔子又用心投入，练习了一段时间之后，很快就掌握了弹琴的技巧。师襄子又对孔子说：“你现在已经学会技巧了，可以学点别的了。”孔子回答：

“可我还没有了解曲子表达的意趣。”孔子继续专心练习了一段时间，了解了曲子的意趣。这个时候，师襄子又对孔子说：“你已经了解了它的意趣，现在可以进一步学点别的了。”但是孔子依然想继续深入，回答说：“我还不晓得这首曲子歌颂的是谁。”

于是孔子专心一致，每天弹奏这首曲子，用心地领会这首曲子歌颂的人物。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孔子若有所思，高高地站在一个地方，向着远方眺望说：“我已经知道这首曲子歌颂的是谁了。这个人长得有点黑，身材修长，有着广阔的胸襟，长远的目光，他眼光辽阔，囊括四方。若不是周文王，谁能如此！”

师襄子听了之后，十分惊讶，立刻离开坐席来到孔子的面前，两手交叉于胸前，恭敬地说：“君子，真是无所不通的圣人，这首曲子的名字就是《文王操》。”

孔子学习，锲而不舍，而且用心专一，学得非常深入。不仅学了弹琴的技巧，还要学它的意趣；掌握了它的意趣，还要知道这首曲子歌颂的是谁。纵然他的老师告诉他已经学得可以了，可以学点别的了，但是对于孔子而言，这还不是真正的学会。他这种真诚、恭敬的态度确实让他的老师师襄子深受感动。所以学习确实要用心专一，深入其中，才能够体会其中更深的含义，体会到它的意趣，体会到它的心智，这样才能够得到学习的乐趣。

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成为乐之者就能实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的状态。

当我们抱着这种学习的态度、学习的精神去求学的时候，还有什么东西是学不会、学不懂、学不通的？然而学习不是一蹴而就的，在开始求学的时候，需要付出辛苦和努力，只要有锲而不舍的精神，终会达到这样的境界。

《中庸》言：“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

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

说明学东西要学会、要学通、要学深入，没有学会就决不放弃。学习的要领是熟能生巧，一门深入，持之以恒。这个东西你已经熟透了，就像家常便饭一样，你就能够圆融贯通。可长讲、可短讲、可深讲、可浅讲，这就是得到了学习的乐趣。学习，别人学一遍就学会了，那我要学一百遍，再笨我也能够学会了。别人学十遍学会了，我学一千遍，我再笨也能够学会。真正能够做到这一点，虽然是愚钝的人，也能够变得明智；虽然是柔弱的人，也能变得强大。学习要有锲而不舍的坚强意志，不断地重复、不断地练习，最终都能够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

古人除了向老师学习，还要向同学学习，向众人学习。孔子说：“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遇到贤德的人，要向他学习、向他看齐，取长补短，而不是嫉妒他，心怀不悦；遇到不贤德的人，不能嘲笑他、轻视他、瞧不起他，而是反省自己，自己是不是有类似的问题，但是没有认识到。这个人出现在我的面前是有原因的，为什么出现在我面前？因为我有和他类似的问题，他的出现是来提醒我，给我当镜子的，让我来认清自己的问题，改正自己的缺点。所以我们所遇到的一切人、一切事，都是可以学习的对象，这才叫善学。

当然，不仅要向同学学，向众人学，还要向万物学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我们要学习天地的平等博爱之心，让我们以一种平等博爱的心去对待人事物。

古人向竹子学习。看到竹子，就想到自己要虚心、谦虚。竹子还有气节，一节一节地向上生长，告诉我们，做人也要有气节。竹子都是向上长的，而且是一片一片地生长。这告诉我们，学习要选择善友相依，好的朋友在一起切磋琢磨，互相促进、互相补益、互相纠正、互相提醒。

善学除了要尊师以外，还要立志，“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现在的一些年轻人，缺失责任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没有大志。

当下，学习被赋予了更重要的使命，即“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所以我们要立志把圣贤之道传承下去，这就是志存高远。

## 力行近于仁

“力行近于仁。”学习圣贤教诲和学习知识并不一样，不能满足于会背、会写、会说，而要用心领会圣贤的存心，把这些道理运用于生活之中，运用于为人处世、待人接物之中，只有这样才能对圣贤教诲生起坚定的信心。

“力行近于仁”，“仁”从人、从二，是两个人相处之道。力行圣贤教诲才能够体会到对方的想法、对方的需要，体会到众生的苦，仁爱之心才能真正生起。中国人经常说“一体之仁”，表明我和众生、我和万物是一体的。那么众生有苦难，我们去帮助，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一体之仁”，说明要从内心消除和任何人、任何事的对立之心，真正做到没有我恨的人，没有我不能原谅的人，没有我不爱的人，这才与本性相应。因为圣贤人告诉我们，我们和万物是一体的。既然是一体的，当我们和别人产生对立的时候，产生冲突和矛盾的时候，内心一定不会如常安稳，因为冲突违背了人的本性。所以如果真正地、从内心去化解了和任何人的对立冲突的念头就会体会到一种喜悦。“人之初，性本善”，说明人人都是天性本善的，但是因为后天的环境，没有机缘接受良好的熏陶，才把本性本善蒙蔽了、迷失了，而教育的目的就是让我们找回本性本善。

孔子说：“不教而杀谓之虐。”没有事先教导他做人的道理，他就不懂得五伦五常、四维八德，不知道做人的本分在哪里，一旦做出了很多悖德、悖理的事，甚至违法乱纪，直接不明就里地对其进行惩罚就是虐政的

表现。

《礼记》上说：“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古代的一些领导者，都存仁爱之心，效法天地之道来制定各种政策。天道有好生之德，好生而恶杀。所以遵循天道制定的政策，不仅顺应人心，而且能够转恶为善。

《论语讲要》批注中写道，古代的民众大致分为四个类型，就是士、农、工、商。农、工、商都是生产者与营利者；唯有士，是读书人，既不生产也不营利，而是全心全力地学道。道有体有用，用就是行仁，以行仁为己任。而士大夫、读书人，要尽力学道、讲道、传道。对于士，《论语》中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曾子也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一个读书人不可以不弘毅，这个“弘”就是心胸宽宏、意志坚定；“毅”就是有毅力，意志很坚强。因为他的责任很重大，路途很遥远，他以仁为己任，这个任务不是太重大了吗？这个任务直到去世才结束，这个路途不是也太遥远了吗？

士有通达的时候，也有穷困的时候。通达的时候，也就是为国家重用的时候，他要用仁道来治国平天下，就是“进则兼济天下”；穷困的时候，则是“穷则独善其身”，还要尽力宣扬仁道，一日不死，一日不休。所以“士”肩负着重要的责任与使命。

在古代，对于“士”有如下规定：第一，如张载所言“志仁无恶”。第二，如孔子所言“不务多，务审”。第三，如孟子所谓的“有诸己之谓信”，有诸己然后求诸人，自己所想的东西，一定要先做到才说出来。第四，如孔子所言“若性命肌肤之不可易”，这个东西就像自己的性命、肌肤一样不可改变，时刻都不能够离开，“道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只有做到以上四点，士才能做到“富贵不足以益，卑贱不足以损”，富贵和卑贱都不足以让他改变，或者因为富贵而心生骄傲，或者因为卑贱而心生不足、不满意，求道的心也不会因为外在的条件而改变，始终如一。在

具体表现上，要做到孔子所说的“虽不能尽道术之本，必有率也；虽不能备百善之美，必有处也”。虽然不能够尽知彻悟道的根本，但是他一定有所遵循的东西，他做事是有一定的规范的。这就是对于一个读书人、一个士的要求。

## 知耻近于勇

“知耻近于勇”。“耻”从心，耳声。当一个人听到别人说自己的过失而心生惭愧时，表现在外就是面红耳赤，这就是耻。孟子特别强调了耻对于个人修养提升的重要意义。他说，“耻之于人大矣”，所以古人把耻看得特别重要。

《了凡四训》上把孟子的话进行了进一步的发挥：“思古之圣贤，与我同为丈夫，彼何以百世可师？我何以一身瓦裂？耽染尘情，私行不义，谓人不知，傲然无愧，将日沦于禽兽而不自知矣。”我们所羞耻的并不是我们做了某一件事，我们感到惭愧，当然这也是羞耻心的一面。更加让人感到惭愧和羞耻的是，想到古代的圣贤人，譬如孔子、孟子，他们和我们同样是人，为什么他们能够成为百世的师表，成圣成贤？甚至到今天，不分种族、不分国籍的人，一提到他们，还愿意向他们学习，他们受到后人的尊重，为“百世可师”。“我何以一身瓦裂”，可是回过头来想想我自己，还是一身瓦裂。这个“瓦裂”是指破碎了的陶器，譬如陶制的杯子、陶制的碗、陶制的盆，但是这个陶器破碎了，结果是一文不值。“耽染尘情”，过分地放纵于感官的享受和欲望的满足。“私行不义”，偷偷地做着一些不仁不义的事情。“谓人不知”，还以为别人都不知道。就这样一天一天地将要沦落为禽兽而不知不觉，相反还妄自尊大，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圣贤人和一般人的不同之处在于是否有羞耻之心，有羞耻心，和勇就接近了。“知耻近于勇”，近于勇，还不是勇。知道羞耻后，再把过失改

正过来，才叫勇。知耻才能勇猛精进，改过自新。

只有做到了好学、力行、知耻，才能通晓修身；知道自己怎么样修身，自己怎么样改正自己的过失，也就能够帮助别人去修身，也就知道怎样去管理别人；知道怎样管理别人，也就知道了怎么来治理天下国家。这就是《大学》中所说的“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 第三十八讲

仁信和道，帝王之器



发政施令，为天下福者，谓之道；上下相亲，谓之和；民不求而得所欲，谓之信。除天下之害，谓之仁。仁与信，和与道，帝王之器也。

——《群书治要》卷三十一《鬻子》

## 为天下福

“发政施令，为天下福者，谓之道。”“发政”指发布政令，施行政治措施；“施令”指施行教令、施行政令。“道”，是宇宙人生的本体，生长万事万物并无处不在。天法道而天无私覆，地法道而地无私载，人法道而人无偏私。领导者旨在为天下人谋福利，就称为道义。道义之君，必然是“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就像邹穆公一样为天下人所爱戴。

邹穆公做国君时，自己勤俭节约但对百姓非常宽厚。做到了“爱民如子，视民如伤”。邹穆公当政时有一个命令，要用秕谷喂养野鸭、大雁，而不能用粟米（粟米就是脱了壳的小米）。等到粮仓里的秕谷全都用完了，他就派人到民间用粟米去换秕谷，并规定两石的粟米换一石的秕谷。官吏们觉得这样做实在太浪费了，就向他请示：“两石的粟米换了一石的秕谷，还不如直接用粟米去喂养飞禽。”

邹穆公回答说：“粟米是上等人的食物，不能用来养鸟。周朝有一个谚语‘囊漏贮中’，意思是盛粮食的口袋漏了，但是粮食还是漏在更大的

容器里。君主是百姓的父母，我们把国库里的粟米转移到百姓的家中，难道这就不是国家的粟米了吗？让鸟吃这些秕谷，为的是不伤害我们国家的粟米。粟米在国家的仓库里还是在百姓那里，对我有什么区别？”只有明白私积的粮食和公家的粮食是一体的，才是真正的富国之道。

正是因为邹穆公发政施令都是为天下人谋福利，而不是出于自私自利，所以邹国虽然是一个很弱小的国家，但是能让像鲁国和卫国这样的大国都不敢轻视它，像齐国和楚国这样的大国也不能够威胁它。

邹穆公过世的时候，邹国的百姓都非常哀伤。即使是邹国四邻的百姓，也都朝着邹国的方向表达哀思，民间断绝琴瑟之音长达一年之久。贾谊对此评论说：“故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一位国君能以仁爱之心待人，人们对他回报的也同样是仁爱；能够给天下人带来福祉的人，他自己的福气也自然会到来。可见，邹穆公发布政令，他是关心天下百姓的福祉，为天下百姓着想，而不是为了自己的偏私、自己的喜好，所以他也受到了天下人的爱戴。

发布政令、制定国策、制定制度，都要想到为天下人谋福利，而不是仅仅想到自己的“乌纱帽”，这才叫道义。

## 上下相亲

“上下相亲，谓之和。”上指领导者，下指被领导者，上下相亲的原因在于道义的结合，而非纯粹功利的结合。现代社会的企业之中，个别企业家和员工的关系很紧张。原因很简单，就是没有学习中华文化，没有按照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教育的理念去治理企业，把企业之间的关系搞成了纯粹的利害关系、功利关系。

有一个代表团到一家企业去参观，他们中午来到企业，先考察了食堂，考察之后他们很不满意：“给员工吃这样的饭，员工都不应该给老板工作。”

下午又来考察车间，考察完之后，他们火气更大了、更不满意了：“员工用这样的态度给老板工作，老板都不应该给他们饭吃。”这是什么原因？就是因为没有换位思考，没有将心比心。做老板的没有想到，企业之所以有利润的增长，能够长期稳定地发展，都是一线员工辛苦地付出，起码对他们的身体健康要负责任，要把饭菜做好。员工感受不到领导的体贴关心，工作起来也就是混时间，只要把钱拿到手就够了，也不会尽心尽力地去负责任。

有人质疑传统文化是在传统的农耕社会下发展出来的，是建立在家族血缘的基础之上的。而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家庭血缘关系不复存在了，传统文化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壤。实际上这些观点都是似是而非，传统文化最重要的是讲伦理道德教育，即使是同一个家族的人、存在血缘关系的人，如果没有良好的伦理道德的教育，没有良好的家风家教，也会反目成仇。

在改革开放之后，我们的一些影片，拍了很多农村兄弟为了财产不得不分家的现象。很多的电影、电视剧还认为这是一种潮流，是一种先进，大家在一起生活得那么累，不能在一起住就分开，还把它作为一种先进的趋势来倡导。实际上我们没有去分析，为什么在古代的时候，一个家族十几代人，上千口人都能够和睦相处、相亲相爱，而在我们现代社会，一家三口人，甚至是亲兄弟之间都要反目成仇？其根本的原因，就是忽视了伦理道德的教育。

中国古人强调“让”，从小就学习礼让、谦让、退让，念念为对方着想。“兄道友，弟道恭。兄弟睦，孝在中”，兄弟姐妹之间看重的是恩义、情义、手足之情。“言语忍，忿自泯。财物轻，怨何生”，如果兄弟姐妹更看重的是恩义、道义、情义、手足之情，而把财产看得淡一点、看得轻一点，便不会产生怨恨。因此，谦让的文化可以有效地缓解争执。所以有良好的伦理道德教育，事事都能够为对方着想。遇到利益在前的时候，先考虑到对方，都是礼让、谦让、退让，怎么会有争执产生？

而目前受西方个人主义的影响，竞争成为了主流价值观，讲自私，

讲自利，为了自己的利益就竞争，竞争向上提升就是斗争，斗争向上提升就是战争。所以产生了一系列尔虞我诈、钩心斗角的问题，甚至是战争产生的根源。

忠恕，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教导我们要换位思考。如《弟子规》中所说：“将加人，先问己，己不欲，即速已。”我们对别人做任何事之前，首先要扪心自问，我希不希望别人以这样的方式、态度来对我？如果我不希望别人以这样的方式来对我，就不可以以这样的方式、态度去对待别人。如果做到了仁义忠恕，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 民不求而得所欲

“民不求而得所欲，谓之信。”人民没有提出要求，做领导者的、做君主的就已经看到了他的需求。这说明他有仁爱之心，他的心念念都关注着人民的福祉，念念想给百姓带来好处，这叫“信”。如果一个君主能够主动地看到百姓的需要，在百姓没有提出要求时，就对他很关心，满足他潜在的、内心的需要，那么领导者就获取了下属的信任。

目前的很多企业，很多员工可能来到这里就是为了挣工资，养家糊口。但一些企业站位高远的领导者意识到，员工如果想实现幸福美满的人生，不仅要有物质上的保证、经济上的收入，还必须有一个正确的人生态度、正确的价值观，所以主动送员工参加免费的传统文化学习。开始的时候，一些员工可能会不解，甚至还会抱怨。但是如果他们认识到领导者确实是处处为员工着想，最后就会被感化。“民不求而得所欲”，他对领导者的回报是什么？一定是忠心，竭尽全力地为企业去付出，这都是以心换心的结果。

## 除天下之害

“除天下之害，谓之仁。”能够除天下之害，这叫作“仁”。《大学》言：“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做人民的父母、做人民的领导者，应该是什么样的态度？人民喜好什么，自己也喜好；人民厌恶什么，自己也要厌恶。那人民喜欢什么？人们喜欢人际关系和谐，人伦关系稳定，每一个人都过上幸福、安乐的人生，不要生活在惶恐不安之中，做领导者的就要兴起道德教育。人民不喜欢颠沛流离、不喜欢战争，做领导者的也要解民之忧、济民之困，所以在历史上，周武王伐纣、汤王伐夏桀都是解民于倒悬，都是为天下人除害，他们都被称为“仁君”。

而“天下之害”也可能是领导者自身。如果这个领导者利欲熏心、骄奢淫逸，一定会伤害下属的利益，所以他本身就成为了天下之害。而他为了骄奢淫逸，每一天都想着满足自己不断增长的欲望，心思肯定不在治理国家、治理天下、满足百姓的需要上，就会使国家治理不好，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所以领导者必须首先克除自己的私欲。

《论语》言：“克己复礼为仁。”克服自己的私欲，克除自己的习气，恢复到礼的要求上，这才称为仁。而“克己”，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就像《了凡四训》上讲改过要发三种心，要有羞耻心、畏惧心、勇猛心。对于自己小的过失，“如芒刺在肉，速与抉剔”；对于自己大的过失，“如毒蛇啮指，速与斩除，无丝毫凝滞”。对于自己身上的小过失、大过失，都要速速地断除。就像一条毒蛇把手指咬到了，如果不把这个手指砍掉，毒素扩散到全身，自己的性命就很难保，所以要没有丝毫的犹豫。

什么样的人是大英雄？就是能克除自己烦恼习气的人。人如果能够战胜自己，也就能无所不胜了。所以“天下之害”的“害”，不一定是

外在的人事物，可能就是君主自身的习气。

“仁与信，和与道，帝王之器也。”仁爱和诚信，和睦与道义，都是领导者治国理政的法宝。

# 第三十九讲

## 为政天下



文王曰：“何如而可以为天下？”太公对曰：“大盖天下，然后能容天下；信盖天下，然后可约天下；仁盖天下，然后可以求天下；恩盖天下，然后王天下；权盖天下，然后可以不失天下；事而不疑，然后天下恃。此六者备，然后可以为天下政。”

——《群书治要·六韬》

## 大盖天下

文王曰：“何如而可以为天下？”文王请教姜太公治理好天下的策略，太公对曰：“大盖天下，然后能容天下”。“大”，指度量，即度量大到足以涵盖天下，起心动念为天下着想，天下人的过失都能够包容。因为古圣先王洞悉事实真相，明了吾与众生皆为一体，是一不是二。因此，众生的过失怎么能够不包容？

明了宇宙人生真相的人能够做到“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任何事情的根都是在内不在外。只有在内化解和一切人的矛盾、对立、冲突，外在的境缘才能够转变。古圣先王的存心是纯粹的爱人、利人之心，是明了宇宙人生真相的必然选择。

“厚德载物”，即一个人外在的财富、身份、地位、名声是靠什么承载的？是靠一个人内在的深厚德行。《周易》中记载“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是可以得以验证的。受人滴水之恩，常思涌

泉相报。正如《弟子规》所教导的，“恩欲报，怨欲忘；报怨短，报恩长”，这样的人心量大，福分也大。

孔子也是“见人一善而忘其百非”的人。他看到别人有一个善、一个特长、一个好处，就只记得这一善并虚心学习，对别人的其他种种过失很宽容。当前这个时代，人的习气重，财色名利总有一样是放不下的。言“放下”易，做“放下”难。我们看世间的人，不是贪财就是贪利，不是贪名就是贪色，财色名利总有一样放不下。因为习气太重了，习惯成自然，放不下也是很正常的。即使接触了圣贤教诲，明了道义，要改习气，也不是一件易事。人的习气的养成不是一朝一夕，要放下也不是一朝一夕，正因为习气难改，所以对于别人的过失要有宽恕之心，要能够原谅，这才是正常的。当然，难能而能为，难能可贵；难改而能改，更值得珍惜和赞叹了。

“大盖天下，然后能容天下。”即做到天下无我不能容之人、不能原谅之人、不爱之人和无我恨之人。学习圣贤教诲，要知行合一。譬如学了这句“大盖天下，然后能容天下”，以后要真正地放下和一切人、物对立、冲突和矛盾的心，这才是真正地去力行。

## 信盖天下

“信盖天下，然后可约天下。”诚信遍及天下，能够取信于天下，就可约束天下，因为“无规矩不成方圆”。俗话说：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家族、每一个团队都有其规矩，时刻提醒人们不要放纵习性。《中庸》言：“率性之谓道”，“率”，顺着、循着，“率性”是顺着自己的本性去做。本性有什么特点？“本自清净”，顺着自己的本性去做，就要改正习性，回归到本性，即“克己复礼”，克除自己的私欲，返回到礼的要求上，这才是符合道的。而现在多数人却错把人们的任性当率性。任性指任着自己的习性、习气而不能自拔，放纵情欲，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么，此任性决非率性。本性是很清静的。我们要顺着自己的本性去做，就要改正习性，回归到本性，这就叫“克己复礼”，克除自己的私欲，返回到礼的要求上，这才叫率性。

要约束天下、他人，首先自己的威信要足够，让大家信任自己。而威信得以立，需做到“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自己能够做到了，才要求别人做到；自己不去做了，不去贪污受贿了，不去放纵欲望了，才要求别人不去做。“正己化人”，方能够约束天下。

《论语》言君子“信而后谏”，信任建立之后，才能够去劝谏他、引导他、教导他，如果没有信任基础，即使是父母也很难把孩子教好，上司也很难把下属教好，老师也很难把学生教好。譬如，孩子的逆反心理是怎么来的？孩子小的时候，父母让他做什么，如果他不去做，做父母的就会打骂他，他迫于身体的弱小，不能和父母抗衡，便被迫去做父母要求他做的事。但是随着他年龄的增长，身体愈来愈强壮，再要求他去做连父母都没有做到的事情，他心里就不信服了，也就不去做了，这是逆反的真正来源。例如，父母教孩子要懂得孝顺，要看到父母的需要。结果这个孩子马上起了个念头：“你对爷爷奶奶都不好，还叫我孝顺！”这就是父母在孩子的心目中沒有信任。

既然“信”是如此重要，那么怎样提升自己在他人心目中的威信？首先，提升自己的德行，才有威信，即“道德之威”。因为有德行而形成的威信，是令人“心悦而诚服”的，是从内心里佩服你的。即使是一个恶人，面对一个有德行的人、堂堂正正的人、有浩然正气的人，也会从内心佩服他、尊敬他。所以虽然人自己造恶，但是当他遇到有德行的人时，仍然会生起惭愧心。

之所以不能感动他人，是因为我们自己做得不够好，自己的德行、真诚心不够，所以不能取得人家的信任，因此信任不是求来的，而是自己的德行自然感召的。正如老师在授课的时候讲的是同样的内容，学生也会复

讲老师的课程，但是讲出来的效果不一样。这是因为学生和老师的信心不同，第一个原因是深入经藏的深度不一样，第二个原因是力行的程度不一样。一个人真正去力行证实自己所讲所学的内容，才真正地有信心。所以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习”，就是经常在生活中去练习、去力行。

历史上，孔子的教学最有效果、最有影响，原因是他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因此，虽孔子无财无权无势，但是弟子三千，对他不离不弃，有七十二位贤人都有所成就。因为他所讲的每一句话，他都身体力行地首先做到了。

《说苑》记载，大禹治水，民众跟着他奔波劳苦却没有怨言，这是因为大禹本身有德行，能够取信于天下之人。《说苑》言，“禹称民无食，则我不能使也”。大禹认为假如老百姓连吃的食物都没有，那就不可能指使他们。“故疏河而导之，凿江通于九派，洒五湖而定东海，民亦劳矣，然而而不怨者，利归于民也。”大禹治水付出巨大的艰辛，老百姓也非常辛劳，却没有人抱怨、讲条件，喊苦喊累。这是因为大禹身先士卒，自己很辛苦，三过家门而不入。大禹治水是为了疏通水道，减少水患，并且把水引到农田去灌溉，是为了让百姓过上幸福安稳的生活，否则水患一来，百姓流离失所，甚至连性命都难以保全，所以百姓非常信任他。“信盖天下，然后可约天下”，因此大禹做事情，老百姓都心悦诚服地配合他。今天在上位的人若不顾及百姓的疾苦，只是想着自己，“功成而不利于民，则我不能劝也”，所做的事业对百姓无真实利益，就很难让百姓心甘情愿地来做这些事情。

所以假如我们的孩子、学生、下属听到我们提出的要求时，他们的内心都认为：我父母是为我好的，老师是为我好的，领导是为我好的。他们肯定是心甘情愿地做，不需要太多的督促。那我们就是做到了“信盖天下，然后可约天下”。

而要取信于人，就要有道德，还要有智能。仅仅有为对方好的存心，也愿意去付出，但是给人指引的方向是错误的，而且愈付出，使人愈有压

力、愈反感，这是因为我们的智慧不够。而智慧不够的原因，是没有深入学习古圣先贤的智慧，不知是非、善恶、美丑的标准。好心指引别人方向，却把人指上了歧途，让人愈努力，离目标愈来愈远。所以必须好学，善于深入学习，这样才能用智慧给他人引领正确方向，同时要适应对方的需要，不能够把自己的状态、水平强加给别人，按照自己的喜好去要求别人，说法要契理契机，这才是真正的智慧，有道德、有智慧，悲智双运，方能够真正地取信于人，约束天下。

## 仁盖天下

“仁盖天下，然后可以求天下。”“求”，招致、招来，即让天下人都心悦诚服。

《说苑》记载：“尧存心于天下，加志于穷民，痛万姓之罹罪，忧众生之不遂也。”尧帝存心于天下的百姓，记挂着穷苦的百姓，对于百姓的苦难、罪过都感觉到哀痛，对于众生不能顺利地生存下去感觉到忧虑。如果有一个百姓挨饿，他就说，这是我让他们挨饿的；如果有一个百姓受寒，他就说，这是我让他们受冻的；有一个人犯罪，他就说，这是我自己的过失使他们犯罪的。因为尧彰显仁慈，所以社会的道义也就树立起来了。这正如《大学》中所说的：“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在上位的人仁慈，底下臣民的善良就会被他唤起，百姓佩服他、学习他，这就是“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他德行广博，不需用奖赏之法，百姓自然勤勉做善；不需用刑罚，百姓自然就能得以治理。所以“先恕而后教，是尧道也”，先宽恕百姓，以仁恕之心对待百姓，然后再去教导百姓，这就是尧的治国之道。

这些圣王都心存仁爱之心，并做到了“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说苑》上记载，禹王有一次出门，遇到了一个犯罪的人，他马上下车询问情

况，并且非常哀泣。左右的人看了都大惑不解：“这个犯罪的人是因为不走正路才导致了今天的结果，君王您何必如此伤痛？”禹回答：“尧舜时期的百姓都是以尧舜之心为心，而我当了国君之后，百姓都各以他们的私心为心，我为此感觉到伤痛。”意思是说，我当国君比不上尧舜了，人们自私自利的心都生起来了，各以其私心为心。正是因为古圣先贤有这样的仁德之心，所以才让天下人都心悦诚服。

孟子说：“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夏商周三代，为什么可以得到天下臣民的拥护？是因为他们仁慈。而夏桀王、商纣王、周幽王、周厉王“其失天下也以不仁”，所以才亡国。“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不仅天下是这样，一个国家、一个团队的兴衰存亡关键也都在于领导者是否有仁慈之心。

孟子曰：“天子不仁，不保四海”，天子不仁慈，而残忍，就会失去天下。“诸侯不仁，不保社稷”，诸侯国的国君不仁慈，他的诸侯国就要被推翻了。“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卿大夫不仁慈地去照顾人民，他自己的家就毁了，自己的宗庙也保不住了。“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一般的读书人还有老百姓不仁慈，他自己的事业就做不下去了，也就没有办法积累财富，别人对他也生不起信任之心，结果连自身都难保。“今恶死亡而乐不仁”，现在厌恶死亡，厌恶被人推翻、残杀，但是每天干的事还都是不仁慈的事。“犹恶醉而强酒”，就好像一个人明明很厌恶喝醉酒，但是还一直强行地饮酒，不停地把酒往口里灌。这就是颠倒、愚痴，不明事理了。孟子的这段话，也印证了“仁盖天下，然后可以求天下”。

## 恩盖天下

“恩盖天下，然后王天下。”“王”，《说文解字》段玉裁注：“天下所归往也。”天下人都归心，这叫“王天下”。

周文王有仁爱之心，不仅施及百姓，而且还施及枯骨，因而天下归心。《新序》记载，周文王建造灵台，在挖池的时候却挖到了一具死人的骨头。文王命令官吏把该枯骨改葬。官吏言：“这是无主之骨。”文王言：“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国者，一国之主也。”拥有天下的人，就是天下的君主、主人；拥有一个国家的人，就是一个国家的、百姓的主人。“寡人固其主，又安求主？”我就是他的主人，又到哪里去找他的主人？天下人听了这件事，都说文王真是太贤德了，他的恩泽能够泽及朽骨，更何况是对人？人们评论说，有人以金银财富为宝，但是得到了这些宝物就使国家陷于危险；而文王得到枯骨，却表明他仁爱的心意，天下人都纷纷归心。

## 权盖天下

“权盖天下，然后可以不失天下。”“权”，权威，权威遍及天下才能够不失天下。权威是靠德行感召而来，权威分三种：道德之威、暴察之威、狂妄之威。唯有道德之威，才能不失天下，使天下信服。若是狂妄之威、暴察之威，如夏桀、商纣、秦始皇，使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中却不以为然。夏桀底下的人说：“老百姓要推翻你，你要被推翻了。”夏桀狂妄地说：“天之有日，犹吾之有民。日有之哉？日亡吾亦亡矣。”这真是狂妄到了极处。后来老百姓果然起来造反，推翻了桀的统治。

## 事而不疑

“事而不疑，然后天下恃。”遇事不疑惑，天下的人才能够依赖你。遇事不疑惑是因为有智慧，明理，“理得心安”，若对道理理解得不透彻，遇事就会犹豫不决。譬如，我们现在要不要用传统文化来教育孩子？要不要让孩子学习《弟子规》？在我们现代社会，要不要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对于这些关键性的问题，很多人都心存疑虑。因为对传统文化理解得不够透彻，便无法去力行传统文化，若没看到力行的效果，怎么让社会大众生起对传统文化的信心？如果我们希望把孩子培养成对社会大有益处的人，我们就需要学习传统文化，让孩子去力行传统文化。

这让我们想到杨震不收“四知财”的故事。杨震一生廉洁，曾有人劝杨震给儿孙留下一些财物，他说：“我留给他们最好的财富，那就是他们是一个廉洁官员的后代。”杨家代代有贤人出现，连续四世都有人做到“三公”的位置，而且他家的后代一直传承到今天，仍然在纪念祖先的德行。

所以要不要弘扬传统文化？习近平总书记对弘扬传统文化态度鲜明，非常有决心。他在2013年考察曲阜时讲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sup>①</sup>因为习近平总书记自小受传统文化的教育，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理解和认同，所以他做事没有疑惑、没有犹豫，做到了“事而不疑，然后天下恃”。

“此六者备，然后可以为天下政。”以上说的六条都具备了，就可以把天下治理好。

---

<sup>①</sup> 习近平：《汇聚起全面深化改革的强大正能量》，《人民日报》2013年11月29日。

## 第四十讲

君子之务，以行前言



故君子不恤年之将衰，而忧志之有倦，不寢道焉，不宿义焉。言而不行，斯寢道矣。行而不时，斯宿义矣。是故君子之务，以行前言也。

——《群书治要》卷四十六《中论》

## 人须有志

“君子不恤年之将衰，而忧志之有倦。”“恤”，忧虑。君子不忧虑自己年老力衰，而是担忧自己的志向退怠、志向动摇。由此可知，圣贤君子与世间普通人担忧不同。

古人云：“贫不足羞，可羞是贫而无志。”一个人没有志向，没有使命感、责任感，就不能够改变他家里的贫穷。贫穷不仅指经济贫穷、物质匮乏，也指思想、精神的贫穷。

“贱不足恶，可恶是贱而无能。”身份地位低，不是值得人厌恶的事。可厌恶的是自己瞧不起自己，又不去提升自己的道德和才能，自暴自弃。

“老不足叹，可叹是老而无成。”生老病死乃人之常情，所以老了不值得叹息。可值得叹息的是到老一无所成，一生都虚度光阴。孔子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孔子给我们示范了一个身老但是学而不厌的榜样。他说再给我几年时间学《易》，这样就可以没有大的过失了。活到老，学到老，一天都没有空闲过。

“死不足悲，可悲是死而无补。”一般人一谈到死，就觉得很悲哀，其实死不足悲。对于世间人而言，可悲的是离开世间时，回想往事，自己的一生对家庭、国家、民族、世界没有一点贡献和帮助，这才是真正值得可悲的事情。我们来到世间都是有使命的，都是来服务、奉献的，要留下一点精神，留下一些道义、情义、恩义。正如文天祥所言：“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我们的存在，正是为他人，特别是为我们的亲人、朋友，还有世界的人，有所贡献，给他们带来幸福、带来改变。

所以君子不担忧自己年长了，担忧的是自己的志向没有始终坚持，没有再继续为社会服务。

## 孔子之忧

“不寢道焉，不宿义焉。”“寢”，睡觉，在此引申为停止、止息。“不寢道焉”，就是不让道业停止。“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时时都要保持在精进用功当中。“不宿义焉”，“宿”，过夜，引申为拖延、停留。不要让所学的义理拖延、停留。不要学了一大堆典章词句，却都没有去力行。《弟子规》云：“不力行，但学文，长浮华，成何人。”

现在社会有很多有知识没文化的人。譬如，我们学了：“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小时候就会背的古诗，考试的时候也能够写出来得满分，但是很多人并没有落实到生活中，这就叫有知识没文化。对《弟子规》的学习、做人的教育被大大地忽视了，高等院校也变成了“高等知识技能的传习所”。

从这句话我们看到，圣贤人的心念在道上，而不是在五欲六尘、自私自利上，他和我们一般人所想的、所担忧的的确不同。譬如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孔子所担忧的是什么事？

首先，“德之不修”。要明了什么是德，就得知道什么是道。道就是本心，即真心。它“寂照湛然”。“寂者不动”，指定力。“照者光明”，指智能，道的特点是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定智湛然，有定有慧。

什么是德？《六书精蕴》言“直心为德”“行道而得于心为德”。古代的“德”字是“惇”，上面是一个“直”字，下面是一个“心”字，“不动谓之性，动则谓之心，此心正直，故曰德。”动是动念头，真心起念之时，若初动就能够觉察，就没有失其明，这个时候就叫明德。若能觉察，就会妄动，“妄动，则昧矣”，“昧”就是昏昧，“昧则转为凶德”。所以必须省察修治“使复其明”，“修”就是《大学》的“明明德”，要把自己本有的明德彰显出来。“德之不修”，就是已教给我们德，却不去修治，不知道从何修起、从何学起。

“学之不讲”，学术必须讲究。学术指诗书礼乐，必须讲解、讲习才能明了，所以教学特别重要。《礼记·学记》言“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因为“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

现在，传统文化的公益论坛在全国普遍召开，论坛的内容深得人心，受到人们欢欣喜悦地接受，就是因为道是恒常不变的规律，是自然而然的本性，符合本性，虽然儒家文化好长时间没有人讲了，但是一经提醒，还是很容易被接受。

有个孩子去参加《弟子规》的学习班，学习了一段时间，分享学习体会。这个学生走上台来分享：“在学习了《弟子规》之后，我才知道为人原来要孝敬父母。”我们听了这句话觉得很奇怪，但是我们仔细想一想，一个孩子是从哪里学到的要孝敬父母？中国传统社会都是大家族，和长辈全都住在一起，孩子从小能从父母怎么样照顾爷爷奶奶上学到如何孝顺父母。而走到学校之后，他上的第一堂课就是老师教导他如何孝敬父母。他从小接受了这个教育，自然就知道怎样才是孝敬父母。

但是现在的孩子基本上不和爷爷、奶奶住在一起，父母也不会特别

地孝敬自己的父母，偶尔周六、周日带着孩子回家去探望父母，结果孩子没有从他自己父母的身上真正学会如何孝敬父母，所以孩子很无辜，因为他很少知道到底应该怎样孝敬父母。

我回想自己的人生经历，从小学一直上到了博士，没有一堂课教过我们如何孝敬父母，所以确实是“人不学，不知道”。现代人对父母的态度和古人大大不同，也是有原因的。

另一个孩子，他走上来分享的时候说：“在学习《弟子规》之前，我每天所想到的就是如何去谋害父母。”这个孩子的母亲就坐在台下听，眼泪哗哗地往下流，因为她在平时说起自己儿子的时候，是一脸的骄傲，你看我这个孩子很聪明，但是没想到这样一个在母亲心目中非常聪明能干的儿子，说出了这样一句让母亲伤心的话。

儿女心里真正在想什么做父母的并不了解。他每天都在计算机面前，看似很用功，但是在学什么内容？现在的网络中混杂暴力、色情，这些孩子很小就接触到了网络，很容易受到污染。这些事情看多了、听多了，更觉得传统文化的弘扬迫在眉睫。如果再不讲传统文化，下一代就要被断送了，被西方的一些价值观毒害了。

现在的社会新闻中，儿媳妇把公公婆婆赶出去不赡养的，兄弟因为一点点遗产吵上法庭、大打出手的，甚至儿女虐待杀害父母的，并不少见。原因就是人伦大道没有人讲、没有人学习了。所以道德教育很重要，教育者也应该受到特别的重视和尊敬。“儒”字，是一个单人旁加一个“需”字，说明“儒”是人之所需，是社会所急需。学儒的人如果不受尊敬了，他所讲的道也会不受尊敬，道统就弘传不下去了。左丘明言“人弃常则妖兴”，弘传不下去，妖魔鬼怪的现象就会出现了。反之，如果我们能够尊师重道，就像《淮南子》所言：“孔子养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为文章，行为仪表，教之所成也。”孔子培养的徒弟有三千多人，他们的言语行为都是社会大众的表率，在家能够孝敬父母，出门能够尊敬

长辈、尊敬领导，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可以让人们效法。这靠的就是教育。

所以教学特别重要，能够教学的人也应该受到国家特别的礼遇和尊重。国家是否有真正的人才，也取决于是否有真正的好老师来教导。这就是古人所谓“天下有真教术，斯有真人材”。

《群书治要》中的《尸子》记载：“屋焚而人救之，则知德之；年老者使涂隙戒突，终身无失火之患，而不知德也。”屋子着火时别人帮着救火，我们知道感激别人。而其实老人很早就让他堵塞裂缝，准备烟囱。如果我们按照老人的教诲去做，终身都不会有失火之患，但我们却把它当成了耳旁风，觉得很烦、很唠叨。

同理，假设一个人现在被关进了监狱，如果有人使他免于牢狱之灾，他们全家人都会对该人感恩戴德。而那些教导他仁义慈悌，即做人要仁爱，要考虑对方的需要；做事要有道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要助人为乐等，人们按照这些道理去做，可以保证终身不会被关进监狱，遗憾的是，没有人对这些宣讲伦理道德教育的人感恩戴德。这个比喻非常形象，告诉我们社会的道德风气不好，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那些讲道德、行道德的人没有被重视。这就说明了教学、讲学的重要性，所以“学之不讲”是孔子特别担忧的事。

唐太宗李世民在短短的时间内开创了“贞观之治”，使天下太平、万国来朝，原因之一就是他自己特别尊师重道。清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更是礼请儒释道的大德为国师，坚持讲经教学，并且把这设立为国家的制度来遵循。

《中国礼制史》记载，满族人在入关之前就已经行过祭孔大礼；入关之后，更加清楚地订立了祭孔的制度。譬如，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南巡回来，康熙就特意到曲阜拜先师庙、拜孔庙，行的是三跪九叩首的礼，而这种礼是当时的臣下对皇帝行的最重礼；还将曲柄黄盖留在孔庙，

就是将天子所用的仪仗留供孔庙使用。

《清志》记载：“雍正元年，诏追封孔子五代王爵；四年，释奠献爵，改立为跪。”说明雍正皇帝对孔子的尊重。“八年，曲阜重建庙成，黄瓦画栋，悉仿宫殿制。”在雍正八年（1730年）的时候，曲阜的孔庙重新建成，使用的材料都是黄瓦、琉璃瓦，雕梁画栋，仿照皇宫的建制。“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尊祭孔升为大祀”，就是把祭孔这个礼定为国家重要的大型祭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雍正二年（1724年），曲阜阙里孔庙因为火灾而损坏，雍正帝立即祭告孔子，并派官员赴阙里监修。雍正八年十月，孔庙修复完毕，他命皇子再到当地告祭孔子，并在十一月设立专业官员掌管孔庙的一切事务。从这些故事当中可以看到，清朝的皇帝对于先圣孔子的尊崇达到了非常高的程度，远远超过了前代。

国君应该重视讲学，因为国君的职责是践行圣道，而老师的职责是传承圣道，所以国君应该对那些能够讲圣道的人，给予特别的尊重。只有这样才能够修德明道，进而平治天下。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兴衰，可以总结出这样一个规律：凡是尊师重道、重视教学的时期，都是政治清明，乃至盛世出现的时期；凡是轻师贱道的时期，都是王朝走向衰败和灭亡的时期。《荀子·大略》言：“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国将衰，必贱师而轻傅。”这是一个历史规律。

《群书治要·吕氏春秋》记载：“先王之教，莫荣于孝，莫显于忠。”古圣先王的教诲没有比孝更光荣的了，没有比忠更显扬的了。“忠孝，人君、人亲之所甚欲也；显荣，人臣、人子之所甚愿也。”忠孝，就是对国家忠、对父母孝，这是君主、父母的人特别想得到的；显扬和荣耀，也是做臣子、儿子的最希望得到的。“然而，人君、人亲不得所欲，人臣、人子不得所愿，此生于不知理义。”但是问题是，往往做君主的和做父母的，得不到自己想要的忠臣孝子；而做臣子的和做儿子的，也往往得不到所希望的，也就是上面说的富贵显耀。问题都是因为不知理义。譬如，

本来想飞黄腾达、名扬后世，但是没有学习文化，明白事理，结果贪污受贿，就半途而废、锒铛入狱了。“不知理义，生于不学。”不知理义又是因为不学的缘故。“是故古之圣王，未有不尊师也。”所以古代圣王，没有不尊敬老师的。

接着又列举了历史上的十位圣人、六位贤人都是尊敬老师的。“今尊不至于帝，智不至于圣，而欲无尊师，奚由至哉？”现在，我们的地位尊贵比不上古代的帝王，智慧也不如古圣先贤，却不尊师，靠什么来实现道？靠什么来得到道？“此五帝之所以绝，三代之所以灭。”这就是五帝三代之所以绝灭的原因。因此，五帝三代之后，由于社会不再尊师重道，所以才没有再兴起盛世。

“学之不讲”，就没有人明理义，悖德、悖理、悖法的事情就层出不穷了，所以社会诸多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是没有伦理、道德、因果的教育。

孔子担忧的第三件事是“闻义不能徙”。“闻悉奥义，当迁徙之，如义而行。”听到了正确的、符合道义的事，就应该把自己错误的行为改正过来，按照正确的道义行动。听了对的要守住，不对的要赶快迁到义。

“闻义不能徙”原因就在于习气太重，习惯成自然。所以持之以恒很重要，学习传统文化并不是听几次课把道理弄明白就行了，重要的是按照道理去做，时时提醒自己如义而行。一个人修正自己的行为，如果经常听圣贤教诲，慢慢地自己也就变成了谦谦君子。

放下习气确实不是易事，放不下是因为道理上不够透彻，真正看得破，就一定能够放得下。就像桌子上有一块金子、有一块石头，如果真正明了金子的价值比石头大，那你一定去拿金子，不会再去拿石头。

“不善不能改”，如果不学圣贤之道，就不能够辨别是非、善恶、美丑。学了之后，重要的是能够改过。古人云：“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没有人生来就是圣贤人，圣贤人也都是从凡人一点

一点修行而成，在成圣成贤之前，就免不了会犯诸多过失，但是学习传统文化，听闻圣贤教诲，就能够勇猛精进，把过失改正过来，成就最大的善。

最后，孔子说“是吾忧也”，说明孔子对教学也有忧患的事。孔子教人成圣成贤，但是如果学生这四条都做不到，人才就教不出来，这是孔子为师者的忧虑。如果我们“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德之不修，学之不讲”，我们就不能成为圣人真正的弟子，圣道也就无法传承下去。

要成圣成贤，就不能担忧世间人所担忧的事。世间人一般都担心什么？升官升不了，发财发不了，求美色求不到，求升学升不上。这是一般人所担忧的，离不开四个字：财色名利。都是在这里转圈子，而不知道提升自己的道德修养。孔子担忧的和一般人担忧的不一样，他是提醒弟子要把担忧的重点、关心的重点改过来、转过来，不要担心财色名利获得不了，而应该担心自己的修养提升，切勿辜负老师的希望。

## 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

“言而不行，斯寝道矣。”自己讲出来的话，或者答应了别人的事情，不能够做到、不能够力行，这就会让道业荒废、停滞下来。

“行而不时，斯宿义矣。”“时”可以理解为及时，也可以理解为适时，要选择适当的时机去行，时节不到，也达不到预期的效果。“时”也有时时、长久之意，即做了之后，又半途而废，使义理空守，无法落实。

这段话让我们感到，人过这一生要过得有意义，首先要有志向。“成己成物”，首先要成就自己的德行，进而去成就他人的德行。也就是《大学》开篇所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而把成就自己、成就他人达到圆满，就是“止于至善”。还要有长远心，要对治懈怠和没有恒心的习气，要能够坚持自己的志向，愈挫愈勇。

“行而不时”，“时”也就是长久保持。如何才能够时时保持长久心不变？我们看一个故事，题目是《两只狼的交战》，给我们很多的启发。

一位年迈的北美切罗基人教导孙子们人生的真谛。他说：“在我的内心深处，一直在进行着一场鏖战。交战是在两只狼之间展开的。一只狼是恶的，它代表恐惧、生气、悲伤、悔恨、贪婪、傲慢、自怜、怨恨、自卑、谎言、妄自尊大、自私和不忠。另一只狼是善的，它代表喜悦、宁静、谦逊、仁慈、宽容、友谊、同情、慷慨、真理和忠贞。同样，交战也发生在你们的内心深处，在所有人内心深处。”听完他的话，孩子们静默不语，若有所思。过了片刻，其中一个孩子问：“那么哪一只狼能获胜？”饱经世事的老者回答：“你喂给它食物的那一只。”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所以每天亲近经典，以古圣先贤的榜样来期许自己、要求自己，就不容易迷失本心。如果一天不学习经典，一天不听经、不讲学，很多习气都会冒出来。古人云：“三日不读书，面目可憎。”古时候，人人都学习圣贤经典，整个社会的氛围都是仁义礼智信，在这个时候还“三日不读书，面目可憎”，而在我们现在社会，充满财色名利的诱惑，在这种环境下，只要一日不读书，就可能面目可憎。

“是故君子之务，以行前言也。”君子最重要的要务就是践行前言。“前言”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些重点，要立志、要发愿、去力行，无丝毫的懈怠，做到言行一致。“行前言”，“前言”还可以指我们曾经讲过的话，古圣先贤的教诲，或者我们曾经给别人的许诺，应全心全意地去做到，去践行自己的诺言。

《论语》中的“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都是强调言行一致。古代的读书人以自己的言行不一为最羞耻、最无地自容的事。所以读书人会不断地督促自己成为言行一致的人，这个羞耻心也是他立身行道源源不断的动力。

古人云：“圣人不耻身之贱，耻道之不行；不忧命之短，忧百姓之

穷。”圣人不羞耻自己的身份低微、贫贱，而羞耻大道不能够通行；不担忧自己寿命太短，而担忧的是百姓之穷。明此理，更应肩负使命感和责任感，把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下去，解决人们物质和思想的贫穷，是我们的责任所在。

## 第四十一讲

君子以自强不息



乾。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群书治要》卷一《周易》

## 至诚无息

乾，是指乾卦。《象传》说：“乾卦象征天道运行的刚健而永恒，君子应当效法天道，自我奋发图强，永不止息。”

《周易》是六经之首，而且是中华民族最悠久的一本经典，被称为群经之首。六经指《诗》《书》《礼》《易》《乐》《春秋》，是孔子教导学生的重要经典、重要依据。伏羲氏画八卦，周文王把它延伸变成了六十四卦，然后文王写卦辞，还有一种说法是周公写爻辞。后又经过孔子批注，把整个《周易》的义理彰显出来。《汉书·艺文志》中提道，“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周易》里含摄很深的义理，经过了上古时代的伏羲氏、中古时代的周文王、下古时代的孔子这三位圣人，才得以完成。

孔子诠释《周易》的“易”：“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易”，是《中庸》里讲的“天命之谓性”，是人的性德，宇宙的本体。学习圣贤教诲，目的是回归自性、回归本性。但是要回归，从哪里入手？《大学》言“明明德”必须从格物入手。

“易”有三重含义，第一是变易，世间的万事万物，现象是变化莫测的；第二是不易，虽现象是变化莫测的，但是有一个不易的本体，即规

律、道理；第三是简易，大道至简。所以《四库全书》内容虽很丰富，但是可以用十二个字概括它的内容，即“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

“乾。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此“象”是指《象传》。孔子做十传诠释《周易》：《彖辞》上下两传，《象辞》上下两传，《系辞》上下两传；专门解释乾坤的《文言》；谈八卦道理的《说卦传》；讲整个六十四卦排列道理的《序卦传》；还有一个是《杂卦传》，就是把两两相对的卦并在一起，变成三十二个组合，譬如“泰卦”跟“否卦”是一组，刚好两两相对，谈三十二卦组合的义理。

《象辞》，是解释整个卦的形状延伸出来的意义，所以叫“象”，解释每一爻所产生的现象的意义。《象传》的内容比较丰富，六十四卦都有象辞，还有三百八十四个爻，也都有象辞。而且还不止三百八十四个爻，总共是三百四十六个象辞。

《周易》这部书，孔子一直在深入研究，所以圣人读《易》，韦编三绝。可见得这部书他翻看了好多次，连绑书的牛皮带都断掉了。孔子是圣人，还要用这么多的时间来读《周易》，学圣贤经典，何况是我们？

这里讲乾卦，《象传》说“天行健”。“行”，运行，那么天的运行是什么样的？春夏秋冬气象转变，日出日落永久不止。君子效仿天道，就是要像天这样自我发愤图强，永不止息，这样才能够学好天道。

正如《中庸》言：“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征，征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博厚，所以载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如此者，不见而章，不动而变，无为而成。”为什么强调“无息”？这一段话，把这个“无息”的意义、作用讲得特别清楚。

“不息则久”，久就是长久。天的运行没有休息，没有休息才能够长久。假如我们做了一件事情，做了之后又停止了，这就不算长久。长久就是一直做下去，不要停止，这就是不息。为什么不能停止？因为我们做事

情不是一蹴而就的，必得要恒心，一直做下去。

做久了以后，效果就出现，这就是“久则征”。据郑康成的解释，“征”当作效验来讲。效，有效果。验，有效果来验收。“征”，征候，有效果表现出来了就有现象，那就是一种征候，说明这件事情能够有成就了。

譬如做饭，把生米放进水里去煮。米和水不是一放到锅里，立刻就会煮熟了，必须要有一段时间让锅里的水先煮开，温度持续地保持，慢慢地来才由生转熟。假如我们把米刚放到锅里几分钟，就拿出来看一看，这就叫“息”，“息”就煮不熟了。所以“不息则久”，要把这个米一直煮，直到煮熟了，煮成饭的时候就有“征”。不需要打开锅盖看，煮到一定的时间，就可以闻到米饭煮熟以后的那种香味，这就叫征。煮饭是如此，做任何事情都是如此。不止息地、有恒心地坚持一段时间之后就有征候、效验。

“征则悠远”，因为得到效验之后，信心增长，知道所下的功夫是正确的，譬如人走路，走着走着看到路标了，就有信心一直往前走，这就是“悠远”。

## 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

“悠远则博厚”，悠远就是长久了，用功不止息，有前面这些征候出现了，自己的信心也有了，长远的路一直往下走的时候，就达到了博厚。“博”，广大，无论心胸和见识都很广博；“厚”，深厚，无论德行和学养都既广大又深厚。这样不仅学道，在世间办事情的时候，也一定能够办好。因为有“博厚”。

博厚再进一步则高明。高明，“高”，物体的高度；“明”，光明，照得很清楚。“博厚则高明”，日积月累地求学修道，那么无论是说话还是办事都比别人高明且容易。因为学了圣贤教诲，是按照规律办事，自然而然

就会成功。通过《周易》，知道谦卦六爻皆吉。世间的人有了成就之后就容易傲慢，瞧不起人，给自己的人生带来了很多的障碍，就是处事成障。因此，明了者愈学愈谦虚，愈学愈对人礼敬，“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繁体的“愛”，是一个感受的受，中间有一个心字，就是要用心地感受对方的需要。所以什么是爱？爱就是用心去关心、在意、付出，而不是占有和控制，所以爱的感觉确实是温暖的。当你爱人爱得自己也痛苦，别人也痛苦的时候，那肯定就不是爱了，那是占有、是欲望、是控制。所以一个人心中有爱的时候，你看他自己是温暖的，带给别人也同样温暖的。这就是我们学了圣贤教诲会比别人高明之处。

所谓的“高明”，就是一个人看事情比别人要高远，处理任何一个问题，都有能力把它解决好。一般人不能够明是因为没有学道，处理任何事情都是从自己的私心来考虑。所以要高明，就要学会处理事情不从私心考虑，要为大家来做事情，以大众的利益为出发点。

有一句话叫“利令智昏”，利就是私人的利益，有私人的利益放在心上的时候，就把自己本有的智慧障蔽了，变成昏智了。昏的智慧就是我们一般人说的的小聪明，小聪明常常是损人利己的。处处是障碍，办什么事都很难成功。我们的智慧是明的。有了明智，我们看事情才能看得明白，做事情才容易成功。就是治国理政，也一定是国泰民安，并且能够持久。

古人说“一言而为天下法”。说一句话，就能够成为天下人的行为法则，让天下人都来效法，这就是古人所讲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中的立言。在言语上能够成为不朽之言，对他人生活有实际利益，而不像有些人，说话经常自相矛盾，这怎么能够让人把你说的话当成法则？所以言语要谨慎，它的高明就出自真诚心。出自真诚心的言语，才能够为万世师法。

当我们还没有达到这种境界，说话还不能成为天下人的法则时，可以把圣人的话介绍出来，言语要按照圣人所说的去说。我们这样做了，也

算是高明了。我们办事，要按照圣人的教导，按照《弟子规》上的教导去做，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符合，那你也自然比一般人高明了。

博厚，博到什么程度、厚到什么程度？“博厚，所以载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这也是讲博厚、高明、悠久三者的作用。“博厚，所以载物也”。“载”，承载，好像一个车子，上面可以载人、载物。“物”包含了万事万物，任何东西都可以承载，所以这里讲“博厚”。

“高明，所以覆物也”。“覆”就是覆盖，一个东西把它覆盖起来，就是保护之意。高明所以覆万物，那就是它可以真正地保护万物。万事万物只有在高明之下，才可以得到保护，就像有一个保护伞，使它不受外来的侵害。

“悠久”的作用是“所以成物也”。“悠久”就是长久不断地、不停息地去用功夫，不断地去学习，所以“成物”，“成”就是成就。无论做哪一件事情，学任何东西，明了任何道理，都不是短时间能够成就的。一定要长期用功，长期学习，这样才能够成物。所以博厚、高明、悠久，是载物、覆物、成物。

“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圣人的博厚、高明已经到了极处了。圣人博厚的这种至诚之德，只有拿大地来相比，所以讲“博厚配地”。像大地这么博厚，可以跟大地来相比，这叫“配”。“配”就是圣人的德，跟大地能够平等，可以相配。大地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平等的德。人生长在大地之上，大地能够承载；其他的动物，包括毒蛇猛兽，大地也同样能够承载。任何一种动物、植物、矿物，不管是好是坏，大地都一律平等地来承载，而且还丝毫没有承载不了、负荷不动的感觉，这就是大地的德。拿大地来比喻圣人，圣人可以载物，圣人的德可以容纳一切的人事物。俗语说“宰相肚里能撑船”，比喻宰相的度量能撑大船。再大的船、再多的船，都可以从这里经过，都可以容纳它。这是讲圣人无所不容的。圣人的这个德，就是能够容忍一切人，宽纳一切

人。无论赞美或毁谤，批评或妒忌，或排斥，或陷害，都能够容纳。舜在后母、兄弟三番五次地折磨他，要陷害他于死地时，都能够“反求诸己”，没有去打击报复，是因为他已经成就了圣人的德行。

“高明配天”，“高”，至高无上，“明”，大放光明，都是从自己的天命之性里开发出来的，可以配天。天的高明可以覆盖万物、保护万物，这就是圣人之德。我们学习圣人也必须这样做、这样去学。虽然我们还没有达到圣人的境界，但是我们为人处世都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才能学得好。一说话、一办事，就要想到“高明配天”；一与人来往，跟人接触，譬如你跟人家要辩论的时候，有所争执的时候，要有冲突对立的心生起的时候，我们就要想到“博厚配地，高明配天”。就要想到我们要学圣人，我们的德必须像大地那样，平等地容纳一切人事物。这样学才是学得正确，这样的路才走得正确。

“悠久无疆”，“无疆”，没有界限、没有止境。你一直照这样走下去，学天的那种高明，能够覆盖万物、保护万物；学大地的这种博厚，能够承载万物。什么时候这样学？“悠久”。悠久就是永久地、长期地这样学习，而不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无疆的“疆”，孔颖达的疏，解释为“穷”，没有穷尽的时候，这是一个意义。但是这个“疆”，也可以扩展来理解，也就是学博厚、学高明。讲这个天地，虽然在经典里面，“地”是指地球，指大地；在讲天的时候，只是指大地上的天空。实际上，就“天命之谓性”而言的这个天地，何止我们的地球？那是无穷无尽，空间是无限的。可以说虚空有多大，天就有多大；虚空里的星球有多少，这个地就有多少。这才叫悠久无疆。

学圣人的博厚、高明的德，就必须把自己的心量放开，因为这原本就是我们的本性，也就是《中庸》上所说的“天命之谓性”。所以我们必须把心量放宽了，心里没有任何界限，这样才能够悟到天性、本性。

“如此者，不见而章，不动而变，无为而成。”“天地之道，可壹言而

尽也。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如此者”，就是学博厚、学高明，而且是悠久无疆地学下去，效果是“不见而章”，这个“见”，读“现”。“不见”就是看不到，“见”就是出现了。譬如，以学圣人之德来比喻，悠久无疆地学习，虽然道德还没有出现，还看不见，但是“不见而章”。这个“章”，当“明显”的“显”字讲。彰显，虽然这个境界还没有出现，但是事实上已经有彰显了。

“不动而变”，譬如就大地而言，大地能够承载万物。大地上的万物，生长得很正常，万物是各逐其生，各得其所。这就是“不动而变”。就天而言，我们看天也没有动，但是天有春、夏、秋、冬四时，阴阳两种气候也在不断地转变。在天地之间，感觉天地好像也没有动，但就是在这不动之间有变化，万事万物其实都是不断变化的。而作为人，生理、心理也是不断变化的，这个时候的念头和前一个时候的念头都不一样，所以怎么能够去控制、去占有？明白了这个事实真相，控制、占有的念头就放下了。连自己的身体、自己的念头都控制不了，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人可以控制的？万物顺着四时而生长、变化，这些都叫“不动而变”。

“无为而成”，“为”就是行为，“行”就是行动，有行动、有作为，这叫有为。“无为”是什么？没有一切的行为。还是拿天来做比喻。我们要讲话，这是有为的，但是天空有没有在说话？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大地有没有长手脚？没有。也就是说，天地既没有言语，也没有四肢在那里运动，没有一切的作为，这就叫无为。但是就在这些无为之中“而成”，而成的，就是“天行健”。这个“行健”，可以通过天象来加以体会。天虽然是无为，但是它借着这个气象，来展现春、夏、秋、冬四时的不同。地球亦是如此，它承载我们人类、承载万事万物，它没有说一句话，也没有用手脚来替我们服务。但是一切事情，都是由大地配合这个气象来成就的，这叫“无为而成”。

凡是有为的，都是有限度的，因为有为就有所不为，有知就有所不知，必得无为才是无限度的，达到无所不为。古人让我们求无知，如果有知，就一定有所不知，当达到无知的时候，它起作用才是无所不知。

圣人的道德跟我们一般人的道德不同，一般人做一些善事，还希望对方报答。这就是“为德不纯”，这个道德是不纯粹的。圣人这个德呢？圣人做出一切有利于人的事情，既是平等，又不希望自己将来得到回报。圣人没有这个意思，是尽量地付出，不要回报的。尽量做有利于人的事情，而且是永久地、没有条件地、大公无私地去做，这个德就叫无为。而这种无为是本性里面的。本性是无为，由本性出来的德，表现出来的就是做任何事情，都像天地那样，没有任何界限，没有任何条件，而且还不求回报。并不是说，我替我们国家的人民来做事，我就只管我们国家的人民，别的国家的人我就不管。圣人的德不是如此，而是无论是哪一个国家的人，都是平等地关爱、平等地照顾，这就叫“无为而成”。必得学无法，这个“成”才是真正的“成”。

圣人无为的至诚之德，所做的那些事情，也都是为天下人来做的。他做的事情太多了，他的道德也是无穷无尽的，所以他的博厚、高明、悠久无疆，都是效仿天地、配合于天地，效仿天地的道德，也是他本性无为所自然而然表现出的。

“天地之道，可壹言而尽也。”圣人的至诚之德，是天地之道，“其为物不贰”。“不贰”就是专一的，“物”是事物。做一切事情、修这个诚，都是专一不贰，专一不贰才是一心。“其为物不贰”，就是做任何事情都专心做。譬如，我们求学，就是专心求学；办理政治，就专心办政治，一心为老百姓办事。做任何事情，都是专心地做那一桩事情。

“则其生物不测。”“不测”，不可以测量；“生物”，有圣人之德，对于天下人以及天下的万物，都能够让它受到圣人的教化，都能够让它学好，让它生存发展。有“生物”这种能力，就使万事万物都能各遂其生、

各得其所。“不测”，测量不到。天地之道是人测量不到的，莫测高深，就是指前面的博厚、高明。

圣人之德亦如此。圣人办政治的效果是无为而治。如尧舜的时候，尧帝到外面视察。有一个老人一边击着壤一边在唱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太阳出来了，我就出来工作；太阳下山了，日暮了，我就休息。我的生活所需呢？“凿井而饮，耕田而食。”我自己要喝水，自己凿了井就有水喝；我要吃粮食，自己种田就有粮食吃。“帝力何有于我哉！”我是自食其力的，天子，也就是当时的尧帝，对我有什么影响？这说明圣王办理政治就跟天一样，让那个老人，也就是下面的民众莫测。他感觉不到你的影响，但是实际上他是自自然然地获益。“凿井而饮”，井要依赖大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日出日落是天的能力；耕田要有气候在那里变迁，这都是天地的莫测高深。

圣人办理政治，也是利益万物，但是万物都不知道，觉得对它没有影响。圣人办理政治，为什么让人感受不到他的影响？根本一点就是圣人是自行化他，要求自己不要求别人的。他把正确的做出来，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在对别人产生影响。别人受到影响了，自己还没有感觉，潜移默化地、润物细无声地受到影响，这就叫无为而治。

所以正如尧帝只是把自己的德行修养好，然后再任命贤德之人，“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最后就可以垂拱而治。所以天地之道就是一句话：“其生物不测。”它能够生养万物、培养万物、教育万物，而万物感受不到它的影响，是自然而然、潜移默化地接受了它的教化，这是不可思议的。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我们要学圣人之德，就要学天地，天地之道就是这样博厚、高明、悠久。学成功了，这种道德自然就彰显出来，对别人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对世间有潜移默化的利益。

## 第四十二讲

君子以厚德载物



## 君子有宽厚的德行

坤。象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群书治要》卷一《周易》

坤卦。《象传》说：坤卦象征大地的气势宽厚和顺。君子应当取法大地，以深厚的德行，容载万物。

中国古代的圣人，是“明德”的圣人，真正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相。这些圣人明了宇宙人生的道理之后，才开始教化大众。教人向天地学习，顺从天地之道。为什么要向天地学习？因为真正的圣人明了天人合一，所以我们学习天地之德，就可以回归自己的本性。

《周易》的乾、坤二卦，不仅指天地、阴阳、君臣，也指男女。乾卦为男，坤卦为女。《周易·系辞》言：“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意思是男子要效法乾道，女子要履行坤德，所以中国文化提倡男道女德，道是道德的道。即男子要行天道，女子要显坤德。对于女德而言，应该效法大地，学习大地的宽厚精神。

大地能够承载万物、接纳万物，女子要有大地般深厚的德行，容载万物。具体而言，厚德载物这个厚，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用十二个字概括就是：宽容忍让、谦卑柔顺、慈良贞静。

第一是宽。宽指心胸宽阔。大地宽厚，才能够承载万物、接纳万物。人要有大地般开阔的心胸，不应斤斤计较，没完没了。一个人有宽厚之德，与人相处才会感觉到轻松自然，而不会令人感到战战兢兢。一个人如果事事挑剔、事事计较的话，就会让周围的人感觉到不轻松、不自然。

第二是容。地之秽者多生物。大地的这种容，是一种平等的容纳，对于人可以容纳，对于动物、植物可以容纳，而且即使是毒蛇猛兽，也都可以平等地容纳。学习容，就要学习大地的这种平等的精神，养成平等心。平等心不容易养成。我们对自己的亲人、自己喜欢的人，那是怎么说都说不够，怎么相处也不会烦。但是对于自己不喜欢的人，往往就不愿意说一句话，敬而远之。这些都是平等心不够的原因。如果产生喜欢和讨厌的分别，说明没有养成平等心。

此外，还要能够容人之过。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每个人在修学的过程中都不是完美无缺的，我们应该容忍、理解、接纳别人的过失，而不是求全责备，并且我们愈是能够容纳犯过失的人，愈能够引起过失人的惭愧心，就愈能够感化他。古人观人有很多方法，其中重要的方法是观察言语。《格言别录》提道：“德薄者，其心刻傲，见人皆可憎，故目中所鄙弃者众。”德行浅薄的人，心地刻薄傲慢，总是发现很多人有可憎恶、可挑剔、不如己之处。反之，“德盛者，其心和平，见人皆可取，故口中所许可者多”。德行深厚的人心平气和，见到每个人都有可取之处，都有值得我学习的地方，所以他口里所赞叹的人、认可的人就有很多很多。我们看一个人德行高还是德行低从哪里看呢？就是从一个人的言语中来看，言为心声。

第三是忍。忍字是“心”字上面放一把“刃”。即当用刀割自己的心时，还能心平气和，才是真正的忍。所以讲忍耐、忍辱，表现出来就是脾气好，从来不发脾气，待人一团和气，满面春风。

第四是让。让就是不居功，因为无我，心放在公利之上，为国家、

大众着想，所以能够让贤，把这个位子让给贤人。如果在一个团队中工作，能为团队的发展、前途着想，就一定会把德才兼备的人推举出来，自己让贤于人。

第五是谦，女子想要和谐家庭，成就丈夫，育好儿女，就要具有坤德，培养谦德。

谦卦的卦象是地山谦。平时高山都是在平地之上，但是在谦卦之中，高山宁愿居于平地之下，所以称为地山谦。这启示我们，虽然自己有功、有才能，但不居功自傲，还处处让着别人，不才智盖人。所以做女子的要效法谦卦，学习谦德。所谓“女子无才便是德”，并不是说女子什么都不会才是德，而是她不自以为很能干，自己再能干也不自以为是。这个就是谦德。

第六是卑。中国古人讲男尊女卑。一般人讲到男尊女卑，被认为是贬低女性，其实是完全误会了古人的意思。天在上，地在下，这就是效仿天地之道，要“天尊地卑”。男子效法天，像天一样宽广无私，自强不息，统领万物。做女子的要效仿大地，包容万物，承纳万物。女子处在最低处，并不是说处在低处了，就受轻贱，万事万物都依靠大地才得以生长，所用的资源也全来自于大地，所以她更重要。譬如大海，正是因为它低，所以才能够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不与人争，天下莫能与之争，这是古人教导女子要卑弱的真实含义。

第七是柔。女子柔顺如水。水的特点是“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它成就万物，但是从不争功。所以柔让人不忍心伤害她，还会生起保护她、帮助她的心，这就叫以柔克刚。柔弱不是软弱，像《老子》里讲：“柔弱胜刚强”，“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世界上没有比水更柔弱的东西了，水滴石穿，水能够战胜最强硬的东西。

第八是顺。和顺、顺从、配合，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夫义妇听”，这个听表现的就是顺。坤卦的《彖辞》中讲道：“至哉坤元，万物资生，

乃顺承天。”若“夫义”，做妻子的应该“顺承天”。应该顺从自己的丈夫，成就自己的丈夫，这就需要有深厚的德行；反之，妻子要听从丈夫，并不是说什么都听从，前提是“夫义”。也就是丈夫要讲道义，如果丈夫不讲道义，做事做错了，妻就不能一味地听从。

譬如，汉代班婕妤劝说君主不应与其同乘一车的典故。有一次，汉成帝在后宫游玩，打算和班婕妤一同乘坐车子，结果班婕妤推辞说：“臣妾观察自古以来的图画，发现圣明的君主身旁坐的都是有名的大臣，只有夏商周三代的亡国之君身边才有受宠的女子，现在陛下若是与我同乘一辆车，那不就和那些亡国之君差不多了吗？”成帝觉得她说得很有道理，就不勉强她了。太后听了这件事，非常高兴地说：“古时候楚国有一位樊姬，现在又有了班婕妤。”

第九是慈。“慈”字，上“兹”下“心”。慈就是念兹在兹。慈爱就是用心地感受对方的需要，用心地感受丈夫、儿女的需要，以至于达到念兹在兹的程度。所以女子有慈爱，就让整个家庭氛围非常温暖，每个成员都感觉到爱的包围。

第十是良。善良，能够帮助丈夫成就德行。《群书治要》中节录了很多有德的女子的故事。譬如，《群书治要·后汉书》节录了明帝马皇后的故事。马皇后是伏波将军马援的小女儿，在汉明帝永平三年，被立为皇后。她被立为皇后之后，更加谦和肃敬。她能够诵《周易》，爱读《春秋》《楚辞》，尤其喜欢《周官》。她穿的衣服常常是用厚缯做的，就是粗布的衣服，裙子上连装饰的花边都没有。宫中各位姬妃来请安的时候，远远地看她穿的衣袍很粗疏，认为是绫绸绉纱之类的，但是到了跟前一看，才知道是厚缯，她们就都笑了。皇后说：“这种厚缯特别适合染色，所以用它做衣服。”她的品德后宫没有人不赞叹的。

汉明帝去世之后，她做了太后，亲自撰写《显宗起居注》。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她删减了她的哥哥马防参与医药的事。汉章帝问：“黄门舅从

早到晚供养奉事将近一年的时间，既不给他褒奖，又不记载他的勤劳，这是不是太过分了？”马皇后回答：“我不想让后人知道先帝多次亲近后宫的家人，所以不录。”汉章帝打算给他的舅舅们进封爵位，也没有被马太后允许。

建初二年的夏天，遇到了旱灾。谈论朝事的人认为这是没有封外戚的缘故，纷纷上奏，应该按照过去的章程来封外戚。结果马太后下诏：“凡是言事的人，都是想巴结我来求得好处罢了。昔日成帝朝王谭、王商等五位侯爵，同一天受封，当时黄雾笼罩四野，看不见有及时雨的瑞应。再者田蚡、窦婴，宠贵骄横，招致了祸端，也是为后世所传闻。先帝谨慎地防止舅氏、防止外戚，不让他们在朝廷中枢占有爵位。对几个儿子的封赏，只让他们享有楚、淮等诸侯国的一半。先帝常说：‘我的儿子不应当跟先帝的儿子同样对待。’我虽然是天下之母，但是身穿厚缁衣服，饮食不求甘美，左右只穿黑布衣服，没有麝香、不加修饰的原因，就是想以身作则。我以为外戚们看到这些情况，都应该反躬自问，但他们只笑着说太后平日喜爱节俭。从前从濯龙门上经过，看到外家问候起居的人，车如流水，马如游龙，奴仆们都穿着绿色臂衣，领和袖子都是纯白色的，反回头看一看我的御者，不及他们多了。我之所以不加谴责他们，只是停止他们每年的开支费用，是希望能用这种办法使他们私下里觉得惭愧，但他们仍然懈怠，没有忧国忘家的观念。”这就是说，马太后不准给自己的兄弟们进封，是考虑到整个国家的兴衰，不愿意给整个国家造成不良的影响。

但外亲中凡是谦和本分、有义行的人，马太后都对他们温言劝勉，赏赐些财物。若有人犯有细小的过错，就先以严厉的颜色，然后再批评教育。对于那些车服华美不遵守法度的人，便取消他们的名分，遣送回归故里。这样一来，朝廷内外都受到感化，衣被车服规制如一，外家惶恐，比明帝永平年间更加谨慎。这些都是讲马太后自己率先垂范，感化了自己的兄弟，让他们能够自律，不去奢侈浪费、争功争名。

第十一是贞。贞洁，洁身自好。中国人认为女子要守身如玉，一定要珍爱自己，尊重自己，就是贞洁自尊。作为女子，一定要懂得自爱，懂得珍惜自己的身体。

第十二是静。安静而不浮躁，能够很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如果大地不稳定、不平静的话，就会发生地震，所造成的伤害必然很多。如果女子不安静，脾气不好，也会给家里带来不安定的成分。

一个真正有德行、有智慧的女人，就像大地一样地安静、祥和，效法坤道的自然无为，使万物并不感觉到是强有力的和被动的，而是自然而然地生长演化。这个安静也体现在做女子的要谨言慎行，她的行为才能够方正，才能够为人所效法。

总之，女德非常重要。不仅中国人强调，外国人也非常重视。譬如，英国的思想家斯迈尔斯在《品格的力量》中就这样写道：“女人的影响在世界各地都是一样的，不管在哪个国家中，她们的状况影响着这个民族的道德、行为方式和品格。哪里的女人素养恶劣，那个社会的素养也就恶劣；哪里的女人道德高尚有教养，这个社会就繁荣、就进步。”

## 君子不在乎富贵

不修善事，即为恶人；无事于大，则为小人。纣为无道，见称独夫；仲尼陪臣，谓为素王。即君子不在乎富贵矣。

——《群书治要》卷五十《抱朴子》

不行善事的，就是恶人；不奉事尊长的，就是小人。商纣王为君无道，所以被称为独夫；孔子身为诸侯的大夫，却被推许为素王。素王，就是有王者之德而未居王者之位的人。这说明君子并不在于是否有权势和

财富。

“不修善事”，就是不积德行善。因为我们行善，看到别人有需要，就去帮助他。见义不为就对自己的良知有损。对良知有损，心性就是在堕落。“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一个人不去修善事，不去热心帮助别人，那每一天都是在退步。自私自利的心就在增长。所以要“日行一善”，就是要把行善变成自然，自然而然，甚至我们都感觉不到。

“无事于大，则为小人。”“事”，事奉。不能够事奉恭敬尊长，不管是在家对待父母，还是在团队里对待领导，在学校里对待老师，不能够恭敬奉事的，就是小人的行为。如果一个人连对父母的孝、对老师的恭敬都没有了，很难不堕落到小人的行径。他到社会上怎么可能不和别人产生对立和冲突？

“纣为无道。”纣的行为荒淫无道，虽然是一国之君，却被人家称为“独夫残贼”，被认为是非常残暴的人。

“仲尼陪臣，谓为素王。”孔子当过鲁国的大夫，是一个辅助国家的大臣，但是后人都称他为“素王”。受到百姓的推崇，一直活在百姓的心中。

孔子在历代都备受尊崇。唐朝开元二十七年，唐玄宗封孔子为“文宣王”。宋真宗的时候，封孔子为“至圣文宣王”。元朝元武宗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大成至圣先师”这个称谓，就是从元朝来的。

元武宗言：“先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名”。在孔子之前出世的圣人，如果没有孔子把他们的教诲承传下来，后代根本就不知道有这样的古圣先贤。“后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法。”在孔子之后成圣贤的人，都是以孔子为榜样来效法。孔子真正是一位承前启后的大圣人，所以百姓尊崇他，称他为“素王”。

最后一句话说“即君子不在乎富贵矣”。一个人一生，对人民有多大贡献，不在于他的权势、地位，而是看他有没有智慧、德行。

## 第四十三讲

敦孝悌以重人伦



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

——《群书治要》卷九《孝经》

## 教育的本义

修学要从孝悌开始做起，这是学道的次第，《大学》言“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孔子以四科来教导学生，首德行，次言语、政事、文学。首重德行，即要“先正其心，后为文学，游于艺也”，这个教学的次序是不能够颠倒的。求学的次序是如此，教育的次序也是如此。当前的教育之所以出现了很多的弊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把教育的次序搞颠倒了。教育的次序，一定是《三字经》上所说的“首孝悌，次见闻”，先培养起一个人的孝悌之心，对父母老师谦恭有礼的态度，然后才是知识、技能，这样才不会学得愈多愈傲慢。

什么是教育？“教”在《礼记·学记》上解释为“长善而救其失者也”。从两方面理解：一是使人善良的方面不断地增长，二是使人的过失得以挽救，而做人的教育、德行的教育是教育的基础和核心。“育”，《说文解字》中解释，“养子使作善也”。不仅仅把儿子养大，还必须有良好的品格、高尚的道德。

有一位长者曾经提醒我们：你们这一代人很可惜，没有受过教育。我

们听了很不服气，我们都是硕士毕业、博士毕业了，怎么说我们没有受过教育？我们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但是当明了“教育”的内涵，反思自己是不是随着受教育的时间愈长，德行愈提升？抑或愈受教育，傲慢心、名利心愈来愈增长？但若没有学道的基础，没有培养起一个人正确的为人处世、待人接物的价值观，这些反而都会成为求道的障碍，愈学愈傲慢，愈学愈不把别人看在眼里。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在于把教育的次序搞颠倒了。

古代的圣贤，特别是古代的一些皇帝也读圣贤书，在教导百姓的时候，一定是依据正确的顺序。譬如，康熙皇帝曾经颁布了《圣谕十六条》用来教导百姓。圣谕的第一条“敦孝悌以重人伦”，在这一条下面这样写道：“善事父母为孝，善事兄长为悌”，“盖父母生我，有罔极之恩；兄长先我而生，有同气之谊”。这里解释了能够善待父母就叫作孝，能够善待兄长就叫作悌。

耐心侍奉父母兄长的人，不是为了要让人赞叹我们对父母兄长有多恭敬，而是从内心里深深地体会到父母的恩德。

《礼记·文王世子》中记载周文王悉心照顾他父亲的故事。“文王之为世子，朝于王季，日三。鸡初鸣而衣服，至于寝门外，问内竖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内竖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文王在做世子的时候，每天要到他的父亲那里问安三次。早晨天刚刚亮，鸡鸣头遍，他就起床了，穿好衣服，到父母的房门之外，问那些事奉父王的内侍：“父王今天的身体健康吗？没有什么问题吧？他的起居有没有和平常异样的地方？”如果内侍回答“安”，就是他的父王一切都安好，文王就会很高兴；到了中午的时候，文王又来了；文王从早到晚上都会到父亲那里去问安，而且仔细认真问内侍父亲身体健康状况，没有丝毫的懈怠。

如果父亲有身体不适的地方，内侍就会如实地告诉文王，“文王色忧，行不正履”，脸色忧愁，走路的时候都歪歪斜斜的，和平时不一样了。可

见，忧虑父母之心非常深切。等到他的父王身体恢复健康了，文王“然后亦复初”。而且对于父亲每次的饮食，他也是十分的关心，“食上，必在，视寒暖之节，食下，问所膳；命膳宰曰：‘未有原！’应曰：‘诺。’然后退”，他才恢复了常态。文王每天侍奉父亲，每上一次饮食，他都会亲自看一看食物的冷暖程度是怎么样的，因为食物过冷或者过热，都会伤及人的身体。每当吃完饭要撤下这些食物的时候，他一定要问一问父王吃得多还是少，够不够，是不是太饱等。还要问一问父亲喜欢吃的是什么，不喜欢吃的是什么，并且告诉厨师，凡是已经吃过的剩饭剩菜，就不要再进奉给父王了。为什么？“恐过时味变也。”恐怕时间长了，味道变了，父亲吃了有损健康。厨师们答应了，文王才退下去。

可见文王在做世子的时候，每次给父王问安都不是走形式，是在认真观察父亲到底需要什么，对他的饮食发自内心地关心。纵使身为天子身边定会有众多仆人，但是侍奉孝顺父母之事都是亲力亲为，这里“亲力亲为”很重要，就是不让别人代劳。因为做儿女的对于孝敬父母这桩事情，别人是代劳不了的，父母的感受也是不同的。而且孝敬父母可培养自己的爱心、感恩心，这也是别人取代不了的。

古代的圣王给百姓做出了孝亲的榜样，“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所以“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就是真正能够把孝敬父母、友爱兄弟之道做到尽善尽美。把真诚的爱心表扬出来就能够感通天地神明，让四海之内都充满道德的光辉，没有一个地方不受孝道的感化，无所不通。

## 不孝之人，习以成性

现在人为什么不孝敬父母了？原因有六个方面：

第一个原因是娇宠。因为儿女受到父母的怜爱太多了，父母经常顺

着孩子的性子，事事让儿女占先，做事首先考虑到儿女的需要、儿女的心，所以培养了孩子任性的习惯。突然之间，父母做了不顺孩子性子的事，就像我们现在所说的，十件事情九件事都让他满足了，只有一件事不能满足他，他就不能忍受，这就是因为孩子平时受娇宠已经习惯了。学了《弟子规》之后人们都知道，“或饮食，或坐走，长者先，幼者后”。有一对父母学了《弟子规》后，回家就改变了以前的饮食习惯，在家里吃饭的时候，没有首先夹给孩子，而是首先夹给了自己的父母，小孩看了第一反应是什么呢？他跳了起来，非常不满地说：“为什么我是最后一个？”他以前已经习惯于大家都照顾他了。他是第一个，结果现在他成了最后一个，小孩就忍受不了，因为他在家里处处以自我为中心已经习惯了，娇宠已经习以为常。可将来他走到社会上的时候，别人不买他的账，那怎么办呢？

第二个原因是习惯。如果一个人语言粗率惯了，就敢对父母说一些违逆的话；如果一个人对父母的照顾，行为简慢惯了，他就敢做一些放肆的事。父母对待儿女都是习惯于把好东西留给儿女吃，自己少吃，甚至不吃，久而久之儿女就习以为常了，儿女就不再体会父母吃得是不是习惯了；父母经常拖着重病去做家务，久而久之，儿女也已习以为常，就不再关心父母的疾苦了。

第三个原因是乐纵。有的人对朋友特别讲义气，可以为朋友两肋插刀，请朋友吃喝还非常慷慨大方。但是对于父母呢？对“双老而味薄”，对父母，出去请他们吃一顿饭都觉得浪费。对待朋友不嫌浪费，给予父母就觉得浪费。对待自己喜欢的人，会想方设法讨对方欢心；但是对待父母的时候，却默默无言，无话可说；更有甚者，自己学问高，境界高了，认为父母兄弟都是俗人，就不再愿意和父母兄弟相处。

学习了这些后，要反省自己。像我自己也走过这样的弯路，因为在兄弟姐妹之间自己学历最高，而且去国外留学，长了很多的浮华之气，对

家人没有发自内心的恭敬。经常是和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分享，聊得特别投机，滔滔不绝，但面对家人的时候，经常说话不顾忌，忘了他们是兄长、是姐姐，还经常指责他们，给他们挑毛病。结果久而久之，很难让他们服气。

第四个原因是忘恩，记仇。恩义、情义如果时间长了的话，人就容易忘记。古人说：“受人滴水之恩，常思涌泉相报。”但是常情却是人们对我们有恩，时间长了就淡忘了，而人与人之间的怨仇，累积起来愈结愈深，每想起一遍就把自己气一遍，久久不能忘怀。所以别人帮你一点小忙你可能就会对他感恩戴德，但是父母天天为我们付出，把整个的心都掏给了孩子，我们却总是忽略了对父母要感恩戴德。

有一则故事，一个小女孩在家里和父母吵了一架，一任性就离家出走了。结果身上也没有带多少钱，又冷又饿。后来她遇到一个好心的面店老板娘免费给她煮了一碗热面，小女孩对这个老板娘非常感恩戴德。

老板娘就问她：“你为什么离家出走呢？”她说：“我父母待我特别不好，说的几句话让我很生气，所以我就离家出走了。可是您却待我这么好，在我无依无靠的时候，还给我一碗面，也不收我的钱。”老板娘智慧又慈悲地提醒这个孩子说：“我也是为人父母的人，想一想，你从小到大，你的父母为你端过多少碗饭，为你洗过多少次衣服，做过多少事，你知不知道对他们感恩戴德呢？而我仅仅给你端过一碗面，你就这样地感恩，这样做是不是分不清轻重呢？”听了这番话之后，小女孩很惭愧，赶紧往回跑。跑到自己家巷子的时候，就看到她的母亲在焦急地东张西望，逢人就问：“你有没有看到我的孩子呀？”看到这样的情景，小女孩忍不住掉了眼泪。

对一饭之德，我们经常能够记在心上，感恩戴德，但是我们的母亲每天给我们做饭、洗衣服、打扫卫生，还嫌她给得太多了、太少了、味道重了、味道轻了，等等。而人家救济你一次、帮助你一次，你就对他感恩

戴德；家人常常帮助你，你却忘记了恩德，还嫌家人帮得少了。陌生人之间第一次相见总是会很有礼貌、很热情。但是长年累月地生活在一起，彼此之间就会有猜疑，更何况是父母兄长呢？他们从小就和我们生活在一起，慢慢地也就习惯了。

这就是“以亲爱为故常”，认为父母这样亲爱我，为我付出，给我拿钱花，这都是应该的。有的时候父母为我们担心，我们还嫌他们多事，违背了我们的意愿；父母教诲我们，我们还对他们的用词挑来挑去；甚至在鼓励我们、夸奖我们的时候，还招致我们的厌恶；有的时候，父母辛辛苦苦地庇护儿女，但是做儿女的还不知道报恩，也都习以为常。有的时候因为不理解父母的深情厚谊还怒目相向，对父母发脾气。对于父母的大恩大德，我们尚且认识不到，又如何能够想到母亲的胎养之劳、哺乳之苦。对母亲十月怀胎之苦，三年父母之怀的哺育之恩没有感恩之心，就是忘恩、记怨所导致的。

第五个原因是私财。也就是把财产看得太重了。财到了自己的手里，就认为是自己的了；而在父母的手里，就认为应该给儿女才对。钱财俱足的时候，忘了父母；钱财匮乏的时候，就希望从父母那里得到钱财；求钱财求不到的时候，就怨恨父母；父母需要儿女赡养的时候，就更加厌弃父母。在现代社会看到很多这样的事情：一个父亲含辛茹苦地把这个独生子养大了，但是父子为了钱财却吵上了法庭，形同陌路。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想一想，我们的身都是父母给的、父母哺育的，那这个财又是谁的财呢？

第六个原因是争妒。父母生的孩子有很多，父母对于儿女的照顾和爱护，其实都是平等的，但是儿女对于父母却有顺有逆，所以父母对儿女的爱也是不一样的。顺着父母的，父母对他们的爱就多一些；违逆父母的，父母对他的爱就少一些，这是非常正常的事。一个人如果失爱于父母，不为父母所宠爱，不要怨恨父母，应反求诸己是否自己哪里做得不好

才不招父母宠爱。

譬如，一般人可能都认为父母有重男轻女的思想。像我的母亲就经常当着朋友的面夸赞哥哥，但是对我就很少有夸赞之词。当时我心里就很不高兴，觉得母亲有偏心，重男轻女。但是仔细回想，确实哥哥对母亲的照顾非常细心。如我们回老家，天气非常寒冷，我母亲喜欢吃油条，我哥哥就不惜冒着严寒，走很远的路，也要把油条买回来。我自己就做不到。为什么非得跑那么远的路去买油条？感觉没有必要。所以父母对儿女有偏爱，那也是原因的，还是因为我们自己做得不够好。如果看到兄弟姐妹被父母宠爱就咬牙切齿，生起了怒气，如果让父母知道了，就会更加嗔怒。

以上这几种情况，是为人儿女应该时时警醒、事事检点、念念克制的，每时每刻、每一件小事，甚至每一个起心动念，都要从心底里去警觉。“勿以亲心之慈，我可自恕”，不要因为父母心地很仁慈，不和我们计较，就可以自己宽恕自己；“勿以世道之薄，我犹胜人”，不要因为现在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很多儿女都不赡养父母了，而我还能赡养父母、照顾父母，就认为我做得已经比别人好了。特别是现在一些媒体把子不孝的事情搬上电视荧屏，在社会上引起了一种负面影响，观众就以为天下的人都已经不赡养父母了，而我还能够赡养父母，比那些不知道赡养的人已经强了多少倍。反思古今孝的表现差距甚大，现在的人还自我感觉对父母已经很有孝道了，那是因为他是以自己的标准来评判自己的行为，并没有真正明白什么是孝。

一个人真正把孝悌之道做到了极致，就可感通天地，甚至使万国来朝。不仅把自己的国家治理好了，也能让天下的人都来学习和效仿。

历史上汉文帝之所以能够把国家治理好，让社会太平，就是因为他自己是一个孝子。他的生母薄太后生病三年，汉文帝在旁照顾，目不交睫，衣不解带，因为他时时要侍奉在母亲的身旁，困了的时候只能打一个

盹，甚至睡觉时连衣服都不脱。每次给母亲进奉汤药的时候，他都要先尝一尝温度合不合适，然后才敢给母亲进奉。汉文帝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奴仆众多，但是他作为一个孝子，能够从内心表达出对母亲的关爱，照顾母亲事必躬亲，结果上行而下效，整个社会兴起了孝悌之风，人心厚道，实现了天下大治。

所以作为领导者，能够率先垂范力行孝道，并进而提倡孝道的教育，这才是社会和谐、天下太平的根本。孝悌之心是爱心的原点，如果一个人对父母都不能发自内心地去爱反而去爱别人，这是违背常理和天道的。那么他对别人的耐心，对别人的爱心和付出，可能都是复杂的，是有利可图的。“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孝悌是仁爱之心的根本，正是从爱父母的身上，我们培养起了对一切人发自内心的真诚的关爱。很多领导干部对百姓没有爱心、没有同情心，就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父母都没有爱心，怎么可能全心全意地去爱老百姓？若他能够感受到自己父母的不容易，就能够感受到天下父母的不容易，对天下的百姓也会发自内心地去关爱。

## 第四十四讲

弃老取幼，家之不祥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无父何怙？  
无母何恃？出则衔恤，入则靡至。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  
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

——《群书治要》卷三《毛诗》

## 做人要懂得人情事理

《诗经》是中国历史悠久的一部诗歌总集，大部分都是周朝以前留下来的。诗歌可以陶冶性情，调节人的喜怒哀乐。

《礼记·经解篇》中讲道：“入其国，其教可知也。”进入一个国家，这个国家的人民所受的教育，接受了什么样的教化，是可以感受出来的。这是因为接受了“《诗》、《书》、《礼》、《乐》、《易》、《春秋》”教化的人格，特点都不相同。若接受了《诗经》的教化，会有“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的特点，通过《诗经》的教化，可以陶冶性情，让一个人具有温柔敦厚的特点。一个没有受过《诗经》的教化的人，可以说是敦厚有余，但是温柔不足，甚至不懂得什么是温柔。

《论语·季氏》中言“不学诗，无以言”，不学《诗经》，连说话都不会讲。因此，接受《诗经》教化，会有温柔敦厚的特点，说话言语绝对不会让人难堪，而是让人一听就高兴，促进关系和谐，一点都不刻薄，还容

易让人接受。

有人说，怎么不会讲话？我们每一天都在讲话。这里的“不会讲话”，意思是说不会讲让人一听就高兴的话、促进关系和谐的话，一开口就让人难堪、让人不舒服，所以学《诗经》就显得特别重要。

《诗经》里的诗分成三种，那就是“风、雅、颂”。《风》，“国风”。当时每个国家的诗歌都反映了一个国家的风气，所以有十五国风，《风》收集的是民间的歌谣。《雅》，分为《大雅》《小雅》。《小雅》是当时的贵族、在上位的人，在宴客的时候所演奏的优美和吟诵的音乐；而《大雅》是在朝廷朝会的时候，也就是比较正式隆重的场合，所奏的音乐。《颂》，就是歌颂古圣先王的。《颂》又分为三种，就是《周颂》《鲁颂》和《商颂》。写诗的手法又分为“赋、比、兴”三种。“赋”，就是我们所说的平铺直叙，直接把事情叙述出来，没有任何的修饰、比喻。“比”，就是比喻。“比”有两种，明喻和暗喻，这个“比”通常是明喻。“兴”就是暗喻，它先是以讨论一个东西起兴，然后引出真正要讨论的东西，再从此延伸出一些感受、联想、心情，这就是“兴”。本篇所学的这首诗，就是用“兴”的笔法写出来的。

“可以兴”，就是人学了《诗经》以后，能够从事物当中去感悟道理，然后也能用一些譬喻的方法去启发别人。这对于成年人特别重要。常听别人说：“我这个人讲话就是很直。”其实讲此话的时候，也是在给自己找借口。明明存着好心、存着善意去帮助别人，但是所说的话太过直接，让人接受不了。这就不能够达到预期的目的。

很多人很有才华，也很有善心，却帮不了别人，和人家相处时格格不入，因为总挑别人的缺点，并直截了当地指正出来，对方就很紧张，走路都躲着他走。所以应该反省自己，为什么有善心想帮助别人，却经常被人家误解。

我国历史上有一个“少娣化嫂”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叫崔少娣，

她未过门时就知道婆家四个嫂嫂经常吵架，甚至有的时候会大打出手。结果她嫁过去不到一年的时间，就把一家人团结在一起。最后这四个嫂嫂评价她：“这个五婶很贤德，我们跟她相比真不算人。”从这个评价中，就知道这个人是有真正智慧。她嫁过去之后，从不讲别人不好，而是时刻看到别人的需要，想到别人，任劳任怨。从娘家带回什么好吃的，先给嫂子吃，给侄子吃。有比较累的活，她先跑到前面去做，并说：“嫂嫂你们都辛苦了，我年龄小，我来做。”她把自己完全融入这个大家庭并把整个家风转了过来。

有一次她抱着侄子，侄子不小心尿到了她的衣服上，而她那天还穿着比较漂亮的衣服。嫂嫂一看，很不好意思，赶紧要把自己的儿子抱回来。当下崔少娣就笑着说：“嫂子别急，你这么急，吓到孩子了。”从这一句话中我们看，她遇到问题，首先想到的是对方的感受。她时刻为对方着想，时刻为对方的孩子着想，人心都是肉长的，一次、两次、三次，哪有不被感化的道理？

《论语·阳货》中总结《诗经》的教化作用，“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不仅如此，还“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就是你能够学会，并且能够记得很多的常识，包括这些鸟兽草木的名字。不仅是记下这些鸟兽草木的名字，并且通过诗歌，能够延伸出对人生的感悟，这就叫“兴”。

“兴”是暗喻。读了诗歌之后，要善于去领会，懂得举一反三。学会了《诗经》里面那些温柔的言语，就能善于用譬喻来提醒人，特别是成年人。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会愈来愈好面子，我们要能体恤人的面子，不能让人觉得难堪。《弟子规》中讲：“过不规，道两亏。”看到别人有过失，若不去规劝，那是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但是规劝也要注意方式、方法，要能够让人容易接受。古人说：“扬善于公堂，规过于私室。”鼓励人、赞叹人、肯定人的时候，要当着大众的面；而在规劝一个人过失的时

候，帮助纠正他错误的时候，要在没有人的时候，这就是顾全他的面子。而且规劝时，还要看这个人是不是很直率，有没有谦虚受教的态度。如果他可以接受，你就跟他直言；如果他不能接受，就要用暗喻，要点到为止。20岁以下的可以劝，20岁到40岁之间的，就只能暗示了，不能看到他的问题就直接说出来，这个就是人情世故。40岁以上的，要自己先做，把正确的一遍一遍地做出来，让他从中体会到自己的过失，正己才能化人。

《论语》记载，子路闻过则喜，禹闻善言则拜。这是因为古人从小就学习圣贤教诲，懂得“闻誉恐，闻过欣，直谅士，渐相亲”的道理。所以从小就喜欢别人指正自己的过失，他是在这种教育下成长起来的。有些孩子没有学过《弟子规》，从小生活在父母老师的赞叹、肯定声之中，在十二三岁的时候就已经受了一些不良的影响，这样就把他的天真很早就磨灭了，心性就被误导了。在这种情况下，变成10岁以下可以劝，10岁以上的想去劝他、教导他，都很难了，这也要与时俱进。

要会暗喻，就要学《诗经》，暗喻才是有智慧、有水平的。像本讲开头引的诗，就是暗示他的国君，不要再调人民去服劳役，甚至是参加战争，让他们不能跟父母相聚，一生痛苦不堪。这首诗虽然是“刺幽王”，就是劝告周幽王，但是读起来也会感觉到很美。

“可以观”，就是透过《国风》里的歌曲，可以观朝代的兴衰，甚至可以观个人、团体的兴衰；“可以群”，群指合群，跟人和睦相处，也能够从中得到启示；“可以怨”，这里怨指刺上政，提醒为政者。古人之所以敢于刺上政，敢于写这些诗来讽刺、提醒领导者，是因为在位者有一种谦恭受教的态度，“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愿意纳谏。

读圣贤书的时候，看《尚书》时，看到这些古圣先王在选拔自己身边的侍御仆从时，都选“罔匪正人”，没有一个不是正直的，敢于犯颜直谏的人。所以古圣先王特别设置了“太仆正”这一官职。这个官职专门教

导君王手下的侍御仆从，怎么样做一名合格而负责的侍御仆从。就是告诉他们不能够一味地迎合君主的喜好，谄媚巴结、阿谀奉承，而看到君主有过失的时候，能够当面指正，这才是一个合格的侍御仆从。

现在很多的领导者身居领导位置，却没有古圣先王的德行和智慧，又听不进别人的劝谏，结果只能在领导的位置上任意行非。所以身为领导者更应该诚惶诚恐，要学习纳谏的态度，才能够看清自己的过失，知道自己施政的得失。

“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就是通过学习这些诗，近处可以侍奉父母、劝导父母，并且延伸到劝导自己的领导者。《了凡四训》上告诉我们：“与凡年高、德高、位高、识高者，皆当加意奉事。”对于比自己年长的人，如果很没有礼貌，那么学习传统文化是没有根的。因为孝是中华文化的根，敬是中华文化的本，结果对长辈讲话都没有礼貌，没有恭敬之心，可见习气已经很严重了。

当然这也不能怪年轻人，正如经典上所言：“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语者，殊无怪也。”不仅我们这一代没有人学、没有人教，我们的上一代，再上一代，都没有生长在大家族的环境之中，都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孝悌、恭敬。古人生活在一个大家族之中，几百口人，上千口人，见到这个是大伯，那个是叔，大叔、二叔、三叔，一直排下去，每一天都是这样称呼的。习惯成自然，怎么可能像西方人一样，叫爸爸妈妈名字，叫哥哥姐姐名字？“长幼有叙”就是在大家族的环境中自然而然地培养起来的。现在的年轻人和年长的人怄气，在团队、公司、学校、单位里，不能够尊敬师长，说明这个人在家里一定忤逆长辈，这是根上出了问题。不把病根找出来，这些问题就解决不了。

“德高”，就是德行比较好，要尊重。面对德行好的人都不尊重，可能起傲慢心，甚至是起嫉妒心，那我们的善根就有问题了。《太上感应篇》中说：“见人之得，如己之得。见人之失，如己之失。”这是正常的同情

心。看到别人有获得，就像自己有获得一样高兴；看到别人有损失，像自己有损失一样难过，这是和别人有同样情感的心，是一个正常人的心态。如果我们看到别人德行好、受恭敬，自己心里就不满意，甚至起了嫉妒之心，那你的心就已经扭曲了。

“位高、识高者”，就是他的位置高，他承担的责任也重。识高，见识广泛，“皆当加意奉事”，都应该用心地恭敬对待，向他请教。“在家而奉侍父母，使深爱婉容”，在家侍奉父母的时候，态度就要柔软恭敬，柔声下气。所以学习传统文化，首先要从家庭里，从孝敬父母、侍奉尊长做起，懂得深爱婉容，把这变成我们的习惯，这样出门之后，对尊长才会有这种习惯，有这种态度。

《蓼莪》是斥责周幽王的诗，因为当时百姓辛勤劳苦，使得孝子都没有办法奉侍父母，让他们终其天年。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这句话就是“兴”。“蓼蓼”指长大的样子。莪草已经长得又高又长，我却把它看成了青蒿。批注上说：“兴者，喻忧思心不精识其事也。”因为心里充满了忧思，结果把莪蒿都看成了青蒿。

“哀哀父母，生我劬劳。”“劬劳”指劳苦、劳累的意思。可怜我那父母，为了养育我而劳苦憔悴。

“无父何怙？无母何恃？出则衔恤，入则靡至。”“怙”指依赖、依恃的意思。“衔恤”，就是含哀，心里怀着忧伤。“靡”，不、没的意思。没有父亲，我们可以依靠谁？没有母亲，我们可以仰赖谁？出门在外，心中悲痛，还一直思念着父母。回到家中，看到房屋空旷，再也见不到父母，就如同没有回到家一样。为什么像没有回到家一样？因为在外边看不到父母，回到家里依然也看不到父母。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父亲呀，是你生了我；母亲呀，是你养育了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父母，是你们抚育了我、疼爱着我、长养了我、教育了我，反复顾念、挂念我，出门入门

都抱着我。

“欲报之德，昊天罔极。”“昊天”就是苍天，“罔极”就是无极，像天一样没有尽头，是报之不尽的，无以为报的。想要报答父母含辛茹苦的抚育之恩，但是父母的深恩像苍天一样，报之不尽。

从这里可以体会到，孝子思念父母的恩德，时时都挂念着父母，体会到父母对儿女的恩德无量无边。

## 教儿教女先教自己

中国人有一句话说：“不养儿不知父母恩。”可是很多人已经养了儿，依然不知道父母恩，很多父母对自己的孩子照顾得无微不至、有求必应，对于自己的父母却是不理不睬、不闻不问。我们想一想，在这个世界上，对我们恩德最大的、付出最多的、最无私无求、无怨无悔的人是谁？那就是我们的父母。但是我们对谁最冷漠，对谁说话最没有耐心、最不客气、最不讲礼貌、最不关心他的感受？还是我们的父母。所以现在的很多人确实都活得颠倒了。

在自然界之中，羔羊尚有跪乳之恩，乌鸦尚有反哺之情。小的时候，小乌鸦不会飞，老乌鸦到处觅食来喂养小乌鸦。等老乌鸦老了，飞不动的时候，小乌鸦就会去觅食来反哺老乌鸦。所以一个人如果不孝敬父母的话，确实连禽兽都不如。

“人不学，不知道”，“人不学，不知义”。我们经常指责孩子说，你这个人不懂得为人要孝敬父母吗？可是仔细想一想，孩子从哪里学到的孝敬父母？古代都是大家庭，孩子能看到他父母怎样照顾爷爷奶奶，学会如何孝敬父母。到了学校，老师上的第一堂课，就是如何孝敬父母，这个孝是由老师来教导的，所以老师也受到特别的尊敬。家长在家里教导孩子尊敬老师，到学校老师教导孩子要孝敬父母。家长和老师配合，孩子很容易

受教。

教儿教女先教自己。要想让儿女孝敬自己，首先要把孝敬父母的这些做法，在生活中表现出来。“弃老而取幼，家之不祥也。”我们放弃了父母不去赡养，把所有的关爱都放在了孩子的身上，孩子都变成了“小皇帝”“小公主”，这是不正常的。所以有人把一个家庭中父母和儿女的关系用一棵大树来比喻，孩子是果实，父母是树干，爷爷奶奶是树根。若想大树长得硕果累累，应该把水、养分浇在根上，照顾自己的父母，这叫身教胜于言教。

父母对于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非常在意、非常关心。譬如，我们偶尔说一句话，我们很久都没有吃什么菜了，结果下一次回家的时候，我们自己喜欢吃的菜，就被父母端到了桌子上。虽然是一句不经意的话，但是父母都很用心。父母的心中是无时无刻不在惦记着儿女，如果儿女也无时无刻不惦记着父母，父母和儿女的心就非常容易感通。

再看一篇文章《母亲一生的八大谎言》。从中我们也能体会出父母对于儿女的那一番用心。儿时家里很穷，饭常常不够吃，母亲就把自己碗里的饭分给孩子吃，母亲说：“孩子，快吃吧，我不饿。”孩子吃鱼的时候，母亲不吃，又用筷子把鱼夹到孩子的碗里，母亲说：“孩子，快吃吧，我不爱吃鱼。”有一个冬天，孩子半夜醒来，看到母亲还弓着身子在油灯下糊火柴盒，孩子说：“妈，快睡吧，明早您还要上班呢。”母亲笑了笑说：“孩子，快睡吧，我不困。”高考结束的铃声响了，母亲迎上去递过一杯用罐头瓶泡好的浓茶，叮嘱孩子喝了，望着母亲干裂的嘴唇和满头的汗珠，孩子将手中的罐头瓶反递过来给母亲喝，母亲说：“孩子，快喝吧，我不渴。”母亲在父亲病逝之后，又当爹又当娘，苦不堪言，母亲多年来却始终不嫁，别人再劝，母亲也断然不听，母亲说：“我不爱。”身在外地工作的孩子常常寄钱回来补贴母亲，母亲却坚决不要，并将钱退了回去，母亲说：“我有钱。”孩子长大了，成了家，想把母亲接来享享清福，

却被母亲回绝了，母亲说：“我不习惯。”晚年，母亲患了重病，住进了医院，孩子千里迢迢赶回来时，术后的母亲已经奄奄一息了，看着被病魔折磨得死去活来的母亲，孩子悲痛欲绝，潸然泪下，母亲却说：“孩子，别哭，我不疼。”

看了这位母亲的谎言，确实是非常感动，因为这些“谎言”经常发生在我们的生活中。而母亲说这些“谎言”的时候，还说得特别认真，看起来就像真的一样，儿女也经常被她欺骗了，因为做父母的不愿意让儿女担心。做儿女的却很粗心，不能体会父母对自己的关爱，听了这些话之后，做儿女的常常还信以为真，甚至还以这些话为借口，不再去尽做儿女的孝心。我们想一想，哪一个父母不愿意和儿女在一起享受天伦之乐？为什么会说和儿女住在一起不习惯的话？因为他们到了儿女这里，儿女说他们这儿做得不好，那儿做得不对，整天被儿女挑来挑去的，所以他们确实不再习惯了。

父母对待儿女如此用心，做儿女的对父母，也应该尽心尽力地去孝养。现在的儿女对父母回馈的却是不耐烦，厉声厉色，所以古人把孝顺父母的人称为孝子，而现在的孝子成了孝顺儿子、孝顺孙子。还有人说得更好，“有的人有了儿，他就成了儿；他有了孙，他也就成了孙”。自己没有走在父母和爷爷奶奶的道上，而是走颠倒了，结果小孩被惯成了“小皇帝”“小公主”。没有人生来是“小皇帝”“小公主”，都是做父母的不会教，把他教成了“小皇帝”“小公主”。

中国人言“诸事不顺因不孝”。也许外国人会认为中国人不讲逻辑，做事顺不顺利与孝不孝敬父母都有关系？一个人不孝敬父母，他就没有知恩报恩的意识，不是以恩义、情义、道义的处事原则来待人接物，取而代之的就是一种以利害、以功利的原则为取舍、为处事态度。一个人以利害之心、功利之心与人交往，结果就是《周易》上说：“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你的朋友、领导、生意合作伙伴、属下等，都是以利害之心和你交

往的。

“以利交者，利尽而交疏”，以利益来交往，利益没有了，交情就疏远了。“以势交者，势倾而交绝”，彼此是以权势相交往，当你是领导者的时候，每一年过年过节送礼的人很多，但是一旦从位置上下来了，甚至锒铛入狱了，就会落得门前冷落鞍马稀。“以色交者，花落而爱渝”，彼此是以美色相交往，男的喜欢女的漂亮，女的喜欢男的英俊，但是有一天年华不再了，爱也就终止了。“以道交者，天荒而地老”，彼此是以恩义、情义、道义相交往，这种交往才禁得住考验，才能够天长地久。所以若感慨自己没有天长地久的朋友，一定要反思自己对父母的态度，反思我们是以恩义、情义的原则为人处世，还是以利害的原则在为人处世。

“教”（繁体）字很有深意，左上边是一个叉，下边一个叉，再下面是一个“孩子”的“子”，上边的这个叉是父母、老师所画的，下边这个叉是孩子、学生所画的，意指身教胜于言教。右边是一只手，拿着一个柳条，意指教育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老师、家长拿着鞭子、拿着柳条，不断地耳提面命，不断地提醒，要有耐心。所以孩子教不好，第一，反省自己的身教做得如何。第二，自己是否有耐心。因为孩子的习气形成不是一蹴而就，你要把他导正，也不是一次、两次的提醒就能达到的，要有耐心不断地去提醒，不断地去劝导。

# 第四十五讲

## 善事父母



## 大孝不匮

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劳，大孝不匮。思慈爱忘劳，可谓用力矣；尊仁安义，可谓用劳矣；博施备物，可谓不匮矣。父母爱之，喜而弗忘；父母恶之，惧而无怨；父母有过，谏而不逆；父母既没，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谓礼终。

——《群书治要》卷七《礼记》

孝道有三个层次：小孝用体力，中孝用功劳，大孝永不匮乏（能使孝道精神永远承传，使天下人永远保持孝心的精神，就是“大孝不匮”）。想到父母慈爱的养育之恩，而竭力供养父母，忘记了自己的疲劳，这可称为用力；尊重仁义，安守道义，可称为用劳；广施德教，使四海之内丰衣足食，人民都能礼敬、祭祀父母，这称为不匮。“博施备物”，指广博地施予民众，最重要的是以文化、道德来教导人民，让他们都懂得孝道。“备物”，古代祭祀父母、祭祀祖宗都要准备一些供品。让人民丰衣足食，以足够的、适合其身份的物品祭祀父母，彰显孝道的精神，这就是“不匮”了。

孝，古人解释为“善事父母”，关键就在一个“善”字，怎样做才称得上是善？首先要体会父母是怎么关爱儿女的。孩子襁褓之时，无法用言语表达自己的需要，但是父母依然能够体会到婴儿的需求，这是因为父母的全部心思都在儿女的身上。所以父慈子孝的“慈”字，上“兹”下

“心”，就是念兹在兹之意，父母的心无时无刻不在儿女的身上。《大学》言：“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没有先学会了怎样抚养儿女才去嫁人的。那她怎么就会抚养儿女了呢？就是因为她有真诚心，有爱心。

因此，想要做到善事父母，也要像父母当初照顾养育孩子一样，要全心全意地在父母身上，无论在事上还是在心上，都面面俱到，要让孩子吃得好，穿得暖；睡觉的时候，孩子把床尿湿了，母亲自己睡在湿的地方，而让孩子睡在干的地方；孩子得病了，父母宁愿自己代孩子受这个病苦，只希望孩子健健康康。父母关爱儿女，无论在事上还是在心上，都做得尽善尽美。做儿女的，应该怎样来善事父母？就是要学父母关爱儿女的心，去体会父母的需要才叫善。

善事父母要从一些具体的小事上表现出来。《弟子规》言：“冬则温，夏则清。晨则省，昏则定。”冬天的时候，要问问父母是不是太冷了，穿的衣服够不够厚；夏天的时候，看一看父母是不是太热了，要懂得照顾父母，不要让他们着凉了，也不要让他们太热了。早晨起来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去给父母问安。首先，看一看父母的需要。其次，因为父母心中总是牵挂着儿女，也是让他们知道你一天的状况如何。

我们经常听上一辈的人说我们这一代年轻人不懂得善事父母，缺少恭敬心，我们听了之后很不服气。学习了《礼记·内则》上的一段话，知道了做儿女的应该怎样善事父母，才觉惭愧。这段话是这样写的：“子事父母，鸡初鸣，咸盥漱……冠、绥、纓、端、鞞、绅、搢笏。”儿女侍奉父母，在鸡刚刚啼叫，天刚刚亮的时候，就洗手、漱口。戴上帽子，整理好帽纓，理好饰物；端是指古代的士大夫穿的正式的朝服，再把朝服穿上；鞞指蔽膝，古代当官的人都有一个蔽膝；系好大带，绅就是带子；搢笏，搢是插的意思，笏就是上书言事的笏板，把这个笏板也插好。然后“左右佩用”，还要左右佩带上一些用具，可能是父母公婆需要的东西。“以适父母、舅姑之所。”把这些穿戴好之后，就到父母公婆居住的地方。

“及所，下气怡声，问所欲而敬进之，柔色以温之。”到了父母公婆居住的地方，以欢愉的脸色和声音，问问父母公婆需要什么，就恭敬地敬奉上什么。“柔色以温之”，要和颜悦色，不能够有丝毫的不耐烦。

“父母有过，下气怡色，柔声以谏。”父母有过失的时候要心平气和，柔声以谏。即使父母做错了，你去劝说，声音也要放低，不能因为父母做错了，就可以戾声戾气。“谏若不入，起敬起孝，悦则复谏。”如果我们的谏言父母听不进去，要更加恭敬，更加孝顺，待父母高兴的时候，再次进谏，再次劝说。“父母怒，不悦，而挞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父母生气了，不高兴，甚至把自己打得头破血流，也不敢心怀怨恨，而是更加恭敬，更加孝顺。“父母虽没，将为善，思贻父母令名，必果。”父母过世了，将要做善事的时候，可能会遇到很多挫折，但想要给父母留下一个好的名声，就一定要把这个善事做成。曾子曰：“孝子之养老，乐其耳目，安其寝处，以其饮食忠养之。父母之所爱亦爱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于犬马尽然，而况于人乎？”曾子说，孝子奉养老人，要使其耳目愉悦，寝室安适，以他们的饮食习惯来尽心地奉养。父母所喜欢的，自己要喜欢；父母所尊敬的，自己也要尊敬。连犬马都会如此，更何况于人呢？也就是说在古人那里，从小学习的就是如何善事父母，把这些细节全都能够做到了，才是深体亲心，关心父母的身体。

古人说“生，事之以礼”，就是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要按照礼的要求去奉养父母。当然现在很多人看了这段话，可能觉得太烦琐了，哪有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花费在这个上面。确实，这样的礼在我们中国人的生活中基本已经看不到了。这就是文化的断层。文化的断层就是礼都记在经典之中，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已经不熟悉了，甚至已经看不到了。若儿女平时都是以这样的礼节来侍奉父母、孝敬公婆，那么久而久之，“习以成性”，习惯成自然，她认为这样孝敬父母公婆是正常的，怎么还会有偏颇的行为！所以礼确实能够起到防患于未然的效果。但是这么好的礼仪文化，却

被认为是吃人的礼教、封建的糟粕，结果我们看到现在父子之间、公婆和儿媳之间的冲突不断升级，甚至都吵到法庭上去了。正如左丘明言“人弃常则妖兴”。人把五伦常道都抛弃了，结果怪异的、妖魔鬼怪的现象、反常的现象全都出现了。现在我们看到中华文化的断层，确实非常严重。

“小孝用力”，小孝也不容易做到。孝敬父母要用体力，用劳力。在古代的时候，卢江有一个孝子叫毛义，他身处乱世，当时朝廷下檄文请他去当官。因为他想到自己做官可以有俸禄，奉养母亲，于是就很高兴。他的朋友张奉，本来非常仰慕他的德行，但是看到他接到檄文面露喜色，认为他也是一个追求名利的人，结果对他的恭敬心就消除了。

但毛义在母亲去世之后就终身守节义，不再去做官了。张奉知道后非常惭愧，才知当初误会了毛义。毛义当时面露喜色，不是因为自己能够荣华富贵，而是欢喜母亲不用再陪着他挨饿了。所以道德学问都讲究通权达变。不能为了表示自己的节义，贪好虚名，而把老母亲都给拖累了。

“孝”字上面是“老”字的一部分，下面是“子”字。这是告诉我们，上一代和下一代是一体的，而不是两个。如果有“两个”，这个孝就已经不存在了。因为我们没有体会到和父母是一体的关系，没有尽心尽力地和父母去沟通，没有让他们能够理解我们。

读书志在圣贤。读古代圣贤人的这些事迹，就要效法他们的行为，而不是把故事当成谈资，要学习圣贤人是怎样孝敬父母的。

现在大多数人过着一种“忙、盲、茫”的人生。第一个“忙”是忙碌的忙。工作、学习太忙了，所以心就会不敏锐了，已经不觉悟了，就变成了第二个“盲”。第二个“盲”就是看不见，看不到父母家人的需要。譬如，在母亲节的时候，记者去采访，首先采访了一个儿子，问：“你认为最好的孝敬父母的方式是什么？”结果这个儿子就开始夸夸其谈：“我要挣很多的钱，买大房子，买豪华的车子，让我的父母过上好日子，很有面子。”这个记者又去采访他的母亲：“请问您认为儿女最好的孝顺您的方式是什

么？”没想到这位母亲说：“我也不想住什么大房子，开什么豪华轿车，只希望我的儿女有时间多回家看看，陪我聊聊天，唠唠家常就够了。”因为生活的忙碌、工作的忙碌，已经看不到父母家人真正的需要了，很难体会到他们的感受，所以就变成了第三个“茫”。第三个“茫”就是茫然的茫。虽然自己赚了很多钱，事业很成功，在很多人心里事业成功的标准就是赚了很多钱。中国古代的汉字确实是智慧的符号，繁体的“錢”字的结构是左边“金”，右边“戈戈”，“金戈戈”就叫“钱”，是指若用钱不理智，把钱看得太重，就不惜为了这个金，拿着两把刀、两支枪去互相残杀。现在的人为了挣钱，顾不上照顾家人，也看不到他们的需要。虽然赚了很多钱，但是换得的是家人的怨声载道，甚至是妻离子散，最后就茫然了，说“我们这么辛苦不就是为了这个家！为什么大家都不理解我”。所以很多人说“现在很多人穷得就只剩下钱了”，这句话说得很有深意。

在赚钱的过程中忘记了朋友道义、父母恩义、兄弟情义，最后虽然获得了事业的成功，却发现没有一个是可以信赖的人，那不就穷得只剩钱了！

“中孝用劳”，通过这个“用劳”，我还想到了孔子的弟子子路的孝。“子路好勇”，他很勇敢，这是他的特点。他非常孝敬父母，虽然家里很穷，他自己吃的是很简单的野菜，但是不忍心让父母也和自己一样吃野菜，因此他要到百里之外给父母背米，不论严寒还是酷暑，年年都是如此。等到父母过世之后，他到楚国游历，跟从的车子有上百辆，随从也很多，享受的俸禄也非常丰厚，吃的是山珍海味，但是他说：“思欲食藜藿，为亲负米，不可得也。”虽然吃的是山珍海味，跟从的人车水马龙，非常有排场，但是他还想像以前那样到百里之外为父母背米，却已经没有这个机会了。因为父母已经过世了，体会到了“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遗憾。孔子听了之后这样说：“由也事亲，可谓生事尽力，死事尽思者也。”子路这个人侍奉父母，做到了在父母活着的时候，能够尽心尽力地供养父母；到父母过世之后还能够思念父母，没有忘记父母的养育

之恩，还有思亲的这种情义。

中国古人一年都要举办两次祭祀，提倡“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父母过世，谨慎地办理丧事，追奠亡故的先人，怀念父母，这是表达了一个孝子的知恩报恩、饮水思源，所以提倡祭祀，民风就自然而然地淳厚了。

“父母爱之，喜而弗忘；父母恶之，惧而无怨；父母有过，谏而不逆；父母既没，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谓礼终。”父母喜爱我们的时候，做子女的一定是高兴而不敢忘怀；父母厌恶、嫌弃我们，做子女的应该深加警惕，而没有埋怨；父母有了过失，要婉言劝谏，而不敢忤逆；父母过世之后，要以正当所得的收入来祭祀他们，这才是有始有终的孝亲之礼。

“小孝用力”，讲的是要养父母之身；“中孝用劳”，这个“劳”是功劳；“尊仁安义”就是自己要走在道德的路上，这是养父母之心。即使父母厌恶我们，我们也没有怨言，这就是让我们时时刻刻培养起不和任何人起对立的一种意识，把这作为自己待人处事的一个原则。从对待父母的身上，培养起了一个对待任何人的为人处世的原则。若我们对父母有悖逆之心，走上工作岗位，对领导、对长官、对朋友、对同事也会有这种悖逆之心。

“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这也是养父母之志。因为父母不仅希望我们能够赡养他们，更希望我们能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能够走在道德仁义的路上，这才是尽到了有始有终的孝亲之礼。

## 立身行道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

——《群书治要》卷九《孝经》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身体是来自于父母，所以要善待自己的身体，不让父母为我们担心。“身有伤，贻亲忧”，如果身体有损伤，或者生病，都会让父母为我们忧虑。“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修养自身，奉行道义，让自己立身处世都能够走在道上，这是使父母的声名能够扬于后世。优秀的孩子是由有德行的父母生养教育的，所以孩子名声显扬于后世，也会使父母获得荣耀，这是实行孝道的最终目标。所以实行孝道，开始于侍奉双亲，推广于事奉君王，最终的目的则是立身行道。因此，善事父母，要做到这个“善”字非常不容易。

《弟子规》上言：“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这个“父母呼”不仅是呼喊我们的名字。当呼喊我们的名字的时候，我们不能爱答不理，装没听见，顶多不耐烦地回答一句：“干吗呀？没看我正忙着吗？”这就是不孝了，这是从浅层次的意思讲这个“呼”。父母这个呼，不仅有呼出来的，呼喊你的名字，还有一些呼声是没有用语言表达出来的，你要善于去体会。譬如，父母希望我们做什么呢？父母培养了我们，是希望我们学做君子，学做圣贤；希望立志高远，学有所成，“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为国家、为民族有所贡献；甚至希望我们能够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些全都是父母的呼声。我们要反思，是否真正满足了父母的呼声。我们有没有尽心尽力地来满足呢？我们把自己的学业学好，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把自己的本分尽到，这都是在响应父母的心声，所以“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才是孝的终结。

## 长守富贵之道

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满而不溢，所以长守富也。富贵不离其身，然

后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盖诸侯之孝也。《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群书治要》卷九《孝经》

这段话讲的是诸侯如何尽孝，也就是领导者、在位者应该如何尽孝，如何长久地保持富贵。

“在上不骄，高而不危。”一个人身居高位，能够敬上爱下，没有骄傲之心，尽管地位再高，也不会发生被倾覆的危险。“制节谨度，满而不溢。”费用能够节俭、节约，就叫“制节”。奉行天子的法度，这叫“谨度”。一个人能够节俭又守法，即使财富再丰裕，也不奢侈浪费，这就叫“满而不溢”。

“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高高地居于位置上，但是没有被颠覆的危险，才能够长久地保持尊贵的地位。“满而不溢，所以长守富也。”虽有一国之财而不奢泰，故能长守富。诸侯都是拥有一个诸侯国的财富的人，但是不奢侈不过分，这样才能长久地守住财富。“富贵不离其身，然后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盖诸侯之孝也。”一个人虽然身处尊贵的地位，而且能守住财富不离其身，这样才能保住自己的国家，使人民和乐相处。这就是诸侯的孝道。

《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战战”，恐惧的样子；“兢兢”，戒慎的样子；“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好像站在深渊面前，或者是在薄薄的冰上行走，都非常危险，要特别小心谨慎。这句话是告诉我们，诸侯尽孝道必须做到制节谨度，满而不溢。骄傲和奢侈，其实是现在一些领导者存在的特别严重的两个问题。

《周易》言：“一阴一阳之谓道。”观察天地自然的变化都是盛极必衰、消极必长。这个物极必反的道理，在自然界中时时都有表现。譬如说日与夜，寒与暑，春夏与秋冬，潮涨与潮落。古人观察天地自然的规律，来指

导我们做人不能够骄傲，不能够太过分，否则会给自己招致危险。《周易》言“人道恶盈而好谦”，人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厌恶骄满的，喜欢谦虚的，所以谦卦六爻皆吉。

《周易》有六十四卦，每一卦都有六爻。六爻的爻辞有凶有吉，但是在所有的六十四卦之中，只有谦卦是六爻皆吉的。谦卦的卦象是地山谦。高山本来是在平地之上的，但是在谦卦之中高山宁愿居于平地之下。一个人如果有权有势，又才华横溢，此时，君会戒之，臣会妒之，因此，就要像曾国藩一样推功于上，让利于下。事情做好了，不能把功劳都揽在自己的身上，要推给皇帝，推给领导，说都是领导的支持，领导不支持，我这件事做不成。让利于下，这个利益不能让自己去贪得，贪得无厌就会招致怨恨，要把利益分给属下，没有属下的支持和辛劳付出，这件事也依然办不成。所以说是推，其实也不是推。他是真正明了了这个事实真相，应该明了任何一件事情的成功，都不是一个人聪明智慧的结果。如果没有领导的支持和下属辛勤的付出，这件事依然做不成。所以谦卦，确实是懂得了宇宙人生真相的人为世人提出的为人处世的原则。《尚书》言“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骄满给人带来损失，谦虚给人带来利益，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道理。一旦一个人骄满了，认为自己比别人强，就不会再有好学的品质，他的人生就很难再进步了。

这些道理，都是古代圣贤人观察天地之道给我们提出的怎样长久地保持富贵的方法。现在的领导者，都应该好好学一学。

# 第四十六讲

## 孝无终始



## 非法不言，非道不行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无择言，身无择行，言满天下无口过，行满天下无怨恶。三者备矣，然后能守其宗庙。盖卿大夫之孝也。《诗》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群书治要》卷九《孝经》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法服”指按照古代的礼法规定，不同的等级穿着不同的服饰。古圣先王制定的礼服，一共有五服，也就是五种服饰：天子要穿天子的服饰，诸侯要穿诸侯的服饰，卿（也就是大臣）要穿卿的服饰，大夫有大夫的服饰，士人有士人的服饰。这五等人的服饰不能随便调换。不像现在的服装，没有尊卑等级的秩序。为人臣的卿大夫，最重要的就是要遵守礼法，所以这里讲先王所制定的礼服标准要严格地遵照，这是守礼。

“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法言”指如理如法之言。“德行”指“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不符合道德仁义的话，不敢说。不符合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德行，不敢行。如果卿大夫能够严格地守法，遵守礼制，言语行为就不会有任何的过失。

为什么古人讲的法言、德行不应该违背？为什么我们对古人要深具

信心？我们这样学习是不是不讲创新？古人所讲的东西就一定比现代好吗？我们知道，古人有一个特点，就是心地清静。心就像水一样。当水起波纹的时候或起大风浪的时候，加上泥沙的影响，对外界的映照就不会如实地反映，反而会产生歪曲。现代人和古人相比，最突出的特点是心浮气躁。譬如，读书人忙着去评奖，忙着到处讲课挣薪水，结果就没有时间坐在书桌前静下心来读书。写出来的东西，无法与古人相提并论。古人的文章短小精悍、言简意赅，但传承千古，至今读起来仍能产生强烈的共鸣。而现在个别的读书人，即使是博士毕业，洋洋洒洒几十万字的博士论文却并没有真知灼见，有些甚至是东拼西凑的结果。

我们之所以对古圣先贤深具信心，正是因为他们的心地比我们清静，他们的智慧经过了历史的检验，是大浪淘沙的结果。所谓“非法不言，非道不行”说明不是符合礼法的事情不能说，不是符合道义的行为不能做。这也就是孔子对颜回所说的“四勿”，即“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论语》记载：“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孔子所学就是古圣先贤之道，他一生所秉持的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精神。“古”是指古圣先贤之道，即古代圣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尚古不代表传统文化不讲创新，而是注重掌握蕴含于其中的恒常不变的规律。

《周易》的“易”有三重含义：第一个含义是变易、变化的意思。说明世间的人事物变化莫测、变幻无穷。所以必须与时俱进。“易”的第二个含义，是不易的意思。虽然现象是变化莫测的，但规律是不变的。只有掌握了不易的道，才能够以不变应万变。就像老树每一年都会抽新芽、发新枝，但是它的根并没有变。“易”的第三个含义就是简易，大道至简，说明真正深刻复杂的道理，都是用非常简单的意思表达出来的，目的是让人们易学、易懂、易记，并在社会中去普遍地推行。所以虽然现象变化莫

测，但是只要把握不易的规律、不易的道理，就能够把事情处理好。看似变化莫测的现象，其实都有一个根本，只有抓住这个根本，才能把问题解决好。

之所以强调学经典，是因为圣贤之道是千百年来历史经验所验证的结果，是经过大浪淘沙留下来的智慧。现在很多人喜欢看书，知识面也很广博，但是所看之书未必是经典。特别是在这个知识爆炸的时代，如果对自己所阅读的书、所看的电视节目没有选择的话，可能看得愈多，受的污染愈严重；看得愈多，问题也愈多，烦恼也就愈重。一旦对学习内容不加选择，很可能使人本来清净的心性受到更多潜移默化的染污。

《贾子新书·修政语》记载了一段话，说明了学习古圣先王之道的原因：“汤曰：学圣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静思而独居，譬其若火。夫舍学圣之道，而静居独思，譬其若去日之明于庭，而就火之光于室也。然可以小见，而不可以大知。是故明君而君子，贵尚学道，而贱下独思也。”这段话将学古圣先王之道的人比喻为太阳。一个人静坐冥思苦想的时候，如果舍弃了学圣贤之道，就像舍弃了外边的太阳光明，而去屋子里接近小的烛光。烛光虽然可以让你有小小的见识，但是获得不了大智慧。所以明智的君主都崇尚学圣贤之道、崇尚诵读经典，而不是一个人独自地冥思苦想。因此，要学就要学经典，只有学圣贤之道，才能够学有所成进而变化气质。

学习的过程不是一个不断增加的过程，而是一个不断减少的过程。如老子所言“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才能无所不为。不是你学得愈多愈好，因为你有知，就有所不知，你知道得再多，只要有知，你就有不知的东西。怎样才能做到无所不知？那就要求无知，无知才能无所不知。所以老子讲究“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这是中国古人和西方人求学不同的地方。

“口无择言，身无择行，言满天下无口过，行满天下无怨恶。”如果

所作所为都遵循道法，遵循古圣先贤之道，遵循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自然而然地就形成了习惯，所以无须刻意选择。那么纵使言语传遍天下，也不会口中有失。即使所作所为，为天下人皆知，也不会有怨恨厌恶。

“三者备矣，然后能守其宗庙。”服饰、言语、行为都能够遵守礼法道德，就能够守住其祭祀先祖的宗庙，这就是卿大夫的孝道。

“《诗》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夙”，指早的意思。“夜”，指暮的意思。“一人”，要求卿大夫早晚勤奋不懈地事奉天子。这样才能实现其孝道。

## 忠顺不失，以事其上

故以孝事君则忠，以敬事长则顺。忠顺不失，以事其上，  
然后能保其禄位，而守其祭祀，盖士之孝也。

——《群书治要》卷九《孝经》

这段话讲的是士人应尽的孝道。士人指读书人。读书人之所以称为士，是因为他读圣贤之书。进，可以为国家服务。退，也能够在自己的乡间教书，把古圣先贤的教诲传承下去，促进社会风气的改善。古人讲士、农、工、商。士，读书人，有清高的品德，是最受社会大众尊重的，排在第一位。孟子所谓的“无恒产而有恒心者”，他学做君子、学做圣贤的心恒常不变，正是因为他有这种清高的品格，所以特别受到社会大众的尊崇。

什么样的人才能称为士？《孔子家语》中记载着“五仪”，鲁哀公向孔子请教，怎样任用鲁国的士人治理国家？孔子言，人分为五等，即庸人、士人、君子、贤人、圣人。

“所谓庸人者，心不存慎终之规，口不吐训格之言，不择贤以托其

身，不力行以自定；见小暗大而不知所务；从物如流而不知所执，此则庸人也。”庸人，就是心里没有存着谨慎行事、慎始慎终的原则，口里也不讲伦理道德的教诲之言，因此他们不会选择贤人以托付终身；不会力行伦理道德以成就自己；在小事上明白，在大事上糊涂；随波逐流而没有主见，此谓“庸人”。世间的庸人很多，不懂得提升个人道德修养和人生境界，目光短浅，心胸狭隘，唯利是图，随波逐流，整天谈论家长里短、鸡毛蒜皮的小事。

“所谓士人者，心有所定，计有所守，虽不能尽道术之本，必有率也；虽不能备百善之美，必有处也。”士人心中有目标，做事有原则。虽不能尽知道德学问之根本，但一定有遵循的标准；虽然不能完美地具备各种美德，但一定有安处的规范、道德。

“是故智不务多，务审其所知；言不务多，务审其所谓；行不务多，务审其所由。”所以他的智慧不务求多，而一定有判断，明了是非善恶；言语不务多，但能够明确地表达意欲；行为不务多，但知道行为的原因。

“智既知之，言既得之，行既由之，则若性命形骸之不可易也。”既然知道了善恶，言语也能够表达清楚，能够知道它的要点，行为的原因也明了了，就要像性命身体一样，不会改变了。心有所主，不会随意地改变自己的志向。

“富贵不足以益，贫贱不足以损，此则士人也。”富贵不足以让他更加骄傲，贫贱也不足以让他有所忧戚，这就是士人。因此，做一个士人也不易，士人有明确的目标并要坚持不懈，做到宠辱不惊。

“所谓君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怨，仁义在身而色不伐，思虑通明而辞不专，笃行信道，自强不息，油然若将可越，而终不可及者，此君子也。”君子的要求比士人就更高，说话忠诚守信，心里没有埋怨；行为符合仁义道德，但又不夸耀自己的神态；思虑通达明了，言辞却不专断，信奉道义且身体力行、自强不息；他的所作所为是自自然然的，好像能够超

过他，但终究又赶不上。这就是君子。

“所谓贤者，德不踰闲，行中规绳。言足法于天下，而不伤于身。道足化于百姓，而不伤于本。富则天下无宛财，施则天下不病贫。此贤者也。”所谓贤者，他的德行符合礼法的要求，中规中矩，没有逾越。他的言论可成为天下的标准，让天下人效仿，又不伤害到他自身。他的道义可教化百姓，也因为他自己身体力行，所以伤不到本人。他的富裕使天下人都不会积财丧道。因为他会惠施百姓，也就没有病贫的人。这就是贤者。

“所谓圣者，德合天地，变通无方，穷万事之终始，协庶品之自然，敷其大道而遂成情性，明并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睹者不识其邻，此圣者也。”圣者与天地合其德，不像贤者那样中规中矩地去做事，没有执念，会随着时节因缘变通无碍地做事。譬如，孟子评价孔子，说他是“圣之时者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他能够穷究万事万物始终的规律和道理，能够使万物自然协调，能够把他的大道传布天下，使天下人自然地改变情性，形成一定的道德品性。他的光明与日月同辉，他的教化影响神速，效果神奇。一般的百姓不知道他的德行这样高大，即使见到圣人，也不知道他高深莫测。因为圣人不是要故意表现得与众不同，他看起来无异于常人。但是实际上，他的德行教化影响却非常广泛，这样的人就是圣者。

《论语》中也有一段话专门解释“士”。子贡问：“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孔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士人是非常有羞耻心的，他自己的行为全都符合于道德，像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如果一个人没有羞耻心，做什么事都无所谓，久而久之就堕落得离禽兽不远了。所以孟子说：“耻之于人大矣。以其得之则圣贤，失之则禽兽耳。”特别是做老师的，学为人师，行为世范。这个“耻”字就更重要，如果行而无耻，这样的人就不堪称为人师。有耻心，进能够成为圣贤，退也不失为君子。“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就是这个士人接受了国家的任

务，他出使任何国家，都不会给自己的国家丢面子。

子贡可能觉得这个还是很高的标准，就问：“敢问其次。”孔子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悌焉。”在宗族里边，在邻里乡党之中，人人都称你是个孝子，而且做到兄友弟恭，这个德行也是不错的了，这种人也可以称为士人。

子贡又问：“敢问其次。”再退一步怎么讲？孔子说：“言必信，行必果，硠硠然小人哉！”说话要诚信，做事要坚决，不能够知而不为。因此，学习圣贤教诲就要真干，真落实。“硠硠然”，是形容石头碰撞时发出的声音表示不改变的意思，就是要矢志不渝、锲而不舍。“小人哉”，此小人是从德行意义上的小人，虽然没干大事，但是也能够做到谨守道德仁义，这样也不失为一个士人。

孔子讲了这三个层次的士人，即使是第三等的士人，也有坚持真理、锲而不舍的精神和知行合一的做法。不能够兼善天下，至少也能够独善其身，这样的人才够士的资格、士的标准。

“故以孝事君则忠，以敬事长则顺。忠顺不失，以事其上，然后能保其禄位，而守其祭祀，盖士之孝也。”作为人臣最重要的就是尽忠，《孝经》中体现了一个很重要的精神就是“移孝作忠”，“忠”，“尽己之谓也”，竭尽全力地把自己的本分职责做好，让领导放心。“君”就是在位的领导者，让他们放心就是尽到了忠心。

用侍奉父母的孝心来奉事国君，就能够做到忠诚；用奉事兄长的敬心来奉事上级，就能够做到顺从。《弟子规》中讲“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一个孩子在家里孝顺尊敬父母，他走上社会也会表现出这种恭敬和孝顺，老师呼，应勿缓；老师命，行勿懒；老师教，须敬听；老师责，须顺承。领导呼，应勿缓；领导命，行勿懒；领导教，须敬听；领导责，须顺承。这就是我们所讲的执行力。

中国人特别重视孝道，从对父母的态度上，培养起了对领导、对长辈的忠顺态度。“忠顺不失，以事其上，然后能保其禄位，而守其祭祀，盖士之孝也。”做事能够竭忠尽智，而且能够顺从，做什么都没有缺憾和过失，用这样的态度来事奉国君和上级，就能够保住自己的俸禄和职位，守住宗庙的祭祀，这就是士人应尽的孝道。

这是告诉我们怎样移孝为忠、移孝作忠。在家里把对父母的孝心移到对国家、对人民服务就是尽忠，而能够尽忠才能够保全自己的家业，也才能够更好地对父母尽孝，这是相辅相成的。这是讲士人的孝道。

## 谨身节用，以养父母

因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此庶人之孝也。故自天子至于庶人，孝无终始，而患不及己者，未之有也。

——《群书治要》卷九《孝经》

这段话是讲一般百姓的孝道。“因天之道”，“因”，顺着、顺应，顺应着天之道。古代人讲生产、生活都要顺应自然的规律，这样才是最健康、最养生的生活方式。古代是农业社会，农耕要顺应天时。

古人认为生产、生活要顺应自然之道，这样才是最健康、最养生的生活方式，一年有春夏秋冬四个季节，一天也有春夏秋冬四个季节。一天的春天就是日春，凌晨三点是一天的立春，春天来了，春天主生发，意思是说我们可以起来，可以活动，可以工作了；五点是一天的惊蛰，惊蛰是冬眠小动物开始活动的时候，五点你起来锻炼身体，一天都会身心愉悦健康，很有精神；六点是一天的春分，也就是春天的一半要过去了，最迟不能超过六点起床，否则你赶不上春天的生发，春天生得不好，夏天长得就不会很茂盛。

夏天是上午的九点到下午的三点。很多人睡得很晚，结果第二天九点以后才起床，没有赶上春天的生发季节，直接就进入了夏天，那么这一天无论你睡了多久，还是会昏昏沉沉、无精打采。下午的三点钟到晚上的九点钟，属于日秋，秋天主收，这个时候就不能做激烈的运动，做激烈的运动就会影响晚上的睡眠。

晚上的九点钟到次日凌晨的三点，是一天的日冬，就是一天的冬季。这个时候是最好的休息时间，特别是晚上的十一点到午夜一点，这是一天的寒冬。如果这个时候还不睡觉，就如同穿着单薄衣服出现在寒冬腊月，对于人的身体健康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对比喜欢过夜生活的人，和按照自然节律饮食起居的人，前者不知道保养自己的精神，脸上暗淡无光，脸色发黑，没有光泽；而后者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按照自然节律饮食起居，他们脸上满面的红光，脸上有光泽。

同时，按照自然节律饮食起居才健康，早饭吃好，中午吃饱，晚上吃少。结果现在人恰恰颠倒了，这就有损自己的身体健康。早晨要去上班，又起得晚，所以匆匆忙忙吃了一口饭。中午是在单位里吃，也就吃个盒饭，或者在食堂将就一下。到了晚上，却大吃大喝。应该吃得少的时候，恰恰吃了很多，结果给自己的消化系统带来很大的负担。第二天早晨起来，食物尚未消化完，一打饱嗝，一股臭味喷涌而出。所以很多人口气很重，都是和自己没有按照自然节律饮食起居有关。

古人特别讲究养生之道。讲上医治未病，不治已病，按照自然节律饮食起居是最健康的。《礼记·月令》篇上言，要吃当地的、当季的，甚至是方圆三十里之内的食物，是最健康的、最养生的。而很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花了很昂贵的钱去买进口的水果，殊不知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们吃了进口的东西并不一定就健康。

“分地之利”，就是要充分辨别土地的好坏和适应情况，来获得最大

的收成。

“谨身节用，以养父母。”此处有批注“行不为非，为谨身；富不奢泰，为节用”，也就是自己的所作所为都符合正道，不为非作歹，叫谨身，谨慎自己的行为以遵守礼法要求。“节用”，就是节俭，不过分地消费。谨慎遵礼，节省用度，以此来供养父母，这是老百姓应尽的孝道。

唐玄宗把这四个字用三句话来批注：“身恭谨则远耻辱，用节省则免饥寒，公赋既充则私养不阙。此庶人之孝也。”第一句话讲身恭谨能远耻辱，即谨身之意。谨慎自己的行为举止和品德修养，能够自然地远离耻辱。耻辱都是因为自我放逸的结果，不自重、不自爱，所以才会遭到耻辱。特别是在污染、诱惑多的现代社会，如果没有恭谨之心，就很容易遭到耻辱，败德坏名，甚至是身败名裂，辱没自己的父母。

第二句“用节省则免饥寒”，同样适用于当代。因为当代社会，很多人都养成了铺张浪费的习惯。所以古人提醒我们，家败离不开一个“奢”字。即使是万贯家资也不够一个败家子破败散掉。因为他吃得太过分，穿的都要求名牌，这还不算，还有很多不良的嗜好。这样大手大脚地浪费，即使是万贯家资也迟早会败散掉。所以古人说“至要莫如教子”。

第三句“公赋既充则私养不阙”。“公赋”即现代的税收，有所收入，就要向国家缴税，是每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不偷税漏税，过日子会特别安稳，财富也会愈来愈多。这里讲的是老百姓的孝道。

总结前文，“故自天子至于庶人，孝无终始，而患不及己者，未之有也”。“孝无终始”，这个“终始”指孝道始于天子，终于庶人。五等之孝，无论是天子、卿大夫、士到庶人，都能够行孝。所以不分高低贵贱都要行孝，这就是“孝无终始”。“而患不及己者，未之有也。”孝道是人人能够做到的，不要担心自己做不到，那是不可能的事。

# 第四十七讲

## 事亲有道



子曰：“孝子之事亲，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者备矣，然后能事亲。”

——《群书治要》卷九《孝经》

## 居则致其敬

“孝子之事亲，居则致其敬”，子女对待父母应该以恭敬的心去侍奉。“敬”的态度非常重要。《论语》记载，孔子的弟子子游问孝，孔子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现在的所谓孝子，认为能够赡养父母就尽了孝道，但是对于犬马而言，它们也能够以自己的体力来养主人；如果不孝敬、不尊敬父母的话，和犬马侍奉主人就没有区别了，所以要强调儿女侍奉父母的恭敬之心。

恭敬之心体现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譬如，《弟子规》中说：“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呼喊我们名字的时候，要马上答应，不要迟缓，不能像没有听到一样爱答不理，似听未听，否则就是不恭敬了。“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命令我们做某件事的时候，我们要马上行动，不要偷懒，不要借故不去做。“父母教，须敬听。”父母教导我们的时候，我们有过失、做错事、做事不够完美的时候，父母给我们指正过来，我们要有耐心，要恭敬地去听从。“父母责，须顺承。”父母责备我们的时候，我们也要顺着父母的心思，而不能够违逆父母，心里有逆反。这些都是儿

女对父母恭敬心的表现。

在一个名叫《那是什么》的短片中，讲了一对国外的父子之间的故事。儿子带着父亲到公园里去闲坐，但是儿子的心并没有在父亲身上，他正专心地看报纸。有一只小鸟飞在旁边，父亲为了和儿子沟通、交流，就问他：“那是什么？”儿子漫不经心地把眼睛从报纸上移开，看了一眼说：“那是一只小鸟。”就继续看报纸。过了几分钟，父亲又问：“那是什么？”儿子看了一眼，有些不耐烦地说：“那是一只小鸟。”说完又继续看报纸了。过了一会儿，父亲又问：“那是什么？”儿子冲着他父亲大吼一声：“那是一只小鸟！”儿子强压怒火仍然在看报纸。但老人为了与儿子交流，就又问：“那是什么？”这一次儿子终于爆发了，把报纸扔在地上，非常生气地对父亲吼叫道：“那是一只小鸟，我都跟你说过几遍了？还问，还不明白，真烦！”

这时他的父亲默默地站起身来，向家走去。儿子不依不饶地说：“你要去哪里？你怎么了？”父亲没有作声。等他回到家，找到了一本日记，上面记载的是儿子小时候的一些事。他翻开一页，递给儿子，并让他“大声地读”。儿子念道：“有一天，我带儿子去公园散步，儿子看到了一些小鸟，他问我：‘那是什么？’我很耐心地回答说：‘那是一只小鸟。’但是孩子很好奇，不停地问‘那是什么’。我仍然很耐心地对他说，‘那是一只小鸟’，并且讲了很多关于小鸟的故事、常识给他听。整个下午，这个孩子问了我二十一次‘那是什么’，我每一次都无一例外地告诉他，‘那是一只小鸟’。因为我对孩子充满爱心，丝毫不觉得厌烦。”当儿子读到这里时，想到自己刚刚对父亲的所作所为，非常惭愧，他将父亲抱在怀里，流下了眼泪。

这个故事说明“人不学，不知道”。故事里的主人公是外国人，不能从小没有接受儒家孝道的教育，不知道孝顺父母的关键在于心怀恭敬和感恩。《礼记》言：“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但一个对父母有深爱的孝子，他对父母的态度一定是和颜悦色，欢愉的颜色、温柔的语气，怎么忍心对父母大吼大叫，伤了

父母的心？所以“人之初，性本善”，虽然他没有学过传统文化，也不知道对待父母，不仅要赡养父母之身，更要养父母之心，要从内心发出对父母的恭敬、感恩之心。但当他看了父亲记录自己儿时事情的日记，就唤起了他的孝心。他流下了忏悔的眼泪，和父亲抱在了一起。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了父子有亲是天性，是自然而然的人之常情，不是圣人的规定，圣人的教导只是顺着人的本性，即“率性之谓道”。

孔子的弟子子夏问孝，孔子说：“色难。”指对父母保持和颜悦色是难能可贵的。“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有了事情，儿女去代劳；有了好东西，让父母先吃，你以为这就是尽到孝道了吗？换句话说，这远远不是孝道。养父母之身，侍奉父母，代父母去做各种家事，这是为人子尽孝最起码的本分。但做到这些还远远不够，因为还要养父母之心，对父母恭敬、和颜悦色。《弟子规》言“亲有过，谏使更，怡吾色，柔吾声”。即使父母做错了，子女也要和颜悦色地劝谏，这才是养父母之心。

古代有一个读书人叫俞麟，饱读诗书，每日他都坚持晨昏定省地伺候父母，邻里乡党对此都非常称赞。大家看他每天晨昏定省，早晨去问候父母，晚上侍奉父母睡觉，做得都很符合礼，一致认同他是一个孝子，甚至邻近的乡镇都有人来向他学习。

他有一个朋友王用予，有一天梦到了文昌帝君。因为他们是同乡，他就向文昌帝君请教：“俞麟这个人很孝顺，学问也很好，他有没有考上？”文昌帝君说：“他没考上。他本来是可以考上的，但是他的功名被削掉了。”后边这段话很重要：“他是看起来很孝顺，可都是做给人家看的，他犯了腹诽的罪过。”

什么叫腹诽？就是表面上看起来很恭敬父母，做得都符合礼的要求，但是内心对父母有埋怨、有不满，只是没有表现出来。这样久而久之，伤了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天性，最后使得他的每一个孝顺父母的行为都成了应

付，都是装出来的，他的良知受到了很大的障碍，就是俗话说的“天良泯灭”，而且他对人讲话也非常苛刻，没有真正从内心去培养德行，所以他这一生就考不上功名了。

所以这个孝，应该本于子女和父母之间的天性。父子之间，“人生百日，体露真常”。刚出生不久的孩子，其动作、容貌都是发自内心的，这是人的天性，子女对父母的亲情也是天然的。但因后天环境的熏染，以及接受教育的不同，自然的亲爱、自然的信任、自然的友好、自然的恭敬也逐渐改变，取而代之的是人与人之间充满了怀疑，充满了对立、排斥、互不信任。如俞麟就是表面对父母很恭敬，使做出来的行为都符合礼，但实际却腹诽父母，表面上都是为了装给别人看的，让别人认为他是一个孝子，这就是好名之心，而本性的天良却愈来愈少了。这种不是发自内心的恭敬，需要我们特别注意。

“养则致其乐。”奉养父母的时候，要让父母感觉到欢乐。做儿女的应该以和悦的心去服侍父母。看到这个“悦亲”，就使人想到《二十四孝》中老莱子 70 多岁，其父母已经 90 多岁了。为了让父母欢喜，他穿上小孩子的衣服，在父母面前装婴儿的啼叫，学小孩子走路，甚至在挑水的时候故意滑倒，只为让父母开怀大笑，这种父子母子之间的天然本性，就从老莱子的表演中自然流露出来了。

父母即使犯了过失，子女劝谏的时候，也不能够厉声戾气，伤了父子之间的和气。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如果我们为了讲道理而伤了情，伤害了父子之间的亲情，那么这个理就不再是理了。家庭是温暖的地方，需要爱、关心和理解。如果你的态度是傲慢无礼的、不恭敬的、违逆父母的，你这个道理再好，父母也仍然听不进去。所以你看古人，特别通达人情世故，说“亲有过，谏使更，怡吾色，柔吾声”，在父母高兴的时候再次去劝谏，不要在父母不高兴的时候，非要给他讲理，非要去劝他，说他不对，这无论是谁都很难接受。

## 养则致其乐

“养则致其乐”，说明要让父母乐在道中。如果能帮助父母学习传统文化，那么就能提升父母的智慧，有助于父母保持良好的心态，防止他们患得患失。

古人关于“乐”的两个成语给我们很大的启发。第一是“知足常乐”。因为一个人上了年纪，年老力衰了，他往往对财物就看得比较重，而且容易患得患失。孔子说，年老的时候戒之在得，特别戒贪得无厌。子女要劝父母看淡财物，这些财物都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不要把它看得太重要。“屋宽不如心宽”，这个房子愈来愈大，但是如果没有一个积极的心态、阳光的心理，即使屋子愈住愈大，他也高兴不起来。古人说：“别人骑马我骑驴，仔细思量我不如。待我回头看，还有挑脚汉。”别人骑着马赶路，我骑着一头驴赶路，就像现在很多人开着宝马、奔驰上班，我开了一辆桑塔纳，仔细想一想，我比不上开宝马、奔驰的人。但是回头一看，这刘老师上课都是骑自行车来的，骑自行车都能很快乐，那我开桑塔纳为什么不快乐？所以一个人高兴与否、快乐与否，绝对不是建立在物质之上的。

现在很多人都在探讨一个问题，为什么人的物质条件愈来愈好，经济愈来愈发达，但是幸福指数却愈来愈低了？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伪问题。因为我们一直误以为人只要有钱了，经济增长了，物质财富满足了，人就能够快乐起来、幸福起来。但实际上，一个人的幸福感是一个人内在的感受。一个人内心的感受，怎么能靠外在的物质欲望的满足达到？

《论语》曾直接评价孔子的弟子颜回：“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颜回的物质条件非常简单，吃饭没有饭碗，喝水没有杯子，住在非常简陋的巷子里，别人都忍受不了那种贫苦的

生活条件，颜回却乐在其中，不改其乐。再看孔子，他在自己的一生之中也没有表现出任何怨天尤人的情绪。他周游列国，希望把自己好的仁义学说推而广之，实现社会的和谐、天下太平，人民过上幸福安定的生活。但是这些国君或者没有智慧，不能领略他的学说的价值；或者有嫉妒他的、排斥他的，让他的学说不为所用。《论语》的开篇提道：“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此处的“说”就像泉水一样，从内心不断地涌现出来。这个“说”和“乐”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发自内心的，而后者必须依靠外在的条件。“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朋友的到来带来了乐，乐在志同道合。此处的“乐”与“说”分属不同的层次，当没有乐的外在条件后，快乐也就不存在了。“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一个人有德行、有学问，但是国君都认识不到，社会大众也不知道敬仰他，他也没有任何怨怒的、不满的表现，这不也是一个君子的行持吗？为什么没有怨怒？因为他去周游列国，不是为了自己求升官、求发财、求自私自利，是为了把好的学说推而广之，让社会大众受益，让社会安定和谐，世界大同。

反观当今的人，无论贫富贵贱，都难免身心不安、怨天尤人。这是什么原因？原因很简单。我们发现一个人在抱怨的时候，不是抱怨别人对不起自己，就是抱怨自己的利益没有得到最大化的满足。说明一个人有怨言的时候，还是因为有一个“私”字没有放下，自私自利之心很严重。古人说“学问深时意气平”，一个人学问深的时候，他就没有怨天尤人的表现；一个人学问深的时候，他知道一切结果的产生都不是偶然的，都是有原因的，所以他都能够心平气和地去接受。反过来我们看一个人，他还有怨天尤人的情绪，说明这个人学问还不够深。这就是告诉我们要知足常乐。

现在的一些年轻人为什么活得无精打采，没有使命感、没有责任心？为什么很多人在贫穷的时候拼命地赚钱，但赚了很多钱后却很空虚，甚至跳楼自杀了？这是因为以前他把自己的人生目标设定在赚钱上，贫穷

的时候以赚钱为目标，有钱的时候，他的人生反而没有了目标，以致内心空虚，最终导致自杀。

如果人把自己所挣的钱用来服务于社会，用来帮助别人提升道德，改善社会风气，那他就会感到人生有价值，这样的人才会真正地感受到快乐。新加坡有一位许哲女士，身体力行地解释了至善之道。她的故事被记载在《快乐是一种习惯：106岁的快乐法则》一书中。许哲从母亲乐于助人的行为中感受到为人处世、待人接物的原则，那就是去帮助别人。

有一次她的母亲做了一桌很丰盛的饭菜，全家人正要吃的时候，突然门外响起了敲门的声音。许哲的母亲赶紧过去把门打开，看到一群面露菜色，几天没有吃饱饭的人。他们向许哲的母亲苦苦地哀求，要讨一点饭吃。看到这种情形，许哲的母亲二话没说，转过身来，把桌上所有的饭菜端出来给这些人吃。这些几天没有吃饱饭的人终于吃到一顿美餐，他们脸上露出了笑容，露出了一种满足感。这一幕许哲看在眼里，并深深地印在她的脑海里。她认为帮助别人是一件快乐的事，所以她决心用自己一生的时间去做帮助别人的事业。

后来，她来到美洲的巴拉圭，无私无求地致力于当地人的健康事业和教育事业。再后来，她的母亲活到90多岁，年纪很大了，给她打电话说：“你要帮助别人，在哪儿都可以，现在我的年纪也很大了，也需要你的帮助了。”许哲听了母亲的话，就回到了新加坡，照顾她的母亲。许哲在很多人的帮助支持下，还建立起一家养老院，照顾好多八九十岁的老人。再后来，她又把这家养老院转让给别人，自己却依旧无私无求地照顾着二十多位八九十岁的老人。

她说，她自己的衣服从来没有买过新的，除了节俭之外，她还为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着想，因为她要帮助的那些人，家庭条件都很贫苦。如果自己穿得很富贵、很豪华，拿着东西去送给这些贫苦的人，这些贫苦的人接受起来，就会觉得心理上有距离，好像是被施舍一样。所以她穿的全都

是旧衣服。这样去照顾这些贫穷的老人，他们就把她当成姐妹，心理上没有任何的距离。

许哲女士即使是去帮助别人，也是从被帮助者的心理需要出发，考虑到他们的感受。为了使被帮助的对象没有被施舍的心理负担，她的穿着非常俭朴，发自内心地将帮助的对象当作自己的亲人。她说：“能够感受到他人的需要，这是人生最高的学问、第一等的学问。”许哲女士一直生活在帮助他人的快乐之中，健康地活到了115岁。她去世之前经常应邀到世界各地去讲瑜伽，分享她的养生之道。

美国科学家做了一个实验，并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实验的结果。美国密西根大学的布朗教授，对四百二十三位65岁以上的老人进行了长年跟踪调查，最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那些经常给予他人精神上的支持和物质上帮助的老人，与那些从不为别人提供任何帮助的老人相比，他们的预期寿命平均要长五年左右。而那些只是接受别人帮助的老人，他们的寿命却没有太大的变化。所以布朗教授说：“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经常得益于对社会和他人的付出，而不是一味地从社会 and 他人那里去索取。”这个科学实验证明了助人本身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所以人年纪大了，不要总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斤斤计较、患得患失，因为这样容易抱怨，容易郁郁寡欢。我们想着如何去帮助别人，我们的身体就老化得慢，而且从帮助别人那里，还重新看到了自己的价值，感受到自己被人需要。这种心情愉悦，也会让自己更长寿。儿女应该耐心地、反复地给父母讲保持长寿的真正方法，这才是从道的高度来赡养父母。

## 病则致其忧

“病则致其忧。”当父母有病的时候，做儿女的一定要尽心尽力地去照顾。“亲有疾，药先尝。昼夜侍，不离床。”父母病的时候，是他们最

脆弱的时候，也是他们最需要儿女关心的时候，如果儿女在照料的过程中表现出厌烦的情绪，就会严重地伤害父母的心。所以做儿女的一定不能忘记自己在成长的过程中，父母是怎样耐心扶我们走路，教我们生活的常识的。当我们生病的时候，父母那种焦急、难过、愿意代儿女去受苦的心情，如果我们能够体会到的话，那当父母老的时候，我们也会对他们耐心照顾，加以体恤。

## 丧则致其哀

“丧则致其哀。”父母过世后，做儿女的要举办丧礼，目的就是缅怀父母的恩德。父母这一生培养儿女付出了很多的辛劳，他们也有很多美好的品德值得后人学习。他们对社会的贡献、他们的德行，我们都应该讲述出来，让子子孙孙记在心上，加以效仿。

## 祭则致其严

“祭则致其严。”古代非常重视祭祀，对过世的父母，乃至祖先，都要定时地依礼祭祀。祭祀的宗旨在于不忘本，所谓返本报始也。教导人知恩报恩、饮水思源。一个人连祖先都念念不忘，想着定时去祭祀；对于过世久远的父母，都能够想着定时去祭祀，这个人就会有深厚的知恩报恩的意识，不会以功利的原则去为人处世、待人接物。

祭祀时，关键在于从内心表达出对祖先的感恩之心。孔子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如果我们祭祀的是祖先、父母，那我们在祭祀祖先、父母的时候，就如同祖先、父母在面前一样；如果是祭神，也就像神在我们的面前一样，要毕恭毕敬。孔子说“我祭则得福”，为什么？因为通过祭祀，把自己内心的诚敬焕发出来了。君子对父母，“生事之以礼，死祭

之以礼”。君子行孝道，父母在世时恭敬地赡养，父母去世之后则是虔诚地祭祀。

《礼记·祭统》言：“君子之教也，外则教之以尊其君长，内则教之以孝于其亲。”教人孝于其亲，就要从根本教起，而祭祀对于推进孝道而言至关重要。“顺之至也，祭其是与”，指将孝心表达到极致的就是祭礼了。父母在世时，恭敬父母，可能是因为畏惧父母的权威，目的是为获得父母的欢心；而父母过世之后，如果还能够定时地纪念、祭祀，便纯粹是出于一片知恩报恩的心，不存在任何功利的企图，所以通过祭礼能够把孝顺之心表现得淋漓尽致。“故曰：祭者，教之本也已。”因此，祭祀是教育的根本，而恭敬心是祭祀的根本。“祭而不敬，何以为也？”参加祭祀，如果没有内心的诚敬和感恩，那就不必参加祭礼。

“五者备矣，然后能事亲。”以上五点全都做到了，才算是尽到了事奉双亲的责任。

## 第四十八讲

孝心一开，百善皆开



## 德有伤，贻亲羞

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遗体也。行父母之遗体，敢不敬乎？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阵无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灾及于亲，敢不敬乎？

——《群书治要》卷七《礼记》

“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遗体也。行父母之遗体，敢不敬乎？”指用父母生下来的身体去做事，怎么能够不慎重、不恭敬？

“居处不庄，非孝也。”生活起居不庄重是不孝。因为生活起居不庄重，生活没有规律，环境保持得不清洁，对自己的健康会有影响。“身有伤，贻亲忧”，自己身体得病，有损伤，会使父母忧虑。“居处不庄”，言行越矩是不孝。不恰当的言行会遭到他人的非议，这会使父母感到羞愧，即“德有伤，贻亲羞”。譬如现在的个别孩子，刚刚上小学就谈恋爱，年纪轻轻都堕胎好几次了，给自己的身体、自己的人生带来了很大的损害，也让父母担心。有的孩子经常上网吧打游戏、赌博，这些也会影响自己的身心健康，都会让父母担忧。如果我们做出了一些不知礼的行为，让别人说我们没有教养，这也会辱没父母。我们这一代人最怕的就是别人说我们没教养，因为这句话不仅批评了自己，而且还辱没了自己的父母，让父母

跟着蒙羞，所以“居处不庄”就不是孝了。

“事君不忠，非孝也。”事奉君主、领导不尽心，就是没有做到孝道。古人将忠解释为“尽己之谓也”，即竭尽全力地把领导交给自己的工作做好，这就是尽到了忠心。如果子女贪污受贿、以权谋私，最后东窗事发、锒铛入狱，一方面不能再照顾父母，另一方面也会让父母蒙羞，这便是灾及父母。

“莅官不敬，非孝也。”做官没有恭敬心，对自己的事业不恭敬、没有尽心尽力，这也不是孝道。一些刚毕业的年轻人非常任性，经常“解雇”领导或老板，不珍惜工作的机会，最后沦为“啃老族”。这也会让父母担忧，是不孝的表现。

中国古人看一个人可不可以用、可不可以信任，首先看他是不是一个孝子，看这个人是不是孝敬父母；其次看他有没有贪心、够不够廉洁。一个人如果能孝敬父母，他就会知恩报恩、饮水思源，不会做出忘恩负义之事；而一个人如果能够廉洁，就不会贪心，就不会贪赃枉法、以权谋私。这是选择官员两个最重要的标准。

《群书治要·晋书》记载了一个吴隐之的故事。吴隐之早年丧父，他对母亲非常孝敬、恭谨，特别注重和颜悦色。母亲过世时，他因悲伤过度差点丧命。他的邻居韩康伯的母亲是一位有德行的妇人，每次听到吴隐之哭泣，她便与他一同悲泣，直至吴隐之服丧期满。韩康伯的母亲对韩康伯说：“如果你以后做了官，应该推举像吴隐之这样有孝顺之心的人。”后来韩康伯到吏部任职时就推荐了吴隐之，之后吴隐之被封为龙骧将军、广州刺史，成为一位廉洁官吏。

吴隐之去广州上任的时候，听说广州的北边有一个泉叫“贪泉”，父老乡亲都传说，一旦饮了贪泉的水，即使廉洁的官员也会变成贪官污吏。吴隐之反其道而行，不仅喝了贪泉水而且赋诗一首：“古人云此水，一歃怀千金。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意思是古人说喝了贪泉的水，就会

变成贪官污吏，但是假使让伯夷、叔齐这样廉洁之士饮了这贪泉的水，终究也不会改变他们的廉洁之心。吴隐之在任时，克勤克俭、严于律己，特别注重德操，使当地人民受到了感化。晋安帝为此颁布诏书，褒奖吴隐之的德行：“广州刺史吴隐之孝心过人，他把自己的俸禄平均分配给九族的亲属，处在可以贪得的官位上，却不改变他的节操，不讲求自己的享受。虽然家庭可以享受富裕生活，但是他们家的人所穿的还是粗布的衣服。他不改变服饰，革除奢侈的作风，务求简约，所以使南方地带的社会风气大大地改观。朕以为这样的行为应该受到嘉奖。给他进号前将军，赐钱五十万，赐谷千斛。”

吴隐之做官之所以如此恭敬、廉洁，就是因为他是孝子，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小心谨慎，牢记父母的教诲。

“朋友不信，非孝也。”朋友之间相处最重要的是信，“信”由“人”与“言”组成，说明人言为信。孔子也说，“信”这个字对一个人太重要了。如果一个人说话不讲信用，做事不讲信用，别人就没有办法信任他。“信”这个字，用我们现代的话比喻，就像车子最关键的部件发动机一样。如果一个人言而无信，在这个社会上将寸步难行。朋友之间相处，同门曰朋，同志曰友，朋友是指和我们地位平等的人，如果因为不讲求信义遭到他人的非议，也会伤害到父母。

“战阵无勇，非孝也。”作战不勇敢，会殃及整个国家的安危、人民的利益，那也会让父母蒙羞。

“五者不遂，灾及于亲，敢不敬乎？”这五者做不好，都会给父母带来灾害，损及父母的名声，因此孝子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要小心谨慎，做到面面俱到。

## 行孝并非一味顺从

《群书治要·昌言》记载：“人之事亲也，不去乎父母之侧，不倦乎劳辱之事，唯父母之所言也，唯父母之所欲也。”人们侍奉双亲，要不离开父母身边，不因为劳累困辱而倦怠，要听从父母的话，满足父母的期望。

“于其体之不安，则不能寝；于其餐之不饱，则不能食。孜孜为此，以没其身，恶有为此人父母而憎之者也。”意思是孝子看到父母身体不安，就会睡不着觉；看到父母饮食不佳，自己也难以下咽。终生都孜孜不倦地这样做，就不会遭到父母的厌恶。

同理，“人之事君也，言无小大，无愆也；事无劳逸，无所避也”。事奉君主、领导，如果不出现过失，就不会得罪君主、领导，而且在工作中要避免拈轻怕重，认真完成所有任务。

“其见识知也，则不恃恩宠而加敬；其见遗忘也，则不怀怨恨而加勤。”臣子事奉君主，如果获得君主的赏识，不能恃宠而骄，反而应更加敬业；如果怀才不遇，也不要心怀怨恨，反而应更加勤勉。

“安危不贰其志，险易不革其心。”无论处于安危或险易的状态，都不改变他的志向和诚心。“孜孜为此，以没其身，恶有为此人君长而憎之者也。”这样孜孜不倦地保持终生，就不会遭到君主的憎恶。

“人之交士也，仁爱笃恕，谦逊敬让，忠诚发乎内，信效著乎外。流言无所受，爱憎无所偏。幽闲攻人之短，会友述人之长。”人与人交往，应该做到仁爱、宽恕、谦逊、礼让，忠诚是发自于内心，信用显扬于外，不听信流言蜚语，爱憎没有偏私。不是因为我喜欢这个人，就对他好一些；不喜欢那个人，就对他厌恶。在私下的时候，要严谨防止责备别人。和朋友相聚的时候，多说别人的长处。

“有负我者，我又加厚焉；有疑我者，我又加信焉。患难必相及，行潜德而不有，立潜功而不名。孜孜为此，以没其身，恶有与此人交而憎之

者也。”有辜负我的人，我对他更加宽厚；有怀疑我的人，我对他更加真诚、更加信任。别人有祸患灾难，一定要去帮助，暗中施恩于人而不图回报，暗中立功而不求为人所知，像这样孜孜不倦地保持终生，与人交往就不会被憎恶。

“故事亲而不为亲所知，是孝未至者也；事君而不为君所知，是忠未至者也；与人交而不为人所知，是信义未至者也。”侍奉父母，如果不为父母理解、认可，那么一定是孝行尚未做到极致；事奉君主、领导，如果不被领导所认可，一定是忠诚、忠贞没有尽到极致；与人交往而不被人理解、认可，那也是信义没有达到极致。

当然，行孝不是一味地顺从父母，有时违背父母也同样是孝。

“父母怨咎人，不以正己，审其不然，可违而不报也。”如果父母埋怨怪罪别人，而不知道反求诸己、端正自己，做儿女的就可以违背父母之命，而不去报复别人。“父母欲与人以官位爵禄，而才实不可，可违而不从也。”如果父母要给无才无德之人官位爵禄，也可以违背父母之命。

“父母欲为奢泰侈靡，以适心快意，可违而不许也。”如果父母追求奢侈靡费的生活，还可以违背父母之命不予答应。“父母不好学问，疾子孙之为之，可违而学也。”如果父母不喜好圣贤教诲，并且还反对子孙求学，这种情况，就可以违背父母的意愿而去学习，否则会陷父母于不义。

“父母不好善士，恶子孙交之，可违而友也。”如果父母不喜欢贤良之士，反对子孙和贤德之士交往，也可以违背父母之命，与这些人交朋友。“士友有患故，待己而济，父母不欲其行，可违而往也。”如果朋友遇到了困难，需要自己去帮助他们，但是遭到父母反对，也可以违背父母之命前去帮助。

“故不可违而违，非孝也；可违而不违，亦非孝也。”不应该违背的你却违背了，这是不孝；应该违背的却没有违背也不是孝。凭什么标准来判断？后面给我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好不违，非孝也；好违，亦非孝

也。其得义而已也。”一味地讲不违背父母，这是不孝。因为如果父母做不义之事，你也不违背父母，那就是成就父母去做恶事，这也是不孝了。一味地违背父母之命，也是不孝。父母说你是对的，是符合义的，但是你仍然违背父母，这也是不孝。最后这一句话是关键，“其得义而已也”，主要是看你所做的事情是不是符合道义。

## 不辱其身，不羞其亲

壹举足而不敢忘父母，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壹举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弗径，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遗体行危殆。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恶言不出于口，忿言不及于身。不辱其身，不羞其亲，可谓孝矣！

——《群书治要》卷七《礼记》

担任乐正之职的子春，在下堂的时候脚部受了伤，几个月都没有出门，而且面有忧愁之色。他门下的弟子问：“老师的脚伤不是好了吗？为什么几个月不出门，还面露忧愁之色？”子春回答：“我听曾子说过，父母生我们的时候，齐齐全全地给了我们一个完整的身体，子女也要齐齐全全地把这个身体保护好，这才是‘孝’。不缺损自己的躯体，不辱没自己的身份，这就是‘全’。所以君子每走一步都不敢忘记孝道，但是这一次，我却忘了孝道，所以面有忧色。”进而他提出“壹举足而不敢忘父母，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孝子连走路、说话的时候都不敢忘记父母。“壹举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弗径，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遗体行危殆。”如果连走路都不敢忘记父母，有大道可走的时候，就不会选择走那僻的小径；有船可乘的话，就不会冒险过河，因为不敢用父母给我们的身体做危险的事情。“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恶言不出于口，忿言不及

（及作反）于身。”这里有个括号，“及作反”，也就是忿言不反于身。如果孝子开口说话都不敢忘记父母，就不会口出恶言，招致别人的辱骂，那么也不会遭到别人的回骂而使父母远离恶言。“不辱其身，不羞其亲，可谓孝矣！”不辱没自己的名声，也不让父母蒙羞，这才是孝道。

真正的孝子，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要想到父母。只要他能够想到父母，言行举止必然谨慎。有一个官员的亲身经历验证了“德有伤，貽亲羞”。在一次重大的走私案中，相关的领导纷纷牵涉在案，只有一个官员没有牵涉到，没有贪污，也没有因为帮忙走私而接受贿赂。检察人员问他原因，记者也来采访，他说，因为我的父亲是一位老师。我当时就想，如果我一旦东窗事发，被关进监狱，我的父亲肯定受不了，他会自杀。我一想到这点，就不敢去贪污受贿了。他正是因为想到了不让父母蒙羞，自己的行为不当会辱没父母，所以他能够保持廉洁不贪。

这就是告诉我们，一个人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能想到父母，他必然不敢做违背理法的事情，必然是一个廉洁有守的官员。

## 爱其亲，敬其亲

故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

——《群书治要》卷九《孝经》

“悖”指违逆、违背的意思。如果不爱自己的父母，而去爱其他人，就违背道德；如果不尊敬自己的父母，而去尊敬别人，就违背礼法。“父子有亲”是天性，“人生百日，体露真常”，我们从小孩身上特别能够观察到人性本善。譬如小孩子看到每一个人都是微笑、都是亲爱，没有分别之心，不会说喜欢这个、讨厌那个。这种对每一个人平等的微笑、亲爱，就

是人之本性。

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教育的目的就是把这种本性保持一生而不改变。“父子有亲”是天性，把这种亲爱保持一生不变，就是教育的功能。父母爱儿女没有任何功利之心，是竭尽所能、无私无求、无怨无悔，所以对儿女的恩德是最大的。

古人言“诸事不顺因不孝”，这是因为没有从孝敬父母上培养起一个人深厚的知恩报恩、饮水思源的意识，树立起恩义、情义、道义的处事原则。所以这里讲：“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

《论语》的“为政”篇很多内容都强调孝道。很多人可能不理解，谈治理国家，怎么连续谈了孝道，讲了这么多？我们讲办理政治就是要管理人民，怎样能把人管好？以孝治天下，每个人都有孝道，他的德行有了基础，家和万事兴，家齐会使国家得治，天下太平。所以孝顺为齐家之本，人有孝顺之心，家庭又和乐，社会不就安定了吗？家庭是社会最基本的细胞，所以管理一个企业、一个团队、一个国家，都要从孝道下手，家族的兴旺也是要从孝道下手。

古人言：“孝心一开，百善皆开。”做任何事情都要懂得“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目前社会出现的一些问题，很多都是缺失孝心而导致的。如教育孩子，花了特别多的金钱、精力，但是愈教素质愈下降，孩子都成了“小皇帝”“小公主”，不懂得孝敬父母。又如，有的公司送员工去培训，花了很多钱，希望员工有知恩报恩的心，效果却不明显。再如，现在很多慈善机构，包括一些学校都在感叹，说我们资助了这个学生，他却没有任何感恩之心。为什么？古人告诉我们，他连父母都不感恩，怎么会感恩你？父母为他付出那么多，无私无求，他都不知道感恩戴德，记在心上回去回报，对于陌生人的资助，对于政府的帮助，又怎么会知恩图报？

《礼记》言“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只有教育才能够从根本上转变

人心，使家庭、社会、国家乃至天下的问题都能够得以解决。教育要从哪里入手？就是要从孝道入手。很多时候，我们的确应该停下忙碌的工作，去关心身边日渐衰老的父母。无论我们走到哪里都要记住父母的教诲，而且更要趁他们健在的时候，多多陪伴在他们身边，多孝敬他们，多关心他们的需要。因为父母对儿女无私无求的付出，确实儿女无以为报。

# 第四十九讲

## 行仁思义



## 弘毅行仁，见利思义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群书治要》卷九《论语》

曾子认为做士人不可以不弘毅，因为士人的责任重大，而且所行之道遥远。他以行仁为自己的重任；这种重大的责任要一直担负下去，到死为止。

“士不可以不弘毅”，“士”不是普通百姓。在古代把人分为四类，分别是士、农、工、商。士是读书人，农、工、商都是生产者和营利者，而士既不生产也不营利，他尽全力来学道，所以士专求学、专讲道，专讲做人的道理。而要把人道讲得清楚透彻，必须要通达天道。古人说“天道敏生，地道敏树，人道敏政”。但是对于天道，一般人很难体悟，所以要从哪里学起呢？

士要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学起。虽然这句话，士、农、工、商都需要学习，但士更需要。《论语》记载，子游到武城做官，孔子去考察，听到弦歌之声，说道：“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回答说：“从前，我听夫子您说过‘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不学道的人不能发布或听从命令。君子和在位者学道，就能用仁爱之心对待百

姓；百姓学道，则会听命于在位的君子。士就是全神贯注地、专一地学道、悟道、体道、讲道、行道。他与商人不同，他是纯粹分利而不生利。

道有体有用，用就是行仁。士也有通达和贫穷之分。孟子说“达则兼济天下”，通达之时就以仁治国平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穷困之时就修养自身，弘扬仁道。当士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按照仁道去做，就是在影响别人，就是在弘扬仁道。

而且弘扬仁道是一日不死，一日不休，所以士必须“弘毅”。“弘”是大，就是见识学问，一切都要广大。读书能举一反三，学以致用。孔子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虽多，亦奚以为？”即使把《诗经》三百首诗都背熟，但处理政事却不通达，不能把所学落实在日常生活、工作、待人处事之中，那么背诵虽多，也不能得其用。“弘”不仅学问、见识要广大，心胸也要广大，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古人说“一事不知，儒者之耻”，说明儒者的见识学问很广博，没有他不通达的事情。

反观当今很多硕士、博士，对国家政策没有有独到的见识，也无法提出对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所以不能称为“士”。古代的士读的是圣贤之书，通达圣贤之道，所以有能力对社会的治理、国家的安定、天下的太平提出正确的应对之策。

“毅”，包咸的批注为“强而能断也”，“强”不是“暴”的意思，而是《周易》上乾卦，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意思。人们应该效法天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如太阳每一天从东方升起，从西方落下，一年四季，寒来暑往，没有中断，这是天的自强不息。我们效法天自强不息的精神，求学上进，没有休息，这是“强”。“强而能断”，“断”是有决断，而正确地决断，必须运用智慧。所以弘毅的“毅”既是自强不息，又有智慧决断。

为什么士必须要弘毅？因为“任重而道远”，肩负的责任很重大，行走的路程很遥远。“士”肩负何种重任呢？如今天下变乱丛生，平天下便

是士的责任。小能治国，再小能齐家，能修身，这些都是士的责任。很多人志向很远大，想要成就大事，促进和平。那么成就大事，促进世界和平，要从哪里做起？《大学》中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要担当大事，促进世界和平，必须从修身做起，自己做到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才能进而去齐家、治国、平天下。

“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将仁加于自身，以行仁为己任，须臾不离开仁，这个责任难道不重大吗？那么为什么应当以弘扬仁德为己任？

仁者爱人，“仁”字是由单立“人”和“二”组成，就是两个人的相处之道，想到自己就要想到对方，要换位思考，将心比心。

不懂得为他人着想，人就会自私自利，自私自利的结果就是“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所以只有仁义之道才是君王最应当重视的。

《贞观政要》记载，贞观四年（630年），房玄龄向太宗报告，当时盔甲和兵器的完备已经超越隋代。太宗却说，虽然保卫国家需要武器，但维护国家安定最重要的是仁义。君臣上下一心为百姓着想，使百姓安居乐业，这才是最重要的武备，我用来维护国家安定最重要的武备是仁义，而不是兵器。古人说，即使是大国，虽然“忘战必危”，忘记战争是危险的，但是“好战必亡”，好战一定会亡国。隋炀帝时期，武器繁多，装备完善，财力雄厚，却依旧没能阻止亡国。

所以“以利为名，则有不利之患矣”，如果把利益看得最重要，那么人生，乃至整个社会，就会产生不祥和祸患。《孟子》中说：“王曰‘何以利吾国’？”假如每个国君都只寻求国家的利益，“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国家领导干部就会只寻求家族的利益，“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读书人和老百姓就会只寻求自身的利益，结果必定是唯利是图。所以“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从最高领导者到百姓，每个人都谋求私利，国家就危险了。

“万乘之国”，拥有万乘车马的大国。如果大夫谋私利，国主就会被

“千乘之家”的大夫篡位。大夫谋私利，下面的士人也会谋私利，所以大夫也会被士人推翻。如此一来，整个社会、国家就毫无安定可言。

反观当今，不仅是国家危矣，家庭也危矣。整个社会伦理道德和道义缺失，以利益为指归。结果父子、兄弟因为财利、财产而争讼失和；夫妻同床异梦，毫无道义可言，家庭危矣。就国家而言，食品安全问题、假冒伪劣问题、贪污腐败问题、国有资产流失问题等，皆是由重利忘义所导致。

孟子接着说：“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有仁爱之心的人，不会遗弃他的父母；“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重视道义的臣子也不会轻视怠慢他的君主。梁惠王听罢孟子的分析赞同道：“寡人愿安承教”，我一定按照你的教诲去做。

所以当今社会最重要的是兴起仁义道德的教化，转自私自利为见利思义，如此才能真正化解这个时代的社会问题。“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如果全世界各国、各党、各级领导人都能学习《群书治要》，以仁义忠恕为治国理念，矛盾冲突自然就会化解，世界和平自然也会到来。

“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这个路程不是很遥远吗？如曾子一生力行孝道，临终时还要让弟子打开他的被子，检查自己的身体是否完好。“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所以曾子临终前才说：“而今而后，吾知免夫。”从今以后，我才可以免于担忧没有尽到孝道。

在《礼记·檀弓》中还记载着“曾子易箦”的故事。鲁国大夫季孙子为了表达对曾子的敬意，送给曾子一个大夫专用的竹席。后来曾子得了重病，卧床不起，他的学生乐正子春前去探望时，听到侍僮指着曾子的睡席好奇地问：“这是大夫用的席子吧，光泽多么华美啊！”曾子听到这番话，说道：“这是季孙子赐予我的，我现在坐不起来，无力去换这张席子。”于是便让儿子把这张席子换下。他的儿子说：“您的病情这样重，身体又不便移动，还是等天亮之后再换吧。”

曾子对儿子说：“你爱我还不如这个侍僮！”“君子之爱人也以德，细

人之爱人也以姑息。”君子爱人是成就他的道德，让他有警觉、有提升。而小人爱人是姑息他的过失，甚至放纵他的欲望、满足他的要求，却不过问这些要求是否符合礼。所以曾子说：“你爱我还比不上这个僮仆。我何必要这块席子？我能守礼而终，就足够了。”于是他的儿子只好扶起父亲更换床席，但未等曾子在换好的席子上躺稳，他就去世了。曾子确实做到了“死而后已”。他的这句话也感动了后人，流传千古。大圣大贤的言论，都出自于他们真正力行的功夫。正因为曾子力行仁道、任重道远，他的这番话在现在读来，仍然感动、鼓励着人们。

## 恕者仁之术，正者义之要

有一言而可常行者，恕也；一行而可常履者，正也。恕者仁之术也，正者义之要也。至矣哉！

——《群书治要》卷四十六《申鉴》

“有一言而可常行者，恕也。”一个可以恒常奉行的字是“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恕”字由“如”和“心”组成。就是如其心，如对方的存心，能够换位思考、将心比心，就是恕。《弟子规》上说：“将加人，先问己，己不欲，即速已。”我们做任何事情，首先要扪心自问，我能否接受别人以这样的态度方式对待自己，如果我不能接受，那我也不能以这样的态度对待别人。

譬如，我们看到别人做错事而要发怒时，先要思考，我自己是否毫无过失，是否能事事做到完美？我自己还有种种过失，怎能要求别人不犯错误呢？“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当我们犯错时，希望被别人以怎样的态度对待呢？我们希望别人原谅、宽恕和体谅，希望别人能给自己一个改正的机会。所以当别人犯错时，我们也要体谅他的苦衷，给他一

个改过的机会，这就叫将心比心、换位思考。古人说：“以责人之心责己，则寡过。以恕己之心恕人，则全交。”人通常看不到自己的问题，对自己很宽恕。用宽恕自己的心去宽恕别人，就能保全交情，使情谊维系长久。以责备别人的心来责备自己，严于律己，自己的过失就会愈来愈少。

孔子说：“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看到贤德的人，就向他学习、向他看齐。观察自己是否具备他的优点，而不是嫉妒、憎恶。看到不贤德的人，不是轻视、傲慢，而是反省自己是否有类似的问题，这就叫善学。古人说：“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所以“恕”，就是时时体谅对方的心情，感受对方的需要。

“一行而可常履者，正也。”一种可以恒常落实的行为就是“正”。“正”是正直无私。正直无私的心和真心本性相应。

《列子》上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有个小孩对海鸟没有谋害的心理，每天都到海滩上跟海鸟玩耍，海鸟也不害怕他。有一天他的父亲说，你明天去抓几只鸟回来。第二天，这个小孩带着抓鸟的心想去海滩，结果所有的海鸟见到他都飞走了。这表明真心不仅人能够感受到，动物也能够感受到。

“恕者仁之术也。”时刻保持恕道，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施行仁德的方法。孟子讲“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强”是时刻提醒自己。我们习惯自私自利，所以自私的心念很强，必须时刻提醒自己为人着想，能够时刻为别人着想，就可以培养出自己的仁慈之心。

“正者义之要也”，“正”是守住道义的重要纲领。遵守道义，一定要守住正直的态度。社会上很多人讲义气，但是缺乏正，就成为江湖义气，这就是不守道义。顺从江湖义气，不仅不是帮助朋友，反而是害朋友。朋友的行为不符合正义，不去劝告他，反而因为感情和他同盟，就是错上加错。所以真正的道义，是导正朋友错误的观念，使他返回做人的正路。如

何导正呢？首先要自己归正。所以爱人、爱朋友要用理智而非感情。自己回归正道，克服烦恼习气，再把经验传授给朋友，这才是帮助朋友遵守道义的关键。

“至矣哉！”“至”是极致，这真是至理名言！所以学道并不仅仅是把四书五经都研究明了，背诵下来，而是用“恕”来修养自己的仁慈之心；用“正”来使自己的行为遵守道义，把所学的道力行于生活之中，所以“道”字有一个走之旁，告诉人们道是用来行的。如果不按照经典修心，即使把四书五经背熟也没有作用，重要的是在心上有所改变，所以古人说读书贵在变化气质。

《格言别录》上说：“古之学者，在心地上做工夫，故发之容貌，则为盛德之符。今之学者，在容貌上做工夫，故反之于心，则为实德之病。”古代求学的人从自己的心地上下功夫，从正心诚意做起。心正了，诚于中，自然发于外，就有盛德之容，别人看到他的盛德之容，自然生起恭敬之心，就会受感动。而如今的个别学者，只在容貌上下功夫，看起来很合礼仪，却没有内在的诚敬和仁慈。所以即使容貌、行为都做得合理、合礼仪，也感动不了人，让人无法生起恭敬之心，这是因为没有真才实德。

“制乎外，所以养其中。”人们学礼的目的是培养内心的诚敬。如果只做出鞠躬的动作，却依旧心怀傲慢，就是没有起到培养人恭敬心的作用，只重视形式而忽视实质。孔子说：“礼啊礼啊，难道就是呈现玉帛这些形式吗？乐啊乐啊，难道就是敲钟击鼓吗？”即使在孔子的时代，人们行礼乐，也存在忽视实质、徒重形式的弊病，所以人们学习礼仪，学习圣贤之书，不仅要做出符合礼的容貌，更要有真才实德，要“诚于中，形于外”，才能真正感动人、帮助人。

## 克己复礼为仁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群书治要》卷九《论语》

孔子提倡仁道，颜渊问仁是温故而又求新。孔子对不同程度的弟子问仁的回答也不同，根据他们的程度因材施教。颜回的道德学问在孔子的学生中最高，也最受孔子的肯定，所以他的行为很值得人们效法。“不让古人，是谓有志”，“读书志在圣贤”。“德比于上故知耻”，人们向复圣颜回学习，就能够时刻提起羞耻心。古人特别强调“耻”，“耻之于人大矣，以其得之则圣贤，失之则禽兽耳”。羞耻心不仅是因为做错事而羞耻。孔子、颜回都已经成圣成贤了，我却是一介凡夫，没有能够成圣成贤，这才是真正值得人羞耻的事。

颜渊问仁，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孟子也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学习圣贤之道，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将虚妄、烦恼的心恢复为真心、明德，这也是圣人教育最重要的目标。恢复的一个方法就是“克己复礼”。马融批注说：“克己，约身。”“约身”是约束自己，控制自己的身心，使之不会随顺欲望和烦恼。

如何做到克己？《论语》上说“博学于文，约之以礼”，要从礼上学。人们学习《三字经》《弟子规》的目的就是从礼开始逐渐规范自己的行为，把自己不符合礼的言行举止都导正。第一步就是克己，“三省吾身”，使自己的言行举止合礼。克服习气不容易。譬如人们想克除自己的怒气，可能会花费十年、二十年的功夫；克除自己的贪心，也是终身的功课。但是一定要有信心，信心很重要。信心从哪里来？信心从明理而来。

《了凡四训》上说，蘧伯玉在20岁时，每天认真地反省改过。待他50岁时，还知道49年之非，知道他的过失仍未改尽，“欲寡过而未能也”。

只要能“克己复礼”就是仁，所以凡事不要责怪别人，自己先改过。对别人要礼敬、宽恕、包容，这就是仁。

“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只要有一天克己复礼就能天下归仁。但普通人做不到。曾子为什么能做到？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他每天都省察、反思自己。所以孔子之道，除了颜回能悟之外，曾子也能够得到孔子的心要。

自上而下来说，如果作为国家统治者能够一日克己复礼，天下皆归仁，天下的人就会都来归附。譬如，周文王时期，虞芮两国的国君，因为田界发生争执，他们知道西伯昌很有德行，所以非常尊敬他，想请他来裁决。但是当它们进入西伯昌所治理的国境，看到全国上下男女老少都互相推让、礼让，这两国的国君感到非常惭愧，没有请西伯昌裁决便离开了。这就是克己复礼使天下归仁的力量。批注上说：“一日犹见归，况终身乎。”贤明国君一天做到克己复礼，就能使百姓、使身边的人仰慕他、归附他，如果他能够终身保持，那么一定会形成万国来朝的局面。

“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要想行仁，不在于别人，全在于自己。孔子说的：“我欲仁，斯仁至矣。”颜渊说：“请问其目。”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是孔子最赞赏的学生，他当然能够明白这句话的含义。但是他仍然进一步请教，这是谦虚的表现，担心自己理解错误，请老师更加详细地解释。“克己复礼”是总纲，“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是细目。“非礼勿视”，不符合礼的不要看，譬如现在的电视、网络都要少看。因为眼不见为净。电视、网络的内容大都是杀盗淫妄，会引起人的欲望，导致人的邪思邪念。《弟子规》上也提醒我们，“非圣书，屏勿视。蔽聪明，坏心志”，我们要懂得防患于未然。“非礼勿听”，耳不听，心不烦，凡是不符合礼的都不看、不听。“非

礼勿言”，比如“奸巧语，秽污词，市井气，切戒之”。而且要言而有信，“凡出言，信为先，诈与妄，奚可焉？”非礼勿言，没有信用的话不说，挑逗诱惑的话不说，欺骗人的话不说，出口伤人的话不说，一切让人心生烦恼的话都不说，所以言语必须懂得艺术。孔子以四科教导学生，首重德行，其次就是言语，然后才是政事和文学。说明口为祸福之根，言语不能不谨慎。“非礼勿动”，“动”指心意的起动。不合礼的事，要八风吹不动。

我们能否克己复礼，完全由自己决定。鲁哀公曾对孔子说：“有个人非常健忘，他搬家之后，就把太太忘记了，真是夸张。”孔子说：“这还不算是最夸张的，最健忘的人是把自己都忘记了。”哀公就问：“还有这样的人，居然把自身都忘记了？”孔子说：“对呀，夏桀、商纣，不就是把自己忘记了，最终把自己毁了吗？”忘记自己，就是忘记了自己的明德和本善。

人们经常说自暴自弃，什么是自暴自弃？《孟子》上说：“言非礼义，谓之自暴也。”说话与礼义不相应，叫自暴。“吾身不能居仁由义，谓之自弃也。”言行举止没有止于仁义，叫自弃。使自己的心性堕落，是真正的自暴自弃。所以我们要保护好自己的本性，不能违背仁义道德。

一个人能够“克己复礼”，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便是君子，在社会上会受到人们的尊重，个人生活也会幸福美满，这是小利益。真正的大利益是能够回归本性，能够明明德。

##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

——《群书治要》卷九《论语》

仲弓请教如何实践仁德，孔子告诉他三件事。第一件事是“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第二件事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第三件事是“在邦无怨，在家无怨”。

首先“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孔子是用古代成语回答仲弓的提问。在《左传·僖公三十三年》中，晋臼季说：“臣闻之，出门如宾，承事如祭，仁之则也。”出门与人相见，犹如接见大宾；使用民力，犹如承奉大祭。

皇侃在注疏中引注说：“大宾，君臣嘉会也；大祭，国祭也。”大宾，是朝会或会同；大祭，就是祭太庙、祭天，这两件事情很重要、很严肃。所以称为“大”。见大宾必须敬，承大祭必须诚，诚与敬即可为仁，这是就领导者而言。因为在孔子的时代，君不君，臣不臣，所以先教导在上位的人，因为上行而下效。比如尧、舜率天下以仁，百姓也从之为仁；桀、纣率天下以暴，百姓也从之为暴。如果领导者懂得大宾大祭，百姓出门做客就懂得礼貌，在家就懂得祭祀。见大宾、承大祭是国君的责任，普通百姓效仿国君诚敬的态度，就是“如见大宾”“如承大祭”。

人们也应效仿这种诚敬的态度，出门会客时，如同去会大宾，要恭敬守礼。平时在家可以穿着简单，但外出授课时，要穿着正式，这是恭敬听众。

“使民”是领导者处理政事，要恭敬一切，毫不苟且，如同怀着祭祀时的恭敬之心。当然，这句话不仅领导者要学习，普通人做事也要如同祭祀一般，尽心尽力地完成。即使报酬微薄，也应“反求诸己”，而非责怪他人。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未曾听闻君子大道，做事就会以利益为驱使；但是君子做事，考虑的是这件事是否符合道义。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管子·小问篇》引语说：“非其所欲，勿施于人，仁也。”“施”是加。自己不愿意接受的事，也不要施加于他人身上。人们时刻以这句话为标准衡量自己的行为，就会懂得应如何为人处世。

如果我们待人居高临下，就要想到别人这样对待我，我是否会心生不悦。用这种方式提醒自己，不以傲慢的态度对待别人。《曲礼》开篇就说“毋不敬”，要一切恭敬。无论一个人是贫富贵贱，都要保持恭敬之心。

“在邦无怨，在家无怨。”包咸批注说：在邦为诸侯，在家为卿大夫。在邦，是仕于诸侯之邦，在诸侯国做官；在家是在士大夫家，都须做到无怨，不使人抱怨。这一点如果没有仁德，就很难做到。即使一个人是做售货员，也要尽心尽力地照顾好顾客的需要，使顾客没有抱怨。所以凡事把自己的本分竭忠尽力地做好，才会无怨。孔子说“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是引用古代成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是引用古代成语，所以孔子说话是以古训为依据。我们普通人，言论更需谨慎，要依据经典，依据圣贤之道，才能做到“言满天下无口过”。

## 夫妇有别，夫义妇德

贫贱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

——《群书治要》卷二十二《后汉书二》

“糟糠之妻”，“糟”是酒滓，“糠”是谷皮。糟糠比喻粗劣的食物，糟糠之妻就是比喻贫困时共患难的妻子。“下堂”是女子被丈夫遗弃或者和丈夫离异。这句话出自《后汉书·宋弘传》，是宋弘的典故。

“时帝姊湖阳公主新寡，帝与共论朝臣，微观其意。”当时汉光武帝的姐姐湖阳公主的丈夫刚过世，光武帝和她议论朝臣，探测她欣赏的对象。“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群臣莫及。’帝曰：‘方且图之。’”公主委婉地说，宋弘的威严、容貌、德行、器量群臣莫能与之相比。皇帝明白公主欣赏宋弘，就答应帮助她。

“后弘被引见，帝令主坐屏风后，因谓弘曰：‘谚言贵易交，富易妻，’

人情乎？’”于是光武帝召见宋弘，并让公主坐在屏风后，听他们的对话。光武帝对宋弘说：“我听谚语说，人做了官就会变换朋友，有了钱就会另娶妻子，这是人之常情吧？”“弘曰：‘臣闻贫贱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宋弘回答得也很委婉。他先说“贫贱之知不可忘”，贫贱时结交的朋友，即使以后飞黄腾达，也不能遗忘。这句话提起了皇帝的正气，因为古代的一些皇帝也都是饱读诗书，也有正义感。宋弘又说“糟糠之妻不下堂”，同甘共苦过的妻子也不应该遗弃。“帝顾谓主曰：‘事不谐矣。’”光武帝回头对公主说，这件事无能为力了。

文言文用简洁的语言，就把故事情节描述得淋漓尽致，让人仿佛身临其境。这个故事告诉人们古人是见利思义、见得思义，利益摆在面前，首先想到是否符合道义；如果不符合道义，即使能够成为皇亲国戚，也会婉言谢绝。成为皇亲国戚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事情，但是古代读书人有道义、有情义、有恩义，所以能够拒绝。古人说“夫义妇德”，为人丈夫要有恩义、有道义、有情义；为人妻子要有德行，才能够相夫教子，两个人互相配合，家庭才能够经营好。所以“夫妇有别”，“别”不是身份和地位的差别，而是有不同的职责，男主外、女主内。男子负担家庭的经济收入，使家人衣食无忧，而女子负责教育儿女。因此女子必须有德行，才能够言传身教，把儿女教导好。夫妻相互配合，家庭才能够和谐，家和万事兴，社会也才能够和谐，所以人们应该效仿宋弘这种恩义、情义、道义的处事原则。

# 第五十讲

## 诚信为人



## 诚者，天之道也

天地有纪矣，不诚则不能化育；君臣有义矣，不诚则不能相临；父子有礼矣，不诚则疏；夫妇有恩矣，不诚则离；交接有分矣，不诚则绝。以义应当，曲得其情，其唯诚乎。

——《群书治要》卷四十八《体论》

“天地有纪矣，不诚则不能化育。”天地有纲纪，不真诚就不能化育万物。天地的纲纪，比如一年有四季，春夏秋冬，寒来暑往。四时无论是对人，还是对山河大地、动物、植物、矿物都相同，不是只为某一个人，或者某一类的动植物而来，它没有任何偏私。如同春雨普润，是无私的，万物都能够得到它的滋润。所以古人说：“日月无私烛也，四时无私行也。”日月的光明普遍地照在大地上，没有丝毫偏私。春夏秋冬，也没有私行，“行”是流行、行动。这就是大地的真诚，是平等无私地照顾万物，使天地万物各遂其生，各得其所，所以天之道，就是诚。

《中庸》上说“诚者，天之道也”，真诚是每一个人本有的天性。“诚之者，人之道也。”人应该效法天道去体现和恢复这种真诚。“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人们依循经典、依循圣贤的教诲来恢复自己的明德，就是人的修行之道。要做到真诚，就要老实听话真干，不是经典所说的教诲就不说，不是经典所教的行为就不做。

《孝经·卿大夫章第四》中有一句话：“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古圣先贤都是明心见性之人，他们明了自己的本性，进而也明了他人之性，明了万事万物之性。他们彻底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相，所以人们向他们学习才没有错误。人们的所言所行都依据经典，就是循规蹈矩。古人说无规矩不成方圆，我们依照经典学习规矩，长此以往，言行举止就与圣贤的气质相近，最后就能成圣成贤。

所以人们要做到真诚就要随顺圣贤教诲，而不能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这才是真正向圣贤和经典学习。但是现在有些人都太自以为是，太过“聪明”，结果聪明反被聪明误。比如当今社会，无论贫富贵贱都会身心不安。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自以为聪明，对古圣先贤的教诲和经典生起怀疑之心，不能依教奉行。人们本来想追求一个幸福美满、吉祥如意的人生，但是因为选择的方法、途径、手段错误而适得其反、背道而驰。其实修道并不难，难在人们没有信心，不肯相信圣贤和经典。《尚书》上说“克念作圣”，“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只要一个人把念头转正，当下就是圣贤人。圣贤与凡夫就在一念之间。再通过每日读圣贤书，每日依照圣贤经典要求自己，修正自己的言行举止。长此用功、不懈怠，便可成为圣贤人。

老子说：“大道甚夷，而民好径。”大道本来是很平坦易行的，但是人却喜好寻求捷径。违背圣贤和经典的教诲，就会导致只能在原地打转。古人说：“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止步不前，进而就会倒退。

在《论语》中子张问善人之道，孔子回答：“不践迹，亦不入于室。”子张问的是善人之道，学做善人还不是学做圣贤。人们读圣贤书应该有更高的要求。学做善人只是最低标准，但是这个最低标准，对于一些人来说，也很难守住了。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善人呢？孔子说：“不践迹，亦不入于室。”“践迹”是踏着足迹。不遵循成功之道去学习，如何成为善人呢？如何成就道德学问，恢复自己的明德呢？不践迹就不可能登堂入室。

要时刻谨记经典的教诲、老师的教诲。所谓“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哪些是“老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是老人，《群书治要》上的经史子所记载的教诲，都是老人言，所以要时刻学习，时刻铭记在心，时刻用这些教诲修正行为。

修身最重要的是修心，看人们内心放下了多少，而不在于人们背诵经典的多少，如果仅能背诵很多经典，而不能按照经典去做，就是《弟子规》上说的“长浮华，成何人”，徒增了人们的虚荣之心。譬如在与人交谈时，我们能把《论语》和《诗经》中的话讲得头头是道，但是自己的日常生活、言谈举止、处事待人接物却与此毫不相关，这不是真学问。

我们要做到真诚，还要将贪念放下，要将追名逐利的心放下。如果看重名利欲望，超过看重父母，又如何能提起孝心呢？现在很多人认为自己很孝顺，但是如果看了古代的德育故事，就会感到很惭愧。古人为父母连死亡都不畏惧，所以能够显现出诚心。而我们为父母仅做了微不足道的一点事情，就认为已经付出了很多，怎能显现出诚心呢？

《中庸》上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至诚心显露，就能够见性；至诚见性之人，就能够感动他人；“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不仅可以感化他人，动物、植物也都可以被他感化；“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所以他就可以和天地一样化育万物。君子圣贤的德风，“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君臣有义矣，不诚则不能相临。”君臣之间是有道义的，不真诚就不能相处共事。“义者，宜也”，做君主有做君主适宜的责任，做臣子有做臣子适宜的本分，各尽其责，各守本分，君臣之间才能够和睦相处，互相协助。“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君对臣的义表现为对臣子恭敬有礼，对臣要恭敬。虽然他是臣子属下，但是仍要对其心存恭敬。这样属下才会竭尽全力地完成君主交给自己的任务，就是尽忠。“忠”是为人臣的本分，就是竭尽全力完成自己的责任。

在《贞观政要·诚信》上记载：“贞观初，有上书请去佞臣者，太宗谓曰：‘朕之所任，皆以为贤，卿知佞者谁耶？’”贞观初年，有人上书，请求斥退皇帝身边的佞臣。“佞臣”就是邪佞的、谄媚巴结、阿谀奉承的人。太宗对上书的人说：“我所任用的人，都认为他们是贤臣，您认为谁是佞臣呢？”“对曰：‘臣居草泽，不的知佞者，请陛下佯怒以试群臣，若能不畏雷霆，直言进谏，则是正人，顺情阿旨，则是佞人。’”这个人向太宗提议一个办法：“我住在民间，的确不知道谁是佞臣。但是请陛下假装发怒，以试探身边的大臣，如果有人不畏惧雷霆之怒，仍然直言进谏，此人就是正直之人。如果有人一味地依顺陛下，不分曲直地迎合皇上的意见，此人就是佞邪之人。”

一般人听到这个办法，可能会认为这个人很聪明，这个方法确实能辨别直臣和佞臣。但是太宗谓封德彝曰：“流水清浊，在其源也。君者政源，人庶犹水，君自为诈，欲臣下行直，是犹源浊而望水清，理不可得。”太宗说道，君王对于整个政治而言，就像河流的源头，如果源头污染了，中下游的水怎能清澈？君王不真诚，臣子百姓怎能真诚？如今君王希望臣子真诚正直，自己却使用诈术，装作雷霆大怒来对待臣子，这就如同水源浑浊却希望水能清澈一样，是不可能的。

真正有责任感的领导者，随时随地谨慎自己的言行，以免误导属下。他的每句话都依照经典，而不是依照个人的意愿，这才是真正的慈爱。如果领导者因为属下的恭维和顺从忽视自己的言行，就会误导属下的知见，误导其人生态度。所以人们如果没有深入经典，就会赞叹这个人的聪明才智，但其实这个人的态度是错误的。幸好太宗很有智慧，他懂得“因地不真，果招迂曲”，念头和手段不真诚，怎能使得臣子响应的是真诚和正直呢？

唐太宗接着说：“朕常以魏武帝多诡诈，深鄙其为人，如此，岂可堪为教令？”我常常认为魏武帝曹操言行多诡诈，所以很看不起他的为人，

现在如果让我也这样做，不是让我效仿他吗？这不是实行政治教化的好办法。唐太宗读《群书治要》，确实是按照经典的教诲奉行。他又谓上书人曰：“朕欲使大信行于天下，不欲以诈道训俗，卿言虽善，朕所不取也。”唐太宗又对上书的人说，我想要使诚信行于天下，不想用诈骗的行为损坏社会风气。你的话虽然很好，但是我不能采纳。这句话体现了太宗的智慧，他没有责骂上书之人，因为毕竟他提供了可行的建议和方法。太宗没有因为自己真诚，就对别人的意见轻视傲慢，甚至责骂，而是肯定他为国出力的这份心。这段话就是教导人们，君臣之间相处要有诚心。

“父子有礼矣，不诚则疏。”父子之间是有礼节的，不真诚就会无礼而疏远。《礼记·内则》教导我们，儿子侍奉父母，应遵循怎样的礼。礼有形式，长期遵循这些形式的要求，就能培养出一个人的恭敬之心。但是如果徒有形式，而缺少了内心的恭敬，就无法达到真诚，父子之间的关系就会疏远。譬如孝敬父母，给父母洗脚，如果只是为了做给别人看，为了让父母认同自己，而没有从内心表达出对父母的恭敬和感恩，就是把礼学成了形式，所以重要的是要体现出内心的诚敬。

“夫妇有恩矣，不诚则离。”夫妇之间是有恩义的，不真诚就会忘恩而离异。夫妻之间有道义、情义和恩义，就是真心，是和真诚相应的。不诚就会把恩义、情义、道义都抛之脑后。“不诚则离”，忘恩负义就会离异，所以《弟子规》上讲“恩欲报，怨欲忘。报怨短，报恩长”。心里铭记的都是对方的付出和恩德，把夫妇间的不愉快忘记，诚才能得以体现。宋弘的“糟糠之妻不下堂”，就是谨记与妻子同甘共苦的情义，夫妻之间有真诚的爱心，所以即使面对成为皇亲国戚的诱惑依然不动心。

“交接有分矣，不诚则绝。”结交朋友是有情分的，不真诚就会因无情而断绝来往。朋友之间以诚信相交，随着天长日久，情分会愈来愈浓，如同陈年老酒愈陈愈醇香；但是如果以利害相交，以权势相交，就不真诚了，交往也会因为没有情义而断绝。

“以义应当，曲得其情，其唯诚乎。”“以义”，以道义来处事待人接物，就都能够应对恰当。“曲得其情”，“曲”是微细、详细地体察对方的心意和需要，或者是事实的真相。“其唯诚乎。”唯有用真诚心才能做得到这点。人们之所以不能感受到对方的需要和真实想法，就是因为没有真诚心。

如果把自己的利益、欲望和想法看得太重，不能够放下，就不能够体会到对方的心意和需要，还有真实想法。所以放下自己，才有真诚之心。

##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无他，唯仁之守，唯义之行。

诚心守仁则能化，诚心行义则能变。变化代兴，谓之天德。

——《群书治要》卷三十八《孙卿子》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君子修养心性没有比真诚更好的方法。怎样达到真诚？“致诚无他，唯仁之守，唯义之行。”就要时刻保持仁义的存心，信守仁德，实践道义，如此一来，就能逐渐达到真诚，恢复明德。“仁”，单立“人”加“二”，告诉我们想到自己，就要想到对方，是两个人相处之道。有弟子请教孔子，什么是仁？孔子回答说：“仁者爱人。”爱人就不自私。“义者宜也。”一个人讲道义就能够见利思义，就不会自利。“仁义”教导人们要把自私自利放下。“仁”让人们时刻为对方着想，去爱护他人。爱护他人，就必须把自己放下，为对方着想。做任何事情，“唯义之行”，要遵循义理去做，做得合情、合理、合法。

隋朝时期，辛公义在岷州做刺史，刺史相当于现在的省长。当地发生了瘟疫，而患瘟疫的人，会被家人丢出去，不再照顾他。可见没有了孝

道，道义也就丧失了。辛公义没有去责备这些人，而是把所有的病人全部移到他的厅堂，厅堂是他办公的地方，他找来最好的医生，把这些病人都治好了。他这样做，就是合情、合理、合法，没有使不孝的人，恩断义绝的人难堪。当病人的病治好，再让他们的家人把他们接回去。所有来接病人的家属，都惭愧得抬不起头。自己的亲人，不亲自照顾，反而狠心地将他们丢出去。但是长官却将他们医好，所以整个岷州称辛公义为慈母。他通过自己行仁行义挽救了当地百姓的良心。

人如果连父母亲人都丢下不管，就变成了行尸走肉，因为他的良心已经先死了。辛公义做到了“诚心守仁”，用真诚的心守仁，全心全意为百姓着想，关爱百姓，“则能化”。“正己化人”，自己能够先做到有仁爱之心，最后才能教化百姓。辛公义本着这颗至诚的心行义，行为符合道义，所以能够去除地方的恶习，使岷州的社会风气得到改观。

“变化代兴”，就是以仁义来教化百姓，让百姓断恶修善，形成风气；“谓之天德”，就是与天拥有同样的德行。天有怎样的德行？上天有好生之德，辛公义所表现的仁爱之心，所做出的道义之行，正是体现了好生之德。

## 君子重信

唯君子为能信，一不信则终身之行废矣，故君子重之。

——《群书治要》卷五十《袁子正书》

只有君子能坚守信义，因为一旦不守信义，他一生的作为都将被世人否定和唾弃，所以君子非常看重信义。这句话强调“信”的重要性。《说文解字》上把“信”解释为“诚也”；“诚，信也”，“诚”和“信”二字互训。古文的“信”写作“訖”，“言”字旁加“心”字，是言必由衷之意。所以“信”字告诉人们，言语要诚实，出于真诚心，不能虚假。“孝

悌忠信，礼义廉耻”，被称为八德，“信”被列为八德之一，可见它对于一个人立身行道、为人处世的重要性。《论语》上多次强调“信”，“主忠信”。曾子讲“吾日三省吾身”，其中之一就是“与朋友交而不信乎”，都是强调“信”的重要性。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轻视了“信”，不能做到信。孔子也认为“信”不可以看轻，他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人如果连“信”都做不到，其他的就更无可取之处了。

孔子为强调“信”的重要性，做了一个比喻：“大车无輓，小车无軹，其何以行之哉。”大车就是牛车，小车就是驷马车，大车、小车都有輓，輓是牛马拉车之用。在輓端与横木相接之处，凿有一个圆孔，用金属物来贯穿，使輓端与横木可以活动自如，这个金属物在大车称为“輓”，在小车称为“軹”，是大车、小车行动的关键。在《说文解字》注上，戴东原说：“輓所以引车，必施輓軹然后行。”輓之所以能够把车拉动，必须要有輓軹。“信之在人，亦交接相持之关键，故孔子以輓軹喻信。”无輓无軹，必不能行。“信”对于人来说，也是人际交往的关键，所以孔子以輓和軹来比喻。如果一个人言而无信，就像车子没有輓軹一样，在社会上必定无法畅行。

无信之人，他说的话，别人不相信；他办的事，别人有怀疑，妄言妄行，“不知其可”，就是一事无成，更不必谈学道了，所以孔子在比喻之后便问“何以行之哉”。人如果容易失信、妄语，他的心就不直。心不直，就离真心、离明德愈来愈远。因此，人们要谨慎地守住“信”，认真地学习“信”，才是希圣希贤。

司马光曾经说，修身从不妄语开始。最后达到的境界是平生所为之事，没有一件不可与人言，所以“信”很重要。

“信”首先要求言语诚信、守实，这是人际交往的基本要求。《弟子规》上说：“凡出言，信为先。诈与妄，奚可焉？”人与人之间交流意

见、传达感情全靠言语，所以言语要正确、要诚实。这样才能得到别人的信任。如果言语不正确、不诚实，就不能担负起传达感情、交流意见的任务。这如同两岸之间有一座桥，当桥梁断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络就破坏了。

就个人而言，一个人成就或者失败的根源在于内心的诚与敬。如果失去了诚信，很难得到别人的信任，也就很难取得成功。这就是《中庸》上所说的“不诚无物”。内心缺乏真诚，外在表现就是言语不信实，做事很难成就。就社会而言，如果人与人之间互相欺骗，会造成彼此之间的猜疑、不信任，导致社会秩序紊乱、社会交往的成本增高。

“信”也是一个人在社会上立身行道的根本。《论语》上记载，孔子的弟子子张向孔子请教一个人怎样才能在社会中畅行，孔子回答：“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如果一个人言语信实，行为笃厚，为人很厚道，很有德行，即使身处蛮夷之地，也能够畅行无阻，受到欢迎。而如果一个人言语不信实，行为不厚道，即使处于邻里乡党之中，也会出现摩擦和矛盾，所以一个人要在社会上畅行无阻、立身行道，必须首先讲诚信。

那么什么时候可以失信于人呢？为什么《孟子》上说“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呢？这是提醒人们学习圣贤教诲是有境界、有层次的。

《论语》上有一句话：“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告诉人们做学问有四个不同的境界。第一个境界，“可与共学”。譬如我们一起学习传统文化、圣贤教诲，这是第一个境界。但是“未可与适道”，虽然我们学习的是圣贤教诲，但是有人并没有依教奉行。如虽然人们学习诚信，但是仍有人经常妄语，不守诺言。虽然人们学习了“各自责天清地宁，各相责天翻地覆”，但是在生活工作之中，依旧有人挑剔别人，这就是“未可与适道”，没有按照道去做。再譬如，人们学习夫妻相处之道，懂得“夫妇有别”。丈夫要有

恩义、有道义、有情义。妻子要有德行，言传身教，起到相夫教子的作用，夫妻之间要只看对方的优点，不看对方的缺点，互相欣赏、互相赞叹。但是回到家庭生活中，却把这些道理都抛到脑后，不依道而行。这也是没有适道。

“可与适道，未可与立。”这是第二个境界，就是人们能依教奉行，但是仍未达到第三个境界，就是“立”。“立”是屹立不摇。譬如，一个人在小事上能够信守承诺，但当利益出现在眼前时，就忘记了诚信。当人们事事顺利时，能够做到孝顺忠诚。但是遇到困难时，就临危变节了。所以在纷乱的社会中，依然能够坚守孝心的，才是真正的孝子。在国家遇到危难时，依然能够忠诚的，才是真正的忠臣。《道德经》中说：“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在国家动乱之时，才看得出谁是屹立不摇的忠臣。当家庭不和睦之时，才看得出谁是真正懂得兄友弟恭、能够孝顺父母的人。在关键时刻屹立不摇，这是第三个境界。

但是这仍然不是学问的最高境界。学问的最高境界，是“可与立，未可与权”，是可以通权达变。如果没有通权达变的能力，就会死守原则，以至于做错了，却仍自以为是。中国人有句古话说：上天有好生之德。不杀生是教导人们要有仁慈之心。但是同时，圣贤人也教导人们做人要守信用，不能欺骗别人。

孔子曾经路过卫国的一个封地，掌管封地的臣子正在造兵器，准备叛乱，推翻卫国。孔子最反对、最厌恶的就是这种乱臣贼子，所以他打算马上离开，并揭发这个臣子的叛乱之事。但是不巧被这个臣子得知，于是派大军把孔子团团包围，并对孔子说：“你对天发誓，绝对不会揭发我的事情。”在危机之下，孔子无可奈何，于是对天发誓，绝对不泄露这件事情。但是军队刚刚撤走，孔子马上说：“去卫国。”他的弟子子路听后，不悦地问：“夫子，您怎么可以言而无信？”孔子对子路说：“一个人，在被要挟之下的信，可以不必遵守。”

被要挟只是原因之一。最重要的是信与义相配合，人们经常说“信义”。如果信不符合道义，却固执地坚守信用，就是“未可与权”，就是不知道何时应通权达变。对于正义的、符合道义的事情，要守信；对于不正义的事情，就不必守信，要灵活运用。孔子说：“假如我不去揭发，就会让一个国家的人民都受灾难。我一个人背信不要紧，但不能让人民受难。”这就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一个人不失信于人重要，还是不使整个国家的人民受难重要？所以遇到问题时，我们要懂得如何正确地取舍。

有的人喜欢感情用事，为朋友两肋插刀，讲哥们义气。但是我们首先要去衡量，这个人是否值得我们为他两肋插刀。如果他去做错误的事情，我们却依旧为他两肋插刀，就是助纣为虐，所以做事要“依法不依人”。我们的所作所为要先衡量它是否符合道义，如果不符合道义，就不能只是忠于某个人而背弃道义。

这就是学问的最高境界“可与权”，懂得通权达变，不死守原则。什么时候可以权变？当做一件事情是为了大众、为了国家、为了民族，而不是为了自己时，就能够通权达变。当然这件事必须是符合道义的才可以权变。如果死守原则，不能够通权达变，学问就做得太死板，不能够活学活用。如历史上记载有一个书生尾生高，他和一个女子约定在桥下相会，结果女子爽约，又发了大水，尾生高死守承诺，抱着桥柱不肯离去，最后被大水淹死了，这就是不懂得通权达变所导致的。

## 微言而笃行

孔子曰：“欲人之信己，则微言而笃行之。笃行之，则用日久；用日久，则事著明；事著明，则有目者莫不见也，有耳者莫不闻也，其可诬乎？”

——《群书治要》卷四十六《中论》

孔子说：想让别人信任自己，就应当少说而切实履行。“微言而笃行之”，有两种解释：一个人做了很小的承诺，也要尽力地去履行。如果每一个小的承诺都能够尽力实行，久而久之，人们就能够看到他的行为符合道义。“微言”也可以理解为少说而多做，就是《论语》上所说的“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真正去落实，效果才会愈来愈长久，“则用日久”，是效果持久。“用日久，则事著明”，成效日益长久，事理就会更加彰显。

“事著明，则有目者莫不见也，有耳者莫不闻也，其可诬乎？”效果能够持久，事理能够彰显，事情会更加清晰。有目共睹、有耳皆闻，就无法歪曲事实。所以希求别人信任自己，不能仅靠自己的言语，而是要靠自己的行为去争取。观察一个人也是如此，不能只观察他如何说，而要观察他如何做。就如同孔子所说的“听其言而观其行”，这非常重要。要想不轻易地失信于人，就要做到《弟子规》上所说的：“事非宜，勿轻诺；苟轻诺，进退错。”在许诺之前，要首先考虑这件事是否符合道义，是否应该答应，是否能够办到。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就不要轻易承诺。

譬如，有人很喜欢喝酒，喝到尽兴处，别人称赞他、肯定他、夸奖他，他就很兴奋地轻易许诺。结果第二天酒醒后，发觉这件事不符合政策规定，不容易办成，这时才后悔莫及。“苟轻诺，进退错”，如果轻易地许下承诺，但又做不到，就会进退两难。所以要做到不失信于人，就要在许诺之时非常谨慎，衡量好是否应许下承诺。

# 第五十一讲

无信不立



## 以信为先

子夏曰：“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己也。”

——《群书治要》卷九《论语》

子夏认为，君子使民、事君，都要以信为先。君子在位时，要先取得民众的信赖，然后才能劳役民众。尚未取得民众的信赖就劳役他们，民众就会认为是对他们的虐待。君子若是处于臣位时，要先取得君主的信任，然后才能劝谏君主。如果尚未得到君主的信任，就劝谏他，君主会认为是对他的毁谤。这都是人情世故。作为领导者，对上仍有领导，要处理好事君的关系；对下有下级百姓，要处理好使民的关系。怎样把这些关系都处理好？首先要建立信任的基础，否则，对下使民、对上事君都很难取得理想的效果，甚至还会产生各种误解。其实不仅是上下级之间的关系，要处理好与任何人的关系，都必须首先以真诚心建立起彼此的信任。当对方对自己有信心和信任时，人际关系才能够进一步发展好。

那么应如何“使民”呢？孔子说：“民无信不立。”如果人们不信任政府或者政府的官员，那么国家和政府就无法正常运行，所以关键是要取信于民。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在艰苦卓绝的情况下，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装备精良的日本侵略者，靠的是当时的共产党人率先垂范艰苦奋斗、爱

民如子的美德。得民心者得天下，正是因为他们率先垂范的行为，取得了民众的信任，所以最后取得了胜利。民众对政府的信任至关重要。在商鞅变法时期，他首先通过立木取信。只有当人们信任他时，才愿意配合他推行一系列的变法政策。如果人们不信任政府，就不会拥护和支持政府的决策，那么很多政策都会难以推行。

如何取得民众的信任呢？首先要爱民。能够看到民众真实的需要，解除民众的困难，取得民众的信任。孔子说，即使足食、足兵这两个条件都不具备，也不可以缺少民众的信任和信用。

孔子的弟子子路，治理蒲地三年。三年之后，孔子出游正好经过蒲地，刚进入蒲地境内，孔子就说：“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仲由治理得不错，恭敬而诚信。“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而宽矣。’”再向内，进入蒲城的城邑，又感叹地说，仲由治理得很好，忠信而宽厚。“至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断矣。’”进入县衙庭堂里，孔子又感叹地说，仲由治理得好，明察而善断！

这时子贡问：“老师您还没有见到子路，却连续三次称赞他治理得不错，能否告诉我其中的原因？”孔子说：“我进入蒲境，看到田地都进行了整治，郊外的荒地也都得到开垦，田间的水沟挖得特别深，这说明他恭敬而诚信，百姓才会尽心尽力地耕种；我进入城邑，看到城市中心房屋的墙壁高大而整齐，树木也生长茂盛，这说明他忠信而宽厚，百姓做事就不会苟且，不会偷懒；我走到他的官衙大堂，大堂上很清闲，说明他明察善断，百姓没有需要申诉的情况，才不来打扰。”正是因为子路能够恭敬诚信、忠信宽厚，百姓对他才回报以真心诚意，他所交代的工作，甚至未等他交代，就已经做得尽善尽美了。

要得到民众的信任，除了爱民，发自内心地体会民众的需要和感受之外，还要教民。首先就要教孝，为什么教孝？因为一个人只有孝敬父母，才能够培养起恩义、情义、道义的处世原则，才会懂得知恩报恩，不

会忘恩负义。当今社会还有个别学生，因为贫穷，得到了好心人士的资助而获得上学的机会，却连感恩的话、感谢的信都没有，甚至久而久之认为别人的付出是理所应当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其实原因很简单，一个人连父母无私无求的付出和养育之恩，都不能铭记在心，并时刻想去回报，对于陌生人的资助、政府的关怀，又怎么可能记在心上感恩戴德呢？

除了教孝，还要教导人们甘于付出懂得为大众服务。人们在这种付出之中体现了自己的价值，当无数人因为我们的工作而改变了他们的人生和命运，甚至改变了家庭的命运、企业的命运，我们会感到自己的付出特别有意义、有价值，所以充满激情工作。当我们能够一心为公众着想，为大众付出，通过言传身教对于我们的属下、孩子、学生时，就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引导他们走上人生的正路，我们的人生也会因此变得更加有意义。

要取得民众的信任，第三点是要以身作则。自己明白道理，仅仅是用道理教导民众，而没有率先去落实，也没有从内心认同，同样不会有好效果。《说苑》上记载，大禹曾经说：“百姓没有吃的，我就不能够役使他们；事业成功，却无利于人民，我就不能够勉励他们。”大禹治水，疏通黄河，使长江畅通，又把五湖之水泄放，使之归于东海。治水十几年，“三过家门而不入”，百姓跟着他也确实很辛苦，但是百姓却没有怨言。首先是因为他们明白，大禹治水是为了百姓；其次大禹率先垂范“三过家门而不入”，劳心劳力，所以得到百姓的信任，也愿意跟随他，心甘情愿地做这些虽然劳苦，却有利于国家和百姓的事。

稻盛和夫被称为“经营之圣”。他在短短的四百天左右的时间，就使日本航空公司从一个即将倒闭的公司发展成为在同行业中盈利最高的公司，他是如何成就这个企业界的奇迹的呢？他就是运用孔子的“信而后劳其民”，先取得航空公司员工的信任。他出任日本航空公司的董事长，不要一分钱工资。这是向日本航空公司的同人表明，自己担任董事长，不是

为了名利，而是要挽救日本航空公司，挽救这么多的员工，让他们的生活有着落，使国家的经济不受损失。在取得了员工的信任之后，他再让员工去讨论日本航空公司究竟属于谁，讨论的结果是，公司是每个员工自己的。员工懂得了这个道理，工作的劲头就发生了改变，于是一年多之后就创造了奇迹。

所以要真正取得别人的信任，关键是要彻底放下私利，毫无私心地为对方着想和付出。如果仍存有私心，却想在团队里获得信任，是难以实现的。领导者如果心存“这个企业是我的，这些财富是我的”这种想法，再想获得员工的信任就非常困难了。

“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己也。”先取得信任，再向领导劝谏，指正他的不足。如果尚未取得领导的信任，就指正他的不足和过失，他会认为是对自己的诽谤，这也是人情世故。

由此可知，人们很多时候去劝谏他人，但是效果往往不佳，其原因就是没有掌握劝谏的方法和技巧。所以当人们想要劝谏他人时，首先要反省的是自己是否出于真诚。

除了先取得对方的信任，在提出建议和意见之前，要先美其长，先赞叹他做得好的地方。因为对方做了很多工作，你要体会对方辛苦的付出，存有感恩之心，而且很多人都有长处，都有我们值得学习的地方。劝谏时要先肯定他的长处，再委婉地提出改进的建议，会更容易令人接受。另外，劝谏也需要寻找合适的时机。譬如，在对方情绪不佳时指正他的过失，这无异于火上浇油，无法取得很好的劝谏效果，反而适得其反，破坏了人际关系。所以《弟子规》上说“悦复谏”，趁父母喜悦、高兴的时候再去劝谏，更容易取得好的效果。

要使劝谏有效果，最重要的是要放下自我。放下自我，才能够做到换位思考、将心比心。人们劝谏他人，不是用高标准去要求对方，指责对方没有做到更高的程度，而是要把自己修学的境界和想法先放下，考虑对

方的处境和需要，体会对方的所思所想。比如，对方有什么困难，需要怎样的帮助，最关心的事情是什么，等等。当人们放下自己，才能够看到对方真正的需要。如果心中常存一个我——我的意思、我的想法、我的建议，就不可能看到对方真正的需要，劝谏也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对方会感到得不到理解，与劝谏者之间有距离感。

信对于人伦关系的处理非常重要，可以说是人伦关系、人际相处的基础。在古代，师生关系之所以能够处理好，老师可以严厉地对待学生，也是因为信任的基础。在古代，父母可以责备儿女，老师也可以责备学生。即使老师对学生百般刁难，学生也知道老师是为了成就自己，所以他总是心存感恩，没有任何怀疑。如果彼此之间没有信任，学生就会认为老师是故意刁难、虐待他，而心生怨恨。

因此，想要做成事，想要把人伦关系处理好，首先要取得别人的信任。如果没有取得别人的信任，即使看似出发点很好，但是效果不一定很好；即使是想去做好事，也会经常遭到误解。

## 上行下效以立信

夫信由上而结者也。故君以信训其臣，则臣以信忠其君；父以信诲其子，则子以信孝其父；夫以信先其妇，则妇以信顺其夫。上乘常以化下，下服常而应上，其不化者，百未有一也。

——《群书治要》卷四十九《傅子》

这段话阐述了诚信由在上者缔结，上行下效对于建立信任特别重要。“故君以信训其臣，则臣以信忠其君。”君主以诚信的言行态度教导臣子，臣子就会以诚信忠于君主。《群书治要·史记》中记载，唐叔虞是周成王的弟弟。有一次，成王同叔虞开玩笑，把桐叶削成了珪形赠给叔虞，并且

说：“用这个来封赐你。”“珪”在古代是诸侯朝见天子的信物。于是史佚就请成王选择吉日封叔虞为诸侯。成王说：“我是同他开玩笑而已，你怎么当真了呢？”史佚说：“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礼成之、乐歌之。”天子没有开玩笑的话，一旦说了话，史官就会记录下来，还要用礼仪来完成，用乐章来歌唱，于是周成王封叔虞为唐国之侯。“天子无戏言”“君无戏言”的典故就出自于此。所以领导者要想让属下诚信，不说谎、不妄语，必须做到自己率先垂范，为属下做一个榜样。

同样的道理，“父以信诲其子，则子以信孝其父”，父亲用诚信的身教教诲子女，子女就会用诚信孝顺父亲。

《韩子》上记载着曾子的一个故事。曾子的妻子要到市场上去，这时他的儿子哭着闹着要同母亲一起去。不得已，母亲就对儿子说：“你回去吧，等我回来后杀猪给你吃。”当她从集市回来后，看到曾子在磨刀，就问他：“你要做什么？”曾子说准备捉猪去杀。妻子连忙劝阻说：“我的那些话是跟小孩开玩笑，你怎么当真了呢？”曾子说：“婴儿者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学之者也。”孩子还不懂事，都是跟父母学习，等待父母教他。“今子欺之，是教子欺也。”前边的“子”是“你”的意思，现在你欺骗了孩子，这就是教孩子学会了欺骗。“母欺子，子而不信其母，非所以成教也。”如果母亲欺骗了孩子，那么孩子就不会再信任母亲，这不是良好的教育方法。“遂杀彘”，于是真的把猪杀了。所以古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儿女的榜样，不能说欺骗儿女的话。

如果儿女不诚实、说谎了，那一定要反省自己的日常言行。譬如，很多人打电话的时候，常常是妄语，对方问：“你丈夫在家吗？我今天想请他出来吃个饭。”妻子不希望丈夫出去喝酒，丈夫明明就坐在茶几面前喝茶，她却说，他不在家，出门了。如果这个行为恰好被她的儿女看到，儿女会误认为说谎是可以得到好处的，是很必要的，所以儿女就从父母的身上学会了不诚实。父母的言行举止对儿女来说都是榜样，所以要小心谨慎。

“夫以信先其妇，则妇以信顺其夫。”丈夫用诚信对待妻子，妻子就会用诚信顺承丈夫。如今夫妻关系处理不好，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彼此不能够完全信任，互相有隐瞒。一个好丈夫首先要以身作则，要有恩义、有道义、有情义，要做好榜样，与妻子共同走在正确的为人处世、待人接物的道路上，而不是处处去管妻子。

作为好丈夫要立住“三刚”，即“性刚无脾气，心刚无私欲，身刚无嗜好”。“性刚无脾气”，是指一个人的性刚并不体现在性情暴烈、容易发怒，而是恰恰体现在没有脾气，遇事很冷静，性格很温和，很有修养。“心刚无私欲”，是指一个人不是偏私自己的妻子、儿女，而是能够时刻体恤父母的需要。“身刚无嗜好”，是指一个人不能有吃喝嫖赌等不良嗜好，因为这些会让家人担心。作为丈夫，只有自己做得很好，才能够为妻子做一个好榜样，才能够带领家里的每一个成员言行举止端正，没有偏邪。

一旦丈夫出现这些问题，如何能够让妻子在感情上依靠和信任呢？如何能够让孩子不学坏、不走偏呢？如果父亲教导孩子要用功读书，不要上网，不要迷恋网络游戏，而自己却整天沉迷网络，那么孩子自然不会服气，而且潜移默化地会向父亲学习。一个尽责的丈夫应该时刻关心家人，体谅妻子的不易，关心孩子的学习和成长。如果父亲在家里起到了表率的作用，那么家庭就会长幼有叙，父母慈爱，儿女孝顺，其乐融融。

而一个丈夫要身为表率，最重要的是要有责任感，要有信义，不能朝三暮四、始乱终弃。

《中华德育故事》里说，宋朝有一位读书人叫刘庭式，他和邻居家的女子口头上订了婚，尚未举办婚礼，就去读太学了。五年之后，刘庭式考中进士衣锦还乡，却发现和他订婚的邻居家的女子已经双目失明。于是女子的家人就说：“如今你已经考中进士，而她却双目失明，而且家道也衰落了，两家门不当、户不对，这桩婚事就取消吧。”但是刘庭式非常有信义，他坚持自己的承诺，迎娶这位女子过门。于是这位女子过门之后，对

他感恩戴德，把他照顾得很好，还为他生了两个儿子，并且非常用心地教育两个儿子。后来两个儿子也都学有所成，双双考中进士。

后来，刘庭式到高密去做通守，通守就是太守的助理。当时高密的太守是苏轼。在做通守期间，他的妻子不幸因病过世了。刘庭式思念妻子的恩德，想起平日妻子对自己点点滴滴的照顾，经常哭得很伤心。苏轼劝他说：“我听说一个人因为美色才会生起情爱，因为情爱才会有伤痛的感受。你的妻子并不是美人，还是一位盲人，有什么哀伤可言？”刘庭式止住悲泣说：“我所哀伤的，是我失去了一个和我同甘共苦的妻子，我并没有想到她的双目是失明的。如果诚如你所说，一个人因为美色才生起情爱，因为情爱才有伤痛的感受，那每天在大街小巷挥动手绢，挑逗、诱惑人们的红尘女子，她们每个人都长得很美，你愿意娶她们做你的妻子吗？”苏轼听到这番话非常惭愧，也更加感佩刘庭式的德行。

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体会到，能够让两个人天长地久的，不是欲望，也不是美色，而是在生活中为对方点点滴滴的付出，这些点滴付出使人一想起就非常感动。所以“以道交者，天荒而地老”，正是这种恩义、情义、信义，才使彼此之间能够互相珍惜，天长地久。

“上乘常以化下，下服常而应上，其不化者，百未有一也。”在上位者，如果能够依循伦常大道教化下位者，下位者自然会服从常道而顺应上位者。如此上行下效，如果仍有不被教化的人，一百个人里也找不到一个。这句话强调了“上行下效”的力量很重要，在上位者的言行举止，一定要符合伦常大道。

《群书治要》上记载了一个郭伋的故事。郭伋外出巡行，到达西河美稷这个地方，遇到几百个儿童骑着竹马在道边迎拜他。郭伋问：“你们为什么这么远跑来？”这些孩子回答：“听说您要来，我们都很高兴，所以特意来欢迎。”郭伋于是向孩子们道谢。当他把事情办完，将要离开之时，这些孩子又一直送他到城外，还问他什么时候回来。郭伋估算了归来的日期告诉

孩子们。当他再次到来时，却早到了一天。郭伋不愿失信于这些孩子，就在野外的亭栈住了下来，等预先说定的时间到了，才进入美稷。郭伋对于孩子都不忍心欺骗，说定哪一天回来就信守承诺，这就是不失信于民，所以他做官也确实很成功。郭伋平时有恩于百姓，当他到达曾经治理的并州境内时，百姓都扶老携幼，在道路上迎接他。这就是上行下效的力量。

## 得贤贵诚

色取仁而实违之者，谓之虚；不以诚待其臣，而望其臣以诚事己，谓之愚。虚愚之君，未有能得人之死力者也。故《书》“称君为元首，臣为股肱”，期其一体相须而成也。

——《群书治要》卷四十八《体论》

表面做出仁义的样子而实际却相违背，这叫虚伪；对待臣属不真诚，却希望臣属真诚地事奉自己，这叫愚昧。虚伪愚昧的君主，不可能得到愿为他舍生忘死效力的臣属。所以《尚书》说，君主就像是人的头，臣属就像是人的胳膊和大腿，这是希望君臣能成为一个整体，相互配合使国家大治。这句话告诉人们，君主不以虚伪来对待臣属，才能换得臣属的真诚相待。

《史记》上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晋国人豫让曾经服侍过范氏和中行氏，但不为人知。后来他离开范氏和中行氏，去服侍智伯，智伯很尊重他、宠信他。智伯去攻伐赵襄子时，赵襄子与韩、魏合谋消灭了智伯，并且瓜分了他的土地。赵襄子把智伯的头骨涂上油漆，作为饮酒用的大酒盅。

豫让知道此事后，逃到山中，改换了姓名，而且假装成是被判罪罚做苦役的人。为了替智伯报仇，他潜入赵襄子的宫中粉刷厕所，准备刺杀

赵襄子。赵襄子上厕所时心中一惊，便拘问粉刷厕所墙壁的人，才发现是豫让。豫让的衣服里夹着凶器说：“我要给智伯报仇！”随从要杀掉豫让，赵襄子却说：“他是一个义士，我以后注意回避就是了。”于是就释放了他。

豫让仍不甘心，一心想为智伯报仇。没过多久，他又全身涂漆，使皮肤长满癞疮，吞下炭使嗓子变得沙哑，在街上讨饭，甚至他的妻子都无法认出他。但是他的朋友还认得出，就问他：“以你的才能，委身去侍奉赵襄子，赵襄子一定会接纳你、宠信你，给你一官半职。到那时，你再去替智伯报仇，不是更容易吗？何必要摧残自己的身体、丑化自己的容貌呢？用这种方式达到复仇的目的，不是很困难吗？”豫让说：“委身服侍别人，又想杀掉他，这是怀着二心服侍君王。我知道用现在这种方式去报仇是很艰难的，但我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使后世怀着二心去服侍君主的人感到羞愧。”

不久以后，赵襄子外出，豫让潜伏在他将要经过的桥下。赵襄子来到桥上，马突然受惊。赵襄子说：“一定是豫让在这里。”派人去查问，果然是豫让。这时赵襄子责问豫让：“你过去不是也服侍过范氏、中行氏吗？智伯消灭了他们，你却不为他们报仇，反而委身做智伯的臣子。如今智伯已死，你为什么三番五次地要为他报仇呢？”

豫让说：“以前的范氏、中行氏，在我寒冷时不给我衣服穿，在我饥饿时也不给我食物吃。他们是对一般士人的礼节来对待我，所以我也以一般士人的态度回报他们。但智氏对我不同，我饥饿时，他关心我、给我食物；我寒冷时，他给我衣服穿；在朝会时，他特别尊敬我，以国士之礼待我，所以我也以国士的态度来回报他，一定要为他报仇。”

豫让之所以不惜残害自己的身体，三番五次地冒着生命危险为他服侍过的智伯报仇，其根源是他被智伯生前待他的真诚态度所感动，是为了报答他的知遇之恩。这是以心换心的结果。所以历史上贤明的君主，一定

是以真诚的态度礼敬贤德之人，这样才会拥有真正的股肱之臣、国家良将，来真心为他付出。

《说苑》上记载，齐桓公为了称霸天下，想让管仲来辅佐他，管仲说：“身份低贱的人，不能够统治身份高贵的人。”齐桓公就拜他为上卿，但是国家依旧没有治理好，齐桓公询问原因，管仲说：“贫穷的人不能指使富裕的人”。齐桓公就把齐国市场上一年度的租税都赐给他，但是国家仍然没有得到治理，齐桓公又问原因，管仲说：“关系疏远的人不能够控制、管理关系亲密的人”。齐桓公便把管仲立为“仲父”，以待奉父亲的礼节来礼敬管仲。最后齐国终于得到治理，齐桓公也成为春秋五霸之首。

孔子听说这件事评论道：“即使是管仲这样的贤德之才，没有得到这三种权力，也不能够使他的君主南面而称霸。”所以齐桓公能够得到管仲尽心尽力的付出，是因为他真诚地信任管仲。如此，贤才才能够真心地付出，帮助君王弥补自身的不足，使他得到天下人的尊重和认可。

《中论》上说：“故明主之得贤也，得其心也，非谓得其躯也。”明智的君主得到贤才，是得到他的心，而不是得到他的身。没有得到贤才的心，就会像三国时期的徐庶一样，“身在曹营心在汉”，即使得到了贤才的身，也不会得到他的任何帮助。怎样得到贤才的心？关键是用真诚心来感动。但如今很多领导者对于身边的人不够尊重、不够真诚，而对于远道而来的人反而特别尊重，习惯性地舍近求远。人时常会犯的过失就是不懂得珍惜，所以即使有贤德之士在身边，他们也不能够被重用，不能够竭尽全力地发挥自己的才能。

## 第五十二讲

正己化人，成人达己



## 为君者正，何物不正

曾子曰：“敢问何谓七教？”孔子曰：“上敬老，则下益孝；上尊齿，则下益悌；上乐施，则下益宽；上亲贤，则下择友；上好德，则下无隐；上恶贪，则下耻争；上廉让，则下知节。此之谓七教也。七教者，治民之本也。政教定，则本正矣。凡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则何物不正！”

——《群书治要》卷十《孔子家语》

曾子向孔子请教何为“七教”。

孔子说：“上敬老，则下益孝。”在位者能够尊敬老人，臣民就会更加孝亲。中国古人特别强调尊敬老人，这是因为尊敬老人是教导人们以恩义、情义、道义的处世原则待人处事。老人其实是对社会贡献最多的人，下一代之所以能过上幸福安乐的生活，都得益于上一代所做出的贡献。所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所以人们知恩报恩，对老年人特别尊重。

但是当下一些人为什么对老年人愈来愈忽视和淡漠呢？甚至出现了很多不赡养父母、虐待打骂父母的现象呢？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些人把功利主义作为处事待人的标准，一件事对人们有利益，人们才会全力以赴。如果一个人没有了恩义、情义、道义的处世原则，对于在位者、当权者，就可能极尽谄媚巴结之能事，言听计从；但是对于自己的父母，却不能照

顾和关心，不能把父母的话放在心上。这就是把恩义、情义、道义的处世原则变成了功利的处世原则。

老年人对社会有贡献，父母培养儿女成才，但是有些年轻人认为，父母现在体力、智力等身体机能衰退了，已经成为子女的包袱了，所以对他们不闻不问。这是社会对老年人不照顾、不关心、不赡养，甚至打骂父母这些现象出现的重要原因。孔子在《孔子家语》中说：“弃老而取幼，家之不祥也。”现在很多人出于功利之心，把所有的关爱放在孩子身上，努力地教育他、培养他，希望以后孩子也能对自己好，这完全是一种功利的思想。孩子潜移默化地看到自己的父母是怎样对待他们的父母，也逐渐养成了以自我为中心的“小皇帝”“小公主”的习气，当父母年老时，他同样不会去关爱父母。为什么“弃老而取幼，家之不祥也”？因为在家道、家风之中，没有培养起恩义、情义、道义的处世原则。

古人为了教化百姓，使民风淳厚，而不是忘恩负义、见利忘义，就要求在位者以身作则，尊敬父母、老人。历史上出现孝子最多的朝代是汉代，就是因为汉朝的皇帝奉行孝道。譬如汉文帝，他的母亲薄太后生病时，他亲自奉上汤药，真正做到“亲有疾，药先尝；昼夜侍，不离床”。在他母后病重的三年之中，他每天晚上睡觉都是衣服不解带，因为如果母后在深夜里出现突发症状，他就可以马上起身侍奉，而不会因为穿衣服耽误时间。所以至孝体现在侍奉父母的点滴之中，全心全意地为父母着想。正是他以孝治天下，当时才出现了很多孝子，纷纷效仿皇帝的孝心。所以在汉代，每一个皇帝的谥号都要加一个“孝”字：汉孝文帝、汉孝景帝、汉孝武帝。这说明汉朝是以孝治天下的，因此才出现“文景之治”，天下太平。

汉朝的皇帝也非常有智慧，他们不仅自己做好榜样，也很懂得教化。如果发现有奉行孝亲的优秀范例，一定会将他树立为孝的榜样，并加以表彰。譬如《三字经》中有一句话：“香九龄，能温席”；《弟子规》中也有

“冬则温，夏则清”，都是关于汉朝黄香的典故。黄香9岁时就能够想到，冬天的时候，先用身体为父亲把床铺暖热；夏天的时候，先用扇子把床席扇凉，再让父亲去躺。从小就有这种体贴入微的意识。当汉朝的皇帝知道这件事后，立即重赏黄香，并且赐予他八个大字：“江夏黄香，举世无双。”将好的榜样树立起来，让人们都向他学习、效仿，于是孝的观念就能得到迅速普及。

“上尊齿，则下益悌”，君上尊敬年长者，臣民就更加友爱兄长。自汉代以来，中国就是以礼治天下。礼有很多种，如“冠礼”“婚礼”等，都是起到教化的意义，绝对不是繁文缛节。还有一种礼叫“乡饮酒礼”，是在家族聚会时，为了团结整个家族的感情，而设计的一种礼节。在乡饮酒礼当中，座次的排位都是按辈分、年龄排序。即使有人身居高位，做到了宰相，但是由于年纪比较小，还是要排在后面。这样安排就是提醒人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曾接受过叔叔伯伯、那些长辈给予的照顾、教育和付出，不要忘恩负义。不能因为自己有钱、有地位了，就可以财大气粗，执意要坐在前面、坐在正位，这不是以恩义、情义、道义为处世原则。

人生最可贵的，就是能将知恩报恩的心自然地保持一生而不改变。礼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提起感恩之心。最可怕的就是随着社会地位的逐渐提升，随着财富的逐渐累积，而报恩的心愈来愈少，认为那些成就是全凭自己的本事。所以有一些学生，上大学之前，还懂得孝敬父母，但是上了大学之后，就开始瞧不起在农村把自己养育成才的父母。这是被外在的虚荣心，把自己的本性本善逐渐染污了。

比如，有的人有钱之后，觉得父母跟自己一起住，兄弟姐妹也都靠自己扶持，自己付出的最多，所以对父母说话不恭敬，对兄弟姐妹也没有礼貌，“兄道友，弟道恭”，恭敬心没有了，也是内心被外在的虚荣染污了。这种变化可能是潜移默化、不知不觉的，自己都很难意识到。

中国古人强调孝悌，就是培养知恩报恩的意识，培养恩义、情义、

道义的处世原则。从爱父母、爱兄弟，把孝悌之心推而广之，推广到爱一切人，爱一切生命，这个仁慈博爱的心才有了原点和基础，所以孝悌之心确实非常重要。中国传统教育就是将孝悌之心这一天性保持一生不变，并且将它发扬光大。

孝悌之心是人的本性、人的天性。一个人懂得爱自己的父母，就懂得天下的父母都不容易；知道友爱自己的兄弟，也就知道天下的兄弟都非常有情义。将这种爱心推而广之，就会懂得尊重一切生命，就会爱好和平，而反对战争。

有人曾经调查过那些高考状元，调查结果表明，大部分的高考状元，都是出生在贫寒的家庭环境，他们的父母为了供他们上学，费尽千辛万苦。他们那样刻苦学习，就是为了报答父母，不让父母失望，不辜负父母的期望，所以一个孩子是不是很聪明，是不是外界的环境很好，是不是请了很多好老师教导，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要有回报父母的孝心。

孝敬父母是做人的本分，然而现在一些年轻人却认为孝顺是中国的古老思想，是落伍的行为。其实知恩报恩、饮水思源是人类的良知，不论古今中外，人类的良知是相同的。威尔逊虽然是美国人，他没有受过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教育，但是“人之初，性本善”，人的本性本善是相同的。通过威尔逊的故事我们也能够体会到《大学》上所说的“德者本也，财者末也”。正因为威尔逊是一个孝子，他有知恩报恩的意识，所以他不仅荣获了品学兼优的荣誉金牌，后来更是成为美国总统，倡导世界和平。

如果人们忽视了孝心的培养，忽视了孝道的教育，不仅受恩者会对施恩者的施惠行为表示冷漠，出现忘恩负义的行为，还会使一些不正常的现象成为正常的现象。什么是不正常的现象？人知恩报恩、饮水思源是正常现象，而现在一些人知恩不报恩，甚至认为施恩的行为是理所当然，更有甚者想方设法地去蒙骗施恩者，这就是积非成是，把错误的现象积累多

了，反而认为是正常现象。比如，现在有些寺院旁边有很多行乞的人，实际上其中有很多是利用了别人的善良在欺骗人。如此一来，人们就不愿意再去做慈善的事。出现这个问题的一个原因就是孝道教育的缺失。

一个人从小培养起孝道的品质，能够真正对父母做到养其身、暖其心、解其忧、遵其言、承其志、继其业，这才是真正做到了孝。并且更进一步把孝心扩大，关爱尊敬所有的老年人，孝敬天下的父母。人们学习传统文化，能够对天下人产生爱心，正是因为有孝道的基础。孝悌之心培养了一个人恩义、情义、道义的处世原则，而不是一切以功利为取舍的处世原则，所以孝心一开，百善皆开，这就是古人这样强调孝悌的原因。

“上乐施，则下益宽”，君上乐善好施，臣民就会更加宽厚。在《古文观止》里有一篇文章叫《义田记》，记载的是范仲淹的故事。范仲淹在世时，兴办义田，当时的义田有一千亩。他乐善好施，有仁慈之心，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的后代子孙，传到清朝时期，他的后代将义田扩大到四千亩。范仲淹自己生活非常清寒，对自己要求很严格，他去世时没有为后代留下多少钱财。他还写下千古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有些人看到这样的行为，也许会嘲笑他实在太傻，但是这些人就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反观历史，范仲淹的儿子们做到了宰相、公卿、侍郎，而且都道德崇高，能够守家风，把好的风范代代相传。到了清朝时期，曾有人统计，范家出了七十多位做到部长以上的官员。不仅如此，他的家风一直传承到今天，仍然出现了很多优秀的人才。

“上亲贤，则下择友”，君上亲近贤士，臣民就重视选择朋友。在上面的人尊师重道，亲近贤德的人，百姓也自然重视教育，聘请有德行的老师教导自己的子弟，所以上行下效，整个社会的风气都很良善。

《弟子规》中说，“能亲仁，无限好，德日进，过日少”。人们每天读圣贤书，就是和圣贤人做朋友，就是在亲近圣贤，亲近仁者，其结果就是

人们潜移默化地受到圣贤的熏陶，不知不觉间，思想、行为、言语就产生了变化。所以古人说“读书贵在变化气质”。古人也说：“亲附善友，如雾露中行，虽不湿衣，时时有润。”与善良的、有德行的贤者交朋友，就如同在雾水中、露水中行走，虽然不能打湿衣服，但是却能时时蒙受他德风的滋润。

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也非常有体会。在我的学生中有一个是我的外甥，他的进步非常快。因为他负责录像，每次讲课，别人可以不来听课，但是他每次必须来录像，结果一堂课都没有缺的只有他，所以他的改变最快，提升也最大。这就是因为每天接受圣贤的教诲，潜移默化地受到了圣贤气氛的熏陶，别人再见到他时，确实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这说明，亲近怎样的朋友特别重要。

“上好德，则下无隐；上恶贪，则下耻争；上廉让，则下知节。”君上注重道德修养，臣民就不会做不可告人的事；“无隐”是没有隐瞒的事。就像司马光所说的，我平生所为之事没有一件不可与人言，“仰不愧于天，俯不作于人”。君上厌恶贪婪，臣民就耻于相争；君上清廉谦让，臣民就知道坚守节操。这都是教导领导者、父母和教育工作者，要身体力行，给下属、儿女及学生以潜移默化的影响。

《群书治要·后汉书·鲁恭传》中记载着鲁恭做中牟县令，以德化治理百姓，不用刑罚，结果使民风改善的故事。譬如有一人叫许伯，他很多年以来一直在与人争田产，郡守和县令都不能判决这一案件。直到鲁恭成为县令，为他们评论曲直，因为鲁恭自己很有德行，评判合情、合理、合法，于是双方都退堂自责，并将耕作暂停，互相推让田界。

还有一个亭长，他从老百姓的手里借了一头牛，但不肯再归还，于是牛主人就将此事告到鲁恭面前。鲁恭把亭长召来，屡次命令他归还，但是亭长仍不听从。鲁恭叹息地说：“这是教化不行的结果！”于是准备自己辞官。结果县内的吏员们都哭着挽留他。亭长看到这种局面，心生惭

愧，非常忏悔，就把牛归还给原主人，并且请求到狱中服罪。可见，一个人有德行，就能够感化下面的人悔过自新。鲁恭赦免了他，不再过问此事，因为他已经知过能改，于是所有官吏和百姓都心悦诚服。

建初七年，与中牟县相邻的郡县都有螟虫危害庄稼。鲁恭所治理的中牟县和邻县是犬牙交界，但是奇怪的是螟虫唯独没有进入中牟县。当时的河南尹袁安听到这件事，怀疑这个情况不属实。于是派一位叫肥亲的官员亲自去察看。鲁恭陪同肥亲来到田间，他们坐在桑树下察看，有一只野鸡飞过来，停在他们身边，也不怕人，旁边还有一些儿童。肥亲就问儿童：“你们为什么不去捕捉野鸡？”儿童说：“野鸡还要喂养它的小鸡。”听到这个回答，肥亲忽然站起身来，同鲁恭告别说：“我这次来的原因，是想察看您的政绩究竟如何。如今看来，蝗虫不侵犯中牟县境，这是第一件奇异的事；教化施及鸟兽，这是第二件奇异的事；连小孩子都有仁爱之心，不去捕杀野鸡，因为野鸡还要照顾它们的孩子，这是第三件奇异的事。我久留于此，只能白白打扰贤者。”于是他便告辞离去。

回去之后，肥亲把在中牟县看到的一切汇报给袁安。袁安上书把这些情况向当时的皇帝——汉光武帝汇报，光武帝对此也感到很惊异。这是《后汉书》上记载的历史故事。这些都告诉人们，一个地方治理得好坏，和地方官员本身的德行密切相关。

“七教者，治民之本也。政教定，则本正矣。凡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则何物不正！”“七教”，即上述的七条，是治理人民的根本。政治教化的原则确定了，根本就端正了。凡是在上位者，都是人民的表率，表率端正，还有什么事物不端正！这是强调，要治理人民在上位者的率先垂范是最重要的，所谓“上行则下效”，身教的力量是潜移默化的，所以做领导的、做父母的、做老师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要小心谨慎。在上位者不能一味要求下位者，而是要负起责任，靠自己的言行、身教，把家庭、团队和企业单位的良好风气带动起来。

## 其身正，不令而行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群书治要》卷九《论语》

孔子说，当政者本身言行端正，能做出表率、模范，不用发号施令，人民自然起身效法，政令也会畅行无阻；如果当政者本身言行不正，虽然下命令，人民也不会服从遵守。“其”是指当政的人、领导者。处理政治及任何事情，必须有领导者。领导者最辛苦，因为他颁布的任何政策法规，都必须自己先遵行。如果领导者本身行得正，办事合乎规矩，自然能够得到民众的拥护和支持，不需要下达命令，民众也会依照去实行，所以说“不令而行”。

《大戴礼记·子张问入官篇》中有一句话，君子“欲政之速行也者，莫若以身先之也；欲民之速服也者，莫若以道御之也”。这句话告诉人们怎样才能迅速地推行政教。如果在位者想使政策迅速地推行，没有比自己首先身体力行更好的办法。比如，很多人意识到《弟子规》很好，很多家长说一定要让孩子学习《弟子规》；很多企业老板说，一定要让员工学习《弟子规》，但学习后的效果都不明显，这是什么原因？因为他们自己都没做到。中国古代是怎样教孩子学习《弟子规》的呢？是父母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全都符合《弟子规》里的要求，孩子是从父母的身上学到了《弟子规》。在企业推行《弟子规》也是如此，如果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所作所为不符合《弟子规》，却要求员工学习，员工会认为这是“愚民政策”，不可能心甘情愿地去做。

所以领导者的带动作用至关重要。如果想使民众迅速地服从，没有比用“道”来教导民众更好的办法。怎样教呢？这句通俗易懂的话概括出为政之要。同时也指明，道德教育不得力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一些领导

者的心目中，需要教育的人都是百姓。道德教育都是教育百姓的，领导者本身已经做得很好了，而且领导者日理万机，不需要接受这些教育。其实恰恰相反，最需要教育的便是领导者，但是往往领导者没有来接受教育。

在一些领导者的心目中，道德教育是软的，解决不了实际问题。拉项目、谈投资，这比道德教育更实在、更能够看见政绩，所以道德教育就沦为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必要。而那些道德教育做得很好的地方，确实是当地的党委书记、市长这些一把手全部都来听课。人们看到领导坐得整整齐齐，而且很早就到达会场，对老师又很恭敬，听起课来也是劲头十足，就知道这些领导者不是在搞形式主义。

如果领导者本身行得不正，虽然屡次下命令，民众也不会服从，大家会问为什么领导者不先做。正所谓“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讼”。

《淮南子·缪称训》上也有一句类似的话：“无诸己，求诸人，古今未之闻也。”自己没有做到，却希望别人能够做到，这是自古至今闻所未闻的。“同言而民信，信在言前也；同令而民化，诚在令外也。”领导者的言论百姓赞同，并且取得了百姓的信任，是因为领导者在对百姓说教之前，一向讲诚信。百姓服从、执行领导者的命令，而且能够被教化好，是因为领导者在发号施令时，或者在发号施令之前，有一片真诚之心。这个真诚之心能够被百姓所感受、所认可，所以当领导者去发号施令时，百姓才会听从。如果领导者没有诚信，那么即使发号施令，百姓也不会服从。

“圣人在上，民迁而化，情以先之也。”圣人处于上位，百姓归顺并且被感化，同样是由于圣人对百姓动之以真情实意。正是他的真诚之心为百姓所感受，百姓才愿意顺从。

“动于上，不应于下者，情与令殊也。”反之，君王处于高位发布政令，而下面的百姓却不响应，其中的原因，就是君王的真情与政令不一致。虽然口上是这样要求，但是实际上并没有做到，心里也并不认可，所以不能够感动人。这就是说一套做一套，假话、空话、大话特别多，怎

么能感动人？

《新序·杂事》中也这样说：“唱而不和，动而不随，中必有不全者矣。夫不降席而匡天下者，求之己也。”领导者倡导，但是没有人应和；领导者行动，但是没有人追随，这其中一定有做得不完善的地方。不需要走下坐席就能够匡正天下的人，都是反求诸己的人。他不是从别人身上找原因，而是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论语·颜渊》篇中孔子也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子路》篇中也有一句话：“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如果在位的领导者能够端正自身，对于办理政治这件事又有何难处？完全不难。而为什么不能够正人？为什么别人不服从领导者？就是因为领导者不能正自己，所以“正己化人”才是教育的真谛。

《群书治要·汉书》记载，汉武帝曾经下诏求取治国的方略，董仲舒在对答中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同样值得现代人思考。他说：“古代的国土也是今天的国土，同是一片国土，而古代能够使国家大治，上下和睦，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官吏没有奸诈邪恶，图圉空虚，恩德润及草木，福泽广被四海。以古观今，为什么相差如此之远？是什么地方出现了错乱，以至于道德风气衰败成这种地步？”这个问题值得思考，因为现在社会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也需要寻找答案。

在提出问题之后，董仲舒自己给出了答案，他说：“想来大概是现今的治国之道，比之古时有所差失，或者说是与天理有所违背。天理是什么？上天对待万物是有所分配的，譬如，给予了一种动物锋利的牙齿，就要去掉它的抵角；给予了一种动物翅膀，就让它只长两只脚。这就是接受了大的好处，就不能再获得小的好处。同样的道理，凡是接受俸禄的人（即现在的官员、公务员），不需要以体力劳动谋生，就不得从事商贸事业。这也是接受了大的好处，就不得再谋取小利。如果已经接受了大的好处，又要谋取小利，连上天都不能满足其需要，更何况是人？这就是人们

怨恨、忧愁、苦其不足的原因。”

两极分化之所以会出现，就是因为有些官员不满足于当官的收入，还要与民争利，去搞商贸活动。自身受宠而居于高位，家人温饱而享受厚禄，还要凭借富贵的财力同天下人民争利，人民怎么能比得过他们？所以享受俸禄之家，只要以俸禄为生就可以，不能与人民争占产业。这样利益就可以普遍地分布，而人民也可以家给人足，这是上天的公理，也是上古的治国之道。天子应该取法此道作为制度，大夫也应该遵循它，使其成为自己的行为。古代的贤人君子都是如此，所以居下位者崇敬他们的品行，听从他们的教导，人民被他们的廉洁所感化，而不贪婪鄙陋。由此看来，天子、大夫是百姓效仿的榜样，怎能已居贤人之位，却像平民一般作为？惶惶不安地谋取财利，并且经常担心财用匮乏，这是平民的意识和所思所想；惶惶不安地求取仁义，并且担心不能教化百姓，这才是大夫应该考虑的事。

习近平同志早就提出，“不要既想当官，又想发财，要当干部就不要想发财”<sup>①</sup>。说得非常好，因为这是上天的公理，不能已经得到大的好处，再去谋取小利，所以在上位者要以身作则，不与民争利。既然选择了当官、当领导，就要心存教化百姓的职责，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尊重的职业，致力于使天下太平、国泰民安、风调雨顺，这是多么有意义、有价值的工作。选择了这样一个高尚的职业，就要把财利看淡。老师、医生、官员都受到人们的尊重，就是因为他们有高尚的德行。不与民争利，以身作则，然后再去推行道德教化，才能让人心服口服，人们才会信任领导者，心甘情愿地接受领导者的教化。当然古人设计任何制度都是非常合理的。领导者被尊重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他的收入对于养家糊口而言绝对不会缺乏。这也是从制度上让他能够安心于本职工作，尽心尽力地把政事办好，使人民得到良好的教育。

---

<sup>①</sup> 习近平：《摆脱贫困》，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4页。

## 君子为政，以正己为先

故君子为政，以正己为先，教禁为次。

——《群书治要》卷四十七《政要论》

君子治理政务，首先要端正自己的思想言行，其次才是推行教育和政令、禁令。

《汉书·公孙弘传》中有这样一句话：“上古尧舜之时，不贵爵赏而民劝善，不重刑罚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末世贵爵厚赏而民不劝，深刑重罚而奸不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在上古时期尧舜统治的时代，没有尊贵的官爵和丰厚的奖赏，百姓却相互勉励行善，争先恐后地去做善事；不重刑罚，百姓却不犯法。原因很简单，因为君主为臣民做出了正直的表率，而且对待民众非常守信。

到了后世，有尊贵的官爵和丰厚的赏赐，作善就给予奖赏，有德的人就给予官位，百姓却不能够勉力行善；设立了严酷的刑罚，却不能够禁止作奸犯科的事情发生。这其中的原因，是君主本身不正，并且对待百姓不守信。可见，君主、上位者想使民众信服，愿意遵循他的制度、政策、教令去执行，必须首先把他自己所倡导的都落实好。

在当今现实生活中同样可以观察到，凡是推行传统文化成绩卓著的地方，无论是小区、单位、企业、学校，甚至监狱，还是传统文化的学习中心，之所以能够取得好的效果，都是因为领导者或者老师，能够身体力行圣贤的教诲，上行下效的效果非常显著。

2005年，安徽省庐江县汤池镇兴办了一所庐江中华文化教育中心。有一些老师从全国各地来到汤池镇，想要推行传统文化，通过学习《弟子规》，把汤池镇构建成一个和谐示范镇，为大家做出榜样，使人们对传统文化产生信心。

这些老师是如何做到的？他们初来这个小镇时，发现小镇的民众没有卫生意识，环保意识也比较差，垃圾随地乱扔，影响街容，也影响交通。于是这些老师自己穿上写有“和谐社会，从我做起、从我心做起、从我家做起、从我镇做起、从我县做起”的马甲，排着队到大街上去捡垃圾。结果捡了一段时间之后，小镇的民众便不再乱扔垃圾了。他们都说，看人家都在捡垃圾，我们怎么好意思再往地上扔垃圾。还有很多商家主动提供了垃圾桶，让过往的行人能够把垃圾扔到垃圾桶里。经过一段时间，小镇的风气便大为改观，镇容镇貌变得清洁整齐，人与人之间相处和睦，儿女懂得孝敬父母，夫妻恩爱，懂得如何教育孩子。

由于成效显著，他们应邀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汇报成果，进行展览。几天的展览，使来自世界各国驻联合国大使心服口服，确实对传统文化产生了信心。因为以前他们认为这是理想，现实中办不到。但通过汤池镇的变化，使他们对中华传统文化教化人心、改变社会风气的作用产生了信心。

现代人很难教，对于传统文化的益处总是怀疑，认为传统文化有很多的糟粕，是统治阶级愚昧被统治阶级的精神鸦片。如果没有做出示范镇，大家确实很难产生信心。而汤池示范镇之所以在短时间能够产生效果、产生影响，就是因为这些老师首先自己落实了《弟子规》，然后再去讲解，再去带动，小镇的风气才蔚为改观。

## 上之所好恶，不可不慎

子曰：“下之事上也，不从其所令，而从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矣。故上之所好恶，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

——《群书治要》卷七《礼记》

下级为上级办事，下级事奉上级，并非只是机械地服从上级的命令，而是看着上级的行为而效法他。上级爱好某一事物，下级一定有比他更加爱好的。所以上位者的喜好和厌恶不能不谨慎，因为都是民众的表率。下属看上级，并不是看他怎样说，而是看他怎样做，上级的所作所为才是下属学习的榜样。

《孔子家语》上有这样一个典故，即鲁哀公向孔子请教：“大礼何如？”“大礼”是怎样的？“子之言礼，何其尊也？”为什么您一谈到礼，就对它如此尊崇？孔子说：“丘闻之，民之所以生者，礼为大。非礼则无以节事天地之神焉，非礼则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焉，非礼则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婚姻、亲族疏数之交焉。”我听说人们之所以能够正常地生活，礼是最重要的。如果没有礼，就无法按照一个合适的标准祭祀天地鬼神；如果没有礼，就无法区别君臣、上下、长幼的位置；如果没有礼，也就没有办法辨别男女、父子、兄弟、婚姻、亲族远近亲疏的交往。

“是故君子此为之尊敬，然后以其所能教顺百姓所能……卑其宫室，节其服御，车不雕玕，器不雕镂，食不二味，心不淫志，以与民同利。古之明王行礼也如此。”因为礼如此重要，所以古代治国理政的人对礼特别尊重，并且以他们自己所能做到的来教导百姓，率先垂范。他们居住的房屋很简陋，穿的服饰很俭朴，乘坐的马车没有特别雕饰，使用的器具也不精雕细刻，饮食不讲究美味，心里也没有特别贪求，与天下百姓共享利益。古代圣明的君王是如此行礼的。

哀公听后，也提出一个很好的问题，他说：“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为什么今天的国君不能够行礼了？孔子的回答很耐人寻味，他说：“今之君子，好利无厌，淫行不倦，荒怠慢游，固民是尽，以遂其心，以怨其政，以忤其众，以伐有道。”今天的君主追求利益，贪得无厌，荒淫奢侈无度，懒惰怠慢、游手好闲，一味地搜刮百姓的钱财来满足自己的贪心，使百姓抱怨朝政，并且违背众人的意愿去征伐政治清明的国家。“求得当

欲不以其所，虐杀刑诛不以其治。”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不择手段，不依据正常的法度，而是任意地使用暴虐严酷的刑罚来诛杀百姓。“夫昔之用民者由前，今之用民者由后，是即今之君子莫能为礼也。”从前的君王治理和役用百姓，像尧舜禹汤，都是按照前述的方法去做，自己俭朴，严于律己；而如今的君主、官吏役用和治理百姓，都是按照后述的做法去做，荒淫无度。这就是当今的君主、官吏不能够修明礼教的原因。

政教不修，礼仪不能复兴的原因，就是君主、官员不能够率先垂范。他们习惯于骄奢淫逸的生活，把升官作为发财求利的手段，没有想到做领导的是为人民服务，是为天下人谋福利的。古代的盛世君王，都能够带头去做自己所要求的事。就像习近平总书记，带头去反对奢侈，力求节俭，才能够上行下效，把反对“四风”工作做好。

## 第五十三讲

有诸己，而后求诸人



## 教，上所施，下所效

我有公心焉，则士民不敢念其私矣；我有平心焉，则士民不敢行其险矣；我有俭心焉，则士民不敢放其奢矣。此躬行之所征者也。

——《群书治要》卷四十五《昌言》

《大学》上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要治理好国家、平天下，必须从修身开始，而修身首先要从天子做起。有人认为儒家文化是统治阶级用来愚昧被统治阶级的精神鸦片，实际上由此可知这是误解。因为儒家文化首先要求天子、领导者要率先垂范，以修身为本，而后整个社会才能兴起道德的风尚。如果天子、领导者不以身作则，却让下面的人去实行，才是真正的愚民。

“我有公心焉，则士民不敢念其私矣。”“我”泛指领导者。领导者有为公尽忠之心，下属、百姓就不敢有谋私的念头。

古人一心为公，“公”到什么程度呢？《群书治要·晋书》上记载着胡威父子清正廉洁的故事。胡威的父亲胡质清廉正直。在胡质做荆州刺史时，他的儿子胡威从京都洛阳去探望他。因为家境贫穷，每到客舍，胡威都是亲自放驴、打柴、做饭。他到荆州拜见过父亲，住在马厩中十多天。临走之前，父亲送给他一匹绢作为路费。胡威问父亲：“您一向清廉高洁，

不知是从哪里得到这匹绢的？”胡质说：“这是我平时剩余的官俸积攒而来的，现在给你用作路费。”胡威收下这匹绢，辞别父亲回京都去。

这时，荆州官府有一位都督听说胡威要回京都，就请假回到家中，取来资粮，邀请胡威在路上一一起做伴。一路走来，这位都督凡事都给予胡威资助，并且买来饭菜招待胡威。胡威大惑不解，便询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当清楚原因之后，胡威取出父亲送的绢给予这位都督，并且向他道谢，请他回去。后来，胡威在信上将这件事禀告他的父亲胡质，胡质知道后，杖责都督一百大板，并且解除他都督的职务。从此之后，胡氏父子清白慎行的名誉就传扬开来。

后来，胡威成为安丰太守，又升迁为徐州刺史，同样廉洁奉公，所以社会风气很好。他入朝觐见晋武帝，晋武帝司马炎问他：“你和你的父亲相比，谁更清廉？”胡威回答：“臣不如也”。我比不上我的父亲。武帝问：“为什么说你的父亲胜过你？”胡威回答：“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臣不及远也。”我父亲清正廉洁唯恐别人知道，而我清正廉洁却唯恐别人不知道，这就是我远远不如父亲的地方。晋武帝听后，认为他的说法正直而委婉、谦虚而合理，就将他迁为豫州刺史，后来又征他到朝廷做尚书。

从上述例子可以体会到，中国古人一心为公，廉洁有守，确实达到在念头上反省自己的境界。领导者希望属下怎样做，就要自己做出好榜样。如果领导者自己贪财好利，一心谋取私利，却希望下属百姓都清廉不贪，一心为公，这是不可能的事。

“我有平心焉，则士民不敢行其险矣。”如果领导者有平等之心，下属百姓就不敢行险，心存侥幸。

历史上那些卓有成就的人物，都有其成功的原因。比如，曹操为了爱民，颁布一道紧急命令，马不可以践踏麦田。突然有一只乌鸦飞过来，曹操的马受惊，冲入麦田。曹操就想自刎受罚，在大众的恳求之下，曹操

不得自刎，便以割发代罚。当他做出这个举动时，全军悚然，从此纪律严明。所以虽然曹操不是故意触犯军令，却仍然割发以正军纪，严于律己，以公平心、平等心来惩罚自己。下属、士兵就不敢再冒险触犯军纪，也没有人敢心存侥幸。可见曹操也懂得“上行则下效”的道理。

“我有俭心焉，则士民不敢放其奢矣。”领导者有节俭之心，下属百姓就不敢放纵享受，奢侈浪费。历史上凡是有道之人必定教民勤俭。比如尧舜禹汤、文武周公，都提倡节俭。尧的房舍只有三级土台阶，而且茅茨不翦。在东汉时期，汉明帝的夫人马皇后非常节俭，她的衣服大都是自己亲手做的，因为她的双手经常劳动要做衣服，所以都长了茧。她的用人和后宫的妃子，穿的衣服也都很朴素，不会有很多华丽的装饰品。因为她是皇后，一宫之主，她做出节俭的示范，底下的人就不会奢侈浪费，也会以崇尚节俭为荣。一个皇后节俭，她影响的是整个皇宫的作风，甚至于影响整个天下的民风。

《群书治要·傅子》中讲道：“天下之害，莫甚于女饰。上之人不节其耳目之欲，殫生民之巧，以极天下之变。一首之饰，盈千金之资；婢妾之服，兼四海之珍。纵欲者无穷，用力者有尽。用有尽之力，逞无穷之欲，此汉灵之所以失其民也。上欲无节，众下肆情，淫奢并兴，而百姓受其殃毒矣。”对天下最有害的是什么？莫过于女人的装饰打扮，莫过于女子的装饰品。居高位的人，不节制耳目的欲望，竭尽天下的奇巧，耗尽天下的奇异之物。仅一头的首饰，就花费千金之资；婢妾的衣服，兼有四海的珍宝。纵欲的人欲望无穷，而百姓的物力是有限的。用有限的物力去满足无限的欲望，这是汉灵帝失去民心的原因。上位者的欲望没有节制，下位者肆情纵欲，荒淫奢侈之风并起，百姓就会遭殃受害。

《礼记·礼运篇》上说：“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剩余的东西不要抛弃于地上，要拿出来给大家用，否则导致的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贫富两极分化严重，人心就会不平，不平得久了就会有怨气，

怨气积累得深了，就会产生恨意，社会矛盾重重。所以古人提醒人们，过多的东西不能随意浪费，要及时拿出来分享给需要的人，特别是贫穷的人。因为社会上还有很多人吃不饱、穿不暖，需要人们的帮助。古人讲助人为乐，帮助别人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通过帮助别人，能够体现出自己存在的价值，感受到内心的快乐。所以儒家的政治是出自仁义，儒家的文化教育也为我们现在解决贫富分化的问题提供了有效的途径。

最后一句话“此躬行之所征者也”，就是强调在上位者以身作则的作用。“征”是征候、效验。上位者能够躬行、力行传统伦理道德的教诲，上行而下效，效果就会特别明显。所以人是很好教的，是可以教得好的，关键在于怎样教。《说文解字》上解释“教”为“上所施，下所效也”。上面怎样做，下面跟着怎样效仿，就是良好有效的道德教育途径。现在道德教育不得力，原因就是人们把它变成了说教，都是用言语去教，而没有把正确的行为做出来，这一点值得我们反省。

上行下效的感化作用，在《文子》上解释得很清楚，《文子》上说：“冬日之阳，夏日之阴，万物归之，而莫之使也。”冬天天气很冷，人们都喜欢太阳；夏天天气很热，人们都喜欢阴凉。万物自然趋附于它，不需要有人去指使。“至精之感，弗召自来，不去自往，不知所为者，而功自成。”同样的道理，精诚到极致的感化，不需要征召，不需要打广告、招生，人们也会自然来归附；不需要驱使，人们也会自然前往。不知道他究竟做了什么，功效却自然而然地得以实现。“待目而照见，待言而使令，其于以治难矣。”君主若是依靠眼目才能看见，依靠言语才能发号施令，这样想要治理好国家是很难的。

后面又列举了几个例子：“皋陶喑而为大理，天下无虐刑；师旷瞽而为大宰，晋国无乱政；不言之令，不视之见，圣人以为师也。”皋陶虽然失声不能说话，却能够担任大法官，而且他担任大法官，不用施行暴虐的刑罚，天下就能得到治理；师旷是晋国的乐师，眼睛失明，他却能够担

任太宰，晋国的政事并没有因此而混乱。以不言的方式传达政令，以不视的方式观察天下，这是圣人所要效法的。

“民之化上，不从其言，从其所行也。”为什么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呢？这句话指出了原因。百姓受到君王的感化，不是听从他的言辞，不是看他发布的政令，而是追随他的所作所为。

后面接着说：“故人君好勇，而国家多难；人君好色，而国多昏乱。”如果国君喜欢武力、好勇斗狠，国家就会多灾多难。如果国君沉湎于美色，国家就会昏愤混乱。“故圣人精诚形于内，好憎明于外，出言以副情，发号以明旨。”因此圣人的精诚之心形成于内，内在有精诚之心，他的好憎就会显现于外。言为心声，他说出的话就能够合情合理，也是他内在心思的表达，发布的政令也能够明确他的旨意。“是故刑罚不足以移风，杀戮不足以禁奸，唯神化为贵也。”所以刑罚不足以改变社会风气，杀戮也不能够禁止奸邪。只有精诚的感化才最为可贵。

“夫至精为神，精之所动，若春气之生，秋气之杀也。故治人者，慎所以感也。”所以至精至诚的感化才最为可贵，也最为神奇。用精诚来感化人，就像春日的天气使万物生长，春风化雨，是潜移默化、自然而然的，甚至感受不到。像深秋的天气能够使草木凋零一样，所以治理百姓的人，要慎重地选择用以感化人民的方法。用什么来感化人民呢？只有依靠至诚之心。

《尸子》上讲，舜能无为而治，就是因为他自己德行好，而且能够重用贤才，不嫉贤妒能，天下人都以他为父。尧帝曾经向舜询问治国之道，舜回答了两个字：“事天”，就是按照天的规律、按照自然的规律去治理。他解释道：“平地而注水，水流湿。”同样是在平地上浇水，水自然而然地会流向低洼潮湿的地方。“均薪而施火，火从燥。”同样是把一堆柴火点燃，火自然会先点燃干燥的柴火。“召之类也”，这就是自然感召的结果。他说：“尧为善而众美至焉，桀为非而众恶至焉。”尧凭借他美好的

德行，感召的全都是贤良的臣子和人才；而桀的品行败坏，所招致的都是德行缺失、狡诈奸猾的人做他的臣子。可见，领导者的德行是怎样的，他就会感召怎样的臣子与他为伍。这就是《周易》上说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所以如果我们身边的下属有问题，感召不到德才兼备的人，我们一定要反省自己，一定是自己德行上有欠缺，才不能感召德才兼备的人来到身边。如果自己的德行没有缺失，优秀的人才一定会蜂拥而至。

## 将有三礼

太公曰：“将有三礼。冬日不服裘，夏日不操扇，天雨不张盖幕，名曰三礼也。”

——《群书治要》卷三十一《六韬》

在这句话前面有一段话，周武王向姜太公请教：“吾欲令三军之众，亲其将如父母，攻城争先登，野战争先赴，闻金声而怒，闻鼓音而喜，为之奈何？”周武王向姜太公提出了一个问题，我想让三军将士一心，亲爱他的将帅就像亲爱父母一样，攻城时争相先登，野战时争先前赴，都争着向前冲，听到撤军的金声就不欢喜，不愿意撤兵；听到进军的鼓声就欢喜。如何才能做到这些？太公回答说，为将者有三礼：冬天不穿皮衣，夏天不用扇子，雨天不打伞盖。后面又说到为什么为将者要遵守这三礼。为将者如果不率先垂范，就无从体会士卒的冷暖。越过险阻关隘，通过泥泞的道路，为将者必须首先下马步行，这是勇健而能吃苦的力将。为将者不身体力行，就无从体会士卒的劳苦。部队安营扎寨就绪，为将者才进入自己的帐舍；士兵的饭菜都已做好，为将者才能用餐；部队没有照明，为将者也不照明而食，这叫作止欲。为将者不律身克制私欲，就无以体会士卒

的饥饱。上将能与士卒同甘共苦，所以全军官兵听到前进的号令就欢喜，听到停止的号令就会不欢喜。即使面临高城深池，冒着敌人的如雨箭石，三军却都能奋勇争先。野战时白刃交锋，士卒也无不踊跃向前。三军之所以能如此，并不是因为他们好死乐伤，而是因为他们的将军深深地关怀他们的冷暖饥饱，体贴他们的辛苦，因而他们甘愿尽力报效。

人们对于礼要有正确的认识。礼绝对不是吃人的礼教，不是限制人、要求人、束缚人的。实际上礼是通达人性的，是让人们取得预期的效果的。作为将领，当然希望自己的士兵个个勇敢争先而不懦弱退后，这样才能有士气，百战不殆。怎样做才能达到这一点？就是做将领的要能体会士兵的冷暖，对他们倍加体恤，有仁爱之心，重要的是自己要率先垂范。作战关系到生死大事，所以必须同甘共苦、爱兵如子，这样才能使将士团结一心，才能百战百胜。

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君仁则臣忠”的道理。孟子也说到，夏、商、周三代之所以能够取得天下，都是因为仁慈之心。之所以失去天下，都是因为失去了仁慈之心。能否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这是得人心、失人心的关键，所以让将守这三礼，首先就是要培养他的仁爱之心。而仁爱之心从何而来？一定是能够和士兵同甘共苦，才能够体会士兵的冷暖，知道士兵的不容易。

为什么现在有的企业会出现劳资纠纷？原因之一就在于这些企业领导者没有承担君、亲、师的责任。所以“作之君，作之亲，作之师”，这三个职责一个都不能缺少，这样才能实现君仁臣忠的理想管理。领导者仁慈关爱下属、关爱员工，不仅关心他们的身体、关心他们的收入、关心他们的饱暖，还要关心他们的精神状态、道德心性的提升，给他们以好的教育和引导。下属才会竭尽全力地付出自己的时间，把工作尽心尽地做好。

所以礼的设置，第一就是让将帅能够设身处地地体会士卒的冷暖，

对士卒有仁爱体恤之心。而且将帅要能够吃苦，能够率先垂范，士气才能够大振，起到鼓舞士气的作用，这样的军队才能战无不胜。

## 君子有三恕

孔子曰：“君子有三恕。有君不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恕也；有亲弗能孝，有子而求其报，非恕也；有兄弟能敬，有弟而求其顺，非恕也。士能明于三恕之本，则可谓端身矣。”

——《群书治要》卷十《孔子家语》

孔子说，君子有三个方面要心存恕道，“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推己及人”。那么有哪三恕呢？“有君不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恕也。”有君主不能够尽心奉事，却要求部属供他使唤，这就不是恕道。一个人有多种角色和职位，可能既是领导者，又是被领导者。作为被领导者，对领导者是怎样的态度，直接影响了属下对待他的态度。因为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属下都在观察、都在学习。所以如果希望属下能够竭忠尽智地对待自己，能够有诚信，言出必行，我们对待自己的领导也必须是以这样的态度。

“有亲弗能孝，有子而求其报，非恕也。”如果对父母不能够力尽孝道，却要求孩子能回报恩德，这也不是恕道。现在很多父母对儿女关心得无微不至，有求必应，对自己的父母却不理不睬，不能够尽心尽力。结果把孩子溺爱成“小皇帝”“小公主”，还希望他们能够孝敬自己，等到自己老的时候，期待他们能够回报，这就不是恕道了。为什么？因为父母每一天的言行举止都是给孩子以身教。教导孩子行孝道，不是靠言语去说就可以。父母怎样做，儿女从小观察到，就成为他日后的行为方式。所以看到孩子被宠坏，以自我为中心的现象很严重，做父母的一定要反省自己错在

哪里。就是错在以利害之心为人处世，自己忘恩负义。因为父母希望儿女在自己老的时候能够照顾自己，所以现在尽心尽力地照顾儿女，实际却不知道这是“爱之不以道，适足以害之也”。孩子要什么就满足什么，喜欢到哪里去旅游就带他去，结果全家人都在考虑孩子的需要，他以自我为中心的习惯自然而然就养成了，“小皇帝”“小公主”的脾气很严重。中国古人说“伴君如伴虎”，皇帝的脾气都很暴烈，十件事有九件事都满足他，只有一件事没有满足，他就会大怒。父母对孩子束手无策，原因在哪里？原因很简单，就是做父母的没有身体力行把孝道表现在生活之中。现在经常会听到家长这样说：你做人不知道要孝敬父母吗？可是我们仔细想一想，现在的孩子从哪里学到孝敬父母呢？

有一位老教授曾经做过这样一个比喻，在人们面前摆放着一个天平，天平的一边是《弟子规》，另一边是《四库全书》，包括四书五经、十三经等，说两边的重量是相等的。有一些来自高校的教授，都是非常知名的传统文化的教授、国学大家，他们就问老教授为什么这一本小册子和这么多的书是平等的。老教授解释道：“《弟子规》代表的是行，而《四库全书》代表的是知。如果学了《四库全书》却做不到，还不如《弟子规》这一本小册子管用。”所以古人讲“知行合一”，特别是学习传统文化、学习圣贤教诲的人。必须从《弟子规》《太上感应篇》，还有《十善业道经》来扎根。把德行的根树立起来，再从文字学上把学问的根奠定好，这样长出的枝叶花果才能够繁茂，才能够持久，才不会像花瓶里的花，中看不中用。《中庸》上讲，“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最后还有“笃行之”。一定要把所学力行在生活之中，这才称为实学，真实的学问、真实的功夫。学习传统文化确实不是谈玄说妙，不是学了很多的知识，就会达到一定的境界。它是需要切实的修身功夫。修身从格物做起，就是格除物欲，克除自己的种种习气和欲望。面对财色名利的诱惑都能不动心，这才是真功夫。

《弟子规》中所说的，“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

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却被认为是不正常的。如果有父母喊他们孩子的名字，这个孩子应该恭恭敬敬地跑到他父母面前，甚至还鞠一个躬说：“请问爸爸妈妈有什么事吗？”

所以做父母的希望儿女孝顺自己，首先要在生活中真诚地去感恩、孝顺父母，自然而然会影响到孩子。孩子看到父母的行为，自然知道应该怎样去对待父母。

“有兄弗能敬，有弟而求其顺，非恕也。”有兄长不能够尊敬，却要求弟弟顺从自己，这也不是恕道。为什么有兄不能敬呢？可能因为自己财大气粗，自己的官位很高，对于哥哥姐姐就没有那样尊重，没有做到兄友弟恭。兄长、姐姐对弟弟妹妹要有友爱之心。“友”的古字是“𠄎”，写作两只手互相搀扶的形象。就是弟弟妹妹有了困难，做兄长的要去帮助、要去扶持，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不能讲条件。而弟弟妹妹要时刻记得在自己从小长大的过程中，哥哥姐姐对自己的照顾、体恤、帮助，这种感恩之心终生不能忘。不能因为自己有钱有势，就不再把哥哥姐姐放在眼里，对他们说话也不客气，这就是做错了。所以读书人能够明白忠于君、孝于亲、悌于兄是恕道的根本，就可以说是端正自己了。所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就是恕道。能够事事反省自己而不要求别人，这才能把恕道落实在生活之中。

## 正己而不求于人

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

——《群书治要》卷七《礼记》

有德行的领导者，一定是自己先有了善行，然后再带动别人行善；一定是先要求自己没有恶行，然后再禁止别人作恶。“君子”，有两种意

义：一种是有德行的人，另一种是在位的人。有德行的领导人，“有诸己”，“诸”是“之于”的合音。有之于自己，就是自己有了好的德行、有了善行，“而后求诸人”，才会要求、带动别人行善。自己没有做到之前，绝对不先去要求别人。甚至古人教导人们，“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端正自己，把自己做好，但是不去要求别人，就不会导致别人的怨恨。如果处处要求别人，自己却做不到，别人就会不服气，就会有逆反心理。

我们现在学习优秀传统文化，认为传统文化特别好，也希望别人都来学习，所以有机会就想将传统文化介绍给别人，这是好心。但是如果我们介绍给别人时，有很多教诲自己都没有去力行，这就很难让人树立起信心，也容易引起别人的怀疑。别人会说：“如果传统文化这样好，为什么你自己没有做到？好像也好不到哪里。”这就在无形之中让人对圣贤教诲产生怀疑，甚至对我们的行为也产生反感。

所以《大学》中说：“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个学问的次第非常重要，不能把时间花在介绍给别人上，而是先要学一句，就反省自己做没做到，先要来要求自己，而不是去要求别人。重点一定要放在自己身上，自己做好了，自然就会感化别人，自然就会影响别人、带动别人。

“无诸己，而后非诸人。”自己没有不好的恶行，然后才能禁止别人作恶。如果人们事事要求对方，自己却有这样的坏习惯，对方也会难以接受。有一句话叫“五十步笑百步”，就是自己没有做好，而希望别人做好，这是不可能的。《中庸》中讲到君子的修身，就像弓箭手射箭一样，当他把箭射出去，但是“失诸正鹄”，没有射中靶心。那么应该是怎样的态度呢？他会立刻反省自己，自己的技艺哪里还有不够精湛的地方，哪里还有有待提高的地方？君子的修身也像弓箭手射箭一样，凡事不合己意，没有达到理想的状态，一定要反过来反省自己，是否是自己的德行和能力有欠缺。

## 第五十四讲

率道而行，端然正己



## 与人无争，于世无求

君子能为可贵，不能使人必贵己；能为可信，不能使人必信己；能为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己。故君子耻不修，不耻见污；耻不信，不耻不见信；耻不能，不耻不见用。是以不诱于誉，不恐于诽，率道而行，端然正己，不为物倾侧，夫是之谓诚君子。

——《群书治要》卷三十八《孙卿子》

孙卿子即荀子。

“君子能为可贵，不能使人必贵己”，“贵”是尊重。“君子能为可贵”，君子能做出值得人尊重的事；“不能使人必贵己”，但是不能让别人必定尊重自己。这句话提醒人们，君子都是从根本上求。

《大学》上说：“德者，本也；财者，末也。”财富、地位、身份、名声、别人的尊重，等等，都是外在的枝叶花果。它的根本在哪里？根本就在一个人深厚的德行。所以我们希望别人尊敬自己，一定要做出值得人尊重的行为，培养自己深厚的德行，这才是受人尊重的根本。而且即使已经做出了值得人尊重的事，别人却不尊重自己，也不要放在心上成为挂碍。

由此可知，君子是处处要求自己，不要求别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而且君子处世豁达，但求无愧于心。即使自己已经做得十全十美，

但是很多人会戴着有色眼镜看待别人的行为。所以即使自己有德行、有学问，但是会被别人曲解、误解，也是正常的。人们的很多烦恼都源于太重视别人对自己的态度。有一句话说得很有深意，“别人做得对不对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自己一定要做对”。不能因为别人的过恶而丧失了自己的美德。如果因为别人不尊重自己，就产生抱怨、愤愤不平的情绪，这就丢失了自己的德行。所以君子处处要求自己，把一切外在的人事物都看作是提升自己的机会，都是自己考试的场所，如此一来，就能时时愿意接受考试。

“能为可信，不能使人必信己”。一个人能够做出值得别人信任的行为，但是不能要求别人必定信任自己。

汉代时，有一个人叫刘宽。他的修养在历史上很出名。有一天，刘宽坐牛车外出，半路上碰到一个人，他说自己的牛丢了，非要看一看刘宽的牛是不是自己的。结果他愈看愈觉得刘宽的牛是自己的，因而就怀疑刘宽偷了他的牛。如果遇到这样无缘无故的冤枉，一般人可能立即会火冒三丈，何况刘宽还是当时的地方官。但是刘宽却一句话没有反驳，直接从牛车上跳下来，把牛送给了这个人，自己往回走了。没过多久，丢了牛的人找到了自己的牛，又牵着刘宽的牛上门道歉，说自己的牛找到了，白白误会了他，实在对不起，刘宽怎样处罚他，他都愿意接受。刘宽是怎样做的呢？刘宽对他说：“这个世界上长得相似的东西实在太多了，认错了也是难免，还麻烦您亲自把牛送回来，有什么好责罚的呢？”刘宽的这一番举动，还有他的言辞，非常大度，不但感化了这个人，街坊邻居听了之后，也非常佩服刘宽。

所以一个人做了错事，知道自己做错了，这时如果我们不去责怪他，而是能够换位思考，能够宽容他，就更加让人佩服。俗话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如果一个人总是持续不断地做诚信的行为，天长日久，总有一天是会被人信任 and 理解的。所以别人不信任自己，自己也不要

放在心上，那可能是因为彼此之间缺少沟通，不够了解所导致的。

当然现在社会，确实存在着信心危机。信心危机的表现是，当人们听到别人做了好事就会不相信，就会怀疑，听到别人做坏事就信以为真。这是什么原因呢？信任危机存在的主要原因就是人们失去了自信。比如，曾国藩可以做到不取军中一钱寄回家中，很多人听到这句话都是半信半疑，甚至根本不相信。人们既没有读曾国藩的家书，也没有了解曾国藩的为人，没有看过他的传记，为什么就可以对他不取公家一文钱的行为提出质疑。根本的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很简单，这是因为人们自己做不到不占公家一文钱的便宜。因为没有自信，所以听到别人做出这样的事，才会去怀疑，才会去诽谤。

人们读古书也同样会读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陆游的“位卑未敢忘忧国”，还有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些都是人们所熟悉的历史名人，还有很多人们不熟悉的读书人，他们都有这种志在天下、襟怀天下的胸怀。这是什么原因？因为是他们从小接受的教育是圣贤教育，从小熟读四书五经，培养了浩然正气。

什么是大丈夫？孟子说大丈夫就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就是古人所崇尚的理想人格。古人在圣贤经典的教育之下成长起来，所以每个人都志在圣贤，每个读书人不能成为圣贤，也能成为君子。

所以“人不学，不知道”，“人不学，不知义”。为什么要这样强调学习《弟子规》？因为这里有做人的标准。这些标准都达不到，做人是不合格的。所以孟子说：“人之有道也，饱食、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如果人吃饱了饭，穿暖了衣服，过上了安逸的生活，但是没有良好的伦理道德的教育，这个时候人就堕落得离禽兽不远了。所以像电视、网

络、广播、报纸、杂志等大众媒体，都应该承担起社会教育的责任，都应该秉持隐恶扬善的原则。否则，对社会风气的引导会有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也是当今社会出现信任危机的原因之一。

“能为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己。”能够提升自己的能力、德行，成为足以担当重任的人才，但是不能使人一定重用自己。为什么不能使人重用自己？别人能不能重用自己，首先要看他是不是有识人之才，其次需要看他是不是有嫉贤妒能之心。如果一个人很有能力、很有德行，确实德才兼备，但是没有人认识他，也没有人愿意任用他，那么他的才华也不能够得以施展。像孔子还有怀才不遇的时候。但是孔子所表现出来的态度是怎样的？孔子表现的态度是“不怨天，不尤人”“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即使我有德行、有能力，别人都不认识自己，但是我也没有任何怨恨、愠怒的表现，这不也是一种君子的修养吗？所以人们应该向孔子学习，别人了解他、任用他，他就尽心尽力地把事情做得十全十美；别人不了解他、不任用他，他是“舍之则藏”，自己也是乐在道中，不强求，没有任何怨天尤人的情绪。孟子也说，“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进、退都是缘分所导致的，但是无论是进是退，自己都乐在其中。

人之所以还有抱怨的情绪，原因在哪里？其实一个人可以从烦恼中体会到，自己最放不下的是什么。人们有什么烦恼呢？有担忧，有抱怨，有恐惧，有嗔怒，有难受。当人们陷入这些情绪中时，有这些烦恼时，不妨静下心来，仔细反省，自己在为何事而心生烦恼。如果能够观察、反省，就知道自己还有什么东西没有放下。如果因为自己有能力而不被任用就心生烦恼，其原因何在？根本的原因，在于还没有放下名利之心、好名之心。所以不被重视，自己就不欢喜，就心生烦恼。事实上当我们因为没有被重用，而心生烦恼时，说明我们自己也不是可以肩负重任的人。为什么这样说？如果我们感觉重大的责任都轮不到自己，很可能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培养起君子的心态。假如真正让我们担当重大的责任，我们有一堆烦

恼，反而会给团体带来麻烦。所以一个能担大任的人，一定有很强的忍辱能力，必须能够消除自己的烦恼。否则即使担当了重任，却时常心生烦恼，还需要领导经常帮忙调整心态，甚至因为任性而放弃，这就会给别人徒增烦恼。

所以从这里可以体会到，一个能够成大事的人，必须有忍辱的能力。所以中国有很多好的成语，如“忍辱负重”，说明如果一个人不能忍辱，就不能担当大任。

“君子耻不修，不耻见污。”君子羞耻的是没有努力修养自己的品德，没有真正的德行，而不以别人羞辱自己而羞耻。甚至对于别人的羞辱不仅不会难过，还把它当作提升自己、考验自己的机会。如果能够在这种环境中不断通过考试，就说明我们的德行在日益提升，境界也在日益提升。

比如，唐朝有一个宰相叫娄师德，他的心胸极大，气量超过一般人。“宰相肚子能撑船”，愈是能够担当大任的人，他的心量也必须愈宽广。曾经有人告诉娄师德：“有一个缺乏教养的无知者，指名辱骂你。”娄师德听后说：“天下之大，怎么会没有同名同姓的人？”但是这个人仍然替他鸣不平，再次去告诉他说：“那个人指名骂你。”娄师德却说：“你对我说他骂我，这是重复骂我，请你不要再说了。”有一天娄师德上朝，因为身体很肥胖，行走迟缓。有一个官员看到他就说：“娄公和庄稼人有何区别？”娄师德听后，笑着说：“我不像庄稼人，谁应当像？”仍然没有生气。

娄师德的弟弟要去做代州刺史，临行前来向他告别。娄师德告诉弟弟：“我们兄弟受到国家的大恩，官位过于隆盛，必然为一般人所嫉恨，你如何对待这件事？”他的弟弟也很难得，说：“如果有人往我脸上吐唾沫，我自己擦去完事，请哥哥不要担心。”意思是说他不会与人作对，不会和人产生矛盾。但是没想到娄师德严肃地说：“别人唾在你脸上，是恨你。你把唾沫擦去，是驳回了他的怒气，会使他更加愤怒。你应该怎么做呢？要唾面自干。你应该笑脸接受他的唾面，这才是处理满盈正确的方

法。”娄师德心胸宽广，教导弟弟要能够忍辱。

娄师德深受皇帝信任，满朝文武无人敢比。但他不仅不高傲自大，反而更加谦虚谨慎。凡是遇到别人攻击、诽谤自己，他就反省自责，好像无地自容似的。他常说：“别人对自己无礼攻击，其中必然有他的道理。对此不去计较，不仅仅是培养自己的气量，也是为了避免灾祸。”这就是君子“三省”的原因，对每件事多次反省自己的不足所在。

古人就是这样面对别人的侮辱的，那么君子以什么为羞耻呢？以自己没有真才实德而羞耻，不是以别人侮辱自己而羞耻。

别人批评我们，我们应该以怎样的态度对待呢？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能够有这样的心境，我们在处事待人接物之中，就不会产生烦恼。人心里还会感到难过，往往是太在意别人对自己的态度。特别是当别人诽谤我们、误会我们时，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是想要辩解，甚至还会愤愤不平，难过好几天。究其原因，根本在于没有放下“我”。因为有“我”存在，所以才有我被诽谤、我被指责、我被冤枉、我被误解。

《论语》上有一句话：“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为什么君子能做到坦坦荡荡？因为君子总是助人为乐、成人之美。他的心中没有自私自利，他的“我”很淡泊，所以总是处于一种欢欣、喜悦的精神状态。而为什么小人长戚戚？小人最大的特点，就是一心考虑自己的需要、自己的感受，自私自利。所以为了自己的利益和别人尔虞我诈、钩心斗角，甚至还想方设法地谋算别人，这是小人忧戚、郁郁寡欢的原因。

只要我们心里感到难过，就要提醒自己，这是自己心地修养的功夫还不够，还不到家。君子应该是“无人而不自得”，在怎样的情况下都安然自得。如何把“我”放下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常常想到，怎样做才能真正有利于身边的人，怎样去关爱别人、帮助别人。

“耻不信，不耻不见信。”君子羞耻的是自己没有做出诚信的行为，而不以不被别人信任而感觉到羞耻难过。“耻不能，不耻不见用。”羞耻

自己没有才能、德行来担当大任，而不以不被任用而感到羞耻。一个君子应该是怎样的？《论语》说：“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做君子处处都要回到根本，要从根本上求，才会少很多烦恼。不要担心自己没有好的位置发挥才能，应该担心的是，要培养自己怎样的能力，提升怎样的德行，可以立德、立功、立言于社会。“不患莫己知”，不要担心自己的名声不够显扬，天下人都不知道自己，而是应该追求那个足以使你名声显扬，而且能带给人真实利益、垂范后世的德行和能力。

人们常追求的名，其实都是虚名。即使一个人外在的名声很大，但是那些名都是虚的，毫无用处，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如果因为别人尊重、赞叹而沾沾自喜，这说明自己的内心不够充实，还会把别人的看法看得很重，放在心上。

比如，现在有很多暴发户，暴发户最大的特点，就是特别喜欢买名牌。向别人介绍时，经常会说我的西服是什么牌子的，裤子是什么牌子的，包、皮鞋、袜子、腰带、眼镜、手表是什么牌子的。但介绍了一圈儿，唯独没有介绍自己。因为没有内在的自信，所以才依靠外在的装扮提升自己的声望，希望因此受人尊重。

孔子的弟子子路，穿着破棉袄和穿着裘皮大衣的人站在一起，也不会感到不好意思。为什么他不会感到不好意思呢？因为他有内在的信心，底气十足。他的学问道德非常高，不需要靠外在的东西来提升自己，这值得人们学习。

“是以不诱于誉，不恐于诽。”君子不会被虚名、虚欲所诱惑，他知道自己做事是为了惠及大众，况且名不副实还会给自己招致灾祸。《了凡四训》上说：“世之享盛名而实不副者，多有奇祸。”在世间享有很盛大的名声，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但是名不副实，古人也称之为德不配位。德行和一个人所处的位置，所享的名声不相符合、不相匹配，就会有突如其来的灾祸。

现在很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想方设法地制造一些假冒伪劣的东西。譬如假文凭，自己本来没有这个经历，却冒充有这个经历，到处大肆宣扬，让别人恭敬、尊重，其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追求虚名，结果被曝光后身败名裂。

这些都提醒人们要从根本上求，培养自己深厚的德行，提升自己的能力，要做到实至名归。其实名也和财富一样，它本身没有好坏之分。财多好不好？对于有智慧的人来说，财多当然好，因为他可以用在正确的地方。名声也是如此，一个人名声在外好不好？它本身没有好坏之分，关键要看我们如何去用这个名声。《论语》上说“一言而兴邦，一言而丧邦”，这个主要是指古代的国君，因为国君说了一句有利于社会的话，就能够正确地引导整个社会风气向善；如果他说了一句错误的话，就会给社会一个错误的引导，损坏整个社会的风气。

现在社会随着大众媒体的发达，名人效应非常大。一个名人说一句话，会影响很多人，其效果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扩大很多倍。如果他说了一句对社会风气有利的話，给社会大众一个正确的引导、正确的提醒、正确的教育，也会惠及无数人；如果他说了一句对社会风气有害的话，那造成的危害也非常大，所以不能不谨慎。

“不恐于诽”，不因为别人的侮辱、诽谤而恐惧、担心或者难过。特别是在现代社会，大众传播媒体很发达，一个人出名后，难免招人嫉妒，结果就会出现谣言、恶意攻击的现象。对于侮辱、诽谤，《了凡四训》告诉我们：“闻谤而不怒，虽谗焰熏天，如举火焚空，终将自息。”如果一个人听到了诽谤而不发怒，当作此事未曾发生，即使诽谤的谗焰如同火焰一样熏到天空中，但是就像举火焚空，烧不着任何东西。因为你不在意它，它对你就没有伤害。“终将自息”，人不去理睬它，诽谤的人说着也会自觉无趣，自然就不说了。“闻谤而怒，虽巧心力辩，如春蚕作茧，自取缠绵。”如果一个人听到别人的诽谤、侮辱、误解就生气，愤愤不平，即

使能够很巧妙地为自己辩解，也会如同“春蚕作茧，自取缠绵”，愈辩愈辩不清楚，还让自己烦恼重重，不得解脱。

“率道而行，端然正己，不为物倾侧，夫是之谓诚君子。”率，是顺着、循着。遵循正道去做，端正自身，观照自己有没有跟道德、经典相应。“不为物倾侧”，不为外物，包括种种的物欲，动摇内心。

以上这些修养都做到了，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君子。所以成为真正的君子确实非常不容易，必须能够于世无争，于世无求，不能自私自利，太在乎自己。学做君子首先要学会放下自我，能时时为他人着想，特别是领导者，要时时刻刻为团体、为国家、为社会，甚至是为天下着想。

## 荣辱之责，在乎己

荣辱之责，在乎己，而不在于人。

——《群书治要》卷四十《韩子》

招致光荣或侮辱的责任，全在自己，不在别人。这句话意义很深。一个人一生荣辱、成败、吉凶、祸福的责任都在于自己，不在于他人。《诗经》中说：“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尚书》上也说：“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所以人生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上。

《孟子》中也有一句话：“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一个人一定是先侮辱了自己，所以才遭别人的侮辱。明白了这个道理，人们对于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要小心谨慎，因为荣辱都是自己的心念、行为所引发的。

晏子曾经出使楚国，楚国是一个大国。但晏子走到楚国门口，迎宾的人不为他开大门，而在大门的旁边为晏子开了一个小门。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他们知道晏子的身材矮小，所以故意开小门，想侮辱他。动了

侮辱别人的念头，最后谁会受到侮辱呢？“荣辱之责，在乎己，而不在乎人。”人们从自己的人生经验去观察，会发现经典上的话都是恒常不变的道理，确实也是金玉良言，它提醒人们要保持理智，不要做错事。晏子走到门口，但不进去，他说：“出使一个大国，要走大门，出使狗国，才走狗门。”意思是说，如果让我从狗门走进去，我就是进入了狗国。于是接待的人赶紧打开大门，请他进来。

晏子进了大门，觐见楚王，楚王看到他说：“你们齐国没有人可派遣了吗？”意思是说，怎么派遣如此矮小的人来出使。晏子回答说：“禀大王，我们齐国有几百条街，我们老百姓的袖子挥起来都能把太阳遮住；如果每个人都擦汗，都如同下雨一样；走路肩膀碰着肩膀，脚跟碰着脚跟，怎么能说我们齐国没有人呢？我们的百姓非常多。”这段话用文言文说得很精彩，也很简洁，叫“张袂成阴，挥汗成雨，比肩继踵”。“袂”是衣袖，“张袂”就是把衣袖张开，就变成阴天，能够把太阳遮住，形容人多得不得了；“挥汗成雨”，人们把汗擦一擦就如同下雨那样多；“比肩”是肩和肩挨在一起，“继踵”，“继”是相续，“踵”是脚后跟，脚和脚跟都碰到一起，形容人非常多。

楚王就问：“既然你们国家的人这样多，为什么派你来呢？”晏子回答说：“我们国家派人都是有讲究的，贤德的国家就派贤德的人去，不肖的国家就派不贤德的人去。我自己很差、很不贤德，所以才来到了楚国。”楚王看看旁边的人，无话可说。所以与有智慧、有德行的人交往，不能随便开玩笑，否则是自取其辱。

但是楚王仍然不肯罢休，在招待晏子时，特意安排了一个官吏，带来一个小偷。这个小偷是齐国人，在楚国偷了东西，就故意把他带进来。楚王故意问：“这个人犯了什么罪？”回答说：“偷盗。”“哪里人？”回答说：“是齐国人。”楚王看了看晏子说：“怎么你们齐国人都会偷东西？”晏子怎样回答呢？晏子就对楚王说：“橘子长在淮河以南叫橘子；长在淮

河以北，就叫枳子。它们的外观看起来完全一样，从叶子、果实都无法区分，但是橘子和枳吃起来的味道完全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它们的水土不同。淮河北南的水土不同，所以长出来的东西就不同。这个人在齐国的时候不偷东西，结果到了楚国就学会了偷东西，这是因为水土不好才染上这个恶习。”

楚王多次自取其辱的原因何在？原因就在于他首先有想侮辱别人的念头，所以“荣辱之责，在乎己，而不在乎人”。这个例子提醒人们要恭敬一切人，不要对任何人有丝毫的傲慢，更不能刻意去挖苦别人、嘲讽别人、侮辱别人。如果有这个念头，那么侮辱一定会回到自己身上。

“荣辱之责，在乎己，而不在乎人。”这是提醒人们一个人的命运能否改变，命运的好坏掌握在自己手上，所以人要为自己负百分之百的责任。就像《了凡四训》上说：“世间享千金之产者，定是千金人物；享百金之产者，定是百金人物；应饿死者，定是饿死人物。”一个人的境遇为什么会有好坏？其实都是自己的心念、德行所引发的，不能怪别人；或者是自己的心量不够，总之要为自己的人际关系、自己的环境、自己的状态负百分之百的责任。所以命运确实是有，但是每一天都有加减乘除。加减乘除就是看我们是做了善事，还是做了恶事。如果我们做一件善事，惠及了别人，命运就加；如果做一件恶事，损害到别人，命运就减；如果我们做一件大善事，惠及了很多人，命运就乘；如果我们做一件大恶事，损害到很多人，命运就除。古人讲现世报。现世报应就是这个人当生做了极大的善，或者是极大的恶，晚年的时候报应就会出现。明白了这个道理，人们就不会再去怨天尤人。

譬如说自己的领导不好，他做了很多不公平的事情，会不会影响我们自己的发展？当然不会。我们遇到好领导，能够做到君仁臣忠，这不算难得；当我们遇到不好的领导，仍然能够至死尽忠，这才是真正的德行。《弟子规》上说“亲憎我，孝方贤”，不仅仅是指父子之间的关系，在五伦

关系之中都适用。所以当领导做得不好，处处刁难我们、为难我们的时候，我们还能对他很尊敬，这更加显得难能可贵。

我们在生活中要学会用真心，真心就是不变的爱心。不因为对方的态度就转变我们对他的态度。当对方对我好，我就对他好；当对方对我不好，我就对他不好，这就变成了交易，不是真心。真心是什么？无论别人怎样对我，我都一如既往地用爱心来帮助他、提升他、成就他，这才是真心。所以我们对别人好，不是讲条件的，该尽的本分要尽心尽力去做到。

《论语》中说：“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一个君子走到哪里，对每一个人都很恭敬，处处看到对方的需要，乐于帮助别人。为人处世、待人接物没有什么过失，对每一个人都彬彬有礼，这样的人走到哪里，哪里都是他的兄弟姐妹。

比如，有一次我们到英国伦敦去参加中华传统文化的展出，就感化了很多来访的人。因为我们对每个来访的人都是恭恭敬敬、彬彬有礼，为他们细心地介绍传统文化的品质，爱好和谐、追求和平的特点，每个人来到这里，都感觉到温暖，走的时候都恋恋不舍。我们对每一个人彬彬有礼，别人回报给我们的也同样是像兄弟姐妹一样的友好和关爱。

## 言有物，行有恒

家人。《象》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群书治要》卷一《周易》

“家人”，“家人卦”是《周易》六十四卦中的第三十七卦。这个卦的卦象是离下巽上。《象传》曰：“风自火出，家人。”这是解释家人卦“上巽为风，下离为火”之象。《周易禅解》上说：“火因风鼓，而今风自火

出，犹家以德化，而今德从家播也。”家人卦说明了齐家对于治国平天下的重要意义。家庭是社会最基本的细胞，如果每个家庭都和谐，就如同身体的每个细胞都健康，整个身体自然也会健康。家人卦还说明，在一家之内，夫妇关系是家庭关系的核心，并且特别强调女子、女人在家庭中的作用。如果女人能够坚守正道，始终如一，将会对整个家庭幸福和发展非常有利。

这句话是告诉人们居家行事的道理，要从身边的人和日常小事着手，不可轻忽随意。因此君子说话一定要言之有物，“物”是事。说话要有内容、有实质、有根有据，这样话一出口，就会合乎道理而无须选择。行为一定要遵循规律和法则。“恒”是恒常不变的规律，这样就会符合大道而无须选择。“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就是告诉人们，君子的言语和行为要谨慎，不能随意。

孔子以四科来教导学生，首重德行，其次就是言语，然后才是政事和文学。《周易》上也说：“言行，君子之枢机。”告诉人们，一个人成败、荣辱、祸福的关键就取决于一个人的言行。

有一个成语叫“自暴自弃”。什么叫自暴自弃？《孟子》中说：“言非礼义，谓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义，谓之自弃也。”这就是自暴自弃的标准。人们的说话、言语和礼义的精神不相应，就是自暴；人的一言一行跟仁义相违背，就是自弃。

所以孟子又说：“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旷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仁”是人的安宅。如果一个人时时存着仁爱之心，良心安定，就叫安宅。这是用形象的比喻，苦口婆心地教导人们领会这些道理，让我们做到“居仁由义”。“旷安宅而弗居”，“旷”是空着，不把心安住在仁义之上，就是“旷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由”是行走。没有走在道义的路上，就是“舍正路而不由”，这是多么可悲的一件事。这些都提醒人们，一个人的言语要符合于道、符合于仁义。

古人讲“言为心声”，一个人的言语通常表达了一个人的心声。一个人经常的所思所想，会不由自主地在言语上表达出来、体现出来。“君子之爱人也以德，细人之爱人也以姑息。”君子希望提升对方的德行，所以表现在言语上，总是说利益人、有助于人德行提升的言语；小人姑息人的过失、欲望，所以他说出的话往往是取媚于人，让人放纵欲望、自我感觉良好，甚至飘飘然。这是告诉人们怎样的言语才叫爱语，什么才是真正有利于人的话。

周成王和周康王时期，四十年监狱没有死刑犯，被称为“成康之治”。在《淮南子》上称赞周成王、周康王继承了文王和武王的基业，说成王和康王“非道不言，非义不行；言不苟出，行不苟为，择善而后从事焉。由此观之，则圣人之行方矣”。成王和康王不符合道的话不说，不符合义的事不行；从来不随便出口说话，行为举止也都符合经典，都是择善而从，不敢随意作为。从这里可以看到，圣人的行为是方正的，可以作为后世的表率。

所以圣贤、君子的言语行为和普通大众不一样，他们谨言慎行，说话都是符合经典，做事也是符合圣人的教诲，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能成为社会大众的表率。

## 第五十五讲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



## 顺从道义，公正无私

衣冠中，故朝无奇僻之服；所言义，故下无伪上之报；身行顺，治事公，故国无阿党之义。三者，君子常行也。

——《群书治要》卷三十三《晏子》

“阿党”就是阿谀奉承、结党营私。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在上位者的衣冠中规中矩，朝廷内就不会出现奇装异服；所说的话符合道义，臣下就不会谎报下情；自身的行为遵循道义，处事公正，国家就不会有阿谀奉承、结党营私的现象。以上三点是君子日常的行为规范。

首先，“衣冠中，故朝无奇僻之服”。在上位者的衣冠中规中矩，中规中矩是符合于礼，因此朝廷内就不会出现奇装异服。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以礼治国，所以穿的衣服，所使用的车马，根据人的地位、等级不同而有所不同。为什么这样规定呢？是为了便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行礼，使各个级别的人都能很好地规范自己的行为。比如，学习传统文化的人都有这样的感受，如果我们穿着唐装出现在公共场合，就是向人表明自己是学习、弘扬传统文化的，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要非常小心谨慎，至少要做到合乎《弟子规》的行为，符合《弟子规》的要求。

古来中国以礼治国，早在《尚书》中就记载，在尧舜时期，就非常重视通过人的服制来表现尊卑不同的次序，做到等级有序。譬如《尚书》

中记载：“予欲观古人之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我想看一看古人的样子，希望看到可以显示符合礼仪规定的仪表和举止，以及因为尊卑不同而款式、图案各异的衣着式样，以五种颜料将布帛染成五种鲜明的色彩来制作的服装，你们先把这件事情搞明白。

在古代，天子所穿的是绘有日月图案的衣服，以及以下等级的衣服；诸侯所穿的是绘有龙的图案，被称为“龙衮”的礼服，以及以下等级的衣服。也就是说，尊贵的人可以同时穿低级别的衣服，但是低级别的人不可以越分冒用尊者的仪制。如果级别低的人穿了高级别的服制，就是僭礼，是很大的过失。用五种颜料将布帛染成五种颜色，制作用来区别尊卑的朝服，把这些详细地搞清楚，再把它们做出来。这些都是礼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很多人说礼是维护等级观念的，维护等级观念有何不可呢？让不同级别的人，清楚与这个地位相应的责任和本分。地位高的人就有更高的责任，他的言行要更加小心谨慎，成为社会大众的表率。

所以礼有何好处？在《汉书·王吉传》中就这样写道：“古者衣服车马贵贱有章，以褒有德而别尊卑。”古人所使用的衣服和车马，使地位的尊卑都有所标记，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褒扬有德之人，使尊卑有所区别。在古代特别尊重有德行的人、有爵位的人、地位高的人，还有上了年纪的人。为什么古人特别尊重有地位的领导者呢？我们读《论语》就可以知道，士大夫、读书人的使命和心愿与一般人有所不同，他们读书的目的是治国平天下。所以“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既然选择做官，要治理国家，就不能再看重财利，而是把自己一生的精力用于为百姓服务，治理国家，使天下太平。所以“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这就体现了一个读书人的使命和担当。

既然选择做领导，就意味着要放弃对财利的过分追求；如果想追求财富，可以不选择做官，而去选择做生意赚钱。但是中国古人的制度设计

又非常合乎情理，他不能让一个有这样高尚志愿的人反而受轻视。一个人有很崇高的心志，应该受到社会大众特别的尊敬，所以古人就要通过礼制给予这些领导者以应有的尊重，而且如果领导者没有尊严，说话不受尊重，人们对他的话不重视，他也无法治理好国家。

现在人们都讲执行力，为什么要重视执行力？因为如果没有执行力，领导者的政令下属都不去执行，政令就无法实施。执行力从哪里获得呢？就是领导者的所作所为都要能够为社会大众做表率。不仅如此，各种制度的设计也要让领导者有威严，受人尊重。人们不能僭礼，不能逾越自己的本分，所以对领导者的话就会听从，而不是违逆。

在古代，愈是有德行的人，愈受到尊重、愈受到褒奖。这也需要从制度上加以规定，否则，人们为什么要去追求道德？在《韩诗外传》中就记载着，一个人如果孝敬父母，谦卑有礼，取舍（指在财利上）都谦让、退让、礼让，不与人相争，这样的人，被皇帝下诏称为“命民”。一旦获得“命民”的称号，就是如同现在的道德模范，就会有很多特殊待遇。譬如外出的时候，命民可以乘坐两匹马并排拉的车子，而且装饰精美，人们看到有人乘坐这样的车子出行，就知道这个人是有德行的人，是受封赐的人，就自然会对他毕恭毕敬，恭敬心油然而生。其他人，即使再有钱，生意做得再好，但是没有受过封赐，没有得到“命民”的称号，也不可以使用这样的车子。

这样的制度实行起来有什么好处呢？好处是整个社会的风气会尊重有德行的人，而不是尊重有钱的人，所以在古代，道德教育就是靠礼制来维护的。如果希望人人都谦恭退让，都无私、都有德，就必须让有德行的人受到真正的尊重和褒奖。礼，其实就是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

“今上下僭差，人人自制，是以贪财趋利，不畏死亡。”但是现在的情况是怎样？《汉书》上记载，现在上下之间有僭越的错失，存在僭礼的现象，人们都自行其是，所以贪财谋利，不怕死亡。

“周之所以能致治，刑措而不用者，以其禁邪于冥冥，绝恶于未萌也。”周朝周成王和周康王时期，监狱里没有犯人，叫“囹圄空虚”。并不是他们的法制不健全，监督机制不完善，而是法制、监督机制都非常完善，但是没有人犯罪。他们究竟是依靠什么达到这种境界的呢？刑罚被搁置不用。就是因为他们把邪念禁止于未显露之时，把罪恶杜绝于未萌生之时，这就是礼的优势。所以礼相对于法而言，不仅仅是制裁一个人的行为，还培养起一个人内在的道德。

而且古人有一个规定，如果一个人没有达到级别，没有达到这样的德行，即使再有钱，也不可以乘坐过于豪华的车子；这种车子只有有德行的人、有地位的人才能乘坐。这就是尊重有德行的人，还有那些为人民服务，对国家有贡献的人。因为作为国君，作为领导者，都非常辛苦，日理万机，而且不以谋财为自己工作的目的。正是因为他们有这样的贡献，有这样的德行，所以才备受尊重。

所以凡是在位的领导者，都会非常珍惜自己的位置，珍惜自己的工作，不会去贪污受贿。因为一旦贪污受贿事发，锒铛入狱，所有的这些全都会失去，所以他不会接受贿赂、以权谋私。礼的优势就是把邪念制止于未显露之时，把罪恶杜绝于未萌生之际，它确实对社会的安定非常有益。

中国古人治国就如同医生治病，上医治未病，不治已病，能够防患于未然。但是正因为可以防患于未然，所以效果不为一般人所见，这就容易被人误以为没有作用。

在《刘廙政论》中也有一段论述：“夫名不正则其事错矣，物无制则其用淫矣。”名分不正的结果是事情会错乱，因为名不副实。人们本来要评道德模范，使他成为社会大众行为的表率，结果有一个人本来没有实际的德行，但是他“走了后门”，就把他推举上来。这样的行为一旦产生，就会让人们道德的行为丧失信心，事情就会出错。

所以孔子特别强调正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领导者要有

领导者的样子，要名副其实。古人认为领导者必须尽到君亲师的责任，如果领导者没有领导者的样子，就是独夫残贼，国君就不能称为国君，因为名不副实。

做父亲要有父亲的样子，做儿子要有儿子的样子，这没有什么不对。但是这样的思想，这样好的治国理念却被无端批判。结果现在一些领导者不像领导者的样子，作威作福，不是一心一意为百姓谋福利，而是想方设法敲诈百姓，把自己的权力作为盘剥百姓的工具和自私自利的武器。被领导者也没有被领导者的样子，对领导的话不认真落实，领导交给自己的工作，高兴就做，不高兴就不做，得过且过。

父不父、子不子的现象也非常明显。做父亲的要尽到父亲的本分，父亲也需要同时具备君亲师的责任，教导儿女而且给儿女做一个好表率是最重要的。所以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要符合《弟子规》的要求。孩子从父母的身上可以学到《弟子规》中的教诲。但是，现在做父亲的都忙于赚钱，把教育儿子这样重要的问题忽视了，所以子也不子，儿子不知道孝顺父母，不知道儿子应尽的本分，伦理颠倒了。正如人们所说的，现在生了儿子就成了儿，生了孙子就成了孙，完全颠倒了。

“物无制则其用淫矣。”如果物品不加控制，没有一定的制度，使用就会过滥，人们就会滥用这些物品。“错则无以知其非，淫则无以禁其非。”出错了，就会不知道实际情况，滥用物品就会无法禁止错误的行为。“故王者必正名以督其实，制物以息其非。”所以圣王必须端正名分，来督察人们的实际作为、实际情况，观察名与实是否相符，就是“正名以督其实”。“制物以息其非”，就是让物品的使用都符合一定的制度、符合一定的礼，这样才能止息错误的、僭越的行为。

“名其何以正之哉？曰：行不美则名不得称，称必实所以然，效其所以成，故实无不称于名，名无不当于实也。”名分怎样才能端正，如何才能做到正名呢？回答说：如果所作所为不善，那么该名分就不能称用。如

果一个人的所作所为不符合道德模范的要求，就不能把他称为道德模范。要称用必须查实他做了何种好事，验证他凭什么得以成功，这样就会实称其名，名副其实。如果他的所作所为确实符合道德模范的要求，才能把他评为道德模范，这样才能名副其实。

接着又问道：“曰：物又何以制之哉？曰：物可以养生而不可废之于民者，富之备之。”物品用什么办法来控制呢？物品的分配要制定怎样的制度，符合怎样的礼呢？回答说：凡是物品可以养生且不会于民众无用的，就要使人民富足、完备。“无益于养生而可以宝于世者，则随尊卑而为之制，使不为此官，不得服此服，不得备此饰。”还有一些物品是对于养生没有益处的，不是日常生活所必需的，但是可以作为社会上的财宝，这一类物品，要按照人的地位高低加以控制使用。如果不是某一级别的官吏，就不能穿某一种衣服，不能用某一种饰品。如此一来，即使这些东西人人都非常想要，但是平民不能穿戴；即便抛弃于旷野，平民也不敢去拿；即使禁令松懈，但是百姓都没有占有的欲望。也就是说，很多东西虽然是宝物，但不是一般人想用就用，想得到就能得到的。因为它是一种身份、地位，还有德行的象征，如果没有相应的身份、地位和德行，无论一个人有多少钱都不能使用。这就是重德不重财，重视一个人对国家的贡献，而不是重视他有多少的财富。

如此一来会有怎样的结果呢？“是以民一于业，本务而末息，有益之物阜而贱，无益之宝省而贵矣。”这样的结果，就是人们会专心于自己的工作，使本业得以重视。在古代，本业就是农业，人们都会去从事农业生产，粮食丰收，人们的吃穿问题才能得以保证。而末业得以停息，末业就是工商业。使有用的物品丰足而便宜，就是使人们日常所必需的物品，非常丰足，而且价格便宜，人人都买得起。这样就不会有人吃不饱、穿不暖。

无实用意义的珍宝则稀少而贵重，如玉石、字画等，对于吃不饱、

穿不暖的人来说它们毫无价值，但是因为商业的炒作，它们的价格愈来愈高，这是颠倒。没有实用意义的珍宝稀少而贵重。但是这里的贵重有一个解释，“所谓贵者，民贵愿之也，匪谓贾贵于市也”。这里所指的贵重是说人们心目中的贵重，人们心里把它看得很贵重，但是并不是希望获得它。因为德行和地位没有达到，即使再有钱也不能获得它，并不是指在市场买卖中价格昂贵。

“故其政惠，其民洁，其法易，其业大。”这样的结果就是政治能够彰显仁惠，人民思想纯洁。因为人们不会去贪求那些不符合自己身份、地位及德行的珍宝。法令简约易行，事业光大兴旺。

“昔人曰：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其此之谓与！”古人说，唯有车服之器和爵号之名，不能轻易地授予人，就是指这种情况。所以古人特别重视名分，名分对于社会治理实际上有微妙的作用。但是这种微妙的作用，如果不用心体会，很难理解到。

《群书治要·袁子正书》中说，如果人们所穿的衣服、使用的器物和自己的名分不相匹配，会有怎样的结果。“夫服物不称，则贵贱无等。”如果人们使用的衣服和器物与自己的身份不相称，就无法区分贵贱的等级。无法区分贵贱的等级会是怎样的结果？“于是富者逾侈，贫者不及。”就是现在社会所出现的现象，富人超越等级享用，贫寒的人却还不够，达不到他应该享用的标准，也就是贫富两极分化，富的愈富、贫的愈穷，结果矛盾也就加深了。所以贫富两极分化的问题，古人其实很早就注意到了，而且还有办法去对治。我们现在想了很多办法，其实也可以向古人学习借鉴。

“小人乘君子之器，贾竖袭卿士之服，被文绣，佩银黄，重门而玉食，其中左右叱咄，颐指而使。”贫富分化的结果就是，小人使用君子才能使用的器物，商人穿着卿士才能穿的衣服，他们穿用刺绣的衣带，佩戴着金银首饰，住着高门大第，吃着美食珍馐，对于左右之人随意呵斥、颐

指气使。

“是故有财者光荣，无财者卑辱。”有钱财的人就光彩荣耀，无钱财的人就卑下屈辱，被人瞧不起，被人侮辱。

“上接卿相，下雄齐民，珍宝旁流，而刑放于贿。下而法侵，能无亏乎？”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有钱的人就可以对上交接卿相，对下逞威于平民，也就是官商勾结。商人可以行贿在位的领导者，珍宝可以到处转送，用来行贿受贿。有罪时也可以通过贿赂而得以释放，如此一来，法律便不起作用，对社会也必然有损害。

所以通过这些论述，我们会发现，其实古人思考问题很深入，他们把怎样缩小贫富分化，以及怎样使人们各守本分、遵纪守法，都用礼来加以规定和引导。这样就可以防患于未然，让人根本就不去想违背法律。

当然衣服尊卑有秩、尊卑有礼，并不代表过分地奢侈浪费。在《群书治要·墨子》中就说到圣人为什么做衣服：“故圣人之为衣服，适身体，和肌肤而足矣，非荣耳目而观愚民也。”圣人制作衣服使它适合身体、暖和肌肤就足够了，并不是为了光耀尊贵而让百姓观赏。

“当是之时，坚车良马，不知贵也。刻镂文采，不知喜也。得其所以自养之情，而不感于外，是以其民俭而易治，其君用财节而易赡也。”那时候，坚固的车子、优良的马匹并不认为是高贵，雕刻、刺绣并不让人觉得喜欢，满足于他们能够自养的情形，而不为外来的影响所动心。不是为了夸耀于外，让人们羡慕他。这样做的结果就是百姓节俭而容易治理，君王花费很少，而且很容易供养。

“当今之主，其为衣服则与此异矣。”现在的君主做衣服却与此不同。怎样不同呢？“冬则轻暖，夏则轻清。皆已具矣，必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以为锦绣文采靡曼之衣，铸金以为钩，珠玉以为佩，女工作文采，男工作刻镂，以身服之，此非云益暖之情也。”现在的君主制作衣服，就与古圣先王非常不同，冬天的衣服轻便暖和，夏天的衣服轻便凉

爽。这些都已经具备了，但是仍然不满足，仍然向百姓大量地征收赋税，凶暴地掠夺百姓用于衣食的钱财。用来制作锦绣光彩的华丽衣裳，而且做得很过分，用金子熔铸成带钩，用珍珠宝玉制作佩戴的饰品；女工刺绣，男工雕刻，用来制作身上的配饰。这就不是为了增加温暖了，而是有炫耀的意味。

“单财劳力，毕归之于无用也。”用尽了财力、劳力，完全归于无用。“以此观之，其为衣服，非为身体，皆为观好。是以其民淫僻而难治，其君奢侈而难谏也。夫以奢侈之君，御淫僻之民，欲用无乱，不可得也。君诚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当为衣服不可不节。”从这里可以看到，他们制作衣服，不仅仅是为了身体舒适，而是为了显耀华丽。这样做的结果是，百姓邪僻而难以管理，国君奢侈而难以劝谏。让奢侈的国君去统治邪僻的百姓，想要国家不混乱是不可能的。国君若是确实希望天下太平，确实憎恶天下混乱，从节俭衣服的用度开始就不得不审慎了。这是提醒国君，虽然服装要体现出尊卑等级的不同，但是也不能过分奢华、过分炫耀。

有一年冬天，齐景公请了一位鲁国的鞋匠，做了一双鞋。这双鞋很特别，是用黄金作鞋带，白银作装饰，珍珠作连贯，美玉作鞋头，长足有一尺。齐景公很喜欢，在严冬里穿上这双鞋去处理朝政。恰巧晏子前来朝见，景公就站起来想迎接晏子。但是因为鞋子太重，景公仅可以把这个脚跟提起来，想移动都很困难。齐景公问晏子：“天冷吗？”晏子很有智慧，他和景公对谈的每一个情节，都可以成为劝谏君主的机会。譬如有一次景公上山看到了老虎，在沼泽里看到了蛇，回来就说：“我今天看到这些东西太不吉祥了。”听到这句话，晏子马上就说：“不吉祥的事情有三：有贤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能用，二不祥；用而不能任，三不祥，这才是真正的不吉祥。而老虎本来就住在山上，蛇的家就是在草地上，你看到它们很正常，有什么不吉祥的呢？”

从这些对话之中就能体会到，圣贤人无时无刻不把成就君主的德行、真正为人民谋福利放在心上，这个精神值得人们学习。正是因为他们有提升对方、帮助对方的慈悲之心，所以才会有这样的智慧。使每一个问答、每一个对话，都能成为劝谏君主的机会。

所以当晏子看到景公的鞋，就回答说：“君王何以要问天气寒冷？古代的圣人裁制衣服，冬天的衣服轻柔而温暖，夏天的衣服轻松而凉爽。如今君主用黄金美玉做这双鞋子，又在冰天雪地的寒冬里穿上，不但重，而且也不暖和。鞋子太重，会使脚的负担过重，不能行走，如此不适合穿用，便失去鞋子产生的本意。这样来看，鲁国的这名鞋匠，不知道寒暑季节的变化，不知轻重的分量，违背常理常性，这是他的第一条罪过；裁制穿饰不守常规，使君王穿上这样怪异的鞋履，为天下诸侯所耻笑，这是他的第二条罪过；动用大量的财物，却不能做对国家有益的事，不爱惜百姓的劳力财力，积怨于百姓，这是他的第三条罪过。所以臣请君王能够依法拘捕，并且派官吏审判他。”

齐景公听后，心有不舍，于是就为这名工匠说情：“这名鲁国的工匠，制作这双鞋很费力，也很辛苦，还是放了他吧。”晏子听后非常坚持地说：“不可。臣听说，辛苦去从善之人应该给予重赏，可是劳苦身心去为非作歹之人，应该予以重罚。”景公听后，默不作声。在晏子退朝之后，他就立即派官员拘捕了这名鲁国的工匠，命人押解出境，而且命令他再不得进入齐国境内。景公自己也脱去了这双金玉所做的鞋子，不再穿它。

所以君主、领导者的服装、鞋子都符合礼的要求，整个朝廷、整个国家都也不会穿着奇装异服。如果君主的穿着很奢侈，以奢侈为荣耀，就会带动整个社会的奢侈之风，所以古人对于衣服的穿着特别重视。

“所言义，故下无伪上之报。”在位者所说的话都符合道义，上行下效，也会感染整个团体，下级就不会有欺瞒、虚伪、谄媚的行为出现，欺上瞒下的话也就不会说出。在《论语·子路》中就说：“上好礼，则民莫

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在上位者好礼，一举一动都符合礼的要求，自然而然地会感化属下，属下也会用毕恭毕敬的态度来响应在位者；“上好义”，上位者说话都符合义，符合道义、情义、恩义，合情合理，人民自然会感动，也会佩服、效法；“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上位者说话能够守诚信、说到做到，属下也会用真情实意来配合领导者，上下同心。

“身行顺，治事公，故国无阿党之义。”自身的行为顺从道义，符合礼的要求，处事公正无私，国家就没有阿谀奉承、结党营私的现象。这是上行下效的道理。

在《后汉书》上记载着汉光武帝顺从道义、公正无私，所以当时的政治非常清明，出现了很多廉洁的官员。在《后汉书》上说：汉光武帝“身衣大练，色无重彩，耳不听郑卫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宫房无私爱，左右无偏恩。”因为光武帝出生、生长于民间，他非常了解百姓的疾苦，看到了百姓所经受的苦难，所以天下安定之后，他就采取了与民休息的政策，废除了王莽时期的严刑峻法，而恢复了西汉的轻法。他所穿的是布帛衣服，衣服没有两种颜色；耳不听郑卫淫声，淫词歌舞也不观听；手不拿珠玉玩物，不以珠玉珍宝为贵重；宫房没有私爱，左右的人没有偏恩，没有自己特别宠幸的人，也没有因为是自己左右的人，犯了过失就给以偏袒。

“建武十三年，异国有献名马者，日行千里，又进宝剑，贾兼百金，诏以马驾鼓车，剑赐骑士。”这是一个具体的事例，在建武十三年（37年）的时候，有别国的人贡献了一匹名马，日行千里，是千里马，还进奉了一把宝剑，这把宝剑价值百金。结果汉光武帝没有自己享用，下诏把名马用来驾驶鼓车，宝剑也赐给了骑士。

“损上林池御之官，废骋望弋猎之事。”减损上林苑（即皇家园林）里的池御之官，就是看守池子、御马的官员；停止了出外游猎之事，不再出去打猎游玩。“数引公卿郎将，列于禁坐，广求民瘼，观纳风谣。”他

把时间用来多次召引公卿郎将，排坐御前，广泛地访求民间的疾苦，听取民间讽刺时事的歌谣。

“故能内外匪懈，百姓宽息。”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内外紧密团结，老百姓生活富裕安宁。“自临宰邦邑者，竞能其官。”在汉光武帝所统治的时候，凡是担任邦邑官职的人，都是竭尽全力地做官。譬如“杜诗守南阳，号为‘杜母’。”杜诗去南阳做太守，被老百姓称为“杜母”，就像父母官一样。“任延、锡光移变边俗。”任延、锡光两个人改变了边民的风俗，这些都是政绩最为显著的例子。“又第五伦、宋均之徒，亦足有可称谈。”此外还有第五伦、宋均等人，也都是值得称颂的。

在光武帝统治时期，之所以出现了很多好官，他们能竭尽全力地为老百姓服务，原因在哪里？就在于光武帝本身能够率先垂范。他自己穿的衣服非常简单，而且把时间精力都用于倾听民众的呼声、办理朝政上，所以上行而下效。

最后一句“三者，君子常行也”。以上这三个方面，是君子、领导者应该恒常坚守的行为。

##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故声无小而不闻，行无隐而不形。玉在山而木草润，渊生珠而崖不枯。为善积也，安有不闻者乎？

——《群书治要》卷三十八《孙卿子》

声音不因为小而没有人听到；德行不因为隐藏而不被发现；宝玉蕴藏在山中，山上的草木都得到滋润；深渊里有了珍珠，连崖岸都不会干枯。由此可知，行善贵在日积月累，哪有不为人知的道理？这句话告诉人们，一个人能否留下好名声，全都操之在己。人的一生很短暂，能否过得

有意义、有价值，能否名留千古，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

俗话说：“雁过留声，人过留名。”如果一个人注重自己德行学问的修养，就一定可以留好的榜样给后世效法。所以声音无论多么细小，一旦发出来，一定就能让别人听到。一个人有真才实德，纵使在山里面隐居，也会流露出来，他的德风、他的学问也会自然而然地感化周围的人。首先感染与他有缘的人来向他学习，时间久了，邻里乡党也会受到他德风的熏染。

中国人有一句话：“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桃树和李树都不会说话，也不会用言语表达，但是它结了果实之后，果实成熟的香味自然会飘远，自然会有人来采摘。采摘的人多了，下面就走成了一条小路，这就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所以一个人有德行、有学问，自然而然就能够感召一些仰慕圣教的人来求学。

宝玉蕴藏在山中，就连山上的草木都得到滋润；深渊里有了珍珠，就连岸边的崖岸都不会干枯，整个的崖岸都会因为珍珠而受到滋润、得到滋养。这些比喻都告诉人们，有德行、有学问的人住在一方，这一方的百姓都会受益。他在此地久住之后，当地的百姓也能受到他德风的熏染，自然而然这个地方的风气就会有所改变。

所以古人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山虽然不是一座高山，但是因为有人住在这里，就会出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有德行、有学问的人住在哪里，人气就会慢慢增长，人会愈聚愈多，因为仰慕圣教的人愈来愈多，都想来求学。

## 观德于忍，观福于量

帝曰：“夫建大事者，不忌小怨”。

——《群书治要》卷二十一《后汉书一》

“帝”是汉光武帝。汉光武帝说，建立伟大功业的人，为大局着想，不会忌恨小的仇怨，并不是只有光武帝这样的皇帝才是建大事、建大功业的人。实际上，任何一个人，只要有志愿，都可以为改善社会风气做出一分贡献，都可以成为一方效法的榜样，甚至后世效法的榜样，关键在于内心有没有担当，有没有使命感。

《弟子规》中说：“恩欲报，怨欲忘，报怨短，报恩长。”别人对我们有恩，我们要念念不忘，受人滴水之恩，常思涌泉相报，有机会就要去报答。但是如果彼此之间有仇怨，就不要念念放在心上，时常去想起，这是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就像一个垃圾桶，它刚从商店买回来的时候，和别的桶没有不同，但是为什么会变成污秽不堪、让人不喜欢的垃圾桶了呢？就是因为人们经常把垃圾装在里面。如果一个人经常记起别人的仇怨，就是把自己本来干净的心，变成了承载别人过失的垃圾桶，首先受损害的是我们自己。

所以能够建立大功业的人，是从大局着想，不计小的仇怨，这样的人才能做成大事。譬如在《管子》上记载着齐桓公任用管仲的故事，齐桓公从莒国返回齐国后，想任用鲍叔牙做宰相，鲍叔牙推辞说：“君主您对我特别有恩惠，使我不受冻馁，这已经是您的赏赐了。但是谈到治理国家，并不是我的能力所及，这件事必须任用管夷吾才能做好。”他就推荐了他的朋友管仲。但是齐桓公却说：“管夷吾曾经亲自射过寡人，射中了我的腰钩，几乎把我射死。现在我任用他，岂不是引狼入室吗？”鲍叔牙说：“当时管仲是为了他的君主，如果您能宽恕他，让他返回齐国，他对待您也会非常忠心，也会像对待他以前的君主一样。”于是齐桓公就听从了鲍叔牙的推荐。他不计前嫌，亲自去迎接管仲。把他迎回齐国后，一起在庙堂上行礼，并且向他请教治国之方，把他推为上卿、推为仲父。正是因为齐桓公任用了管仲，在管仲的辅佐下，才使得齐国在诸多的诸侯国中称霸。

这就是一个不计前嫌的故事。这样的故事在历史上有很多，它都是

提醒人们，一个人想要成就大事，可能会遭遇很多的误解、诽谤、中伤、伤害，关键在于面对这些误解伤害的时候，应该如何去处理。

历史上著名的纵横家苏秦，他出生于洛阳，当时的洛阳正是东周的都城。苏秦出生在这里，而且有一些才学，也很想有一番作为，于是就去拜见周天子，但没有见到。苏秦很气馁、很生气，就把家产卖掉，然后到别的国家，想在这些诸侯国施展才华。但是他在几个诸侯国周游一圈，一无所获，钱也花光了，最后没有办法生活下去，只好再次回到洛阳的家里。

他回到家后，家里的人看到他这样落魄，当初他把家产变卖掉，也不管家人，现在一无所有，还穿着破衣烂衫，很落魄地回来，他的母亲把他数落了一通，他妻子也不正眼看他，只顾织布。苏秦感到很饿，想让他的小子给他做饭吃，结果他的妻子也不理他，扭头去做别的事。苏秦受到很大的刺激，心想自己一无所成，连家人都看不起自己，于是就开始发愤读书，一定要有所成就。他不分日夜地刻苦攻读，晚上看书到深夜，困了，就用锥子扎一下大腿，立马就会清醒很多，然后继续读书。这就是后人所说的“锥刺股”。

苏秦就这样刻苦攻读一年多的时间，觉得已经学有所成，便收拾行囊重新去游说各国。首先他游说赵国，联合其他国家一起抗击秦国。赵国国君觉得苏秦说得很有道理，就同意了，还赏赐给苏秦很多金银珠宝。在赵国的资助之下，他又往返于其他几国之间，晓以利害，最终说服其他几个国家，也同意加入到合纵抗衡的计划中。这几个国家订立盟约，并且任苏秦为六国之相。一个人能担任一个国家的国相就已经很了不起了，结果苏秦同时兼任六国之相，赵国的国君还把他封为武安君。秦国知道六国合纵抵御自己的消息大吃一惊，在之后的十几年中，秦国再也没有敢向六国发动大规模的战争。

苏秦在落魄的时候回到家，受到家人的一致鄙视。如果这时他怀恨

在心，想着如何打击报复，如何与他们对立，也就不可能有后面的刻苦读书。他把这些都放下，以自己的行为来改变众人对自己的看法。当他拜六国相，并封为武安君的消息传到苏秦的家乡时，他的家人对他的态度完全改变了。他的兄弟妻嫂，都为自己以前那样对待苏秦的行为而后悔。听说苏秦要从赵国经过老家洛阳时，全家人准备了丰盛的饭菜，到三十里之外，把路打扫得干干净净，跪在地上迎接苏秦的到来。这种前后的对比也让苏秦百感交集。

所以能够成就大事的人，都有忍辱的精神，不会因为一时的挫折、一时的误解或者是诽谤，甚至中伤，放弃自己的志愿。

## 不计前嫌，以德报怨

老子曰：“报怨以德。”

——《群书治要》卷四十《贾子》

老子说，不记仇恨，反而用恩德去回报伤害我们的人。这一境界比上一句更高一筹。上一句是告诉人们要不计前嫌，这句话告诉人们，不仅要不计前嫌，还要用恩德去回报伤害过我们的人。

中国人有一句话：“吃亏是福。”人的福气从哪里来呢？上天给人的福气都是逆着叠加的，今天的福气是以前肯吃亏、肯忍辱得来的。为什么要“报怨以德”？老子对宇宙人生的真相有深刻的理解和洞察。宇宙人生的真相是什么？就是人和人、人和宇宙自然万物都是一体的关系。既然是一体的，就像我们的牙齿咬到舌头，难道舌头还要去报复吗？能够说出“报怨以德”这句话的人，一定是对宇宙人生的真相有深刻洞察的人。

大舜就是一个报怨以德的典范。他的后母、弟弟三番五次都要置他于死地，他不仅没有怀恨在心，反而是反省自己的不足，为什么自己不能得

到父母、弟弟的欢心。最后他终于用德行感化了后母和弟弟，也感化了天下的百姓。这就是圣人和一般人的不同之处，圣人能够做到化敌为友。化敌为友是靠真诚之心的感化，“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所以《弟子规》中说：“亲憎我，孝方贤。”父母憎恨我，我还能用孝心来回报，这更显示出一个人的贤德。这句话不仅在父子之间的关系中适用，在五伦关系中都适用。

“君憎我，孝方贤。”领导者憎恶我，经常无缘无故地找我的麻烦，我还能竭忠尽智地完成领导交给我的工作，这更加显得贤明。当然这样做不是为了显得贤明，而是真正明白了事理，明白了宇宙人生的真相，才能做到这一点。

所以事事是好事，人人是好人，时时是好时，日日是好日，关键在于如何去面对。把一般人看起来不好的处境转变为好的处境，这才是有智慧。其实，物质环境和人际关系本身没有绝对的好坏之分，好坏之分在哪里？都是在于我们内心，都是我们内心的执着导致的。明白了这个道理，确实能够达到事事都是好事的境界。

## 第五十六讲

惟德动天，无远弗届



## 谦尊而光，卑不可逾

《象》曰：谦，亨。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谦，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终也。

——《群书治要》卷一《周易》

《彖传》说：谦卑，则亨通。“谦”是谦卑；“亨”，是亨通，无往而不利。看到“亨”“通”这两个字，就要反省思考我们这一生。顺利的时候多，亨通的时候多，还是遭受挫折的时候多？很多人生活中遇到过很多挫折，原因就是不懂得谦虚，是傲慢、自以为是所导致的。

《论语》中讲：“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而现在的一些孩子无论走到哪里，和别人相处一个星期、一个月，不是自己不喜欢对方，就是对方不喜欢自己，出现很多矛盾和问题。其实原因很简单，现在的孩子都是“小皇帝”“小公主”，在家时所有的长辈都是围绕他的感受、他的需要考虑问题，所以久而久之他就养成了以自我为中心的行为方式。当诸多“小皇帝”“小公主”聚到一起时，如果不产生矛盾摩擦、冲突对立，就不正常了。

所以“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原因就是一个君子对每一个人都很恭敬，为人处世没有什么过失，能够处处看到对方的需要，为对方着想。“恭而

有礼”，对每一个人恭敬、有礼貌，所以他走到哪里，哪里都是自己的兄弟姐妹。但是现在的大多数孩子因为缺少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从小就是以分数为导向，认为自己学习成绩好，就不必在意其他。结果学得愈多愈傲慢，学得愈多愈不把父母长辈放在眼里，这就是我们的教育出现了问题。

传统文化在高校里都有研究及宣讲，但为什么对解决社会问题影响甚微，没有彻底解决当前的一些道德问题？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人们把“学儒”变成了“儒学”，只是把它作为学问来研究。譬如，博士用儒家思想来写论文，来获得博士学位；教授也把它当作研究的对象，用它写专著，但是没有运用于生活，这对于人们解决社会问题没有帮助。这就是人们没有把自己的所学与自己的修身、齐家密切联系在一起，所以社会才出现状况，这就告诉人们知行合一很重要。

虽然孔子没有权势，也没有财富，但是跟随他学习的弟子有三千多人，七十二位成为贤德的人。原因就是孔子把他所说的无一例外力行在生活之中，所以他被称为圣人。这也是道德教化能否产生效果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前道德教育不得力的原因之一在于，有些官员在讲话时慷慨激昂，说一定要把反腐败作为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要事情来抓，但是没过多久，自己却因为贪污腐败被抓了起来。当这样的事情多次出现在生活之中时，人们可能会对道德教育丧失了信心。所以有一句话：“讲道而不行道，是最恶的一种人。”最恶的一种人就是能够把传统文化讲得头头是道，但是自己做不到。这些都提醒人们要反省自己，要时刻保持初心，时刻把自己的所学力行在生活之中，不要成为最恶的那一种人。

孔子说：“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一个人在壮年、中年时，要“戒之在斗”。如果有和别人斗争的思想，就是对立，原

因就在于有傲慢之心。但是现在社会受西方的价值观影响较大，从小就教孩子竞争。西方的价值观是以自利为中心，为了获得自我利益的满足，就要和别人竞争；但是竞争还得不到利益，就会变成了斗争，所以尔虞我诈、钩心斗角的问题就出现了；斗争仍不能满足自己的利益，再向上就变成了战争。

所以现在新闻中会有局部冲突，甚至是大规模的战争的报道。其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西方的价值观普遍在全世界流行的结果。人们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所以与别人产生了冲突和矛盾，最后解决不了，就诉诸战争。在现代社会之中，如果再发生战争，很可能是核武战争。如果一方不理智，选用了核武器，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人类同归于尽、世界末日。所以用竞争的方式获得自我利益满足的价值观，不会将人带向光明，却把人引上了穷途末路。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就是仁义忠恕孝悌礼信。一个人对父母有孝，对兄弟有友悌之心，把孝悌之心再向上提升，就变成了互爱，也就是《论语》中所说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互爱之心再向上提升就是互助，不仅对别人有关爱、同情的情感，还要做出切实的行动给予帮助，就是《孟子》中所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把互爱互助之心再向上提升，就是大同世界，也就是和谐社会。

大同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在《礼记》中有所描述：“天下为公”，“天下”不是一家人的天下，而是大家的天下。“选贤与能”，要把贤德的人、有能力的人举荐出来，作为国家的领导者。“讲信修睦”，人与人之间的相处讲求信用，睦邻友好。“睦”有亲爱的意思，和睦，不仅仅要和谐，还有亲爱。“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所以人不仅仅把自己的父母当作父母来奉养，不仅仅把自己的儿子当成儿子来照顾。“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使老年人能够得到赡养，壮年人能够为社会所用，都有一份好的工作，为社会做贡献，幼年人能够得到良好的教育，健康成

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矜”是老而无妇，鳏夫；“寡”是老而无夫，寡妇；“孤”是少而无父的孤儿；“独”是老而无子的人。这些弱势群体、老弱病残幼需要照顾的人，都能够得到良好的照顾和赡养。这就是大同世界、和谐社会的景象，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如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从“人人亲其亲，长其长”做起。所以孟子说，其实治理天下的道理非常容易，道就近在身边，但是人们却舍近求远、舍易求难。

中国古人说：“步步占先者，必有人以挤之；事事争胜者，必有人以挫之。”如果一个人步步都想占先，最后一定也有人想方设法地将他挤下来；事事都想比别人强，一定也会有人来挫败他，使他受到挫折。所以中国人有一句话叫“恶人自有恶人磨”。我有一个学生说：“老师，‘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好像也不是那么回事。”

所以中国古圣先贤所说的话，都能在生活中得到验证。“恶人自有恶人磨”，都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自己很傲慢无礼，也经常会引起一些傲慢无礼的人对付他。特别是女子要懂得柔顺，不能够傲慢刚强，因为刚与刚相碰，必然会两败俱伤，所以要懂得柔顺，要懂得以柔克刚。如果一个人很柔顺，很善良，懂得示弱，周围的人都愿意帮助她、成就她，而不是去为难她、嫉妒她。

“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的法则，是向下周济万物。譬如阳光普照、春雨普润，都是从上到下来周济万物。地道的法则是“卑而上行”，因为地处在下位，但是地气却向上运行。这样天地沟通，阴阳和合，然后化育万物，所以亨通。

“天道亏盈而益谦。”在《周易》中记载古代圣贤人都是通过观察天文地理，最后得出关于世间一切事物产生、发展和变化的规律。《周易》中有这样一句话：“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听起来比较玄虚，其实都可

以从自然界的现象得以观察。譬如，有日就有夜，有寒就有暑，有春夏就有秋冬，有潮涨就有潮落，从这些自然界的现象来观察，都是一盈一虚、一消一长。所以古人常用太极图来表示天道变化的规律。太极图半边是阴的，半边是阳的，中间还有一条界线。如果超过这条界线，就意味着阴阳失去了平衡。阴阳失去了平衡就会引起变化。这就是“阴极则阳生，阳极则阴生”，也就是物极必反、盛极必衰、消长必长。所以天道的规律，可以通过自然界的现象得以观察。“亏盈而益谦”，如阴历每月十五的时候是满月，满月过后，就开始亏损，一天一天地减少。古人正是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教导人要谦卑退让、舍财不贪。

从这里可以观察到，天道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就是过分的要受到制裁，而不足的要受到补益，就是老子所说的天道“损有余而补不足”的规律。正是圣人观察到这样一种规律，所以孔子一生奉行温、良、恭、俭、让的德行，他一生做到了温和、善良、恭敬、俭朴、礼让。而孔子的后人，又都秉持了他所提出的这些道德教育、道德修养的理念，所以孔子的后人一直传承到今天，保持了八十多代，两千多年而不衰。老子更是把这个规律运用得淋漓尽致。他说“我有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他把“处柔守慈”作为自己的处世原则，这都是通过观察天道的规律提出的为人处世的道理。所以在历史上可以看到，凡是家道能传承三代以上的家族，都有严格的家规、家教和家训。古人说“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家规、家教、家训，才能使家道绵延不衰。

在《群书治要·文子》中也说：“天道极即反，盈则损，物盛则衰，日中而移，月满则亏，乐终而悲。”天道的规律，就是它运行到极致，物极必反，盈则亏，所以天道总是减损盈满而增益谦虚的。《战国策·秦策三》载：“语曰：‘日中则移，月满则亏。’物盛则衰，天之常数也”。正是观察到这样的道理，所以在《礼记·曲礼》的开篇，就教导人们：“傲

不可长，欲不可从，志不可满，乐不可极。”

古人教导我们如何为人处世、待人接物，修养怎样的德行，不是随便想出来的，而是在观察了天地之道的规律上，给人以正确的引导。如果人们按照道去做，就会昌盛；违背道，就会衰落，甚至是灭亡。

“地道变盈而流谦。”地道的法则是改变盈满的，而充实谦虚的。如同样在大地上注水，水自然会流向潮湿、低洼的地方。中国人有一句话叫，“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为什么大海能容纳百川？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谦卑处下，处在最低的位置，所以河流都自然地流向它。在《老子》中也说“上善若水”。为什么“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水有一个特点，它善于给万物带来好处，但是它从来没有从万物那里要求回报；它与人无争，于世无求，从来没有向外界、向对方有要求和索取。最重要的是“处众人之所恶”，一般人都喜欢高高在上，但是水却不同，它是处在众人所不愿意处的、所厌恶处的地方，就是它非常卑下。“故几于道”，所以它和道就相近。道在低处，一个人只有谦卑下来，才能得道，才能和明德相应。

“鬼神害盈而福谦。”鬼神危害骄傲自满的，而施福给谦虚的。

“人道恶盈而好谦。”人与人相处，自然地厌恶自满的人、骄傲的人，而喜欢谦虚的人。特别是作为领导者要成就一番事业，必须能够感召很多德才兼备的人来到身边。怎样才能感召德才兼备的人来？就是领导者自己必须能谦卑有礼、礼贤下士。所以在《群书治要·文子》中就说：“能成霸王者，必得胜者也。能胜敌者，必强者也。能强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能自得者，必柔弱者也。”能够成就霸业或者王业的人，一定是得胜之人；而能够战胜敌人的人，一定是强者、强大的人；而能够强大的人，一定是懂得使用众人的力量的人；能够使用众人力量的人，一定是能够深得人心的人；而能够得人心的人，一定是自得的人。什么是自得的人？就是《大学》中所说的，

能够“明明德”的人。谦虚是人的性德，是人本性之中原有的，如果一个人傲慢了，就是把自己的明德障碍住了。所以“能自得者，必柔弱者也”，能够自得的人，一定是把谦卑柔弱作为根本的修养。柔弱并不是软弱，而是可以包容万物而不争，最终达到“弱之胜强，柔之胜刚”的效果。比如，水至柔，但是其动也刚，滴水可以穿石，虽然它很柔弱，但是可以胜刚强。水本身并没有胜的念头，而是它自自然然地达到了这样的效果，能够为人所信服。

“谦，尊而光。”“尊”是处于尊贵的地位。当一个人处在尊贵的地位，但仍然能够谦虚处下，他的德行之光，他的德风就会自自然然地影响到身边的人，甚至影响到远方。一个人身处高位，如果没有接受圣贤教诲、没有良好的引导，往往会自视甚高、恃宠而骄。所以在《群书治要·文子》中说：“生而贵者骄，生而富者奢。故富贵不以明道自鉴，而能无为非者寡矣。”一个人生来就处在高贵的地位，往往容易骄傲；一个人生来就处于富贵之家，花钱就会大手大脚，不知道珍惜。所以“富贵不以明道自鉴”，如果一个人生来就有钱、有权，但是没有学道，没有按照古圣先贤的教诲去修养自己，“而能无为非者寡矣”，而能够不做错事的人是很少的。所以“人不学，不知道”“人不学，不知义”，学习圣贤经典，向古圣先贤求道，对一个人的人生至关重要。

“卑而不可踰。”纵使一个人的地位卑下，没有出仕做官，但是却不可踰。什么不可逾越呢？他的德行不可逾越，他的德行可以教化一方。如孔子，他没有富贵的地位、权势、财富，但是他被称为“素王”。因为他的德行不仅影响了当时的人，而且影响了世世代代的中国人；不仅影响中国人，现在还影响到外国人。世界各地都建立起孔子学院，目的是学习孔子的风范。所以孔子虽然没有身居高位，但是他的德风却不可逾越，他的道德学问也不可逾越。

“君子之终也。”君子能够自始至终都保持谦卑的修养，不会因为拥

有地位和财富、学问而改变他的谦虚，就可以善始善终。是什么让一个君子能够保持善始善终？就是因为他有谦虚的品德。

## 满招损，谦受益

惟德动天，无远弗届。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

——《群书治要》卷二《尚书》

“惟德动天”，只有德行能够感通天地。“无远弗届”，“届”是至、到的意思，不管多远的地方都会被感动，进而来归附、归顺，或者来求道、求学。“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时”通“是”，是这、此的意思。自满会招来损失，谦虚会得到益处，这是自然而然的规律。

在历史上可以看到“惟德动天，无远弗届”的例子，譬如在《说苑》中记载：“周公摄天子位七年，布衣之士，执贄而所师见者十人，所友见者十二人，穷巷白屋所先见者四十九人，进善者百人，教士者千人，官朝者万人。当此之时，诚使周公骄而且吝，则天下贤士至者寡矣。苟有至者，则心（心作必）贪而尸禄者也。尸禄之臣，不能存君也。”

周公代理天子之政七年。这七年之中，他以拜师之礼求见的人有十个；执贄，贄是礼物。“所友见者十二人”，以朋友的礼节去求见的人有十二个；“穷巷白屋所先见者四十九人”，可以优先见到周公的贫寒之士有四十九个；“进善者百人”，周公所举荐贤良的、德才兼备的人，有上百人之多；“教士者千人”，士是读书人，他所教导的读书人有上千人；“官朝者万人”，给朝拜的人封官，有上万人之多。“当此之时，诚使周公骄而且吝，则天下贤士至者寡矣。”如果在这个时候，就是周公摄天子之位，代理天子处理朝政的时候，他又骄慢、又吝啬，天下来求见他的贤德之士就会很少。即使有前来求见的人，“则心贪而尸禄者也”，也是有贪心或者是

尸位素餐之人。尸位素餐之人，是不能够帮助君主治理天下的，“不能存君也”，不能使君主长存。由此可知，周公虽然身处高位，但是对于有德行的人，仍然非常谦虚礼敬。正是这种礼贤下士的态度，才感召了很多人才来到他身边，而且不遗余力地帮助他。

在《尚书》中也有这样一句话：“能自得师者王，谓人莫己若者亡。”能自得师者就能够称王天下，建立王道政治。为什么一个人能够自得师？因为他对贤德之士以尊师之礼来恭敬，奉他们为师。中国古人特别尊师重道，能够把贤德之人当作老师来恭敬，说明君主自己有谦虚的态度，所以这些人才愿意指正他的过失，帮助他处理朝政。“谓人莫己若者亡”，认为别人不如自己的人就会灭亡，灭亡的原因就是因为自高自大。

在《韩子·外储说左下》中也这么说：“上君之所与处者，尽其师也。中君之所与处者，尽其友也。下君之所与处者，尽其使也。”上等的君王和能够成为他老师的人相处，他待这些贤德之士非常恭敬，像尊师一样尊敬。“中君之所与处者，尽其友也”，中等的君主所相处、所任用的人是他的朋友之类的人。朋友，“同门曰朋，同志曰友”，就是和他地位平等的人相处，都是以朋友之礼来尊敬，这是中等的君主。“下君之所与处者，尽其使也”，下等的君主身边围绕的都是他能够指使的人，可以呼来唤去的人，这是下等的君王所任用的人。所以从一个领导者任用怎样的人、重视怎样的人、身边围绕怎样的人，就可以知道他是怎样级别的君主——是能够建功立业的君主，还是将要灭亡的君主，还是仅仅能够维持国家不衰败的君主。

所以“谦受益”。谦虚的人能够感召贤德之人来帮助他，而且谦虚的人有好学的品质，他的人生可以不断进步。

“满招损”，自满傲慢会招致损害。首先受到损害的是自己的德行。“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一个人傲慢，其实并不能让别人受损失，首先，受损失的是自己。自己不能够明德，不能够明心见性，这是最大的损失。

其次，一个人骄满、轻视别人，就会与别人产生对立，让别人心生怨恨，就会招致麻烦，自己做事就会有阻碍。最后，由于自满的态度会招致失败，做事就会不顺利，这也是很大的损失。

有一句话叫“骄兵必败”。《国语》中记载，在周襄王二十四年，秦国带着军队去攻打郑国，路经周天子所管辖的京畿北门。在路过北门的时候，恰好王孙满看到了秦国的军队路过，于是他就对周襄王说：“秦国的军队一定会打败仗，一定会受到上天的罪罚。”周天子听后很惊讶，就问：“你为什么看到他们的军队路过，就知道一定会打败仗？”王孙说：“因为经过周天子管辖的地方，应该要行礼，这是尊重天子。可是他们的军队经过时，只是把头盔摘下来，身上的甲却没有脱下来，而且走了几步路之后，就立刻又跳回车上，也就是说，这些士兵只是应付一下，并不是诚心行礼。而且这样应付一下就立刻跳回车上的人有多少呢？有三百辆战车，这些战车的士兵都是以应付的态度来行礼，整个军队大部分人对周天子都很傲慢。”所以王孙满接着说：“他们的军队非常轻狂又骄傲，轻狂就会认为自己很了不起，就不会深谋远虑，不会做好万全的准备，也就不会慎重。傲慢则会无礼，做什么事都会随便。整个军队不慎重，又随随便便，可是打仗是要进入很危险的地方，以这样的态度去应战，必败无疑。”

古圣先贤确实观察入微，他们熟读圣贤书，从细微之处就能够判断出一个人未来的结局如何，发展趋势如何。一个人轻狂，就会不慎重。面对战争不慎重，很随便，怎么会不打败仗呢？果然秦国攻打郑国没有成功，军队回来，到了晋国的边界，又被晋国打得落花流水，三名大将都被擒。古人通过观察一个军队的作风，就能够看到战败的结果，所以人们要时刻反思，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是吉还是凶、是福还是祸。

“谦受益”，一个最大的益处就是能够听取别人的教诲。《了凡四训》中说：“谦则受教有地，而取善无穷。”在《了凡四训》中，最后一章是“谦德之效”，其中就有很多例子。有一个例子讲到了敬宇，他年龄小，但是极

为谦虚。了凡先生看到他，就对旁边的朋友费锦坡说：“这个人今年一定能够榜上有名。”因为在所有人之中，他最为谦虚、最为恭敬，甚至受到了别人的侮辱，他都能够忍受；受到别人的诽谤，他都不去辩解。结果开榜后，果然最年轻的丁敬宇榜上有名。这个故事也印证了“谦受益”。

“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规律。

## 劳谦君子，万民服也

《象》曰：劳谦君子，万民服也。

——《群书治要》卷一《周易》

这句话是说，有功劳而又谦虚的君子，必然会得到万民的景仰和归附。一个人有功就容易恃宠而骄，有功就容易傲慢；一个人不居功自傲，就不会招致嫉妒，而且会让人们信服。

曾国藩对“一阴一阳之谓道”的规律理解得特别深刻，所以他给自己的书房取名叫“求阙斋”。“阙”通缺失的“缺”，就是求一点缺失之意。因为他自己有权有势，又才华横溢，可以说是近乎完美，这个时候如果不够谨慎，又居功自傲，很可能让皇帝视他为眼中钉，也会招致群臣的嫉妒。为了避免灾祸，他非常小心谨慎，而且推功于上、让利于下。事情做好后，将功劳推给领导、推给皇帝；利益也不能独占、独贪，要分给属下。如此一来无论是上级还是下级，对于他的成功都不会怀恨，不会嫉妒。

古人说：“让功于众，让位于贤，让名于上。”有这样的胸襟和气度，在处事待人接物之中自然懂得谦退，不会傲慢。

“让功于众。”其实一件事情的圆满成功，并不是某一个人聪明智慧的结果，都是众人共同努力成就的。所以功劳本来就是众人的，也并不是推让。推功于众、让功于众，是真正明了事实真相后所做出的正确选择。

“让位于贤。”如果有贤德的人，才能、德行比自己好，一定要把位子让给他，把贤德的人举荐出来。因为人做事要有公心，都是希望把事情做好、做完美，而不是自私自利，不能有嫉妒之心。

“让名于上。”要把好的名声让给上位者、让给团体、让给国家。所以最重要的是做实事，而不是求虚名，要把事情促成，让事情进展顺利，达到圆满的效果，不必让别人知道这件事是自己做的。非得让人知道是自己做的，这是夹杂着好名的心在其中。况且自己做这些事都是本分，都是道义，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如果有机缘，却不认真、努力地尽职尽责，就会使人感到不安。所以人生要做到理得心安也并不容易。

“劳谦君子，万民服也。”对于领导者更是如此。《群书治要·孙卿子》中指出：“尊圣者王，贵贤者霸，敬贤者存，慢贤者亡。”能够尊重圣人的人，可以称王天下；能够以贤者为贵的人，或者给予贤者以尊贵地位的人，能够称霸天下。“贵贤”，贵贤比尊贤更高一层，以贤人为宝贵，不是以金银珠宝为宝贵，这样的人可以称霸天下。“敬贤者存”，尊敬贤德的人，可以免于灭亡。“慢贤者亡”，怠慢、侮辱贤德的人，最终会走上灭亡的道路，这是古今通用的道理。

## 德日新，万邦惟怀

德日新，万邦惟怀；志自满，九族乃离。

——《群书治要》卷二《尚书》

关于“九族”，汉代的儒者有两种说法：一是指九代的直系亲属，包括高祖、曾祖、祖父、父亲、自己、儿子、孙子、曾孙、玄孙，这是九族。另一种说法是指父族四，包括出嫁的姑母及其儿子、出嫁的姐妹及外甥、出嫁的女儿及外孙；母族三，包括外祖父、外祖母、姨母及其儿子；

还有妻族二，也就是岳父、岳母，这个加起来也是九族。总之，就是与自己有亲缘关系的、很亲近的人。

“德日新”，德行每天进步。“万邦惟怀”，就是世界各国都受到感化而远来归顺。“志自满，九族乃离”，心志骄傲自大，连身边最亲近的家人也会离散。

在《新语》中有一句类似的话：“夫善道存乎心（心作身），无远而不至也。恶行著乎己，无近而不去也。”如果一个人的所言所行都遵循善道，即使远方的人，也会被感召而来；如果一个人恶行昭著，即使是身边很亲近的人，也会离他而去。例如，“周公躬行礼义，郊祀后稷，越裳奉贡而至，麟凤白雉，草泽而应”。周公亲身实践礼义，以郊祀之礼来祭祀他的先祖后稷，结果感召远在南海边的越裳国派使者带着贡品来朝拜。又如，麒麟、凤凰、白雉这些祥瑞的动物也都在草泽中出现；相反，“殷纣无道，微子弃骨肉而亡”。商纣王荒淫无道，不听大臣的劝谏，整天不务正业、荒于朝政，结果他的庶兄微子都弃他而逃亡。

“行善者则百姓悦，行恶者则子孙怨。”如果行善，百姓就爱戴他；行恶，子孙就怨恨他。“是以明者可以致远，否者以失近。”所以明智的人可以招来远方的贤才；而以身行恶的人，却连身边的人都会失去。

## 德不谦者失天下

故《易》曰：“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国家，小足以守其身，谦之谓也。”

——《群书治要》卷四十三《说苑》

《周易》中说：有一个道理，如果按照它去做，大能保住天下，中能保住国家，小能保全自身，这个道理就是谦虚。

中国古代人有很多观人的方法，观一个人是否有德行，就看他是不是谦虚。如果一个人功成名就，但是不够谦虚，不能够谦卑而尊人，反而傲慢无礼、自视甚高，这个人的事业很可能会很快败落下来。

所以《说苑》中说：“吾闻之曰：德行广大而守以恭者荣。”一个人德行广大、高尚，又对人守持恭敬，这样的人才能够显荣。“土地博裕而守以俭者安”，拥有的土地广阔富饶，但是还能够守持节俭，不奢侈浪费，这样的人才能够安宁。“禄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贵”，一个人身居高位，非常尊贵，但是对人谦恭有礼，这样的人才能够受人尊敬。“人众兵强而守以畏者胜”，人口众多，军队势力强大，但仍然小心谨慎，这样的人才能够战无不胜。“聪明睿智而守以愚者益”，一个人很有聪明智慧，但是仍然守持着愚拙的姿态，这样的人才能增益他的学问道德。“博闻多记而守以浅者广”，一个人博闻强记，记忆力很好，见闻也很广博，但是仍然守持着浅陋的态度，这样的人才能够更加广博。“此六守者，皆谦德也。”这六种德行，都是谦德的表现。“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德不谦者失天下，亡其身，桀纣是也，可不慎乎。”一个人虽然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却没有谦虚的德行，最终导致失去天下、丧失性命，这就是桀纣的所作所为，怎么能不谨慎呢？

## 第五十七讲

谦恭处下，慎终如始



## 若升高，必自下

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迩。

——《群书治要》卷二《尚书》

“陟”，《说文解字》解释为登，“遐”，是远，“陟遐”就是远行，“迩”是近。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如果要登高，一定要从低处开始；如果要远行，一定要从近处起步。这是提醒人们，无论做学问或者处事，都应该从浅近处下手，然后循序渐进，慢慢深入，不可好高骛远。

在《论语》中，孔子也说，“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如果观察自然界的现象就会发现，万事万物都有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过程。如果一个人的事业还处于“春生”的阶段，就要有耐心，不要希望立刻就有收获。如果采取的方法有问题，往往会揠苗助长、适得其反。

很多学习传统文化的人，受到古圣先贤智慧的提醒，也受到他们志愿的影响，希望“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个志愿确实值得赞叹，非常远大。但是从哪里做起呢？《大学》中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还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要从哪里做起？修身要从格物做起。所以弘扬传统文化的心愿虽然很广大，很值得赞叹，但是一定要从基础做起，要扎好两个根：第一个就是

德行的根本，第二个就是学问的根本，所以一定要谦虚。

当一个人在扎德行的根本时，就要学习《弟子规》等传统文化经典，用这些规范来反省自己的行为。因为我们从小没有传统文化的基础，为人处世、待人接物都是随波逐流，社会大众怎样做、怎样提倡，我们也就习以为常，所以不知道正确的为人处世、待人接物的方法，“积非成是”的事情已经很多，错误的毛病习气也已经形成很久。

现在开始学习《弟子规》等传统文化经典是在重新补课。但是一个人的习气是长时间形成的，要改正，会有一定的难度，而且是随着自己的年龄愈长，形成习气的时间愈长，愈不好改。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想要成圣成贤，难度非常大，必须有高度的反省能力和自觉的意识。

德行的根本最重要的就是谦虚、恭敬。为什么要谦虚？《了凡四训》中有一段话：“思古之圣贤，与我同为丈夫。”想想古代的圣贤人，如孔子、孟子，他们和我们同样是人。“彼何以百世可师？我何以一身瓦裂？”为什么孔子、孟子能够成为百世的师表，直到今天，不分种族、不分国籍的人，提到他们，还非常尊敬，还愿意向他们学习，而我自己却是一身瓦裂？“瓦裂”，瓦就是陶制的器皿，如陶制的杯子、陶制的盘子、陶制的碗等。但是陶制的器皿却破碎了，结果就是一文不值。

“耽染尘情”，过分地放纵于欲望的满足、感官的享受。情令智迷，利令智昏，人在情欲面前昏头昏脑，把持不住自己，开始放纵欲望，追求感官的享受。但是欲望愈追求愈不能满足，欲是深渊，没有底线。很多人沉迷于欲望的享受不能自拔，贪酒、贪色、贪吃，还有吸毒等，这都是过分地追求感官的享受而不能自拔的表现。

“私行不义”，偷偷地做着一些不仁不义的事情，不符合为人标准的事情。在古人看来，一个人要成为人，取得做人的资格，必须做到仁义礼智信。仁，就是不杀生，不杀生才能培养起仁慈之心；义，就是不偷盗，不是自己的不能取；礼，其中邪淫是违礼最突出的表现；智，要不饮酒。

一个人酒醉之后胡言乱语，自己的尊严就一扫而光；信，要不妄语。所以一个人要取得做人的资格，必须做到仁义礼智信，如果这几样做不到，就失去了为人的资格。但是现在人们不学习传统文化，“人弃常则妖兴”，整个社会把五常大道、五伦大道抛弃了，所以怪异的现象、不正常的现象全都出现了，人就活得不像人了。

偷偷地做着一些不仁不义的事情，但是不知道惭愧，还妄自尊大，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就这样一天一天地沦落为禽兽而不知不觉，这是多么可悲的事情。我们与古圣先贤相比，确实相差太远，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地方呢？所以一定要谦虚，因为确实没有值得骄傲的地方。

《申鉴》中说：“德比于上，欲比于下。德比于上故知耻，欲比于下故知足。”要比德行，不要和那些不如自己的人相比，而是要和那些比自己更有德行的人相比，要和古圣先贤相比。他们早已经成圣成贤，但自己仍是一身瓦裂、一文不值，这是多么让人惭愧的事情，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呢？所以“德比于上故知耻”，“知耻近乎勇”。一个人有了羞耻心，才能提起勇猛精进、断恶修善之心，能够勇于改过。

“欲比于下故知足”，在欲望享受方面不要和那些比自己高的人相比，而是要和那些不如自己的人相比，这样才会知足常乐。我们每天看到过往的人群，有很多人确实比我们富裕，比我们官位高，比我们富贵，享受着比我们更好的生活。但是又有多少人过着三餐不继，或是富而不乐、贵而不安的生活呢？虽然很富贵，但是没有学习传统文化，不明理，所以不能达到心安理得的心境。

孔子的弟子颜回可以做到“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我们和颜回相比，生活条件已经相当优越，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呢？所以知足常乐。更加幸运的、值得庆幸的是我们今生有幸学习圣贤文化，能够用圣贤文化改变自己的心态，提升自己的心性，让自己这一生能有机会超越凡夫、成圣成贤，这是一件多么值得庆幸的事情，所以

欲望要愈淡薄愈好。

《大学》中说“明明德”，每一个人本性都有明德。修学的目的就是把自己的明德彰显出来。而欲望太多、太强，会遮蔽自己的明德；一个人傲慢自得、自以为是，也会遮蔽自己的明德，最终受损伤的不是别人，首先是自己，这是得不偿失。

《礼记·文王世子》中指出：“是故知为人子，然后可以为人父；知为人臣，然后可以为人君；知事人，然后能使人。”古圣先贤教导世子（天子即位之前的称呼），要学会谦卑之道，在日常生活中，潜移默化地培养。古人特别重视对太子的教育，天子修谦卑之德，从他做太子时就已经开始了。

作为储君的世子，当然要学习如何治国理政，但是培养德行更是不可缺少的课程。因为世子以后要成为天子，天子是众阳之尊，如果不懂得修“卑下之德”，就会出现“亢龙有悔”的现象。“亢”是至高，“龙”，是君位。“亢龙有悔”就是处在极尊之位，应该以高傲为戒，否则就有败亡悔恨之祸。为什么呢？后面解释道，地位极其显贵，没有比这更高的位置，身份极其崇高，没有人能够轻易地接近。贤人都处于下位，没有办法在他身旁辅佐，因此一举一动如果不谨慎就会引祸上身。“亢”是只知道进取，却不知道退守；只知道存，却不知道会衰亡；只知道获得，却不知道会丧失。只有智慧的圣人才能够知道如何进退存亡，而不失正道。

所以处在天子之阳位，是非常尊贵的位置，必须有谦卑之德来辅助，否则就会招致悔恨的结果。世子在成为天子之前，一定要学习卑下的德行，才有助于他日后安坐于至高的“阳位”，所以“知为人臣，然后可以为人君。知事人，然后能使人”。知道为人臣子之道，才能够做好君主；知道如何事奉别人，在事奉别人的过程中，培养出谦卑的品德，使谦敬的待人处事态度成为一种习惯，才能够去指使别人、领导别人、管理别人。

中国古人明白这一点，所以在太子出生之后，就要给他以良好的教

导，培养起他谦卑的品德。譬如在史书中记载，文王的母亲太任在怀文王的时候，就非常注重胎教。她“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口不出放言”，不好看的景色不去看，淫词歌舞不去观听，口里所说的话，一定是很温柔的、谦虚的话，没有傲慢的言语，更没有粗鲁骂人的话。正是因为文王的母亲是这样一位谦恭有礼的圣母，所以她所教出的孩子，也才会是一位圣人。

不仅如此，孩子出生之后，就要请最有德行、最有学问的人做他的老师，来教导太子。在《礼记·文王世子》中，就特别指出世子应当与国人“齿于学”。《晋书》也指出：“太子居以士礼，与国人齿，以此明先王欲令知先贱然后乃贵。”“齿”是牙齿的齿，就是根据年龄大小的顺序，来行长幼尊卑之礼。“齿于学”，就是太子入学时，要与平民百姓的子弟按照年龄大小的顺序，行长幼尊卑之礼。世子虽然是储君，但是在登基之前，不可以以君臣之礼与国人相见。这样做的目的，既能够让他亲民，了解民间的疾苦，体察民情，同时也培养了他的谦下之德，知道长幼有叙。因为世子一旦登基，就是居庙堂之高，与百姓接触的机会很少，如果在他为世子时不能和民众建立起相亲相爱之情，就很可能出现为君之后，不能体会民间疾苦，不了解民众之情，甚至于视民众如草芥的情况发生。

当然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对世子的教育，培养起他的谦恭之德，使他把谦恭作为为人处世、待人接物的习惯。习惯成自然，对每一个人都谦恭有礼，而且能够礼贤下士，就不会高高在上，特别是如果对于贤德之人能够尊敬，才能够感召很多德才兼备的人来辅佐他。

《群书治要·晋书》中也记载，愍怀太子年少时本是聪慧好学，但是“由于长养深宫，沉沦富贵，受饶先帝，父母骄之，每见选师傅，下至群吏，率取膏粱击钟鼎食之家，稀有寒门儒素……遂使不见事父事君之道”。太子聪慧好学，本来是国家之幸，但是因为成长环境之中，没有布衣之士、朴实忠谨的人来教导他，而他选择的太师、太傅等，都是豪门大户之

家，沾染了玩世不恭、不务正业、骄奢淫逸的坏习气。对于孝亲尊师、长幼进退的礼节都疏忽大意，没有学习，更谈不上谨慎持身、体察民情了。后来由于太后嫉妒太子的声誉，于是通过假意召见太子并把他灌醉，让他写了一封反书，最终太子被废，而且被陷害至死。这都是因为没有接受良好的教育，不懂得谦卑之德，所招引的杀身之祸。

《晋书》指出：“天子之子，不患不富贵，不患人不敬畏，患于骄盈不闻其过，不知稼穡之艰难耳。”天子之子，就是太子，虽然没有登基，但是已经尊显无比，他所缺乏的是谦下修身、体察民情的德行修养。他不必担心自己不够富贵，也不必担心别人不尊敬他、畏惧他，而应该担心身处于富贵之中，习惯于骄傲自满，听不到自己的过失，甚至成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小皇帝。如此一来，怎能担当治国爱民的大任？

中国人有一句话叫，“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真正的无后为大，就是生了七八个儿子，却没有对这些儿子进行良好的教育和引导，他们不读圣贤书，结果骄奢淫逸，不能把自己的家道、家风、家业承传下去，甚至还做出很多祸国殃民的事，这样的儿子与其有，还不如没有。

中国古人把培养后继人才、后继接班人看得无比重要。普通人家虽然不能像教育太子那样，选择最有德行、最有学问的人来教导子孙，但是可以选择有德行、有学问的人，给子孙以好的教导。所以富能超过三代绝对不是偶然，而是读圣贤书、接受圣贤教育的结果。

如果人们去参观山西的乔家大院，或者常家庄园，就会发现乔家大院即使是亭子之上，写的都是《论语》中的教诲。亭子上写的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而且他们的婚丧嫁娶之礼，完全是按照古代的礼节来进行，这些礼节都是知恩报恩、饮水思源的教育。这说明乔家能够富过几代，不是偶然的，而是接受传统文化教育的结果。而富不过三代，或富不过当代，根本原因就是忽视了伦理、道德、因果、圣贤教育。

明白了这个道理，如果希望自己的孩子以后能有所作为，就要从小给他以《弟子规》的教育，培养起他谦恭有礼的品质，他出去做事才不会处处成障。

《孔子家语》中还记载，周公辅佐成王的时候，想教导年幼的成王世子之礼，但是成王的父亲武王已经过世。于是周公就与自己的儿子伯禽，演示世子之礼给成王观看，让他从中体会到父子、君臣之道，培养起他的谦卑之德，所以中国的孝道、师道，还有臣道的教育非常深奥、非常有效。现在的孩子为什么骄傲？就是因为从小没有接受侍奉人、孝敬人的孝道教育，没有从小培养起谦敬之德，不知道谦卑恭敬为何物。他从来没有侍奉过别人，所有人都在为自己服务，那他怎么可能不高高在上、自以为是呢？

“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天就是天道自然的规律。《弟子规》等传统文化经典都是告诉人们天道自然的规律，“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如果按照“道”去做，就会感召到很多人的帮助；如果违背了“道”，即使是亲朋好友都会被我们伤害，离我们而去。所以现在的人感觉自己没有朋友，没有值得信任的人，原因在哪里？“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如果自己的人生没有知己，没有值得信赖的人，问题一定出在自己的身上，是因为自己没有按照古圣先贤的教诲去做。所以学习谦卑，就是学习怎样使自己人生得到更多好的帮助。一个人如果不能放下傲慢，就是在给自己的人生设置阻碍。明白了这个道理，人们就愿意去培养谦卑之德。

## 海纳百川，谦冲自牧

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以其善下之。

——《群书治要》卷三十四《老子》

江海之所以能够成为溪流河川汇集的地方，就是因为它善于处在低

下的位置。这句话提醒人们，君子应该虚怀若谷、谦冲自牧，德行才能日益增长，才能感召德才兼备的人来到身边。古圣先贤都明白这个道理，即使不是圣贤的君王，想成为霸主，也必须有谦敬的德行。

世间大凡读圣贤书的人，都把财、色、名、利看得很淡，“与人无争，于世无求”，“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如果领导者不能识别这样的人才，或者心胸不够宽容，甚至妒贤嫉能，就不能识才，更不能任用真正的贤才；喜欢任用听自己话的人、谄媚巴结的人、阿谀奉承的人，真正的贤才就会离他而去。

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在《群书治要·贾子》中记载，君王给人授官分为六个等级，即“师”“友”“大臣”“左右”“侍御”“厮役”。这六个等级，对他们的态度不同，对自己的影响也自然不同。

第一个等级是“师”。师的智慧源源不断，他的行为可以做世人的表率，对世人的要求是有问必答、有求必应。他每到一个封地，就可以让这个封地受人尊重，加重这个封地的分量；他每进入一个国家，就可以让这个国家受人尊重，加重这个国家在人们心目中的分量。这样的人叫作师。

第二个等级是“友”。友的智慧足以磨砺人，行为足以辅助人，明于进贤之道，敢于罢黜不肖之徒。对内能够匡正君主的过失，对外能够称扬君主的美名。

第三个等级是“大臣”。大臣的智慧足以帮助为政者谋划国事，行为足以作为人民的表率，仁德足以使上下相处愉悦；能够谨然遵守国家的法律，君主有难能为君主效死；忠于职守，不徇私枉法。如果一件事不符合国法，即使是君主的委托，他也敢违逆而不去做。

第四个等级是“左右”。他们修养自己的身心，端正自己的行为，在乡里不会做对不起乡里的事；所言所行不会有损于朝廷；如果君主做错事，他可以犯颜直谏，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可见，“左右”也很难得。现在有些人担心丢了自己的官职，看到领导做错事，仍然谄媚巴结、一味地

迎合，不敢去指正他的过失。但是“左右”看到领导者做错事，可以冒着生命危险去劝谏，这被古人称为第四等的人。

第五个等级是“侍御”。侍御可以既不贪财，也不淫色，事君没有二心；君主有过失，虽然不敢犯颜直谏，但是忧愁的颜色会表露在脸上。这是第五等的人。虽然没有勇气去劝谏君主，但是一心为君主着想，君主有了过失，他非常担心、非常忧愁。

第六等级是“厮役”。厮役，是专指谄媚巴结、奉承君主的人。

“故与师为国者帝，与友为国者王，与大臣为国者霸，与左右为国者强，与侍御为国者，若存若亡，与厮役为国者，亡可立而待。”这句话特别值得现在人尤其是领导者警醒。人们应该选择与哪一类人一起治理国家，选择哪一类人作为自己的属下、臣子？能够和“师”一起治理国家，可以称“帝”，就是对德才兼备的人、圣贤之人非常尊敬，以待师之礼来恭敬他，这样的人被称为帝；和“友”一起治理国家，可以称“王”，王天下，就是可以作为天下所有国家学习的榜样；和“大臣”一起治理国家，能够称“霸”；和“左右”一起治理国家能够很强盛；与“侍御”一起治理国家，存亡就难置一词，要看运气的好坏；但是和“厮役”，就是与那些谄媚巴结、阿谀奉承的人一起治理国家，灭亡是顷刻之间的事。

所以圣明的领导者都是和师相处，能够尊师，以尊师之礼来礼敬贤德之人，这样才能使人民富裕、国家安定、长治久安。如诸葛亮，他本是隐居，但是最终被刘备三顾茅庐的精诚之心所感动。刘备为了请诸葛亮辅佐他，三顾茅庐，他的真诚之心、恭敬之心，还有为国家、为人民着想的心，使诸葛亮深受感动，所以才出来协助刘备。

如果领导者没有礼贤下士、谦恭有礼的态度，怎么可能感召真正贤德的人来辅助自己呢？所以谦恭、好学、礼敬的态度，对于领导者而言至关重要，因为它决定了领导者能感召怎样的人才来到自己身边。如果领导者所任用的都是不如自己的人，并且嫉妒比自己强的人，那么这个国家、

这个团队就不可能得到好的治理。

## 虚其心志，恭其容貌

君子常虚其心志，恭其容貌，不以逸群之才加乎众人之上；  
视彼犹贤，自视犹不肖也。故人愿告之而不厌，诲之而不倦。

——《群书治要》卷四十六《中论》

“逸群”，是超群出众；“不肖”，是谦辞，指不贤德、不才。这句话的意思是，真正的君子常保心态谦虚，举止恭敬有礼，不以出众的才能而高于众人之上；他把别人都看作贤能之士，而把自己看作不贤之人，因此别人愿意告诫他而不觉得厌烦，教诲他而不觉得疲倦。因为他有谦恭好学的品质，是真心希望学习。对于真心求教的人，别人也会愿意真心教导。

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三个人同行，其中都有我的老师。从善人身上学习他的善，从恶人身上避免他的恶，所以无论是善人、恶人，都是我们可以学习的老师。

“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看到贤德的人，就要向他学习、向他看齐，而不是嫉妒他；看到不贤德的人，做得不如我们的人，要反省自己是不是有和他类似的问题和毛病，从而及时加以改正，所以善人、恶人都是时时提醒我们的老师。

虚心好学的品质要从小培养，从对父母的态度来培养。如果一个人对父母能够有恭敬心、感恩心，时刻记得父母的恩德、父母的品德，就能够保持恭敬之心待人接物、为人处世，一以贯之地运用这种孝顺之心。为什么现在有的孩子学传统文化很难？原因就在于他们没有根。他们在家里不懂得孝顺父母，对父母傲慢无礼，出言不恭，和父母顶嘴。当走到学校，对老师也就不会发自内心地恭敬。当进入社会，对领导同样不会发自

内心地恭敬。如果一个人对父母恭敬，那么他对老师、对领导的恭敬就是真的、是不变的；如果一个人对父母不恭敬，那么他对老师、对领导的恭敬一定是假的，不是出于真诚之心。所谓真的就是恒常不变的。如果对老师、领导恭敬，对父母不恭敬，一定是因为老师和领导对自己有好处，是出于功利之心、算计之心，才对老师和领导恭敬，所以不是真心。

从一个人对父母的态度上，最能够反省出他的不足，他的用心是真心还是妄心，是恩义、情义、道义之心还是功利之心。所以古人讲孝顺父母，其实是从对待父母的态度上，培养起一个人谦恭有礼的态度。当这个态度成为一种习惯，人们习以为常，自然就会对老师、对领导发自内心地恭敬，发自内心地谦虚好学，这样才能感召好的人缘。哪一个领导不愿意提拔谦恭有礼的属下呢？这些都要从学习优秀传统文化，从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来培养。

“不以逸群之才加乎众人之上”，“逸群”就是指一个人才华出众、有卓越的才华。一个人的卓越才华源于什么？一个人有所成就，离不开父母的辛勤养育、老师的辛勤教导、国家的培养。一路走来，有如此多的人成为我们成就的铺路石，所以我们有什么值得骄傲自满的呢？感恩都来不及，生怕自己的言行举止给父母、老师、国家抹黑，这才是一个正确的态度。

记得有一次在唐山论坛，很多同学非常热心，请我的母亲也来到现场。主持人知道我的母亲在现场，就特别想采访一下母亲。她提出一个问题：“您是怎样把孩子培养得这样优秀、这样有德行的呢？”母亲其实特别不愿意出席这样的场合，也不愿意接受采访，她只说了一句话：“这不是我的功劳，这是老师的培养、国家的付出。”也许很多人听后会认为这是说赞叹的话。其实并非如此。因为我们在家时，母亲也经常这样提醒我们，所以说出这样的话，绝非偶然。我现在感觉到了母亲教育人的智慧，平时看到我们取得了一些成就沾沾自喜时，她都会提醒我们不要忘记老师

的教导，不要忘记国家是怎样帮助我们成才的，时时提醒我们要有感恩之心，使我们收敛起傲慢之心。

所以在长者身上，确实可以看到传统文化的影子。他们一生做到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无论贫富贵贱都能够坚守仁义道德，做人无愧于天地。而且懂得知恩报恩，没有傲慢之心，知道自己今天的成就与老师的教导、国家的培养密不可分。

## 骄不与罪期而罪自至

汝惟弗矜，天下莫与汝争能。汝惟弗伐，天下莫与汝争功。

——《群书治要》卷二《尚书》

“矜”，是自夸、自负；“伐”，是自我夸耀。一个人能不自以为贤能，天下就没有人与他争贤能；能不自我夸耀，天下就没有人与他争功劳。国君如果能时刻保持谦恭谨慎的态度，天下才能永保稳固，不被推翻。这句话提醒人们，不要自己夸耀自己，不要自以为贤能。

在战国时期，魏公子牟要出远门，穰侯魏冉去送行。当时魏冉被封于穰这个地方，所以被称为穰侯贵人。临别之时，穰侯就对魏公子说：“你有什么话要提醒我、嘱咐我吗？”魏公子牟对穰侯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夫官不与势期而势自至，势不与富期而富自至，富不与贵期而贵自至，贵不与骄期而骄自至，骄不与罪期而罪自至，罪不与死期而死自至。”魏公子牟在这段话里勾画出一个为官者，由官位到权势，由权势到财富，由财富到华贵，由华贵到奢侈、骄奢，由骄奢到犯罪，由犯罪到亡身的运行轨迹。所以自古以来，有很多“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为官者，就是沿着这样的轨迹最后滑向了无底深渊，成为千古罪人。

“官不与势期而势自至”，一旦人有官位，权势虽然没有跟他相约，

但是权势会自然而然，因为做官就有权势。“势不与富期而富自至”，当官就有俸禄，甚至还有人来行贿，所以慢慢就富裕了；即使没有人行贿，他不收受贿赂，国家给他的俸禄也很丰厚，所以富自至。“富不与贵期而贵自至”，一个人富裕了，就会受人尊重，贵就自然到来。“贵不与骄期而骄自至”，人在富贵的状况下，就很难不傲慢，除非他有很高的警觉性。如果没有警觉性，却高高在上，又有财富，又受人尊敬，很多人都谄媚、巴结他，这时骄傲自大，就很容易犯错、狂妄。“骄不与罪期而罪自至”，虽然骄傲没有和罪相约，但是罪也会不期而至。“罪不与死期而死自至”，现在很多为官者，因为贪污受贿、违法乱纪，最后锒铛入狱，就是没有谦恭谨慎、慎始慎终的态度所导致的。

人在富贵中保持清醒不堕落，应该用怎样的心境来面对富贵呢？就是要用感恩的心。譬如，一个人今天有官位，赚到很多钱，这是结果。原因在哪里？《周易》中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首先要感恩祖宗、感恩祖先积德，得到富贵可能并不是我们自己的聪明智慧的结果。一旦自己富裕了、骄傲了，结果骄奢淫逸，可能很快就把祖先的德行败坏掉，灾难就会降临，所以愈是在富贵的地位，愈要保持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态度，愈要小心谨慎，谦卑自守。

## 使骄且吝，余不足观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

——《群书治要》卷九《论语》

孔子说：“如果一个人有周公那样的才华并且办事完美，但是骄傲而且吝啬，其余虽有小善，也就不值得一提了。”周公是孔子特别敬仰的圣

人，他制礼作乐，无论是才艺还是办事都很完美。这里的“才”和“美”是两码事。“使骄且吝”，“骄”是骄傲，“吝”是吝啬，“骄”和“吝”也是两码事。

比如，晋代的石崇和王恺比富，他们属于骄傲过分，但是并不吝啬，这属于骄而不吝。又譬如王戎，他是竹林七贤之一，家里种了好的李树，但是他很吝啬，害怕别人得到李子核去种，就把李子核钻了个洞，再卖出去，但是他见到别人都说好话。还有一个和峤，他有钱癖，也是十分吝啬，但是他见到别人，都是恭敬赞叹。

普通人大概都是骄而不吝，或者是吝而不骄。但是这一句说“骄且吝”是兼而有之；“其余不足观也已”，“其余”是指什么？程子的批注说是“周公之德”，这个批注是错误的。因为这一句是指周公之才之美，不是说德，是说周公的才艺和办事完美，而不是说周公的德行。周公的德行很崇高，孔子不会拿德来做比喻。因为如果有周公之德的人，就不会骄而且吝，有了骄就会损伤美，办事就不完美了。

孔子的学问，是教人学道德仁义，道德为首。这一句并没有说周公之德。骄吝而有才，就会成为坏才，比如王莽就是坏才。因为有骄，所以办事就不会完美，何况骄且吝呢？骄且吝的人，不能够进德修业，虽有小善，不足观也已，也抵不住大恶。在《论语点睛》上，蕩益大师对这句话进行了一个点睛的批注，他说：“无周公之才美而骄吝者，岂不愧死？”如果没有像周公这样有才艺且办事完美的人，反而还又骄傲又吝啬，不更应该惭愧得无地自容吗？这是提醒人们要克服骄慢之心，即使有周公那样的才艺且办事完美的人，假使又骄傲又吝啬，其余的小善都不值一提，更何况没有那样的才艺，没有那样的学识，不能办事完美的人呢？就更不应该骄傲和吝啬了。

## 第五十八讲

审时度势，明哲保身



亢龙有悔，何谓也？子曰：“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其唯圣人乎！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

——《群书治要》卷一《周易》

## 亢龙有悔

《周易·乾卦》第六爻的解释，上九“亢龙有悔”，象征处于极高点的龙，会有悔闷的后果。“亢”在《说文解字》中为：“人颈也。”段玉裁注：“亢之引申为高也。”《周易集注》：“吴幼清以人之喉骨刚而居高是也。盖上而不能下，信（今‘伸’字）而不能屈之意也。”亢就像人的颈骨，它刚直且居于高位；形容能上不能下，能伸不能屈。

“龙之为物，始而潜，继而见，中而跃，终而飞。既飞于天，至秋分又蛰而潜于渊，此知进知退，变化莫测之物也。”在乾卦中，“龙”代表事物，代表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龙开始是潜伏的；“继而见”，然后显现出来；“中而跃”，跃是跳跃；“终而飞”，最终飞龙在天，利见大人。“既飞于天”，飞龙处于中正、至尊之位，此时正值秋分，应该“蛰而潜于渊”。“蛰”指惊蛰（到惊蛰之时，动物要休眠），走到极致时，就应该潜

伏。“蛰而潜于渊”揭示出事物发展由盛转衰的规律。秋分时“潜于渊”，隐藏起来，这是“知进退”。这里用龙表示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它虽然变化莫测，但一定守着物极必衰、一盈一虚的规律。

“九五飞龙在天，位之极中正者，得时之极，乃在于此。若复过于此，则极而亢矣。以时则极，以势则穷，安得不悔。”此句讲“亢龙有悔”。“飞龙在天”，从位置讲，它处在九五之尊、极其中正之位；就时节而言，它是得时之极，在时节上到达极致。但是如果超过这个位置，就是“极而亢矣”，走到了极端就是亢。“亢”是极高、过分的意思。“以时则极，以势则穷”，时节上，它到达极端；势力上，山穷水尽，“安得不悔”，哪有不悔闷的结果？

孔子解释“亢龙有悔”：“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贵而无位”，《周易正义》中释为：“以上九非位而上九居之，是无位也。”在“九五，飞龙在天”之时，它的位置最中正；上九处于中正之上，就是非位。《周易集解》引荀爽曰：“在上，故‘贵’；失正，故‘无位’。”它高高在上，超过中正之位，所以称为贵；但是它又“失正”，即失去了中正之位，所以说它是“无位”。

“高而无民”，“无民”是指乾卦第六爻下皆为阳爻，没有阴爻。“阳”一般代表君，全阳无阴，就代表没有人民。君王高高在上，却没有人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贤人都处在下位，却没有人辅佐协助君王。真正贤德之人希望用自己的所学来贡献国家、服务人民。领导者对贤人礼敬有加，贤人才会出来协助领导者安天下；如果领导者没有礼贤下士的态度，傲慢无礼，真正有德行之人就会离他而去，他周围都是谄媚巴结、阿谀奉承之人，这些人称为“厮役”。他所感召的全是“厮役”，贤德之人都不愿意辅助他，他怎么会没有悔闷？领导者因为傲慢，没有礼贤下士的态度，所以得不到贤人的辅助。处于极高之位，没有人民，也没有贤德的人辅助，这样的人如果不谨慎行事，很可能因一个举动、一句话就失去民心，

所谓“一言以兴邦，一言以丧邦”。“是以动而有悔也”，他一旦轻举妄动，就会导致悔闷的结果。

“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其唯圣人乎！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亢”是指只知进取而不知谦退，只知存在却不知衰亡，只知获得却不知丧失。只有圣人，才知晓如何进退存亡而不失正道的道理。

## 功成名遂身退

在位者要懂得谦退，老子说：“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功成名就，把政事做好，大家都知道你的名声，这时就要身退。如果不退，就会给自己招致灾难。所谓“树大招风”“人怕出名猪怕壮”，人如果太出名、太有成就，就会招致嫉妒、诽谤，被人中伤、谋算。

故而在位者要懂得审时度势，知进退之时，即使进取有功，也不可自傲，把所有功劳揽在自己身上。要懂得推功于上，让利于下，即把功劳推给领导者、支持自己的人，把利益分给属下。孔子讲：“惠则足以使人”，要经常给予属下恩惠；下属得到利益，感觉备受重视，才会为领导者所用。这样处于上位之人才不会“贵而无位，高而无民”。

由此可知，审时度势非常重要，不要居功自傲，要懂得谦退。此外，还要小心谨慎，知道有存就会有亡；知道有得就会有失。这样才不会过于傲慢，才能长保己身。古人说“明哲保身”，既明且哲才能保全自身。这不是消极的处世之方，而是在洞察宇宙、自然“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基础上，总结出的正确的为人处世、待人接物的方法。

## 第五十九讲

德比于上则知耻



## 从善如登，从恶如崩

传曰：“从善如登，从恶如崩。”

——《群书治要》卷二十七《吴志上》

“传”指《国语》。《国语》中讲，为善如登山那样艰难，造恶如山崩那样迅速堕落。此句感叹为恶容易为善难。“从善如登”，为什么为善就像登山一样艰难？因为向上攀登，要不断地克服地球的引力。此处将地球引力比喻各种诱惑、吸引，譬如财色名利，这四大诱惑时时刻刻吸引人向下堕落。一个人要向善，就必须克服长期以来形成的习气。习气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所以要克服它同样需要一个过程。而为恶就像山崩那样迅速，甚至是一失足而成千古恨。山崩塌的时候，会因地球引力的作用而迅速坠落。

朱子云：“要做好人，则上面煞有等级。做不好人，则立地便至。只在把住放行之间耳。攀跻，分寸不得上；失势，一落千丈强。学者可不畏哉？”朱子提醒学人，做好人不易，要时刻警醒自己。好人有很多等级，有君子、贤人、圣人，而君子、贤人、圣人之中还有很多等级，可见做好人实在不易。所以古人提醒，“德比于上则知耻”。德行方面要跟古圣先贤比，他们早已经成圣成贤，而自己还是凡夫俗子，因此就生起无比惭愧之心。“做不好人，则立地便至。”如果想做一个恶人，那很容易。善人和恶人“只在把住放行之间耳”，能够把持住自己的德行操守，就能向上攀

登，成为君子、贤人、圣人；如果放逸自己，懒散、放纵、任性，就会成为恶人。而要向上攀登，“分寸不得上”，进一步都非常难，要克服很多诱惑。“失势，一落千丈强”，就像爬山的时候，一旦脚踩空了，一失足成千古恨，会非常迅速地坠落。想到这一点，修学之人怎能不心怀恐惧？所以一定要以战战兢兢的心态对待自己的言行。

历史上有一位张恭懿，他到都察院任职时，廷相王台长对他非常器重，觉得他是可塑之才，所以特别提点他，对他讲：“昨天下过雨之后，我出门看到一车人穿新鞋下了车。他们从灰厂经历长安街，走了很远的路。雨后的地很泥泞，因为穿着新鞋，他们都‘择地而蹈’，选择比较干的地方，恐怕自己的新鞋被泥水染污了，非常小心谨慎；但是他们到了贯城后，道路愈来愈泥泞，偶然一次把鞋沾脏了，就不再像以前那样顾惜自己的鞋子了。”他接着说：“居身之道，亦犹是尔；倘一失足，无所不至矣！”为官、修身之道也是如此，就如同新鞋沾上了泥水，第一次被染污之后，就不再像以前那样小心谨慎了，所以“倘一失足，无所不至矣”。如果第一次把持不好自己，譬如说第一次收了贿赂，或犯下了邪淫，以后恶事连连，就不再顾惜了。张恭懿非常感佩王台长给他讲的这一番话，这是非常好的提醒，所以他终生谨记。这告诉人们，人在作恶之前，能够严守自己的节操，把持得很好，但是第一次放纵了之后，就可能一错再错，很难像以前那样把持自己的操守了。

“从善如登，从恶如崩”提醒人，要克服恶习、惯性，开始都不容易，但是一旦让恶念相续之后，就必有大祸。人了解到这一点，才不敢造恶。“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子孙后代和自己都是一体的，做恶不仅仅毁掉了自己的人生，后代也会因为自己不谨慎的行为而受到影响。所以真正慈爱后代的人，一定能够克服自己的妄念、习气，为后代子孙树立榜样。

## 毋不敬，俨若思，安定辞

《曲礼》曰：“毋不敬，俨若思，安定辞，安民哉！”

——《群书治要》卷七《礼记》

“俨”是恭敬、庄重的样子。《曲礼》说：“毋不敬”，就是对一切人事物没有不恭敬的。“毋不敬”从哪里做起？恭敬心从何处培养？首先从孝敬父母来培养。

《礼记》中记载了许多关于孝敬父母的礼。《内则篇》中讲到儿女侍奉父母的次序：鸡刚叫头遍时，就要立即起床，不能懒惰，如果天亮了还在睡懒觉，家事都留给父母做，就不符合礼；起床之后，洗脸、洗手、漱口，戴上帽子，穿上端服（古代做官的人在正式场合所穿的礼服），再套上蔽膝，系上大带，将笏插好（古人在觐见君主时所携带的长方形记事板叫笏），左右佩戴好饰物。打扮整齐后，来到父母舅姑（公婆）之所，即来到父母公婆所住的地方，和颜悦色地问父母公婆需要什么并恭恭敬敬地将其奉上。要用温柔的面容来呈奉父母，即使父母有了过失，仍然要和颜悦色、低声、温柔地加以劝谏。不能因为父母有过失，就厉声戾气，把父母呵斥一顿。如果谏言、规劝不能被父母所采用，就要更加恭敬、更加孝顺，没有抱怨之心，等到父母高兴的时候，再次向父母进谏。如果父母不高兴，甚至生气，儿女也不敢有怨恨之心。

这一段礼的要求，就是从侍奉父母的过程中，培养起孩子永远不和对立的心，即使自己受了委屈、误解，好心不能被父母所认同和理解，都不可以怨恨父母。这一点现在很多人做不到了，现在父母训导，说得重一点，有时打一下，儿女就与父母怒目而视了，对立心很容易就产生。到社会上，老师稍加斥责都不能接受，何况严加管教。

社会之所以出现悖逆反常的现象，都是失教的原因，人们不知道什

么行为是正确的，什么行为是错误的，积非成是，错误的积累多了，都认为是正常的；而正常的，儿女对父母很恭敬、很孝顺的行为，却认为是不正常的了。

这些现象的出现是因为没有“礼教”，即礼的教育。“礼教”不是所谓吃人的礼教，而是维护人伦关系，让人能够有一个真正幸福美满的人生，使社会安定，国家治理良好的教育。但是现代人认识不到它的深意，还把它批评为繁文缛节，这是不理解礼“防患于未然”的效果。

《礼记》中说：“身也者，父母之遗体也。行父母之遗体，敢不敬乎？”身体是父母给予的、生养的，用父母所给予的身体去做事情，怎敢不恭敬？所以生活起居不庄重，是不孝；事奉君主不尽忠心，是不孝；做官不敬业，是不孝；与朋友相处不诚信，是不孝；上阵作战不勇敢，也是不孝。做不到以上五者，灾祸会殃及父母，怎敢不恭敬？

一个真正的孝子，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会小心谨慎、恭恭敬敬。因为他的心中有父母，生怕自己不谨慎的言行举动，令父母蒙羞。《弟子规》中说：“身有伤，贻亲忧；德有伤，贻亲羞。”为官之人若心里总是想着父母，怎敢贪污受贿？他知道自己一旦锒铛入狱，就会辱没父母祖先的名声，让自己的父母抬不起头来，怎会做出违法乱纪的事情？所以一个人有孝敬之心，可以为自己的人生避免很多的灾祸。

孩子教育不好，要从教育者自身寻找原因。第一，要看教育者和领导者是否以身作则，言行一致。第二，要看教育者是否具有耐心。孩子的习气是长时间养成的，帮他改正习气，要有耐心，要相信“人之初，性本善”，经过不断耐心的引导，终有一天他能克服习气，转恶为善。

现在的一些父母不懂得教育，孩子做出失礼的行为不知纠正。譬如大家在一起吃饭，他看到自己喜欢的饭菜就转到自己面前，不懂得“长者先”。然而不但他的父母不说，姑姑、阿姨看了也不说，还夸孩子活泼。孩子已经十分失礼了，而长辈却夸他活泼，这就致使孩子意识不到自己的

无礼，导致他分不清是非对错。“夸”字上面是一个“大”字，下面是一个“亏”字，意思是，不正确的、过度的夸奖会使孩子分不清是非善恶美丑，从而吃大亏。所以夸人一定要谨慎，不要助长人的傲慢之心，更不能夸他错误的地方，要顺着人的德行去夸奖，而不是顺着他的才能去夸奖。

尊敬父母的“敬”延伸开来，就是尊敬老师，尊师重道是中国的传统美德，孝道和师道是中华文化得以传承的两大法宝。《吕氏春秋》中讲道：“忠孝，人君人亲之所甚欲也。显荣，人子人臣之所甚愿也。”哪一个领导不希望属下对自己忠心，哪一个做父母的不希望孩子孝顺？同理，哪一个属下不希望自己能够得到领导的信任？哪一个儿子不希望自己的声名显达，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然而人君人亲不得其所欲，人臣人子不得其所愿。”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往往是事与愿违，究其原因就是不知理义。“不知理义，生于不学”，不知理义是因为没有学习圣贤经典。

我们在教学过程中也发现，大部分学生的毛病、过失都好纠正，但自以为是、傲慢心重的这一类学生是最难帮助的，在他们心中，自己的能力、学识高于一切人，不将他人放在眼里，故而没有人可以为师。

《吕氏春秋》讲到，现在之人，论地位比不上古代的圣王，论智慧也比不上古圣先贤，加之不敬老师，想要成道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求学、求道，但却不尊师，怎么可能达到预期目的？

《了凡四训》中讲：“与凡年高、位高、德高、识高者，皆当加意奉事。”“年高”是指比自己年长；“位高”，地位、职位高，如领导、主管；“德高”，德行比自己高；“识高”，见识广博。对待这些人都要恭敬，要柔声婉容，且要养成习惯。这种恭敬的习惯，是从对待父母、老师时就已经养成的。

《孟子》中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把这种恭敬心推而广之，以孝敬父母、老师的态度，来恭敬一切与自己有缘的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恭敬别人，同样也会得到别人恭

敬的回报。这是说恭敬心的养成有一定的次序。

孟子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恭敬心不仅仅是对人，还延伸到对一切万物。为什么要学习《弟子规》？《弟子规》整篇教导人学一个“敬”字，譬如“置冠服，有定位，勿乱顿，致污秽”，这是对冠服的恭敬；“房室清，墙壁净，几案洁，笔砚正”，是对房室、学习工具的恭敬；“墨磨偏，心不端，字不敬，心先病。”自己的心不恭敬，自己可能觉察不到，但可以通过周围的环境，物品、衣物摆放得整齐与否，字迹是否整洁清晰来判断自己是否具有恭敬心。

“俨若思”，“言人坐思，貌必俨然”。“俨”是端庄、稳重的样子，是说举止端庄、稳重，像若有所思的样子。《论语》中说：“君子不重则不威。”汉代扬雄《法言·修身篇》中提出做人应该取四重，即“重言，重行，重貌，重好。言重则有法，行重则有德，貌重则有威，好重则有观”。“貌重则有威”就是容貌庄重，让人看了就觉得有威严。在容貌上，孔子教导“色思温，貌思恭”，表情要很温和，表情不仅温和，还很恭敬，这样既让人觉得你很好亲近，但是又不敢造次，对你有敬畏心。为什么？因为自己的容貌庄重有威仪，这样就恰到好处。

“安定辞”，“审言语也”，即言语要审慎。前文提到“言重则有法”，言语庄重，就可以为人所效法。《弟子规》中讲到了言语的重要性：“奸巧语，秽污词，市井气，切戒之。”就是不要讲污秽的言语、欺骗人的话、不诚信的话。一个人的言语特别重要，出言要能够利益别人。“爱语”不是花言巧语、取媚于人、巴结奉承的言语，而是对人有真实利益，能够帮助人提升，能够提醒人并起到教育意义的话。古人说：“力贱得人敬，口贱得人憎。”一个人愿意出力帮助别人，他就会受人尊敬；而一个人言语过多，又说得不妥当，就会遭人厌恶。所以《周易》中说：“吉人之辞寡”，吉祥的人言语很少，因为他的心地清净；“躁人之辞多”，心浮气躁、烦躁不安、思虑过多的人，表现出来的言语也很多。这是提醒人们在言语上要

庄重、谨慎。

《周易》中的这段话，对观察人的言语、了解一个人的性情是很有帮助的。“将叛者其辞惭，中心疑者其辞枝，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诬善之人其辞游，失其守者其辞屈。”将要背叛的人，他的言语就显示出惭愧不安；心中有疑虑的人，他的言辞就分散；吉祥善良的人，他的言辞很少，“吉人寡言语”；“躁人之辞多”，一个人心浮气躁，表现在外就是爱说话，言辞很多；“诬善之人其辞游”，诬陷好人的人，他的言语游移不定；失去操守的人，他的言辞就会屈曲不直，因为做了坏事，失去操守，故而有理屈词穷之感。《了凡四训》中有一句话形容一个人有过恶很多时的一种表现，就是“见君子而赧然消沮”，看到真正有德行的人，他就会感到非常惭愧，不好意思，非常扭捏。因为自己做错了事很惭愧，所以表现在外，他的言辞也是屈曲不直。这是告诉我们，通过观察一个人的言语，也可以了解一个人的品性。

《弟子规》中有很多都是关于言语的要求，譬如“扬人恶，即是恶，疾之甚，祸且作”。如果把别人的过恶到处宣扬，他知道后会对你非常痛恨，也在无形之中为自己埋下了祸根；而且宣扬、揭露别人的过恶，本身也是一种恶，不是有德之人做得出来的。中国古人教导我们要心存厚道，厚道的重要表现就是隐恶扬善，别人做了好事、做了善事，譬如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尊敬师长、待人守信，这样的事例要多多宣传。如果把人的过恶宣传得太多了，就让人们为善失去信心。这怎么可能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古人讲“隐恶扬善”，确实非常重要。

山东电视台有两个很好的节目，一个叫《天下父母》，一个叫《孝行天下》。这两个栏目讲的是孝敬父母、友悌兄弟的事，把人的孝心、感恩之心提升起来，让人相信“人之初，性本善”。

《弟子规》教导人“闻誉恐，闻过欣，直谅士，渐相亲”，即听到别人的赞誉要战战兢兢，要想一想自己是不是有真才实德，配得上人家的夸

赞；而当别人指正我们过失的时候，要非常欢喜，这样做久了之后，那些敢于对你说真话、敢于指正你过失的人就会来到你的身边。这就像你的脸上有一个黑点，别人提醒你，快把它擦了，否则别人看了会笑话你。对这样的人要心存感谢，因为他没有让你在众目睽睽之下出丑。

在日常生活中，因为人们从小已经习惯听赞美之言，所以在与人讲话时，也要懂得讲话的艺术，即便存心是为对方好，但是说出的话，也要使对方容易接受。《弟子规》中说，父母有过失时，做儿女的要劝导，这是责任。但是劝导有劝导的艺术和方法，首先要在父母心情好的时候去劝谏，这样父母比较容易接受；父母若是心情不好，又去指出他的过失，可能马上会让他火冒三丈，更加不耐烦。此外，在指正别人过失之前，要先美其长，先赞叹他做得好的地方，然后再委婉地为他指出：如果你再怎样做，就会更加完美。这样说他人就会容易接受。由此可知，言语确实很重要，可能不经意、不小心说了一句话，但是别人听了之后就耿耿于怀，让彼此产生了隔阂，所以古人说“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古人还说：“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说一句爱语、宽慰、理解、体谅或感恩的话，别人在寒冬腊月里都会感觉到温暖；但是恶语伤人，特别是在盛怒之下说的过分的话，别人深受伤害，就可能耿耿于怀、久久不忘，所以脾气大的人，一般人际关系都不好。平时他可能很讲义气，可以为朋友两肋插刀，但是火气一上来，说几句特别伤人的话，人们就把他以前的帮助全都忘记了，只记住那一句使人伤心的话。

《小儿语》中说：“一切言动，都要安详，十差九错，只为慌张。”这是说庄重对人很重要，慌里慌张就容易出错。《弟子规》中也说：“事勿忙，忙多错。”忙是出错的原因。

庄重体现在很多方面。《礼记·玉藻篇》中说：“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声容静，头容直，气容肃，立容德，色容庄。”“足容”，是行走时要像大象一样四平八稳，非常稳重、缓慢不急躁。曾国藩经常教

导弟子：“要走路慢，说话慢，吃饭慢。”这是教导孩子在日常生活中培养稳重的作风。古人说“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一个人的定力达到这种程度，无论发生了什么意料之外的事情，他都知道如何应对，不会慌里慌张。

“手容恭”，坐的时候手容恭敬，要敛手；“起脚敛手”，在走路的时候手容同样要恭敬。

“目容端”，“目”是眼睛，“端”是端平，端正即目光不要向上，也不要向下，否则会显得轻视傲慢，或者自卑、心不在焉。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人的心里有傲慢或是刻薄，表现在眼睛上会不一样。人在说话的时候，若是眼睛骨碌乱转，说明这个人心思复杂，心动得很快。

“口容止”，“止”是停止的止，说话要适可而止，要给别人表现的机会。“吉人之辞寡”，说话不要太多，应说的说，不应说的一个字都不要说。

“声容静”，说话的声音不要过高，不可大声喧哗。

“头容直”，“直”就是不歪斜，要端正。我们在与人说话交流的时候，不要把头侧在一边。

“气容肃”，就是喘气声音不要太重，要给人一种肃静的感受。

“立容德”，站立的时候不能倚在一边，一定要端正，给人一种有德行的感觉。

“色容庄”，也就是容色要庄重，给人威仪的感受，别人就不敢轻慢，这就是“君子不重则不威”。

“毋不敬，俨若思，安定辞。”“毋不敬”，对一切人事物都没有不恭敬的；“俨若思”，举止端庄稳重，像若有所思的样子；“安定辞”，谈吐安稳，安详稳定，条理分明。最后一句话说“安民哉”，以上这三件事都做到了，这样才能安定人民。

## 在上不骄，制节谨度

位已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禄已厚而慎不敢取。

——《群书治要》卷四十三《说苑》

本句源于春秋时期的一个典故。孙叔敖出任楚国令尹即楚国宰相时，全城的官吏百姓全都来祝贺，但一位老人却身穿粗衣，戴着白帽，向他吊唁。孙叔敖不仅没有生气，而且很谦虚地问：“楚王不知道我德才不佳，以致使我忝居高位，受官民们的责骂，现在大家都来祝贺，只有您最后来吊唁，难道是有什么道理要讲给我听吗？”老人说：“有。身已贵而骄人者，民去之；位已高而擅权者，君恶之；禄已厚而不知足者，患处之。”老者为他讲了三句话：身份显贵但是对人傲慢的，百姓会离开他；职位很高而独揽大权的，国君会厌恶他；俸禄已经优厚却不知满足的，灾祸会跟随他。孙叔敖听后非常受教，他再次向老人行礼，说道：“恭敬地接受您的教诲，我还希望听到更多的教诲。”老人就说了这句话：“位已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禄已厚而慎不敢取，君谨守此三者，足以治楚矣。”怎么样才能保持自己的高官厚禄？爵位很高，但是态度却愈来愈谦恭；官愈做愈大，但是内心却愈来愈谨慎；俸禄丰厚，就要更加小心，不敢妄取。如果你谨慎地坚守这三条，就能治理好楚国了。

爵位愈高，代表责任愈大、担子愈重，如果不谦恭谨慎，就会失去人心，没有助缘，自己做什么都很难成功；官愈大愈要谨慎；得的俸禄愈来愈丰厚，就要更加珍惜，不可以权谋私、贪污受贿，否则一旦锒铛入狱了，官位、俸禄也就一同失去了。古代皇帝、大臣都能够学习这些教诲，所以他们为人处世时特别地小心谨慎、谦恭有礼。

赵匡胤在登基当天，带着文武百官跪拜他的母亲，感激母亲抚育、教育的恩德，所有的臣子也都祝贺皇帝、祝贺他的母亲。但是他的母亲杜

太后，在整个过程中都面色严肃，臣子们看到后觉得很奇怪。母以子贵，儿子当了皇帝，做母亲的应该高兴才是，为什么这么严肃而沉重？于是就有大臣向太后请教：“您的孩子这么有成就，当了皇帝，您应该高兴，为何反而非常沉重？”杜太后说：“假如他当了皇帝，能为百姓造福，那百姓都会支持他；假如他做了皇帝，就像前面五个朝代的皇帝那样，我希望他不要做皇帝。为什么？因为这五个朝代的皇帝，他们做了皇帝骄傲奢侈，最终他们的统治被推翻了，不仅如此，他的子孙都被杀了。所以假如当皇帝不能为天下万民着想，只是自己贪图享乐，过骄奢淫逸的生活，以后连做百姓的机会都没有了，有什么值得高兴的？”杜太后很会抓住教育的时机，在皇帝登基，大家满心欢喜庆祝的时候，说出这一段意味深长的话，相信赵匡胤听了以后一生都会铭记在心，一生都会按照母亲的教诲来治国。

## 第六十讲

道也者，不可须臾离



## 自强不息，忠信待人

“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何谓也？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

——《群书治要》卷一《周易》

“乾乾”，自强不息的样子。“惕若”，“惕”，警惕、戒惧；“若”，语助词，没有实意。“厉”，危险。“无咎”，“咎”含有咎害、灾病、罪过的意思。这句话的意思是，君子整天勤奋不懈、自强不息，直到夜晚也警惕戒惧，即使处于险境也能避免祸害。为什么这么说呢？孔子说，君子要增进道德、建立功业。忠诚信实，由此可以增进道德；对人民大兴文教，自己以身作则，保持真诚，由此可以积蓄功业。所以处在上位不骄傲，处在下位也不忧虑，能整天勤奋不懈，随时警惕戒惧，虽处于险境也能避免祸害。

“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此句是解释“九三”的爻辞。“九三”是在下体之上，即下卦的最上一卦，而在上卦之下。他处在这个位置上，就要求“终日乾乾”，每一天都自强不息，即使到了夜晚，也一样警惕戒惧，这样才能够避免危险，即使处于险境也能够避免祸害。

“子曰：‘君子进德修业。’”意思是，君子处在这个位置上，要随时增进道德、建立功业。怎样增进道德、建立功业？后面讲，“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忠”字上面是一个“中”字，下面是一个“心”字，“中”是不偏不邪。古人解释“忠”为“尽己之谓”，就是竭尽全力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把自己的本分尽到。“信”，是一个单人旁加一个“言”字，人言为信，人所讲的话必须诚信，所以言语信实，不欺人，亦不自欺才叫“信”。

“忠”代表负责尽职，竭忠尽智，用古人所说的话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夙夜在公”。魏徵编辑《群书治要》这本书，就做出了“忠”的榜样。他接受了唐太宗的命令，要编辑一部供太宗作为施政参考的书。魏徵用了五年的时间，呕心沥血，从一万四千多部古籍之中，精挑细选出了六十六部。又从六十六部书中，把有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精华挑选出来，用短短五十卷、五十万字的篇幅，就把唐朝以前的经史子的精华概括出来了，所以这一部书被誉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中的精华。如果从这一部书入手学习传统文化，确实用力少而效果好。这本书编辑完成之后，呈给唐太宗，唐太宗每一天手不释卷地阅读，并且这样评价道：“使我致治稽古，临事不惑，卿等力也。”使我遇到事情不迷惑，能够考察借鉴古代的经验，都是得益于这本书，这是你们的功劳。

忠后面讲信，忠信。古人对“信”强调得很多。《弟子规》中说：“凡出言，信为先。诈与妄，奚可焉。”凡是说过的话都要认真负责，要兑现，不能够说欺骗人的言语。还说“事非宜，勿轻诺。苟轻诺，进退错”，若是在承诺的时候，考虑得不是很认真，很多条件还没有成熟，就轻易答应、承诺了，但是事后仔细想想，这件事不容易达成。所以答应了别人之后却无法兑现，就会让人感觉自己说话不诚信，办事不牢靠。久而久之，就会失去别人对自己的信任。

讲信用对于一般人而言都至关重要，对于国家领导者而言，讲求信

用就更加重要。《群书治要·孙卿子》中有一段话，道出讲诚信的必要性。“齐桓，晋文，楚庄，吴阖庐，越勾践，是皆僻陋之国也。震动天下，强殆中国，无他故焉，信也。”本句讲了历史上几个著名的称霸天下的君王，像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他们都是身处僻陋，即偏僻狭小之地的国君，但是后来为什么能够威震天下，使那些中原诸国都感受到威胁？就是因为他们能够讲求信用，“是所谓信立而霸也”。正是他们建立了信用，所以才会称霸于诸侯。

“不务张其义，济其信，唯利之求，内则不惮诈其民而求小利焉，外则不惮诈其与而求大利焉，内不修正其所以有，然常欲人之有。”“不务张其义”，不致力于伸张正义。“济其信”，“济”是成就，成就他的诚信。“唯利之求”即唯利是图。“内则不惮诈其民而求小利焉”，在内不恐惧、不担心欺诈人民，追求小利。“外则不惮诈其与而求大利焉”，“与”是和他结交的国家。在外不顾一切地欺诈和他结盟的国家，追求大利，对于这样的作为不惶恐，也不担心。“内不修正其所以有，然常欲人之有。”在内不尽力地治理自己已经拥有的，譬如国土和人民，而“常欲人之有”，而常常想去侵占别人所拥有的。

“如是，则臣下百姓莫不以诈心得其上矣。上诈其下，下诈其上，则是上下析也。”如果这样做的话，他的臣子和百姓就没有不以欺骗之心来对待君主的。君主欺骗臣民，臣民欺骗君主，这是上下分崩离析，没有同心同德，上下相欺。“如是，则敌国轻之，与国疑之，权谋日行而国不免危亡。”这样敌国一定会轻视他，和他结交的国家会怀疑他，权术阴谋日渐猖獗，以致国家不可避免地出现危机，甚至导致灭亡。

可见，导致灭亡的原因就是没有遵行道义诚信，专门靠玩弄权术阴谋来治国。此地就强调对于领导者而言，要治理好国家，赢得人民的信任，自己首先要诚信，这是最重要的。故而古人非常强调“信”，所以说“信立而霸也”，诚信是这些人成就霸业的根本原因。

“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在《周易正义》中解释：“辞谓文教，诚谓诚实也。外则修理文教，内则立其诚实，内外相成，则有功业可居，故云居业也。”这句话讲建功立业的方法是“外则修理文教”，即以文化人，就如现在经常讲的加强文化建设。什么叫文化？文化的本质就是以文化人。“文”是文章、文字、礼乐、曲调、诗词歌舞，乃至建筑、雕塑等。它们都起到教化人民的作用。譬如读一篇文章，听一首歌曲，看歌舞表演、戏剧小说、电影、电视剧，都能够净化人的心灵，提起人的孝心、忠信之心、感恩之心，使人转恶为善、转凡为圣、转迷为悟，变化人的气质。

古人说，“读书贵在变化气质”，“三日不读书，面目可憎”。古人所读都是圣贤之书，书里所讲的都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的道理。不仅仅书、文章宣传能够引导人们建立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意识，包括人们所看的戏剧，所听的诗词歌赋，无一不起着引导人们培养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作用。古代的妇女，很多人没有读书，但是她们却知道孝敬父母公婆、礼敬丈夫、教育子女，知道忠孝节义，这也许就是从平时的戏剧、歌舞等俗文化学来的道德观念。俗文化并不是内容低级下流的文化，而是以通俗易懂的文艺形式，如快板、相声、二人转等人们乐意接受的通俗的方式，传播正能量。传达积极向上的内容，这才是“文化”的意义。所以“修辞”二字，说明古人特别重视文化教育，“建国君民，教学为先”，这样才能够把人们的理念导正。这是从外在方面来看。

从内在方面要“立其诚”。古人说“上行下效”，如果仅仅教化人民，让人民去做，领导者自己做不到，人民就会认为这是愚民政策。如今道德教育之所以不得力，就是因为很多人认为传统文化、儒家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用来愚昧被统治阶级的精神鸦片、精神武器。既是这样认为，也是这样去做的。很多人认为道德教育是老百姓该学习的、是教育老百姓的，作为领导干部高高在上，可以不必学习，这一观念是造成当今道德教育不能

取得预期效果的一个重要原因。

古人恰恰相反，认为建立一个国家，领导一国百姓，教育是最重要的。如果把人都教好了，人人都讲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还有什么社会问题是不可解决的？社会问题看似很多，其实是枝叶花果，社会问题的根本就在于人心坏了，人的良心泯灭了。所以只有人们都有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意识，这些问题才够迎刃而解。例如，如果把孩子的孝心、感恩心培养起来，就不会发生不孝敬父母的问题；把企业家的诚信之心树立起来，就不会出现假冒伪劣产品、食品安全的问题；如果把官员的廉耻之心培养起来，就不会有贪污受贿、以权谋私的事情发生。关键在于人们对于道德教育的重要性，没有足够的认识，对于道德教育的规律，掌握得不够清楚，所以误以为道德教育不得力。实际上遵循规律的教育，才是行之有效的。

这个“教”，言传、身教都包括在其中，而身教更胜于言教，所以内要“立其诚”。中国古人讲“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一个人只要专心诚意去做，什么疑难问题都能解决。子贱治理单父的时候达到了“不忍欺”的境界，老百姓不忍心欺骗他，就是因为他有精诚之心，感化了当地的百姓，他起到了君亲师的作用。古时讲究“诚”，无论是对人民，还是对君主，都要有诚心。子贱所表现的，就是对人民的精诚之心。

“是故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处在上位而不骄傲。为什么不骄傲？“一阴一阳之谓道”，“阴极则阳生，阳极则阴生”。如果一个人发展到了极致，就要走向衰落。如果在上位又骄傲，一定物极必反，盛极必衰，自己离灾祸也就不远了。处在下位而不忧虑。为什么不忧虑？因为古人读书明理。《论语》中说：“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之，求为可知也。”不要担心没有发挥自己的才能的位置，只要进德修业、精勤不懈，一定会步步高升。所以要担心自己如何提升德行、能力来立德、立言、立功于社会，能够为人民、国家，乃

至天下带来真实的利益。“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不要担心自己的名声不够显扬，天下的人不知道自己。如果有担心，那还是一种好名、自私自利之心。“患所以立”。应该有什么德行和能力来有所建树，为人们带来真实的利益，这才是自己要努力的方向，所以“在下位而不忧”。

“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周易正义》解释：“处事之极，失时则废，懈怠则旷，故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整天勤奋不懈，非常小心谨慎地进德修业，这样，虽处于险境，也能够避免祸害。九三在下卦之上，是下卦的最上一爻，“在下卦之上体，是处事之极至也”。这是到达了极致，如果“失时不进”，浪费时间，不知进德修业，“则几务废阙”，那你就不能够再向上提升了。“所以乾乾须进也”，愈是在这个时候，愈要勤奋不懈，谨慎小心。如果懈怠，事业就会“旷”，“旷”就是被废弃了。“既处事极，极则终也，当保守已终之业，若懈怠骄逸，则功业空旷，所以乾乾也。”当事业已经发展到了极致、极端，要谨慎小心地把事业保持下去。如果不能够谨慎小心，反而走上骄奢淫逸、懈怠懒散的路，事业就不能得以保持，以前的努力也都前功尽弃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更加不敢懈怠。

## 格物致知，慎独修道

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

——《群书治要》卷七《礼记·中庸》

“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道”，《中庸》讲“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道和性是联系在一起，顺性而行就是道。既是

“率性之谓道”，修道怎么修法？“不可须臾离也”。“须臾”最短的时间，通常指一刹那或是一弹指那么短暂。就是在须臾之间也不能离开道，不能做和心性相违背的事。

《中庸》中讲：“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喜怒哀乐没有发出来的状态，称为“中”，这是本性的状态。但一般人很难体会，所以就退而求其次，求“和”的状态，即喜怒哀乐发出来，但是没有过分，能够守住礼的要求，达到和，这就是次一等的境界。喜怒哀乐，无论哪一种都能把人的本性长远地蒙蔽起来，让人在生死当中受到种种的痛苦，对于自己的人生无法做主。所以既然要修道，就要把这个状况改变过来。《大学》中说“格物致知”，要从格物上下真功夫，如果有一丝一毫的懈怠就谈不上修道。这是从浅处讲“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

从深处讲，人的本性具有“竖穷三际，横遍十方”的特点，无论是从时间还是空间，它都是无穷无尽的。既然性是无穷无尽的，哪里能够离得开它？真正了解这个道理，就知道“道”无处不在、无时不在。

“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君子”是学道、学圣、学贤之人、学中庸之道的人。怎样学法？要“戒慎乎其所不睹”。“戒”警戒，“慎”谨慎。“其所不睹”，“其”指别人；“所不睹”，即看不见的状况。像一般人总是在人很多的时候，人能看见自己的时候，行为举止有所约束、不敢随便、不敢违礼；但在没有人看见的时候，一般人就随便，就放纵了，想怎样做就怎样做了，以为别人看不到，放纵自己也没有关系。但此处提醒人们，愈是在没有人看见的地方，愈是要警戒、谨慎。如果你是学道之人，那就要和一般人不一样。一般的人、不学道的人，可能在没人看见的地方无所顾忌，就是在很多人看见的时候，也不在乎，做一些不道德的事情，可以说是明目张胆，这样的人就不足道了。要学做圣人，做一个明白人，要想回归自己的明德本性，就不能像一般人那样随

便。愈是在人看不见的地方，愈是要警戒恐惧。

“恐惧乎其所不闻”，“不闻”别人听不到的地方。“不闻”细说起来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一个人在独处的时候，没有跟任何人谈话，别人也听不到自己；另一种情况是和人秘密地谈话，没有外人听得到，这也是不闻。还有更深的一层含义，就是没有把言语表达出来，但是在心里起了念头。心里起的念头叫动机。机就是指念头，念头微微一动，动这个念头是为自己求利益，还是为大众、为天下？如果想追求自己的利益，但与他人的利益有冲突时，就想方设法地阻碍别人、损人利己，这个念头一动起来，别人是觉察不到的。这个念头一动起来就叫动机。言语没有说出来，就是不闻。虽然没有说出来，只要这个动机、念头一出现，就等于是言语发出来了。为什么？因为一切法从心想生。念头一动，外面境界就跟着动。明了这个道理，就一定要感到恐惧了。

一般人讲，只是想一想，有什么恐惧？就拿国家的法律来比喻，法律上讲犯罪，有已遂罪，有未遂罪。已遂，譬如说抢东西，东西抢到手了，这是已遂罪。未遂就是去抢了，但是没有抢到手，虽未到手，但是有了抢劫的行为。虽然未遂，但是有了这个行为，也是有罪的。假如只是心里想抢东西，念头一起，行为没有表现出来，虽未触犯法律，但是已经起心动念。犯罪的心理一起来，自己就知道，知道之后，虽然国家的法律不管你，但是你确定起了抢劫的念头，这就不是率性，就和性相违背了。为什么要“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因为修道的根本是修心，“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如果起了这样的念头，就已经离本性很遥远了，也就背离了成就圣人的目标。

“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见”字在此处读“现”，意思是出现。“显”是显现。“莫见乎隐，莫显乎微”，“隐”，最隐秘的地方。最隐秘的地方，也是最容易让人看见、最显现的地方。“见”是被人发现，自己认为最隐秘了，即使如此，也是最容易被人发现的。“莫显乎

微”，“微”，是最微细的地方，同样也是最明显的。“故君子慎其独也”，如果明白这个道理，君子即使在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也十分谨慎，这叫“慎独”。

古人讲：“独行不愧影，独卧不愧衾。”譬如，读书人独自在外面散步时，月光照着他，影子投射在地上，这时没有人看见他。他若是起了一个不好的念头，如写了一本书，想着这本书出版后能够轰动，自己能很快成名，好名的念头就起来了。“独行不愧影”，一个人独自散步的时候，起了贪名之心，都会愧对自己的影子。睡觉时要盖被子，古人称被子为“衾”。独自睡觉，心里的念头，都不能离开道。一离开道，譬如说起了一个邪念，虽然没有任何人知道，但是所盖的被子知道，所以不能够起一点点的邪念。如果起了邪念，就会愧对所盖的被子。“独卧不愧衾”，一个人睡觉时对自己盖的被子都没有惭愧之心。这是讲君子慎独的功夫。

为什么要慎独？前面讲“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最隐秘的，也是最容易发现的；最微细的，也是最容易显露的。真正的修道人，不等别人来发现，自己就会约束自己。所以当自己起了一个不好的念头时，就要在这上面用功克除。

孔子曾感叹：“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古人修学是为了提升自己的境界、灵性，能够最终明明德，是为己之学。现在的学者修学是“为人”，背诵、学习经典是为了夸耀自己有学问，让别人赞叹，这是为人之学。

修道之人如果是为了别人而修，就会怕别人指出自己的毛病习气，当然，这也很难得。更难得的是，不是为了怕别人说自己，而是从内心要求自己要向圣人学习，最终成圣成贤。所以如果怕别人说自己不是修道的人，很可能是假装做出好样子给别人看，在人所看见、能听到的地方表现的是一个样子；在人后表现的是另一个样子。那是做表面的功夫，不是慎独。假装修道，装模作样地给人看，目的就是博得一个好名声而已，这是

求名、好名的人，不是真实的修道。真实的修道，是从自己的起心动念来修，控制自己的念头，任何念头起来的时候，自己都要知道。

孔子在《周易·系辞传》中特别赞叹颜回：“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也。”孔子赞叹颜回是因为颜回“其殆庶几乎”。庶几，“几”是动机。动机就是机一动就知道，这是圣人的境界。“庶”，差不多，他和圣人的境界差不多。圣人是“知几”，就是当念头微微要动还没动的时候，圣人就知道了，此时就能让它不动，圣人有这样的功夫。贤人是“庶几”，也就是念头一动起来的时候，他也知道。一知道动机是不善的，它就不再起来了。孔子是“知几”，孔子已经到了纯善的地步，他可以不起一切不善的念头。颜子是“庶几”，也就是起了一些不善的念头，但是一起来他马上知道，就可以把它止住，虽离圣人还有一段距离，但这个境界也已经很高。

而我们无论是离孔子的境界，还是离颜子的境界都差得很远。虽然很远，但自己要知道用功的方法。怎样用功？要慎独，要知道修正自己的念头，特别是修道的人，要明白古人所说的“天人合一”。天是自然界，周围的一切环境等。天人合一，就是人和自然界是一体的，即心灵和物质都是一体的，人的念头会影响宇宙自然；宇宙自然、环境也会影响人的心灵。既是一体，当自己起了念头，不仅仅是一切人、一切动物能知道，自然界的一切物体，桌子、椅子、水杯，全都知道。

明白了这个道理，就知道为什么要慎独了。慎独要从自己的起心动念处开始。念头起来的时候，不要认为他人不知道，因为圣人知道，天地知道，桌椅板凳全都知道。汉代儒学大家扬雄说：“高明之家，鬼瞰其室。”自己在最隐秘的、最微细的地方，就认为自己很高明，没有任何人知道，但是天地万物看得清清楚楚，圣人也看得清清楚楚。为什么圣人能看到？因为圣人的本性已经完全开发出来，本性无处不在。我们的心理就在圣人的本性之中，圣人的本性也在我们的本性之中。所以自己产生了迷

惑颠倒的念头，凡夫不知道，是因为凡夫念头太多，心太杂，感受不到，但是圣人知道。

所以《大学》中说“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十”是形容多。实际上，是圣贤都在看着自己，谁也瞒不了，所以必须慎独。了解这个道理，就要戒慎恐惧，每产生一个不好的、错误的念头，都要赶快把它打消掉。

## 慎守行之四仪

行有四仪：一曰志动不忘仁，二曰智用不忘义，三曰力事不忘忠，四曰口言不忘信。慎守四仪，以终其身。名功之从之也，犹形之有影、声之有响也。

——《群书治要》卷三十六《尸子》

“行有四仪”，“仪”是法则、标准、准则。言行有四个准则：一是遵循志向的过程中，不忘仁爱；二是运用智能时，不忘道义；三是恪尽职守时，不忘忠诚；四是开口说话时，不忘信实。能谨慎地遵守这四个准则，终生不忘，名誉和功业自然会随之而来，就像身形有影子相随，声音发出会有回响一样。

这里讲言行有四个准则，“一曰志动不忘仁”。“志”是心之所至，也就是起心动念。人要立志，这个志不要离开仁。《论语》中说，“仁者爱人”，不能自私自利，要想着为人民服务，为国家、为天下服务。

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要把仁作为自己的志愿和任务，把行仁作为自己的使命。在中国历史上，为什么知识分子、为官之人有这样的志向，开口都是讲天下而不局限于国家？原因就是他们从小读圣贤书，受圣贤的熏

陶，所以能够胸怀天下，心系国家。

“智用不忘义”，当运用智慧、能力的时候，不能够离开道义，一定要用在正确的地方。

“力事不忘忠”，“尽己之谓忠”，做事的时候，一定要尽心尽力地把事情办得完美，竭心尽智，这叫忠。

“口言不忘信”，一开口说话，一定要言出必行、信守承诺。不能随便答应别人，转头就忘，这样是不负责任的表现，久而久之，就让他人对自己丧失了信心。

## 第六十一讲

君子不重则不威



## 言必有防，行必有检

君子口无戏谑之言，言必有防；身无戏谑之行，行必有检。言必有防，行必有检，虽妻妾不可得而黷也，虽朋友不可得而狎也。是以不愠怒，而教行于闺门；不谏谕，而风声化乎乡党。《传》称“大人正己而物正”者，盖此之谓也。

——《群书治要》卷四十六《中论》

“君子口无戏谑之言”，“戏谑”是开玩笑。“行必有检”，“检”，约束。“黷”，褻渎，即轻慢、不恭敬。“愠怒”，恼怒、生气。“盖”，大概。这段话的意思是：君子开口不说玩笑的言语，说话必定防范约束，自身没有玩笑的行为，行为必定检点谨慎。说话防范，行为谨慎，即使是妻妾也不敢因亲近而无礼，即使是朋友也不敢因熟悉而轻慢。所以君子不用严厉训斥，而身教就能影响整个家族；不用规劝告诫，而良好的风气就能教化整个乡里。《孟子》中称赞“圣人端正己身，而身边的万事万物也会随着端正”，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论语》中有一句话说：“君子不重则不威。”汉代扬雄在《法言·修身》篇中提出做人应该取四重，即重言、重行、重貌、重好。“言重则有法，行重则有德，貌重则有威，好重则有观。”一个人的言语庄重，也就是此处说的“口无戏谑之言”，开口不说玩笑的言语。“言必有防”，说话

一定有约束、有防范，他的言语就会为人所效法。《弟子规》中有很多关于言语的论述，譬如“奸巧语，秽污词，市井气，切戒之”。言语之中不要夹杂秽污的词，即能引起人邪思邪念的言语，巧言令色的言语，只是外貌伪善但没有内心仁德的巧言、欺骗人的话，不诚信的甚至还有勾引诱惑的话等，都是应该避免的。

孔子以四个科目来教导学生，“孔门四科”首重德行，言语第二，然后才是政事、文学。所以说话特别体现一个人的修养。如果言语讲得好，可以让人产生恭敬之心，也能使彼此更融洽地交流，更好地了解，使彼此之间的关系更和睦。如果言语不慎，可能无形之中让别人对自己产生了不敬之心，产生误解，甚至憎恨。

“行重则有德”，行为很庄重，有所检点、约束，这就体现了一个人的德行和修养。一个人的德行修养如何是骗不了人的，明眼人看得一清二楚。什么原因？平时的言语形成了习惯，所谓习惯成自然，所以装也装不像。《格言别录》中提道：“青天白日的气节，自暗室屋漏中培来；旋乾转坤的经纶，自临深履薄处得力。”这提醒人们，一个人崇高的气节是在独处的时候，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做到言行一致，对万事万物有恭敬心，逐渐培养出来的。不要小看生活中的细节，细节也是大学问。“旋乾转坤”，是能够扭转乾坤的能力。从哪里开始打基础？从“临深履薄处得力”。面对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能谨慎、恭敬地对待，这样才能够办大事，因为这种谨慎的态度已经在生活的点点滴滴之中积累起来了。《弟子规》告诉我们，“执虚器，如执盈”。捧着空的容器，也要像捧着盛满水的容器一样小心谨慎。一个人如果有这样恭慎的态度，那么把什么事情交给他处理都能够放心。如果把贵重的照相器材、摄像器材等交给年轻人照管，很多人可能会不太放心，因为知道他从小没有形成谨慎、爱物的态度，所以可能会把很贵重的东西乱扔、乱放、乱碰，这样的人是很难承担重任的。

《论语》中孔子教导颜回，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言语、行为都要符合于礼的节度，不符合礼的行为坚决不做。就像现在个别领导干部，做了很多违背礼的行为，说了很多不适当的、违背礼的言语，结果被人拍下来，把这些不当的言论、行为传到网络上，结果一日之间让自己身败名裂，甚至还因此受到党纪国法的惩处。

“貌重则有威”，容貌很庄重，让人看到感觉有威仪。中国古人讲要坐有坐相，坐如钟；站有站相，立如松；走也有走相，行如风；甚至睡也要有睡相，要右卧如弓。如果一个人的容貌庄重、不轻浮，就会让人肃然起敬，不敢有非分之想。

“好重则有观”，“好”指爱好，像中国古人从小学习的琴棋书画，这些爱好都很高雅，很有可观之处，令人赏心悦目。琴棋书画培养了一个人温和、安静的性情。学习琴棋书画的目的是让人不再心浮气躁，让心安定下来。所以好的爱好可以帮助自己提升德行、心性；而不好的嗜好，恰恰相反，会摧残自己的身心。古言道：“勿以嗜欲杀身，勿以财货杀子孙。”不好的嗜好随时在损害自己，如有的人好色，好色过度，给自己的身体带来损害，面黄肌瘦不说，还会因此患上性病等。一个人有好色的嗜好，往往给自己带来身心的不和谐、不健康。此外，很多人好赌、嗜赌，结果赌得倾家荡产。所以就有很多人一出澳门赌场的门，就从桥上跳下去自杀了，因为还不起巨额的高利贷，家产都赌光了，最后不得不走上绝路。这都是不好的嗜好摧残人心所导致的。

“勿以财货杀子孙”，留一大堆的钱财给子孙后代，结果子孙后代为了钱财去争夺，这就害了子孙。《三字经》中说：“人遗子，金满籝；我教子，唯一经。”这才是有智慧的父母。父母要留什么给子孙？要留经典，要留好的教诲给儿孙，还要留德行、留风范、留智慧给儿孙，这比金钱更有价值。司马光早就提醒人们：“积金遗于子孙，子孙未必能守。”现在一些人不读古书，也没有汲取古人的经验智慧，自己赚了很多钱，贪了很多钱，自己

舍不得花，把钱留给子孙后代，希望为他们的事业奠定一个基础。但是古人早就提醒，假设你的儿孙有德行、有能力，他们会用自己的德行和能力创造财富，留钱给他们就没有必要。如果你的儿孙无德无能，即使把钱留给他们，他们迟早都会败散掉，留钱给他又有什么用？

“积书于子孙，子孙未必能读。”古书都是圣人心性的流露，所以每读一遍都有不同的感受，每读一遍都有不同的体会，都有助于自己境界的提升，所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再把所学的经典运用到社会生活中，观察我们身边的人和事物，一看都符合，验证了经典上的规律，所以学起来身心都喜悦。现在的一些年轻人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坐下来认真读一读古书，所以也体会不到古人所说的“不亦说乎”。

“不如积阴德于冥冥之中，以为子孙长久之计。”告诉人们要传家风。如果自己表现出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德行，这种德行也会潜移默化地影响自己的儿孙，可以庇荫儿孙千秋万代。历史上，孔子的后代传承了两千多年，八十多代不衰，他留给儿孙的是德行。范仲淹的后代，传承到今天代代都有贤人出现，他留给后人的是风范。当看到历史上的圣贤人物，自己也要反思，现在人都在讲人生规划，我们都希望自己的家业、家道传承千年不衰，那我们应该用什么来教导子孙？一定要让他们学习圣贤文化，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将所学运用到工作生活中，他们就可以身心和谐、家庭和谐。

## 多言多败，多事多患

戒之哉！无多言，多言多败；无多事，多事多患。安乐必诚，无行所悔。

——《群书治要》卷十《孔子家语》

这段话的意思是：千万要引以为戒！不可多话，多话容易因轻慢而说错话，最后招来祸害；不可多事，多事容易因心浮气躁而做错事，最后引来祸患。处于安乐时要提高警戒，不要做会让自己后悔的事。

《孔子家语》中记载着一个故事。孔子带着弟子们去周家观礼，来到了供奉周家始祖的后稷庙，到了庙门口时，看到一个金人塑像，这个金人的塑像很特别：他的口被封了三重，背后还刻着字，也就是“铭”。这个铭上写的是“古之慎言人也”，这个金人是个慎言之人。有一个成语叫“三缄其口”，就是来自于这个典故，提醒我们对言语要非常谨慎。后面就是这段话：“戒之哉！无多言，多言多败；无多事，多事多患。安乐必诫，无行所悔。”大家一定要警戒！不要多说话，言多必失，过失也会增多。不要多事，事情一多，人心就很难定下来，考虑不周密，就会做错事，给自己招来忧患。即使生活在安乐的环境中，也一定要戒慎恐惧，不要做任何令自己后悔的事。

接着说：“勿谓何伤，其祸将长；勿谓何害，其祸将大；勿谓不闻，神将伺人。”不要认为没有什么损伤，它引起的祸患将一天一天地增长；不要说没有什么损害，那引起的祸患将继续扩大；更不要认为没有人知道，神明正在暗暗观察着人的行为。

这里有几个比喻：“焰焰不灭，炎炎若何？”这个火苗是火焰，在初起的时候，你不去扑灭它，等到熊熊烈火的时候，又该怎么办？“涓涓不壅，终为江河。”涓涓细流，不去堵塞，或许终究会汇聚成大江大河。“绵绵不绝，或成网罗。”绵绵的细丝，不予斩断，或许就会织成网罗。“毫末不扎，将寻斧柯。”毫末就是指草木刚刚萌芽的时候，这时不将其拔除，将来想拔除的时候就必须寻用大斧。这都是通过比喻，反复地强调防微杜渐、谨小慎微的重要性。

“诚能慎之，福之根也；口是何伤，祸之门也。强梁者不得其死，好胜者必遇其敌。盗憎主人，民恶其上。”确实能够慎重行事，就确立了福

佑的根基；不要认为巧言强辩没有什么损伤，它正是致祸的门径。好勇斗狠的人往往得不到善终，争强好胜的人一定会遇到强敌。中国人说“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还说“恶人自有恶人磨”，如果你是一个恶人，最终一定会遇到比你更恶的人把你制服。这正如“盗憎主人，民恶其上”一样自然而然，就像这个盗贼不喜欢碰到这个财物的主人，百姓也总是怨愤他们的上级长官。

“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众人之不可先也，故后之。温恭慎德，使人慕之；执雌持下，人莫逾之。”君子深知不能够位居天下人之上，所以甘居人下；深知不可位列天下人之先，所以退居人后。这都是明哲保身。古人说：“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这不是贬义词，这是在观察了宇宙人生的规律基础上，做出的一种智慧的选择。宇宙自然之道是有日就有夜、有寒就有暑、有春夏就有秋冬、有潮涨就有潮落，物极必反，盛极必衰，消极必长。所以他不是处处居人先，是温和恭敬、谨慎仁德，使人倾慕自己的德行；示弱守下，人们也就不可能凌驾于自己之上。

“人皆趣彼，我独守此；人皆惑惑，我独不徙。”“人皆趣彼”，也就是人人都奔向别处。现在的某些人就是如此，他们追名逐利、争强好胜、崇尚竞争、夸夸其谈，都是在做这样的事。“我独守此”，只有我坚守此处。坚守什么？不敢为天下先。与人无争，于世无求，把名利都看破放下。“人皆惑惑，我独不徙”，别人都是东奔西走时时转移，心无定处，我却坚定不移。为什么我有如此坚定不移的心？就是因为明理，理得心安。现在社会上的人无论贫富贵贱都身心不安，忙忙碌碌地去妄求，追名逐利，心浮气躁，原因就是不明理。古人告诉我们：“但行好事，莫问前程。”明白了这个道理，就处处助人为乐、成人之美、广结善缘、心存善意，你的未来就是祥和、幸福、安宁的，命运也会愈来愈好，不用忙忙碌碌地奔走转移。

“内藏我智，不示人技。”把智慧深藏在内心深处，不向别人显示自

己的技能。人的嫉妒心很强，看到你有智慧、有技能，生怕你能力超过了他、名声超过了他、影响超过了他，所以会想方设法地阻碍你，不让你出头。所以即使有智慧、有技能也要收敛，要韬光养晦。“我虽尊高，人弗我害，唯能于此。”即使处于尊贵的地位，别人也不会伤害我。为什么？就是因为我能明了这个道理，能够坚守此道。“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戒之哉！戒之哉！”上天不论亲疏，却只扶助那些行善之人，一定要警戒！要以此为戒！

“孔子既读斯文，顾谓弟子曰：‘小子识之，此言实而中，情而信。’”孔子读完这篇铭文，回头对弟子们说：“你们这些年轻人一定要记住这些教诲！这些话说得很具体又很中肯，合乎情理而又有说服力，很信实。”这主要是提醒我们言语要谨慎，言多必失。

《常礼举要》中说：“口为祸福之门”，说话一定要谨慎，要经过一番考虑后再说。一个人的吉凶祸福大半都决定在口上。譬如，很多人喜欢夸夸其谈，卖力地夸耀自己。所谓的自夸就是希望别人知道、肯定自己，他自己并没有实质的德能。这样做的目的虽是让别人恭敬自己，但本质上是出于怯懦，在别人面前感到有压力，所以才要展示自己所没有的，或者比自己实际具有的更好的东西，结果往往给自己带来了更大的压力。

观察今天的社会，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世界，一些高声叫卖的人，他的东西往往是比较差的。如果有人炫耀他的优越性，我们就要懂得，这往往证明他并不具备这种优越性。这种优越性无论是他的学识、勇气，还是财富，或者社会地位方面的成功，我们都可以从他的夸耀中推断出他在这些方面往往是一无所有的失败者。一个真正具有能力并且实现人生成功的人，是不会大肆渲染自己的成功的，因为他满足于自己实实在在拥有的一切。如果在别人面前炫耀自己已经拥有的，结果很快就会失去自己所拥有的，或者这些东西会给自己带来许许多多的挫折。在生活中你会发现这样一个规律，如果在别人面前夸耀自己拥有什么，或者什么东西给自己带

来了什么样的好处，刚夸完，可能很快就失去了自己所夸耀的东西，或者这个东西给自己带来了很多的烦恼和不必要的挫折。所以要注意，一定不要讲虚言，自夸会很快被人识破，一旦被识破，就会给自己带来巨大的不安。

《周易》中讲“括囊”，“囊”是古人的布袋，把布袋的口扎起来，代表人的口不要乱讲话，就像布袋的口用绳子给扎起来，里面的东西就出不来了，所以说说话一定要谨慎，不能胡言乱语，言多必失。

人在做事的时候心要镇定、不浮躁。《弟子规》中说：“事勿忙，忙多错。”愈快，事情愈多，愈容易出岔子、出漏洞，欲速则不达。曾国藩教导子弟做事要慢，要四平八稳，像大象那样稳重，说话要慢、吃饭要慢、走路要慢，这样的人才有定力，有稳重感，容易让人产生信心。

《周易》中说：“吉人之辞寡。”吉祥的人说话都是很少的，但他说话能说到点上。说出的内容是心理的表达，凡是牵扯到人与事，就会关系人的利害，关系事情的成败，所以说说话之前要想一想，这些话说出来对人是有利还是有害。有修养的人一想就知道了；没有修养的人，或是一时没有注意的时候，话冲口而出，其实无形之中已经给人造成了伤害。

“戒之哉！勿多言。”“言”不仅仅是说话，还包括写文章，发表各种言论都要慎重。有的人往往把别人伤害了自己还不知道，而对方知道了就会有报复的行为。所以《弟子规》中强调：“扬人恶，即是恶。疾之甚，祸且作。”把别人的过恶到处宣扬，批评别人、挑剔别人的过失，别人知道了就很怨恨，一有机会就会报复。有时候即使对方不知道因为你的话使他受了损失，譬如，因为自己的一句话，给他人的名誉、权利造成损失，这也要承担责任。

反之，若是讲话小心慎重就会带来好处了，如看到别人有忧虑，你去劝解、开导一下；看到别人有恐惧，就去宽慰一下；看到一个人受了委屈诽谤，说一句公道话，仗义执言，为人解围，这样都是有功的。

有一句关于言语的成语：“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这一典故出自《论语》。《论语·颜渊》篇中讲道，“棘子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这句话是说，君子讲本质就可以了，为什么要那么多的文饰，讲求那么多的礼貌？这句话表面上看来好像影响不大，道理做事也通，说君子讲本质就好了。但是子贡却说：“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可惜啊！老夫子你这话错了，为什么说错了？因为君子不是如此，君子是文质彬彬，不仅仅讲求本质好，而且也注重外在的形式和礼貌，也要讲文。虽然只讲文而不讲质是正确的，就像商店的导购小姐，见人就微笑，见面就鞠躬，但是她们中有的人心里并没有对对方发自内心的恭敬，这就是只有文而没有质，这是不对的。但是只讲质而不讲文，也是不对的。所以子贡说，君子就应该是文质彬彬，既讲求内在的本质纯朴，也要讲外在的形式、礼貌，两者调和得恰到好处，才是君子。评论君子，话说出去了，说错了，就驷马难追，所以子贡说“驷不及舌”，不正确的言语说出去之后，用四匹马拉的车子也追不上。所以就有了这句成语：“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这是提醒人们，话一说出去，是非善恶就确定了，后悔也来不及了，所以开口讲话之前要三思。

《论语·子张》篇中记载：“君子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君子一句话说得好，他人会觉得你有智慧；一句话说得不好，人家就认为你没有智慧。因此言语很重要。言语代表了人的心理、修养和学问，所以说话不可以不谨慎。

颜渊问仁于孔子，孔子回答说：“克己复礼为仁。”克除自己的欲望，返回到礼的要求，这就是仁了。颜回很好学，他就说：“请问其目。”请给我详细地讲一讲具体的条目，如何落实在生活中。孔子就讲了四句话：“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非礼勿动。”视听言动都要符合于礼的要求。其中有一条就是非礼勿言，说话要符合礼。礼的内容包括很多，最根本的就是要恭敬他人，不要损害他人，这个全都是礼。凡是不符合于

礼的话就不能说。

还有，虽然所说的话没有针对个人，但是可能会伤风败俗，影响社会大众的心理，这个罪过就更大了。比如，从事媒体传播、新闻行业的人，他们所传播的内容，如果误导、损害了公众的心理，这个罪过就大了。所以媒体人要特别小心谨慎，包括报纸、电视、广播、网络媒体的从业人员，最好都学习传统文化。如果人人都明了言语的重要性，他应该知道应该怎么下笔，话在说出去之前，文章在发表之前，都要慎重考虑一下，以这样的态度从事传播事业，才不会破坏社会风气。

## 君子慎密而不出

子曰：“乱之所生也。则言语为之阶。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机事不密则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群书治要》卷一《周易》

“阶”是途径、缘由、凭借的意思。孔子说，祸乱的产生，是以言语作为途径，君主出言不慎就会失去臣子，臣子出言不慎就会惹祸上身，甚至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机密大事不慎泄露就会造成危害。所以君子谨慎守密而不随意出言。

“乱之所生也，则言语为之阶。”祸乱、混乱、败乱之所以产生，都是有言语做阶梯、做凭借。“乱”，小到混乱，大到祸乱、败乱，都包含在其中。谁乱了？首先是说话的人自身乱了。一个人说话不符合礼，讲的是挑剔、指责、毁谤、批评的言辞，还有勾引、诱惑、欺骗、挑逗的话，这些话出去之后影响就很大，让自己的心已经不在正路上了，自己的心首先乱了，已经被习气所控制了。

不仅自己混乱，听到这些话的人心也会乱。不好的话说出去，不仅

影响了自己的情绪，也影响了别人的情绪，无益于别人德行修养的提高、身心的清净，反而还让对方的情绪一落千丈，影响了他人的清净心。此外，被说的人听到之后心也乱了。如果被你批评、毁谤的人，没有一定的修行，得知你在背后说他的坏话，诽谤、中伤他，他一定会愤愤不平，想着打击报复，他的心也乱了。祸乱产生都是因为言语不谨慎，所以讲话一定要谨慎。

中国人有句话：“家丑不可以外扬。”为什么家丑不可以外扬？因为把家里人际关系不和睦的事情讲给别人，别人会感觉到你家庭不和睦，就有机可乘，就可能进一步挑拨离间。家人知道你在背后讲他的坏话，也发自内心地痛恨你，家庭就更不可能再和睦了，家庭的败相就出现了。

一个真正有德行的人，一定是希望家庭成员之间团结互助、和睦相处，因为家和万事兴。一个团队有没有发展，要看团队成员之间是互相称赞还是互相诋毁，这是团队成败的关键。有德行的人知道团队气氛的和谐比什么都重要。

在日常生活中，假使听到别人谈论自己，或者是在背后批评自己，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譬如有人告诉你，某人在背后说你坏话，我们第一反应可能就是为自己找借口，或是非常生气，进而又去诽谤、反驳别人。中国古人说“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是面对别人的诽谤、面对别人不实的言论应该采取的正确态度。历史上有很多这方面的事例，值得我们借鉴，所以一定得多读史，读史会增长见识，也开阔自己的心胸。北宋时期有一位宰相王旦，所谓“宰相肚子能撑船”，这位宰相的心胸确实非常宽广。王旦做宰相时，寇准经常批评他，结果批评得太多，皇帝都有些看不过去，就对王旦讲：“寇准经常挑你的毛病。”听到别人在背后批评他，王旦是怎么回应的？王旦说：“皇上，我当宰相这么久了，一定会有很多过失，寇准是爱国，所以他才会批评我。”他不仅没有生气，反而还肯定对方。试想，皇帝听完这句话，是不是会对他更加信任？如果是满朝

文武知道了这件事，会不会对他更加佩服？他为文武百官做出了一个好的榜样。所以，面对别人的批评，自己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不能火冒三丈，要有度量接纳别人的批评甚至毁谤。

“君不密则失臣”，“君”指领导者。领导者对待一件事情，本来应该低调保密的，若是他不小心说出去，就会招来人的嫉妒。为什么？因为人的嫉妒心是比较严重的。所以做领导的低调，反而是保护属下。就像改革的时候，会牵动很多人的利益，往往就会遭遇阻碍，所以很多事情就需要慎密地进行。古人说“事以密成”，特别是重要的事情，要低调地去做，过早地透露消息，往往会招致很多阻碍。

“臣不密则失身。”一个人在工作过程中，要和周围的人进行充分沟通。如果沟通不够，别人因为不理解和你产生了对立，你又不能接受，情绪一上来，就会使事情恶化。所以圣贤人劝导人们，要“和颜爱语，劝谕策进”。一定要和颜悦色地和别人沟通，沟通得要充分彻底，让别人了解我们做事的意图，这才是做事正确的方法。

“机事不密则害成”，一些重要的机密大事不慎泄露，也可能会妨碍它的成功，甚至还会造成灾害。所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君子做事都是谨小慎微，而且不随便出言，考虑得非常周全。

## 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

夫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是以圣人犹难之，故终无难。

——《群书治要》卷三十四《老子》

“夫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随便、轻易地许诺，必定很少能够讲求信用；把事情看得太容易，必将遭遇很多的困难。这都是因为不谨慎所导致的。即使是圣人处事，都抱着艰难之心，所以终究没有患难之事。

《弟子规》提醒人们：“事非宜，毋轻诺，苟轻诺，进退错。”在答应一件事情之前，首先要慎密地考虑，这件事是否能答应。如果这件事不适合允诺，但是却轻易地答应了，就会进退两难。譬如有的人喝醉酒了，喝得很高兴，一拍胸脯说：“这件事你放心，包在我身上了”。结果第二天酒醒了，才发现这件事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容易，但是已经答应了，不办又会失去信用，办又很难办到，这样就会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所以不要随便地许诺。随便许诺的人，往往不能够信守承诺，很少能够讲求信用。

《论语》中说：“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君子在言语上应该迟缓，在行为上要敏捷、雷厉风行。为什么不要轻易地言语？下面讲，“多易必多难”，一开始认为这件事太容易了，考虑不周，后面就会出现很多的困难，这都是由于不够谨慎所致。

现在很多国家采取民主选举。民主选举的候选人在演讲的过程中，为了获得更多的选票，会想方设法地承诺很多选民的要求，把话尽量往漂亮处讲，大家一听他讲得挺好，就都去投他的票。这就是没有圣贤教诲做指导的原因。如果学习了“多易必多难”，即一个人认为事情很容易，而且很轻易地许诺，就很难兑现自己所承诺的话，这样，选民就不会轻易选举这样巧言令色的人。因为巧言令色之人只是致事于言语的好听，但没有真才实德，没有内心的仁德。在实际生活中，那些真正做事的，很多都是默默无语的人。他们很努力地将事情做好，却不去表功，也不善于自夸，但往往很多重要的事情都是由这些人做出来的。所以《论语》中说：“有言者不必有德”，一个人的言语很好，但是不一定证明他就有真才实德。所以孔子提醒，既要听其言，还要观其行。“君子不以言举人”，不要因为这个人说得很好听，就对他委以重任。如果他对你做出了很多的承诺，但是事后都不能够兑现，再后悔就为时已晚。

所以不守信用实际上是一个人没有德行的表现。古人讲仁义礼智信，“信”是做人最起码的品德要求。但是现在很多人，都不认为不讲信用是

一种道德低下的表现了，说谎骗人、随意答应别人、不守承诺已经习以为常了。

古人说一句话，他一定要想方设法做到，所以不需要签合同，就能够取得信任。在《季札挂剑》中记载，季札出访时路过徐国。他身上带着一把宝剑，是出访的信物。徐国国君看到这把宝剑流露出喜爱之情。季札看出徐国国君对这把宝剑的喜爱，所以他在心里暗暗许诺，等出使任务完成之后，回来再路过徐国时，就将这把宝剑赠送给徐国的国君。但是他出使回来路过徐国时，徐国的国君已经过世了。季札就到徐国国君的坟前，把这把宝剑挂在他坟前的树上，然后在坟前恭敬地顶礼，默默地离开。他的童子看了就说：“您没有必要这样做，徐国的国君已经过世了，而且您也并没有说出来要把宝剑送给他。”季札说：“我在内心中已经承诺了，不能因为徐国国君过世了，我就违背了自己内心的诺言。”季札只是内心对人许下了的承诺，都不愿意违背。

古人认为，不守信用是一个人没有德行的表现。《傅子》记载：“不修行崇德，则不得此名，不居此位，不食此禄，不获此赏，此先王立教之大体也。”如果一个人没有高尚的德行，就不让他获得好的名声，不能居于官位，不能获得俸禄，也不能获得封赏，这是先王立教的根本。为什么这样立教？“夫德修之难，不积其实，不成其名。”因为德行的修养是很困难的，没有长期克己复礼、格物致知的修养功夫，就没有实际的德行，也就不能成就好的声誉。“夫言撰之易，合所悦而大用。”但是无论谈话、提高演讲能力和写作水平，相对于德行的培养而言，都是容易的事情。如果一个人因为能够获得君王的喜爱，做事合乎君主的心思，就很快被提拔重用，结果会如何呢？“修之不久，所悦无常，故君子不贵也。”修学言语（包括演讲能力、写作能力）的时间不需要太久，不像修学德行需要日积月累的功夫，需要每一天反省自己、提升自己。而且君主的喜好也会不断地变化，不同的君主、领导人在位的时候，喜欢的做事思路 and 方式也不

同，所以变化无常。君子不会通过言语投合君主的喜好来获得官位。而是通过修养德行，使自己的名实相符，做到实至名归。

《了凡四训》中讲：“世之享盛名而实不副者，多有奇祸。”在世间享有很盛大的名声，妇孺皆知、家喻户晓的人，但是却名不副实，即名声与实德不相匹配，这样的人多有意想不到、突如其来的灾祸。古人明白这个道理，所以面对名利都是推让，不敢居名，也不敢居功自傲。但是现在人却不明白这个道理，没有真才实德，还想方设法地去宣传自己。结果伪造了很多假文凭、假证书、假政绩，一经揭露，自己便身败名裂，这也是“世之享盛名而实不副者，多有奇祸”。所以人最重要的是要反省自己、检点自己：自己的所作所为和名声是不是相匹配？如果不相匹配，就要战战兢兢，改过自新，使自己的名实相符。

## 第六十二讲

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 益者三乐，损者三乐

孔子曰：“益者三乐，损者三乐。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益矣。乐骄乐，乐佚游，乐宴乐，损矣。”

——《群书治要》卷九《论语》

“佚游”，指出入不节，放纵游荡而没有节制。本句意为：对人有益的好事有三种，对人有害的好事也有三种。喜好以礼乐来节制举止，喜好赞扬别人的善行，进而引导众人见贤思齐，喜好多结交贤德益友，可以使人受益；喜好以尊贵、才能骄人，喜好散漫游荡，喜好沉迷宴会饮酒、寻欢享乐，这都会使身心受到损害。

“三乐”的“乐”，一种读音是“yào”，是喜爱、爱好的意思；一种读音是“lè”，当喜乐的意思，在古代也读“luò”。

“益者三乐”，有益之乐有三种。“乐节礼乐”，是以礼乐节制为乐。讲礼乐有什么可欢喜的？其实人人都喜欢“乐”，在人的本性中就有，譬如，人在开心时喜欢唱歌。人有心事，就想散闷气。音乐就是人的情感的表达。平常人都有这种喜好，只是他不会选择。圣人作乐，目的是调整人的情感，将其往好的方向引导，与现在的流行歌曲有很大不同。《礼记》中说：“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先王制礼作乐的目的，并不是满足人们耳目口腹的欲望，

而是教导人们培养起正确的好恶观，返回到做人的正路上来。所以，音乐并不是单纯的娱乐，而是起到了教化人心的作用。

礼是出自人的本性。譬如，有人无缘无故地瞪你一眼，打你一下，你会不会感到高兴？如果你自己知道不高兴，就要懂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就是一个懂礼的人。你不愿意接受的，别人也不愿意接受。礼讲的是秩序。譬如，同一条街上的狗，互相之间都比较和善。但它们会欺负外来的狗，甚至群起而攻之，因为关系也分远近厚薄。人对自己的儿女、亲友，自然会比较关爱，爱自己的儿女，关心、照顾、体谅都要比一般的陌生人多很多，这是人之常情，这是可以接受的。所以礼讲等差，为什么讲等差？因为这是自然而然的秩序。

“乐节礼乐”，“礼”讲的是秩序，“乐”讲的是和谐。人天长地久地生活在礼乐之中，彼此恭敬、内心和谐，这是人生快乐的事。一个人能以礼来节制自己的言行，言行就会恰当而不过分，就能做到“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人们希望自己走到哪里都能受人欢迎，人际关系相处和谐。怎样达到这个结果？要“敬而无失”，对每个人都恭敬，为人处世能为对方着想，彬彬有礼，看到对方的需要，没有什么过失。

孔子说：“不学礼，无以立。”《弟子规》就是最起码的礼。如果人不学《弟子规》，不懂得人与人交往最起码的礼节，进退无度，不知道何处该进，何处该退，在社会上就寸步难行。力行《弟子规》的人，走到哪里，都能受到长辈的欢迎，领导的喜欢和重用；不懂得力行《弟子规》的人，可能就会受到排斥，甚至不能与人和睦相处。所以《弟子规》的扎根教育特别重要。

要学习礼乐，用礼来节制自己的言行，用乐来调和自己的情绪。《中庸》中讲：“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什么是“中”、什么是“和”？“喜怒哀乐之未发，

谓之中”，喜怒哀乐还没有发出来的状态，称为“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喜怒哀乐都发出来了，但是都没有过分，有一定的节度，符合于礼的要求，就称为“和”。所以古人制礼作乐，是为了引导人的性情，不要太放纵，不要太过分，这对自己有莫大的利益。对于音乐，孔子特别重视。他到一个地方，还没有看这个地方的政事办得如何，先听一听当地流行什么样的音乐，就知道此地的社会风气如何了，所以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

《晏子春秋》记载，有一次，齐景公没有上早朝。晏子上朝时看到杜扃等候在朝堂前。晏子就问：“君王为什么没来上早朝？”杜扃回答说：“君王整夜未眠，所以没有来上朝。”晏子又问：“为什么君王整夜未眠？”杜扃回答说：“梁丘据（齐景公身边一位善于谄媚巴结、奉承的臣子，特别知道投人所好。齐景公喜欢什么，他就进奉什么）进献了一名叫虞的善乐之人，结果这个人把齐国的古乐篡改了，君王整晚都在听新乐，所以没有来上朝。”晏子知道这个情况，马上就依照礼法，把这个善乐的人关了起来。

齐景公听到之后非常生气，就问：“为什么将虞关起来？他昨天给我唱歌，唱得很好听，我很高兴。”晏子说：“因为他用靡靡之音祸乱君心。”齐景公又说：“诸侯外交的事务、治理百官的政务，我都已经交给您管理了，您把这些事管好就行了，至于我喝什么酒、听什么音乐，希望先生就不要干涉了。再说音乐为什么一定非得听古曲？”晏子回答说：“古乐消亡，礼法就会随之消亡；礼法消亡，政教也会随之消亡；政教消亡，国家便会跟着消亡。音乐跟国家的兴亡是息息相关的。听靡靡之音会导致国运衰败，我怕君王背离政教行事。”他又为齐景公举了历史上的人物作为例证。“就歌乐来说，纣作的《北里》，周幽王与周厉王听的乐曲，都是淫靡鄙下的，所以导致了国家衰亡，君王您为什么要轻易地改变古乐？”齐景公听晏子说得很有道理，马上就说：“很不幸，我这个不才之人拥有了国家的政权，但我却不够谨慎，不假思索就乱讲话。您讲得有道理，我愿意

接受您的劝告。”可见，一个国家，特别是国君喜欢听什么样的音乐，对于国运有着莫大的影响。

“乐道人之善”，这个“道”，有的版本写作“导”，这里不当“道”即“说”的意思讲，而是当引导的“导”字讲。“乐道人之善”，就是以导人向善为乐事。譬如，自己喜欢学礼乐，也引导别人一起学礼乐，一同往善路上走，必得大益。我们如果能落实《弟子规》等传统文化经典，在外面做事的时候，就会少受些讥讽。如果自己不懂礼，如何去引导别人？自己不正，又怎么能使人正？所以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所谓的“正”，就是要使人端正，那怎样使人端正？“子帅以正”，你率领大家去做正确的事，大家自然会跟着你做正确的事，没有人敢不做正当的事，这就是讲“上行下效”。

能以礼乐引导他人，自利利人，又是一件乐事。譬如，蘧伯玉耻独为君子。蘧伯玉羞耻单单自己是君子。如果整个环境都是坏的，唯有自己好，是没有这个道理的。整个社会环境都是坏的，我们身处其中，无形之中也必然受到它的影响。所以要改变整个环境，改变整个社会的风气，才能让自己真的好，使自己的家庭、家人都不受污染。如果自己真好，周围的朋友都会受你的影响而变化，所以他人没有变好，就是自己不好。俗话说“观友而知其人”，为什么观察一个人所结交的朋友，就知道他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周易》中说：“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志同道合，有同样气质、特点、喜好的人，自然会成为朋友。所以能引导自己周围的人都去做好人，这是第二种乐趣。

“乐多贤友”，以多得贤友为乐事。中国人说：“多一个朋友多条路。”朋友是五伦当中重要的一伦，人在社会上离不开朋友，朋友愈多愈好，“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但是一定要选贤者为友，这样才能对自己真正有益。“益矣”，即你在社会上走这样一条路，对你便有好处。所以交友不能不谨慎。

下面说的是对自己有伤害的事，即自己不能做的。“乐骄乐”，以骄为乐。不管是以富贵骄人，还是以学问骄人，都对自己有损害。一个人不知道骄傲有损害，反以为乐，而且以能得到骄乐为乐，那么他所得的损害就可想而知了。骄，人人都有，富与贵，以及有学问的人都容易骄傲。即使没有钱的乞丐，都有一种掩饰不住的傲慢之心。如果做小官的人一心为百姓，就是君子；做大官的人若是唯利是图、以权谋私，甚至还侵害百姓、祸害国家，也是小人。

《尚书》中说：“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骄傲给自己带来损害，谦虚让自己受益，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道理。一旦一个人骄傲了，认为自己比别人强，就不会再有好学的品质，人生也很难进步。

谦虚之人在事业上往往比较容易成就。谦虚好学的人，会遇到很多人主动帮助他、教导他。

春秋时期，齐国的宰相晏子有一位驾马车的属下。一天，当他为晏子张开车盖的时候，车夫的妻子正好从门缝里往外看。结果看到她的丈夫趾高气扬、非常得意。车夫回到家后，妻子就要和他离婚。车夫觉得很奇怪，就问妻子：“你为什么要和我离婚？”他的妻子很有智慧，就说：“晏子身高不到六尺，可是他在齐国能做宰相，名誉传遍了天下的诸侯国，但是我看他出门的时候，态度谦和，好像自己不及他人的样子。而你身高八尺，是为晏子驾车的奴仆，但是你却表现出一副高傲不可一世的神情，所以你只适合做一个卑贱的人。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我看不到你的前途、看不到希望，就要离你而去了。”此后，车夫转变了态度，变得很谦下。晏子看到他的行为突然改变，就觉得奇怪，问其原因。车夫就把事情的原委原原本本地禀告了晏子。晏子很赞赏他能改过自新，就推荐他做齐国的大夫。

“乐佚游”，以佚游为乐。佚游的含义很广泛，依王肃的批注：“佚游，出入不知节也。”“佚”，是出入没有固定的时间。在古代，在位者打猎都

有一定的时节。如果出入没有节度，生活无规律，工作无秩序，一切都会陷于混乱之中。所以不论居家处事，还是饮食起居，都不能没有次序，必须有规律。

一个人的工作生活最好可以列出时间表，做到作息有次序、工作有计划。人生短短数十春秋，每天二十四个小时如果安排不好，确实很容易虚度。有一首偈子这样说：“二十四小时，八时床上眠”，八个小时都是在床上睡眠中度过的。“三餐费三点，加刷牙洗脸，冲凉大小便，需要一个钟。”三餐饭三个小时过去了，再加上刷牙、洗脸、漱口、洗澡、上厕所，也需要一个钟头。“午休小动作，又花一小时。读报看电视，电话并聊天，至少三小时，还有别事情。”一天二十四个小时，除了拉拉杂杂的事情，吃饭睡觉的时间等，就所剩不多了，如果不珍惜，这一天就很容易空过。修学要懂得珍惜时间，“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

“乐宴乐”，就是以宴会为乐。朋友酒食聚会，不可久留，如果以此为乐，对于身心都有损害。

《左传》中记载，鲁庄公二十二年（前672年），陈国发生了动乱，太子御寇被杀，公子陈完流亡到齐国。齐桓公想任命陈完做卿。陈完辞谢说：我是流亡到齐国的人，您能收留我，对我就是很大的恩惠了，我怎么敢接受这么高的官位？他推辞不受。于是齐桓公就任命他做了工正，即主管工匠的官衔。陈完就接受了。随后陈完就请齐桓公喝酒，两个人喝得很高兴，不知不觉就到了晚上，齐桓公就说：“我们点上灯接着喝”。齐桓公还没有喝到尽兴，如果是普通的人，为了投其所好，一定会答应他的请求，但是陈完却没有答应。他说：“我只是选择了在白天招待您，没有选择在夜晚招待您，所以不敢听从您的命令。”这一句话就把齐桓公委婉地拒绝了。接着陈完陈述了拒绝的理由：“酒以成礼，不继之以淫，义也。以君成礼，弗纳于淫，仁也。”酒是帮助完成礼仪的，不能没有限度地喝下去，这才符合义，才是适宜的。能让君主完成礼，同时又不饮

酒过度，这才是对君主真正的爱护，这是爱惜君主的身体。话说到这种程度，齐桓公当然不好意思继续喝酒了，一场酒席也就到此结束了。

即使对于国君的要求，如果不符合礼仪，不是一个好的表率，古人都会婉言谢绝。中国人有一句话说“无酒不成席”，酒是帮助完成礼仪的，绝对不是以此为借口喝得酩酊大醉、满足口腹之欲，这才是中国的“酒文化”。

什么是文化？能上升到文化层次的，一定是“以文化人”，要能变化人的气质，使人转恶为善、转迷为悟。酒是表达敬意、表达感恩的，如果喝得过分了，使一个人变得糊涂了，喝醉之后，胡言乱语、吐了一地，就失去了领导者的风范，没有了威仪就令人轻视，那怎么能称为文化？这就使变化气质变化到相反的方面去了。中国被称为礼仪之邦，凡事都强调要符合于礼的节度，不能太过分。《朱伯庐家训》中说：“宴客切勿流连”，半夜喝酒就更加不对。

后面说“损矣”，也就是说如果犯了这三条，就有损自己的身心。这些都和修身有关。而平天下，使天下太平，都是以修身为本，所以这三条也和齐家、治国、平天下密切相关。什么是最高明的管理？把自己管明白了，就是最高明的管理。如果连自己的修身都成问题，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更谈不上。所以在《群书治要》这本专门讲中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智慧的书中，大部分内容都是关于修身的，因为修身是治国的根本。

## 俭以养德，仁以待人

君子以俭德避难，不可荣以禄。

——《群书治要》卷一《周易》

这句话的意思是：君子应以节俭为德，避免灾难，不要以追求利禄

为荣。《论语》中说：“以约失之者鲜矣。”“约”俭约。孔安国注：“奢与俭约，俱不得中也。”“中”是中道，所谓中道就是恰到好处。奢侈与俭约这两者都不得中道，都不是恰到好处。但是“奢则骄溢招祸”，“溢”，像水一样泛滥出来了。人如果非常奢侈，自己骄满，必然招致很多的祸患。“俭约则无忧患也”，俭约则没有后患。

孔子的意思是说，凡事最好能按照中道来做，如果不能把握住中道，有所偏失，也要有一个选择，与其奢侈，不如节俭。奢侈当然是有偏失的，过分俭约也有偏失，但是俭约的失与奢侈的失相比较，俭约的失相对而言比较少。所以孔子说：“以约失之者鲜矣。”为什么俭约相对于奢侈而言，偏失相对比较轻微？

唐朝诗人李商隐总结历史兴衰成败的规律，写了《咏史》，其中谈道：“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观察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企业、一个政党，之所以能够兴盛，无一例外，都是因为勤俭持家。后来为什么败亡了？也无一例外是因为过分奢侈、过分浪费，以至于入不敷出所致。古人说：“至要莫如教子。”家中再有钱，也抵不过一个败家子破败。因为他喜欢吃山珍海味、穿名牌，还有很多不良嗜好，如好色、饮酒，以及赌博。结果因为这些不良嗜好，就把万贯家产很快败散了。

中国人还有一句话：“由奢返俭难。”一旦一个孩子过上了骄奢淫逸的生活，让他再返过头来过勤俭的生活，就不太容易了。为了满足自己不断膨胀的欲望，他就要去和别人竞争，甚至还要去贪污受贿，走上违法乱纪的道路。

古人说“俭以养廉”，人不能廉洁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欲望太多，奢侈浪费所致。所以中国人特别讲究礼，礼就是让人把自己的欲望限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古人也把礼比作为河水的堤坝。如果河水没有了堤坝，洪水泛滥造成的危害必然很多。如果认为礼没有用，而把礼废弃，那么它所招致的灾祸比堤坝被废除还要严重得多。礼被废除后，导致的是人欲泛

滥，物欲横流。礼有防患于未然的效果。

中国人把节俭看得很重要。古人说：“少年得志大不幸。”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就生活得奢侈浪费，往往这一生还没有走完，因为奢侈浪费的习惯，就把家产败光了。

《礼记·表記》中，有一句类似的话：“俭近仁。”我们以前经常讲“力行近乎仁”，仁是两个人相处之道，想到自己，就要想到对方，能换位思考、将心比心，这样就能做到仁。所以“力行近乎仁”很好理解，即时时刻刻能关心对方的需要，为对方着想，你经常这样做，就能具备仁心了，就近于仁。为什么在这里又讲“俭近仁”？“俭”，就是做一切事情都从俭，不要劳烦很多人。

学仁要从恕道做起。《论语》记载，有弟子来问为仁之方，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忠恕就是为仁之方。经常以这样的态度来处事，就离仁不远了。

俭约除了节省不奢侈的意思之外，还包括说话办事啰唆，这也和仁道不太接近。啰唆都要有一个对象，那个对象就会感到麻烦。所以说说话办事啰唆的人，没有为对方着想，他和仁道也就离得愈来愈远。

## 以道交者，天荒地老

故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坏。

——《群书治要》卷七《礼记》

“醴”是甜酒。君子之间的交往淡如清水，小人之间的交情蜜如甜酒。君子之间交往虽然平淡，但是却能互相成就；小人之交虽然亲密，却容易互相败坏。这句话提醒人们，君子应该谨慎择友，来成就德行、提升道业。

首先分别何谓君子，何谓小人。君子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助人为

乐、成人之美。他没有自私自利之心，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帮助、成就别人、提升别人，和这样的人交往，就像清水一样，没有负担，因为他不图名利，亦无所求，他所做的就是尽己所能来帮助别人。小人最大的特点就是自私自利，以自我为中心，为了自私自利，还想着去谋算别人，自己得不到利益就郁郁寡欢，这样的人经常处于忧戚的状态。君子为什么坦荡荡，就是因为君子没有自我，没有自私自利之心。“小人长戚戚”，就是把自己的利益摆在最首位，以自我为中心。

“小人之接如醴”，既然小人都是自私自利的，做事情都是以自我为中心，与人交往都是有求的。求什么？无非是财色名利而已。所以“小人之交如醴”，彼此之间经常在一起宴会，吃喝玩乐，唱卡拉OK，交往很频繁。如果目的是从你那里求利，这叫酒肉朋友。君子之交淡如水，君子纯粹以道义相交，所以轻松自然、天长地久。

近年来一些落马贪官的忏悔书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词就是“交友不慎”。事实一再证明，有些官员就是因为择友不慎，在人生之路上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因此改变了自己一生的命运。有一个因职务犯罪而落马的官员在狱中这样告白：一个人有什么样的朋友，就有什么样的生活，甚至就有什么样的人生。人际关系、朋友交往看似小事，实为关键。好的朋友不会带你步入误区，甚至在你迷途时当头棒喝，促你清醒。而不好的朋友，从一开始就注定在坏的方面影响你，诱发你人性中罪恶的一面，使你意志消沉，甚至沦为罪犯。他这一段迟来的忏悔，道出了人生交往的真谛。权力是存在于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之中，所以掌握着大小权力的领导干部要特别注意，一旦拥有权力之后，有些人是把你当成资源来开发的，如若权力寻租和“资源”开发一拍即合，早晚会出事。行贿的，人人都是垂钓者；受贿的，个个死在鱼钩上。所以一定要多结交仗义执言的诤友、肝胆相照的挚友、患难与共的密友，少交口蜜腹剑的佞友、投其所好的损友、唯利是图的恶友。

## 亲附善友，时时有润

故曰：“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即与之化矣；与不善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亦与之化矣。是以君子必慎其所与者焉。”

——《群书治要·孔子家语》

“芝兰之室”，放有芝、兰等香草的房间。“鲍鱼之肆”，卖腌鱼的店铺。意思是，与善人相处，就像进入了有香草的屋子，时间一长就闻不到香气，这表示自己已经融入其中，与香气同化了；而与不善之人相处，就像进入卖咸鱼的铺子里，时间一长就闻不到臭味，与臭味同化了。因此，君子一定要谨慎地选择朋友与环境。

《孔子家语》记载，孔子说：“我过世之后，子夏的德行会与日增进，而子贡的德行却会一天比一天地减损。”曾子就问：“为什么？”孔子说：“子夏喜欢与比自己贤德的人相处，而子贡恰恰相反，喜欢与那些不如自己的人交往。”

孔子接着说：“不知其子，视其父；不知其人，视其友；不知其君，视其所使。”如果你不知道这个儿子怎么样，就观察他的父亲；如果你不知道这个人怎么样，就观察他所结交的朋友；如果你不知道这个君主怎么样，就看他所指使之。或者说，你不知道这个领导怎么样，就看他的下属。观察这些人，就知道他本人如何了。

《群书治要·孙卿子》中说：“夫人虽有性质美而心辨智，必求贤师而事之，择贤友而友之。”这个人虽然禀性质朴、美善，心智非常聪慧，但是也必须要求得贤师学习，选择贤友交往。为什么？“得贤师而事之，则所闻者尧舜禹汤之道也。”如果你真正得到贤明的老师，并向他学习求教，那你每一天所听到的都是尧舜禹汤这些古圣先王的大道。尧舜禹汤这

些有德之人的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不怨天不尤人，从来不指责、不挑剔、不推卸责任。他们的德行确实可以为后人所效仿。

“得良友而友之，则所见者忠信敬让之行也。”如果得到善良的朋友并与之交往，所见到的自然是忠诚信实、恭敬礼让的品行。在这种环境下熏陶，“身日进于仁义而不自知者，靡使然也”。即每一天进修仁义以求进步，却不知不觉，这是潜移默化的结果。也就是说如果人在一位好老师身边、在一位善友旁边观摩学习，就会不知不觉受到他们的德行、气氛的熏陶，自自然然地进步。

“今与不善人处，则所闻者欺诬诈伪也，所见者污慢淫邪贪利之行也。身且加于刑戮而不自知者，靡使然也。”如果现在所结交的都是不善之人，所听的全是欺骗、巧诈、虚伪的言行，所看到的都是邪污卑下、放荡邪曲、贪图利益的行为，就会使自己遭受刑罚的处罚还不知不觉，这也是潜移默化的结果。

人能选择好的环境，选择良师益友非常重要。正如荀子所说：“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蓬草本来是软绵、弯曲的，但是如果生长在笔直向上的麻中，不需要去扶持它，它也会自然地向上生长，而且长得笔直。古人说，“亲附善友，如雾露中行，虽不湿衣，时时有润”。与善良、贤德之人交往，与他们成为朋友，就像在雾水、露水中行走一样，虽然打湿不了你的衣服，但是时时受其德风的滋润，不知不觉就受到他的熏陶。所以一个人结交什么样的朋友，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在什么样的环境中生存，就受到什么样的影响。择友对于人的成败荣辱至关重要。

《吕氏春秋》中记载，楚国有一位擅长看相的人，他看过很多人的相，把每一个人都看得很准，说得没有误差。楚庄王就感觉到好奇，把他请过来问是怎么一回事。这个人回答说：“大王，我并不是能给人相面，我只不过是会观察这个人所结交的朋友而已。如果我看的这个人是一个布

衣之士，是一位平民百姓，他所结交的人在家都能孝敬父母、尊敬兄长，做事严谨厚道，畏惧国家的法令，他家一定会愈过愈好，身心一定会愈来愈安定，这就是吉人（吉祥的人）。如果我看的这个人，是一位事奉君主的臣子，他所结交的朋友个个都是诚实守信、有德行，喜欢做善事的人，这样的人，他事奉君主会一天比一天好，他的官职会一天比一天提升，这就是所谓的吉臣（吉祥的臣子）。如果我看的这个人是一位君主，他的朝廷里有很多贤人，左右事奉他的人都是忠诚之士，君主一有过失，这些群臣都敢于据理力争、犯颜直谏，这样的君主，他的国家会一天比一天地更安定，他的地位会一天比一天地更尊崇，天下百姓对他也会愈来愈心悦诚服，这就是所谓的吉主（吉祥的君主）。”最后他还强调说：“其实我并不是会给人看相，我不过是会观察这个人所结交的朋友而已。”楚庄王听了很受启发，于是他广泛地召集贤良之士，自己处理朝政日夜不懈，最后终于称霸天下。

这位相面之人只是观察一个人所结交的朋友，就能判断出他的前途命运。可见朋友对人的影响潜移默化，非常深远。所以择友要非常谨慎。

## 益者三友，损者三友

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

——《群书治要》卷九《论语》

这段话，孔子道出了交友的标准。孔子说：“有益的朋友有三种，有害的朋友也有三种。与正直无私的人交友，与宽恕的人交友，与见闻广博的人交友，交这三种朋友，对自己的德行都有益处。若与谄媚逢迎、伪善奉承、巧言善辩的人交友，就会损害德行。”

人在社会上，就必然要和人交往，不离朋友。在五伦之中，父子兄弟是天然而成的伦常，无法选择。夫妻是半天伦，虽然不是天然的，但是有了共同的子女之后，也就成了天伦。朋友虽然不是天伦，但是在五伦关系之中，也是重要的一部分。

人在社会中要交朋友，交朋友就会受到朋友的熏染和影响，所以这件事事关重大，必须有所选择。孔子为我们讲有益的朋友有三种。哪三种？“友直”，即交正直的朋友。就是这个人的心中没有弯弯绕绕，正直无私，不会害人，也害不了你。想要交到正直的朋友，首先自己必须正直，如果自己不是一个正直的人，正直的人也不会与自己相交往。

“友谅”，就是交宽恕的朋友。这样的朋友对一切事都能宽恕，不苛刻要求，不把别人的过恶记在心上。很多批注把“谅”解释为“信”，但是“信”字和前面的“直”字意思很接近，为什么接近？因为直者必信。所以此处的“谅”解释为“恕”字更合适。和宽恕的人交朋友，自己没有压力，心情也会很好、很自然。

“友多闻”，交博学多闻的朋友。多闻的人，能够通达，遇到事情能提起经典中的教诲，不会钻牛角尖。和博学多闻的人交朋友，还可以帮助自己解决迷惑。《礼记·学记》中说：“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就如同井底之蛙。如何避免孤陋寡闻？那就是要结交博学多闻的朋友。“博学”学的是什么？主要学的是圣贤之道，对儒释道的学问都通达，这样才能有能力辨别是非邪正，不会被蒙蔽、欺骗。

这是讲交正直无私的朋友、宽恕的朋友、博学多闻的朋友，对自己的德行有帮助。

下面是讲三种损友，“友便辟”，就是交善于逢迎的朋友，即很会说话，言语巧妙，绝不得罪人的朋友，这种人善于谄媚、顺承他人。在三国时期，诸葛亮有一个朋友叫司马德操。他对任何事都称好。他的妻子不以为然，骂他他也称好，人称他为好好先生。但是没有人说他的坏话，因为

司马德操的行为正直，这种人就不算便辟的朋友。便辟的朋友善于谄媚逢迎、恭谨周旋，说出来的话不愿意得罪人，就很可能失去正直。

“友善柔”，就是交善于伪善奉承、面柔的朋友，就是“巧言令色，鲜矣仁”，善柔就是令色。

“友便佞”，就是讲善于言辞、巧言善辩的朋友，这样的人可以无理都要辩三分，交这样的朋友会有损失。

在一起学习的朋友都是益友，大家可以在一起切磋琢磨，相观而善。但要清醒地知道，在社会上与其他人接触的时间更长。朋友在一起学习，一周可能是几个小时而已，但是大部分时间，都是与社会上的其他人交往。而且我们所学的，是否真正听进去了？我们听进去了，能否落实在自己的生活中？这些都是问题。中国人有句话说：“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成就绝对是自己让自己成就，别人帮不上太大的忙，别人所提供的只是缘分。如果自己不成器、不上进，即使是圣人来教，对你的帮助也不大。所以这里强调了交友的重要性，但是能不能成就，取决于自己求不求上进。

## 第六十三讲

爱日以学，及时以行



## 学致广才，宽忍致仁

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辨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

——《群书治要》卷一《周易》

“学以聚之，问以辨之”，君子勤奋学习以积累学问道德，有疑难则虚心请教，来明辨真谛。诸葛亮在《诫子书》中说：“非学无以广才。”明朝的大儒郑晓也曾教诫子弟说：“大志非才不就，大才非学不成。”远大的志向，没有伟大的人才就不能够成就；而伟大的人才，不通过学习也不能够成就。无论何种学问，都必须好学才能成就，所以古人说“学海无涯苦作舟”。既然这么苦，为什么还去学？“人不学，不知道”“人不学，不知义”，如果不学、不明理，结果就更苦了。现在的社会，无论是贫富贵贱都是身心不安，身心不安的原因在哪里？古人说“理得心安”，因为不明理，不知道事实真相，所以都是汲汲地妄求，即用不符合道义的方式，去获得不属于自己的利益，结果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还让自己身心疲惫，这皆因人不明理所致。

《中庸》形容好学是：“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有弗学”，“弗”当“不”字讲，就是平时

有不读书的时候。虽然有不学的时候，但是无论如何要勉励自己，一有空闲就要学习，学必须要学得成功，所以说“学之弗能弗措也”。“措”就当“置”字解释。“置”是放置，把一个东西放在那里不予理会，这叫置，也叫措。意思是，只要有空闲学习的时候，就要学。并不是说，学得差不多了，就该停止了。学就要学会、学能，没有学到能的时候，“弗措也”，就不能放下，一定要继续学习。

“有弗问”，有不问问题的时候。但只要有问的机会，如有师长、朋友、同学在旁边，有机会向他们提问，就一定要问。“问之弗知”，问的时候，问得理解得还不够，或者知道得还不够彻底，“弗措也”，也不要就此放下，还要继续再问。

“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不思的时候，“思”是研究。有不研究的时候，但是一有空闲，只要时间许可就要研究。研究到什么程度？“弗得弗措也”，就是心里有所得。如果“思”得不到要领，思得不够透彻，那就不能放下，一定要思出一个结论，思出一个所以然。

“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辨”是辨别。有不辨别的时候，但是一旦要辨别，就要辨别得非常透彻、彻底明了，没有到彻底明了的时候，也不要放下。

“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这一句话是讲实行。有不实行的时候，但是要实行就要实行得彻底，这就叫笃行。也就是说，要行就要行到十分，不要只行到八九分就停止了，没有到这个程度就不能放下、不能停止。下面讲，虽然人的能力、智慧、聪明不相等，但是只要肯学、好学都能成就，所以不要自暴自弃，像《弟子规》中说的“勿自暴，勿自弃，圣与贤，可驯致”。

“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别人的智慧高，他听一次就能明白，要是自己的智慧不如他，就要花上一百倍的功夫，自己也能办得到。“人十能知”，人家拿出十分的力量就能做到，自己拿上千倍的功

夫也能办得到，只要肯干，坚持不懈就能成功。

“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果”就是下定决心。下定决心这么做，即使愚钝，聪明智慧比不上人家，但如果自己用上千百倍的功夫，也能变得明智。“柔”，指能力不足，虽然能力比不上他人，他人的能力强，很快就做好了，但是我们下上千倍的功夫，能力也能变强，就看自己肯不肯学、肯不肯干。这是告诉我们要好学。

“宽以居之，仁以行之。”要用宽恕厚道的存心，待人接物；用仁慈博爱的精神，广行于天下。“宽”，是宽恕。“恕”，上面是一个“如”，下面是一个“心”，这个字让我们明白了什么叫恕。恕，就是做到如其心。如谁的心？如对方的存心。能站在对方的角度，换位思考，将心比心，就能做到宽恕。譬如，看到别人做错事，要生气、发火的时候，就要反躬自问，我自己是不是一个圣贤人？是不是一点错误都不会犯？如果自己还不是一个圣贤人，还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习气毛病，也就不能要求别人一点错误也不犯。当我犯错误的时候，希望别人以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自己？希望别人能考虑到自己的环境、生长条件、经历、苦衷，给自己一个改过的机会。那么当别人犯错误的时候，也要给他一个改过的机会，这就叫恕。

所以孔子的弟子来请教：“有没有一个字，可以终生奉行的？”孔子说：“有，这个字就是恕。”那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就是《弟子规》中所说的“将加人，先问己，己不欲，即速已”。在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都要扪心自问，希不希望别人以这样的态度、行为方式来对待我？如果不希望别人以这样的态度、行为方式来对我，那我就不能这样去对待别人，这就是恕。

## 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士欲宣其义，必先读其书。

《易》曰：“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群书治要》卷四十四《潜夫论》

“识”，记住；“畜”，培养。“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工匠要想把他的工作做到尽善尽美、日新又新，首先要使自己的工具精良。俗话说“磨刀不误砍柴工”，砍柴要砍得快、砍得好，首先要把刀磨好。这是借此比喻来彰显下一句的道理。

“士欲宣其义，必先读其书。”“士”，士人（读书人），想要宣扬阐发这些伦理道德等道义，首先必须要读圣贤书，所谓的“五伦十义”。其实整个四书五经，乃至《四库全书》，讲的就是五伦八德。要想阐述仁义礼智的道理，首先要读圣贤书。读圣贤经典，可以看到历史上圣贤的榜样，也可以看到古圣先贤所阐发的道理，就可以化解冲突、消弭战争，达到身心和谐、家庭和睦、国家和谐、天下太平，这是读书人的责任。

“《易》曰：‘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此处引用《周易》中的一句话说明，君子应该多多记取，并用心领悟前人的嘉言善行，来积累培养自己的德行。

汲取历史的经验智慧十分重要，《群书治要·孔子家语》中记载：“夫明镜者所以察形，往古者所以知今；人主不务袭迹于其所以安存，而忽怠于所以危亡，是犹未有以异于却步而欲求及前人也，岂非惑哉？”镜子是用来察照人的形体的，古代的历史经验是用来启发今人的。如果君主不重视因循前朝之所以安存的经验和轨迹，又忽视了前朝之所以危亡的教训，这就如同向后退步行走，却希望追上前人，不是很糊涂吗？

历史上凡是有成就的领导者，都能以古鉴今，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

古为今用。唐太宗树立了一个“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的榜样。他看了《群书治要》之后，认为经、史、子、集里所记载的典故、经验、教训，乃至治国的方法，他听都没有听说过，更没有见过。这部书能使他借鉴历史的经验，遇到事情知道应该如何去处理而不迷惑。

读《贞观政要》就可以看到，他的所作所为的确受到《群书治要》的影响。譬如，他经常引用公仪休拒鱼等历史故事，告诫臣子要戒除贪心，提醒“为主贪，必丧其国；为臣贪，必丧其身”。大臣们拿着自己的官位不珍惜，去贪污受贿、以权谋私，就如同拿着明珠去射鸟雀。明珠价值连城，但是他不珍惜，反而用它射麻雀，分不清孰轻孰重，得不偿失。他还用“君者，舟也；民者，水也”的比喻，来提醒自己并告诫太子。通过读《群书治要》，他知道了社会风俗教化的根本，也明白了治理国家应该从君主自身的修身开始入手。所以在短短的时间就达到了国泰民安、万国来朝的结果。

《群书治要》这一本书所汇集的古圣先贤的治国理念、方法、经验、教训，确实是经过上千年考验而累积下来的宝藏结晶，历久弥新。但是《群书治要》是大唐初年所编辑的治世宝典，总结的是上始五帝、下到晋代，也就是中国五千多年文明历史的前半段的治国理政经验。自隋朝以后，唐、宋、元、明、清也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的经验，同样需要总结成书。所以有必要把《四库全书》之中隋唐以后的治国理政的经验萃取出来，依照《群书治要》的内容、体例，再编纂一部《群书治要》续编。此续编和《群书治要》一起，就可以完整地呈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典籍的精华。这两部书，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就可以成为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培训的重要教材，号召全世界各国、各政党、各级领导者共同学习。

吸取古圣先贤的经验教训，对于治理国家极其重要，因为一个人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能看得更远。现在我们所面临的种种社会问题，其实古

人早已经历过了，而且已经找到了处理的方法，这些经验和教训如果能被吸取，就可少走弯路。

## 好学的标准

曾子曰：“君子攻其恶，求其过，强其所不能，去私欲，从事于义，可谓学矣。”

——《群书治要》卷三十五《曾子》

这段话是讲好学的标准。古人说“好学近乎智”，无论是求学还是求道，都需要好学、愿学、喜学，才能有所成就。大凡历史上有成就的人物，都不是老师逼出来的，都是“师父领进门，修行在各人”，能自主自愿地学习。因为他们能废寝忘食地用功，所以才能成就。曾子就是“好学近乎智”的榜样。这一段话，出自《曾子·修身》篇，教导我们什么是真正好学。

“君子攻其恶，求其过，强其所不能”，“攻其恶”，不是责备别人的过恶，而是责备自己的不良行为及过恶，尽力改正自己的缺点习气。“求其过”，也是求自己的过失，而不是去看别人的过失。“强其所不能”，尽力突破自己所不能做的，自己还有做得不够好的地方要加强，要勉励自己做得尽善尽美。“去私欲”，克服自己的私欲。“从事于义”，所作所为都要符合于义的标准，要做符合道义的事，这样做才称得上好学。

后面还讲到，学习要珍惜时日。“君子爱日以学，及时以行，难者弗辟，易者弗从，唯义所在。”“爱日以学”，要珍惜学习时间。“及时以行”，古人非常珍惜时间，废寝忘食，挑灯夜读，甚至头悬梁、锥刺股，这样发愤读书才能有所成就，此外，还要适时地把所学的付诸行动，落实在生活中。难做的不回避，容易做的也不盲从，只考虑它是不是符合道

义。“日旦就业，夕而自省思，以歿其身，亦可谓守业矣。”每天早晨就攻治学业，到晚上就自我反省检查，这样一直到老死，一辈子都坚持，才可谓坚守学业。这段话是曾子把自己的学习心得与我们分享。《论语》中讲“吾日三省吾身”，曾子每一天多次地反省自己，他自己确实是这样做的，否则也说不出这样好的教诲。

后面还有一段体现曾子好学的話：“君子既学之，患其不博也；既博之，患其不习也；既习之，患其无知也；既知之，患其不能行也；既能行之，贵其能让也。君子之学，致此五者而已矣。”君子学了之后，还担心自己所学的不够广博，担心并没有真正理解其中的意思，不明白如此做法的原因，不明白其中的道理。“既知之，患其不能行也”，已经理解了，又担心自己不能付诸行动。“行”和上面的“习”有一点区别。“患其不习也”，这个“习”是温习的意思，他的知识已经很广博了，又担心自己不能时时地温习。而这个“行”，就是在生活中去实行。既能在生活中去实行，又担心在行动上做不到谦让，所以说“贵其能让也”。把这五个方面做到了，才称得上是君子之学。

历史上稍有成就的皇帝，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尊重历史，熟读圣贤书，而且尊师重道。对于能讲解圣贤经典的老师，皇帝都以尊师之礼来接待。以史为鉴，所以才能缔造盛世。

现在同样提倡学习，但是学的不是圣贤经典，或者学圣贤经典的时间很少，这样就很难做到“近乎智”。学得愈多，甚至把头脑搞得愈混乱，也没能成就圣贤。现在有句话说：“读书志在赚钱”，和古圣先贤的教诲完全背离了。古代的读书人襟怀天下，心系苍生。例如，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顾炎武所说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些人开口就是天下。而反观现在的读书人，甚至高考状元写的作文，里边的内容不是别人对不起自己，就是别人做了哪些不合适的

事，满纸怨尤，怨天尤人。为什么古代读书人与现代读书人的差别如此之大？就是因为其所受的教育不同，所读的书不一样了。所以党校、行政学院等干部培训机构，应该教的一个最重要内容，就是圣贤经典，这样才能把人们的思想真正统一起来，不易产生自私自利的心。

《大学》中说：“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骄泰以失之。”圣贤学问这个大道，都必须以忠信、诚敬之心来学习，才能获得。如果自己很骄傲，瞧不起古人，认为古人都不如自己，看老师也有这样或者那样的缺点，这种骄傲之心一生起来，就学不到东西了。

曾子说：“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他每日反省自己，重点就在忠信。忠信是个人修学的要点，也是传授生徒的要点。所以《大学》中说“忠信以得之”，《论语》中又说“主忠信”，“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这些都是讲忠信的态度对于求学至关重要。为什么有人能学有所得，有人却一无所成，关键就是态度不同。曾子这一段话，重点强调学习的目的是“慎修己德”。修身是修养自己，要求自己，不是要求他人，让他人去修养。

《续小儿语》中讲：“德行立身之本”，“读圣贤书，字字体验，口耳之学，梦中吃饭。”如果只是读圣贤书，从耳朵里听进去，学了之后又从口里讲出来，而不能落实在日常生活行为之中，不能滋润身心，于人于己都毫无用处。这就是荀子、孔子所说的“小人之学”。荀子告诉我们，为学要强调“君子之学”。不图外在的名利，不是为了声名彰显而学习，而是为了成就自己的德行、智慧而学习，要将圣贤的教诲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进而正己化人。言行举止都能为世人做一个好榜样，才是“君子之学”“为己之学”。

## 贵尚学道，贱下独思

子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

——《群书治要》卷九《论语》

孔子说：“我曾经整天不吃饭，整夜不睡觉，去冥思苦想，但是没有收获，还不如读书求学的好。”《论语·为政》中记载，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孔子主张学与思并重。此处所说的“以思，无益”，是指只思而不学。

人有生而知之者、学而知之者、困而学之者。“生而知之者，上也”，但是这样的人比较少，其余的普通人都需要学，就连孔子都说，他自己是学而知之者，而非生而知之者。《论语·述而》中记载，孔子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所以孔子一生好学，认为自己和普通人的不同之处，就是自己比别人好学。他好学到什么程度？“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孔子一生好学。他学周公，经常梦见周公；他研究某一个道理，可以终日不食，晚上也睡不着觉。

这里的“不如学也”，就是“好古，敏以求之”的意思。“古”是指古书所记载的古圣先王的道理，孔子、颜回所学所好都是圣贤之道。所以孔子一生“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他说自己没有什么发明创作，所学习的都是古圣先贤的道理。现在也有很多人喜欢读书，也很好学，知识面很广博，但是所看之书未必都是圣贤书，未必都是经过历史的检验而沉淀下来的智慧。我们提倡读经典，学圣贤之道，因为这些都是大浪淘沙，为历史所一再证明的成果，所以不会走错路。

很多人说经典之中有糟粕。“经者，常也”，凡是称为“经”的书籍，所记载的都是恒常不变的道理，里边没有糟粕可言。有一位老教授说了一

句很幽默的话。有人问他：“经典之中有没有糟粕？”他说：“有。”“哪些是糟粕？”“看不懂的地方就是糟粕。”的确，现在人对圣贤经典的批判，很多时候都是因为体会不到圣贤人所体会的境界，就像圣人站在二十层楼，而一般人站在二层楼，还以二层楼境界去批判二十层的境界。这是因为一些人没有理解圣人的深义，还把古圣先贤的道理误解了，所以才认为有糟粕。

《贾子新书·修政语》记载：“汤曰：‘学圣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静思而独居，譬其若火。夫舍学圣之道，而静居独思，譬其若去日之明于庭，而就火之光于室也。然可以小见，而不可以大知。是故明君而君子，贵尚学道，而贱下独思也。’”

此处做了一个比喻：学古圣先王之道的人，可以把他比作是太阳；一个人静思独居的时候，可以把他比作像火光一样。如果舍弃了学习圣贤之道，而一个人冥思苦想，就像舍弃了外边太阳的光明，而去屋子里接近小的烛光。这个烛光可以让你有小小的见识，能够见到小的范围，但是开启不了你的大智慧。所以明智的君主，乃至圣贤、君子，都崇尚学习圣贤之道、崇尚读经典，而不是一个人独自冥思苦想。

这段话可以作为这一句很好的批注，提醒我们，要学就要多学经典，多学圣贤之道，这样才能学有所成，也能变化气质。

## 见贤思齐，亲师择友

见善，必以自存也；见不善，必以自省也。故非我而当者，吾师也；是我而当者，吾友也；谄谀我者，吾贼也。

——《群书治要》卷三十八《孙卿子》

“见善，必以自存也；见不善，必以自省也。”即孔子所说的“见贤

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见到贤德的人、善人善行，就要想到向他学习、向他看齐，让自身也具备这种善行；见到不贤德的人，或者做得不好的人，一定要反过头来反省自己，自己是不是有类似的问题，如果自己也有类似的问题，一定要加以改正。所以无论是见到贤德的人还是见到不贤德的人，见到善行还是见到恶行，都要提起正确的观念。怎样提起正确的观念？见到善行，要一丝不苟地自我对照，并且加以学习效法，而不是嫉妒他人；看到不善的行为，一定要戒慎恐惧地反省检点自己，并且拿来警惕借鉴，而不是嘲笑、批评、瞧不起他人。

“故非我而当者，吾师也。”批评指正我，又批评得很恰当的人，就是我的老师。所以那些真正有成就的君王，都重用能够批评指正自己的人。唐玄宗为什么能够创建开元盛世？因为在创造开元盛世时，他所重用的人是韩休、张九龄等这样的忠臣。韩休会随时指出他的问题，以至于他经常要保持很紧张的状态。他在玩乐的时候，都会问旁边的人，“韩休知不知道？”才问完，奏折就传来了，他又吓了一跳，很惶恐，为什么？又来讲他的不是了。有一次唐玄宗在照镜子的时候，好像瘦了很多，旁边的人就进谗言：“皇上，都是韩休让你瘦下来的，他这样做太过分了。”结果唐玄宗说：“有一个大臣叫萧嵩，他每次来跟我谈论国家大事的时候，都顺从我的意思说，还称赞皇帝英明。我每次见到他的时候就很高兴，但是他一离开，那天晚上我就睡不着，觉得他所说的话都是谄媚我的，不知是否符合实际情况，心里很不踏实。而每一次韩休来的时候，都是指正我的过失，让我每每感到很难过，但是他劝完我以后，我就知道问题在哪里。虽然我很难过，但是当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却睡得很踏实。”可见，唐玄宗是一个很明白的人。他还说：“我用韩休是为了这个国家，不是为了我这个身体不要瘦下来。瘦了我一个人，但是肥了天下的人，很值得。”

从这一段话就能体会到，唐玄宗能够创建开元盛世，关键在于他能够重用正直的大臣。如果没有重用这些能犯颜直谏的臣子，他自己有了错

误，自己都不能认识，更谈不上去改正了。结果后来“九龄已老韩休死，明朝不复谏疏来”，后来张九龄年老，韩休也已过世了，就没有劝谏的奏折再递上来了。后来见到了杨贵妃，玄宗就陷到情欲当中不能自拔，从此皇帝不早朝。最后导致一个能够创建“开元盛世”的皇帝遇到了“安史之乱”，险些酿成亡国的悲剧。

由此可见，领导者身边的人，对他的影响至关重要，可能决定了他一生的命运，甚至决定他的团体、国家的命运。所以唐太宗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我们就可以知道国家兴衰成败的规律。而从劝谏我们的人身上，我们就能看到自身的不足，能够不断地提升自己，所以“非我而当者，吾师也”。

“是我而当者，吾友也”，他肯定我，肯定得对，这是我的朋友。魏徵对于唐太宗而言，是亦师亦友。因为他不仅仅经常劝谏太宗的过失，也经常肯定太宗正确的言行。在《贞观政要》中记载：“贞观六年，太宗谓侍臣曰：‘看古之帝王，有兴有衰，犹朝之有暮，皆为蔽其耳目，不知时政得失。’”在贞观六年的时候，皇帝对待臣说：“你看古代的君主，有的兴盛，有的衰亡，就像有早晨也有晚上一样。这是什么原因？都是因为闭塞视听，不知道时政的得失所在。”“忠正者不言，邪谄者日进，既不见过，所以至于灭亡。”忠正的臣子不敢犯颜直谏，而邪曲不正的、谄媚巴结的人却被举进，以至于君王看不到自己的过失，所以才导致了灭亡。

“朕既在九重，不能尽见天下事，故布之卿等，以为朕之耳目。莫以天下无事，四海安宁，便不存意。”我处在宫廷之中，天下的事情不能完全地知晓，所以才任命大臣作为朕的耳目，不要认为天下无事、四海安宁，便不用心了。

“《书》云：‘可爱非君？可畏非民？’”《尚书》上说，可爱的不就是君主吗？可畏惧的不就是百姓吗？“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

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天子即一国之君，他有道的时候，人就把他推为君主；无道的时候，人们就会推翻他，弃而不用。这件事实在是令人畏惧。

魏徵听了之后怎么回答？魏徵对曰：“自古失国之主，皆为居安忘危，处理忘乱，所以不能长久。今陛下富有四海，内外清晏，能留心理道，常临深履薄，国家历数，自然灵长。臣又闻古语云：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陛下以为可畏，诚如圣旨。”魏徵回答说：“自古以来，丧失了国家的君主，都是因为居安忘危，处治忘乱。在安定的时候，就忘记了危亡的时候；处在盛世的时候，就忘了国家可能会败乱，所以才不能长久。现在陛下富有天下，内外清平，还能留心治理国家的道理，能够战战兢兢，像面临着深渊、踩着薄冰那样小心谨慎，国家自然会绵延久长。我又听古语说，君主像船一样，人民像水一样，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陛下认为这件事诚可以畏惧，应该小心谨慎，这确实像您所说的那样。”可见，魏徵对于唐太宗所说的正确言论，也会予以肯定，而且还要再进一步提醒他保持一种战兢惕厉的态度。所以他对于太宗而言，既是老师又是朋友。

“谄谀我者，吾贼也”，总是谄媚、巴结、顺承的，是贼害我的人。齐景公身边就有一个特别善于谄媚顺承、投其所好的谀臣梁丘据。有一天，齐景公看到梁丘据骑着马奔驰而去，就对晏子说：“梁丘据是与我意见相同的人，和我很和谐。”晏子说：“梁丘据只是和您保持意见相同的人，并不是与您和谐的人。”齐景公就问“同”与“和”的区别？晏子就用做菜来比喻，说：“做菜烹饪的时候，要放酸、甜、苦、辣几种不同的味道加以烹饪，菜煮出来味道就好吃，这叫作‘和’。而现在，您说什么好，梁丘据就跟着说什么好；您说什么不好，他也就说什么不好，这就是‘同’。和你保持意见相同的，就像做菜只放一种调料，就很单调了。‘同’与‘和’的区别就在这里。”所以真正与君主和谐的臣子，恰恰能够弥补君

主的不足，指正君主的过失，防止他一错再错。一味顺承、谄媚、巴结君主，就是放任他的错误，让他一错再错，错得离谱，甚至会导致亡国。

有一次，齐景公问晏子：“我的先君齐桓公，曾经率领兵车三百辆，九次会盟诸侯，一匡天下。而现在我的兵车有一千辆，可以赶上齐桓公的业绩，在他之后一统天下吗？”晏子回答说：“齐桓公之所以能率领兵车三百乘，九次会盟诸侯、一匡天下，那是因为他左有鲍叔牙、右有管仲的辅佐。而现在您左右全是倡优，谄媚邪恶的人在前，阿谀奉承的人在后，又怎么可能赶上齐桓公而成就霸业？”

可见，领导者成败的关键是任用贤臣、忠臣，而不在于兵车的多少、实力的雄厚与否。为什么任用忠臣这么重要？任用谀臣，会让君主扬扬自得，有过失也不知道；而任用忠臣，却可以随时指正君主的过失，改正君主的错误，这样才能把国家治理好。

《贞观政要》中说：“君为暗主，臣为谀臣。君暗臣谀，危亡不远。”君主很昏暗，不能够识别人才，臣子还一味地讨好他、巴结他，不能指正他的过失，他的危亡马上就要来到了。这是说明谀臣的危害。

## 第六十四讲

学贵有恒，积善成德



##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群书治要》卷三十四《老子》

这段话的意思是，两手合抱的粗壮大树，是由细小的幼苗长成的；九层高的楼台，是由泥土堆积筑成的；千里远的路程，是从迈开脚下的第一步开始的。

无论何种学问技艺，都要有日积月累的功夫。譬如，少林寺的功夫名闻天下，寺里的武僧可以飞檐走壁，这种功夫是怎样成就的？从一些电视剧可以受到启示。那些僧人去挑水时，都用脚尖来行走，扁担一旦挑到肩膀上，就不能放下，一直要挑到山上，倒入水缸里。而且在挑水的时候，脚上还绑着沉甸甸的沙袋。这样一天挑几次水，天天坚持，就能锻炼脚上的力量，日久天长，就能练就飞檐走壁的功夫。练气功、太极拳、八段锦的人，都有这个体会。练功夫是一个日积月累、潜移默化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经过长时间的练习，才能由量的积累达到质的飞越。

学习技能，都需要坚持，每一天都不中断，所谓“拳不离手，曲不离口”。打拳的人，不可以一天不打；唱歌的人，不可以一天不唱，每天都要练习。讲课的人，也不可以一天不讲，而且要到各个场合讲，这样才能熟能

生巧，遇到各种场合都能应对，不会怯场。对所讲的内容烂熟于心，自然能得心应手，该长讲的时候长讲，该短讲的时候短讲，谈笑风生，应对自如。到不同的场合，面对的观众不同。有时是给省部级的干部讲，有时还要到农村，为那些不太识字、没有文化的老太太、老爷爷讲，无论听众学位高低，是否受过教育，都要想办法让受众听懂，这样讲课，才能熟能生巧。

欧阳修所写的《卖油翁记》中，也讲了这样一个道理。“陈康肃公尧咨善射，当世无双，公亦以此自矜。”陈尧咨特别善于射箭，他射箭的功夫很好，在当时，没有人能比得上他，他也以此沾沾自喜。“尝射于家圃，有卖油翁释担而立，睨之，久而不去。”一次，陈康肃公在自家的场地练习射箭，有一个卖油的老翁把担子卸下来，站在那儿，斜着眼睛看他，看了很久也没有离去。“见其发矢十中八九，但微颌之。”看到他射出去十支箭中了八九支，他只是微微点头微笑。

“康肃问曰：‘汝亦知射乎？吾射不亦精乎？’”陈康肃公看了之后就问：“你也懂得射箭吗？难道我的箭法不够精湛吗？”“翁曰：‘无他，但手熟尔。’”卖油的老翁回答：“其实没有什么奥妙的，只不过是手熟罢了，熟能生巧而已。”听到他这样的回答，“康肃忿然曰：‘尔安敢轻吾射！’”他一看，卖油翁对自己这么精湛的射箭技术都不以为然，就有点不高兴，甚至生气地说：“你怎么敢轻视我的射技！”“翁曰：‘以我酌油知之。’”卖油的老翁说：“从我倒油的经验就懂得熟能生巧的道理了。”“乃取一葫芦置于地，以钱覆其口，徐以杓酌油沥之。”于是他就拿出一个葫芦放在地上，把一枚铜钱盖在葫芦口上，慢慢地将油勺舀油注入葫芦里。“自钱孔入，而钱不湿。”大家都知道铜钱上面的口非常小，但是他把油从钱孔注入，铜钱却没有湿。“因曰：‘我亦无他，唯手熟尔。’”于是他说：“我也没有什么别的奥妙，只不过是手熟罢了。”“康肃笑而遣之。”陈康肃公听了之后，笑着把他送走了。说明他说得很有道理。

无论高超的技术，还是圣人的学问，都是一个熟能生巧、日积月累

的过程，只要有恒心，都能达到高超的境地。譬如，专业的歌舞演员、钢琴家、体育冠军，为什么他们能够成为冠军？就是因为他们日积月累的努力，每一天坚持训练，最后熟能生巧，达到了高超的境地。如果做事没有恒心毅力，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无论做什么都难以成就。

李白“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的典故也印证了这个道理。著名诗人李白，小时候也很贪玩，读书不顺，没有学成就半途而废，在他弃学归家的路上遇到一位老妇人在磨铁杵。李白看了感到很奇怪，就上前去问：“老婆婆您磨铁杵做什么？”老婆婆说：“我要把它磨成绣花针。”李白听了非常感叹，他没有想到，能够把那么粗的铁杵磨成绣花针。他从中受到启发，回去之后，接着读书，最后官至“翰林供奉”，也一举成名，成为唐代著名诗人。

曾国藩也说：“养生与学力，皆从有恒做出。”“养生”是保养身体；“学力”是提升道德学问，都需要有恒心和毅力。如果没有恒心毅力，如锻炼身体，如果不能坚持每天很早起床锻炼，只是坚持不到三天，又恢复原状，身体就很难锻炼好。同样道理，做学问、读圣贤书，也需要日积月累的功夫，需要天天读。所以古人修行都有早课晚课，早晨起来读一遍，是提醒自己；晚上入睡之前再读一遍，是用经典来反省。这样天天不停止，才能把修身功夫提升起来。

##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

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河海。

——《群书治要》卷三十八《孙卿子》

“跬步”就是半步。古人行走，举足一次称为“跬”，举足两次，即左右各迈一次，才称为“步”。不积累半步前进，无法远行千里；不汇聚

滴水细流，无法成为浩瀚江海。由此可见，任何事情都是由小渐大累积而成，没有一步登天的道理。

“断织励学”的故事讲道：“战国乐羊子远寻师学”，“远寻师学”就是到很远处去拜师求学。“一年来归”，一年之后就回到家里。“妻问其故”，妻子问他，为什么只学了一年就回家了？羊子曰：“久出怀思，无他意也。”乐羊子回答说，出行在外太久了，心中想念家人，没有其他特殊的事。“妻乃引刀断机而言曰：‘此织始于蚕丝，成于机杼，一丝而累，以至于寸。’”他的妻子很有智慧。听了这样的回答，她拿起刀来就砍断了织机上的布，说道：这些丝织品最初都是从蚕丝中得来的，又是从织机上织成的，是一根丝一根丝地累积起来的，才达到一寸长。“累寸不已，遂成丈匹。”再一寸一寸地累积，才能成丈成匹。“今吾断斯机也，则损成功，废时日。”如果我现在割断了这些正在织着的织品，那就无法成功地织出布匹，也会荒废时光。“夫子积学，当日知其所亡，以就懿德。”夫子您求学，应该每一天都学到自己所不懂的东西，以此来成就自己美好的德行。“如中道归而废学，何异断斯机乎？”如果你半途而废，那跟切断的这些织品又有什么不同？妻子为了教育丈夫、启示丈夫，把辛辛苦苦织起来的丝织品都割断了。她的诚心打动了丈夫。乐羊被他妻子的话所感动。“羊子感悟妻言，复还终业，七年不返。”他回去重新修完了自己的学业，七年都没有回家。这都是得益于妻子智慧的举动。

从中可以看到，乐羊的妻子确实非常伟大、非常智慧。她对丈夫的爱不是男女情爱，每一天朝思暮想，而且必须缠绵悱恻，相依相伴，寸步不离，而是希望丈夫真正学有所成，成为一个对家庭、对国家有益的人，所以她宁愿在家等着丈夫归来。这种德行令丈夫非常感动，而且也激励乐羊更加勤奋好学，否则就愧对妻子的期望和她对家庭的辛苦付出。

《孟子·告子上》中说：“虽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虽然天下有非常容易生长的植物，但是如果“一日暴之，

十日寒之”，一日给它阳光，十日都冻着它，这样也不可能长出茂盛的植物。这些都是反复说明人要成就任何事业都要具有坚如磐石的意志，并且持之以恒，正如荀子所说：“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

##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群书治要》卷一《周易》

“或”，或许、也许，表示不肯定。恒卦的第三爻象征：不能永恒地保持美德，或许将蒙受羞辱；不能永恒地保持美德，必然丧失操行，无法立足、容身于社会。本句是从德行修养的角度解说持之以恒的重要性。正如毛泽东所说，“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sup>①</sup>。做好事修养德行，要能坚持、有恒心，否则，也将会蒙受羞辱，甚至无法立足容身于社会。

《孔子家语》中记载，子贡来向孔子请教：“夫子，我可不可以休息一下，今天不用孝顺？”孔子说：“孝顺是做人的根本，怎么可以停下来？不可以休息。”子贡很难得，听了老师的教诲就依教奉行，老师说不能休息，他就接受了。子贡又问：“对国君尽忠职守、负责尽职，可不可以休息一下？”孔子说：“不行，这件事情太重要了，它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安危，怎么可以休息？”子贡接着问：“种田可不可以休息一下？这段时间不需要种。”孔子又给他晓之以理，对他说：“不能休息。”子贡又问了：“夫子，那到底什么时候才可以休息？”孔子说：“你看看远方，有一个

---

<sup>①</sup> 毛泽东：《吴玉章寿辰祝词》，《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1页。

坟场，你到那个时候就可以好好休息了。”什么意思？“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人不到断气的一刻，进德修业就不可以停止。

人在刚开始闻听圣贤之道的时候，可能都是勇猛精进，决心也很大，勇猛地改过自新。但是学习一段时间之后就不像起初那样精进了。修道之人要能不忘初心，精进不懈，这对于修行的成就至关重要。同理，对于治国理政而言，领导者能慎终如始，也非常重要。

《贞观政要·论慎终》记载，贞观十六年，太宗问魏徵：“观近古帝王有传位十代者，有一代两代者，亦有身得身失者。”我看近代和古代的帝王，有传位十代的，也有只延续一代两代的，也有自己取得天下，又自己丢失天下的。“朕所以常怀忧惧，或恐抚养生民不得其所，或恐心生骄逸，喜怒过度。然不自知，卿可为朕言之，当以为楷则。”我经常感到忧虑恐惧，或者是因为害怕抚养百姓没有能做到各得其所，或者是因为怕自己心生骄逸，喜怒过度，而自己又不能够觉察，所以请你为我讲一讲其中的道理，我将把它当成准则。

唐太宗很谦虚好学，把魏徵当成老师，经常向他请教。“徵对曰：‘嗜欲喜怒之情，贤愚皆同。贤者能节之，不使过度，愚者纵之，多至失所。’”魏徵回答说：嗜欲喜怒的情感，人生而有之，无论是贤德的人还是愚钝的人都在所难免，但是贤德的人和愚钝的人区别在于，贤德的人能够节制情欲，有所控制，凡事都不过度，而愚者却恣意放纵，以致达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他又进一步鼓励唐太宗：“陛下圣德玄远，居安思危，伏愿陛下常能自制，以保克终之美，则万代永赖。”他对皇帝能提出这样好的问题，给予肯定。陛下圣德高远，能够居安思危，所以也衷心希望陛下能够抑制私欲，善始善终，成就完美的功业，造福千秋万代，青史留名。太宗皇帝之所以能够成就“贞观之治”，确实和魏徵等贤臣在旁边时时提醒密切相关。

古代为官，不从小熟读圣贤书，就很难被举荐或考中科举，很难出任为官。所以历史上许多的为官者，都是熟读圣贤书的人。但是每个朝代也都有贪官奸臣，这是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不恒其德，无所容也”。这些人不是没有读圣贤书，不是不明道理，是因为欲望太强，不能克除自己的欲望，没有做到孔子所说的“克己复礼”，所以最后就是“无所容也”，没有办法容身于社会。譬如，明朝的严嵩，学识很高，读了很多书，但是他却是大奸臣，草菅人命，心狠手辣，贪赃枉法。最后他被没收家产，削官还乡，无家可归，两年后病卒。他死的时候，寄食于墓舍，既无棺木下葬，也没有人去吊唁。

人最难战胜的是自己，最难战胜自己的欲望和习气。所谓的竞争，其实不是与别人争，而是和自己的烦恼习气做斗争。没有别人能够把你打败，真正能够打败你的是自己。所以能够战胜自己的人，才无所不胜。

那么需要战胜自己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财、色、名、利”这四个字。如果很贪财，一定要记住《大学》中的一句话：“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钱财是以不好的、不正当的方式获得的，那必将以不好的方式败散掉。“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德行是根本，财富、声名、地位，全都是枝叶花果。所以应该懂得厚德载物。要积累自己深厚的德行，做到根深叶茂。如果德行深厚，那么财富、名声、地位不需要去追求，也会自然而然地来到。

孟子去见梁惠王时，梁惠王开口就问：“老人家，您不远千里来到我们国家，将给我们国家带来什么利益？”开口就讲利。孟子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大王您为什么非得要讲利？只要讲仁义就可以了。为什么只要讲仁义就可以了？《论语》中记载，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今作‘拱’）之。”北辰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北极星，另一种说法是北极所对的天空的方位。“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它在那不动，但是众星都围绕着它。这句话告诉我们，要办好政治，自己首先必须是一个有

德的人，是一个众望所归的人。所谓“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只要讲仁义、讲道德，那么财利、名声不求也都自然而然地来了。以上是讲贪财。

“色”字头上一把刀，这一把刀绝对不是形容。因为这一把刀，会把你所所有的功名利禄削得平平的，让你一无所有。所以中国古人对这个字特别小心谨慎，可以说是不敢越雷池半步。《尚书》中说：“天道福善祸淫。”天道自然的规律，都是给善良的人带来福分，而给过分的人带来灾祸。“淫”，是指对一切事情的过分与放纵。当然好色过分，也会给自己招来灾祸。

除了贪财、好色，还有贪名。《了凡四训》中说：“名者，造物所忌。世之享盛名而实不副者，多有奇祸。”在世间享有很盛大的名声，可以说是妇孺皆知、家喻户晓的人，但是名不副实，古人称为“德不配位”，这样的人多有意想不到、突如其来的灾祸。

最后是贪利。利就是凡是有利于自己的环境和条件。古人提醒人们要“见利思义，见得思义”，看到有利益的时候，首先考虑它符不符合道义，如果不符合道义，那就是送给你都不敢要。这才是一个真正明理的人。

正是古人看到了财色名利这些欲望对人的诱惑，所以把欲比作深渊，提醒人们，面对财色名利的诱惑应该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当别人拿着金钱、美色来诱惑我们时，就好像自己站在悬崖面前。因为在悬崖面前一不小心，一只脚踏进了悬崖，再想后悔，再想翻过身来，那就不可能了。所以古人说：“立名于一世，失之仅顷刻。”我们从小学到初中、高中、大学，再走上工作岗位，这一路走来都是小心谨慎、克勤克俭、励精图治，过五关斩六将，克服了很多鲜为人知的困难，终于有了一个好的位置，可以发挥自己的才能，可以为人们服务，为国家奉献，让父母安心了。所有的这一切都来之不易，但是“失之仅顷刻”。在诱惑面前作出一次错误的选择，把持不住自己，就会前功尽弃。

所以修养德行也要有恒心，要能坚持，克服自己的欲望，改正自己的过失，勇猛精进、不疲不厌。

